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清閑與戒懼——晚明山人陳繼儒及其形象變遷

涂柏辰 撰

二〇〇八年六月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清閑與戒懼——晚明山人陳繼儒及其形象變遷

Chen Jiru——The Hermit in Late Ming Dynasty and His Figure



Change

涂柏辰

Po-Chan Tu

指導教授：徐 泓 教授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June 2008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ii
緒論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史回顧與徵引文獻探討	2
三、研究目的與章節安排	22
第一章 山人陳繼儒	27
第一節 晚明山人陳繼儒生平	27
第二節 陳繼儒謀生方式	31
一、詩文干謁—人際網絡之經營與謀名求利之階	32
二、筆耕、賣文—謀生主道	36
三、文學活動—藉結社增加社會聲望與人際經營之道	40
第三節 陳繼儒與山人評價關係	42
一、山人在政治上的角色認定與評價	44
二、山人在經濟上所處地位與評價	48
三、山人於社會上的評價	51
四、山人於明中葉後在文化上的地位與評價	54
第二章 清閑與戒懼——陳繼儒的狷者心態	61
第一節 清閑優雅下的陳繼儒生活品味	61
一、林下隱逸之風與文化生活的顯現	61
二、清談與清言小品	68
第二節 戒懼心態——陳繼儒冷眼時局與畏謠心態	72
一、八十年來履薄臨深——陳繼儒之懼	72

二、陳繼儒冷眼旁觀的謹慎	78
第三節 李贄、袁宏道與陳繼儒——狂者到狷者的調和	91
一、李贄的狂與真	92
二、李贄之死——袁宏道的狂者向狷者過渡	99
三、陳繼儒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心態	109
第三章 陳繼儒所處時代脈絡	119
第一節 名士陳繼儒與時代脈絡	119
一、陳繼儒的成名過程	119
二、陳繼儒成名所處時代脈絡	122
第二節 陳繼儒與中央地方的關係	132
一、雅尚高致，博學多聞——時人眼中的陳繼儒	132
二、陳繼儒關懷時事實例	137
第四章 陳繼儒形象變遷	161
第一節 山人陳繼儒的自述	161
一、〈空青先生墓誌銘〉——陳繼儒自撰墓誌銘及其自我認知	161
二、陳繼儒的自述與時代背景的關聯	165
第二節 從聖代逸民到雲間鶴——晚明至清中期四庫館臣眼中的陳繼儒形象演 變	171
一、晚明時人眼中的逸民陳繼儒	171
二、清初士人眼中學問有爭議但人品仍不錯的陳繼儒	179
三、乾隆時期大肆撻伐下學問淺陋人品低下的陳繼儒	187
第三節 不應醜詆陳繼儒——道光至民初配合時代轉變的陳繼儒形象	193
結論	211
附錄一、陳繼儒年表與明代大事表	217
徵引書目	225

誌謝

這篇不成熟的論文得以順利完成，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徐泓先生與口試委員王鴻泰先生與林麗月先生，在論文寫作上給予我許多建議，並在口試會場上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給我，使我對於自己的題目在寫作上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另外，特別感寫業師徐泓先生這三年來的提攜，在我對於明代懵懂無知的基礎下，漸漸引導我得以使論文粗具規模，感謝徐泓老師的教誨。而王鴻泰先生則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多次給予我許多實質上的建議以及提供論文寫作方向與我，給予我在論文寫作上許多啟發。此外，還有王德毅先生親切的提供許多有關陳繼儒相關資料給我參考，並且關懷我的論文進度，而衣若蘭先生則提供我許多關於論文內容的擴充意見與幫助，使我不成熟的作品得以順利完成。

其次，我也非常感謝研究室的諸位學長姐與學弟妹，在論文寫作的煩悶過程中，由於諸位的問候與關懷，使我得以靜心寫作論文。尤其是潘志群學長與翁健鐘學長以及張繼瑩學長的幫忙，在我論文構思與寫作當中，提供新觀點與新訊息供我參考，使我得以在論文寫作途中不忘補充新資料，並且使得論文得以日趨完善。也感謝王立本學長與查忻學長在我寫作煩悶時，助我解壓與伴我休閒，使我得以在舒適心境下寫作，尤其是施佩欣學妹更是研究室的開心果，使我在歡樂的心情下快樂書寫論文。而翁稷安學長則是提供我日常打工的好機會並且也時常給予問候，使我得以安心寫作。

此外，我也非常感謝班上同學林思好、鄭佩宜、邱俊明、黃士榮等的關懷，使我得以在同學之間的鞭策與聊天談心下順利趕出論文。俊明與士榮的輕鬆態度，使我在論文期限將近的壓迫下，得以稍獲抒解；而每次與思好聊天時，總是能使心情得以放鬆，讓一直運轉的腦袋與緊繃心情得以舒緩。另外，在我寫論文的前期時，心情鬱悶的時候，佩宜總是扮演著良好傾聽者的角色，也因佩宜的早畢業，亦鞭策

我加快自身論文的書寫，沒有因一時沒靈感而選擇逃避。同時，我也非常感謝明清私塾的諸位學友，在每兩週一次的讀書會中總使我獲益良多，使我習慣口考的氣氛與對時間的控制，尤其是富翔與英舜，在我寫論文時總是互相鼓勵與激勵對方；在我壓力累積過大時，也陪我去外面亂逛抒解煩悶心情。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父母與姊姊，因為你們的諒解與鼓勵，我才得以繼續下去。上大學以來，在台北度過八年求學階段，期間回家時間每次皆不長。當初憑自己興趣念歷史所時，親戚與朋友皆覺得沒前途，然而，父母卻容忍我的任性，容許我憑自身喜好選讀歷史所，在自己面臨未來前途感到迷茫時，父母又適時鼓勵我，使我在論文寫作的同時沒有太多心理負擔。姊姊則是盡最大努力幫我想以後出路，又時時鼓勵我，使我不會過於灰心。如今論文寫作完成之下，謹獻於我最愛與尊敬的父母與姊姊，多虧家人的支持，使我得以鞭策自己寫完論文。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以陳繼儒作為主要論述對象，先說明陳繼儒山人名士身份，復以陳繼儒清閑與戒懼者兩種心態，點出其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精神，以之和當時士人與山人作比較，見其與士人和山人的同異處。藉說明陳繼儒因以清閑優雅文化示人，表現其山居閑靜一面；與熱心關懷地方事務，對國家大勢亦有所建議，但卻時懷戒懼，以謹慎心態處世這兩方面，說明陳繼儒的人格特質。並以山人被後世學者認為是晚明社會亂象的同時，陳繼儒如何看待自身山人身份與如何劃清自身與當時社會橫行的山人之間的分際，從中說明陳繼儒與社會文化的連結。

以陳繼儒的交遊、謀生方式以及其成名過程，討論晚明當時的社會習尚，說明隨著名士風尚的興起，許多山人藉抨擊仿效自身自稱山人者為社會亂象，以此與自己劃清界限，故有所謂假山人出現。當中，隨著個人認知不同，時人對於山人的定義與抨擊亦有所差異。這除了個人喜惡之外，也與當時社會謗言流行有所關係，因此，陳繼儒對於當時士風與謗言抱持著戒懼心情，以得大名為憂，時懷履薄臨深心情，所以形成其清閑與戒懼這兩種心態同時並存的特性。同時亦因他這一特性，使得時人不以陳繼儒為當時山人之流。復因陳繼儒關懷時事之舉，使其獲得山中宰相的美名，屢受朝廷薦舉，對於地方事務有許多策議留世，在國家大勢上亦有精闢見解。從中，可從陳繼儒成名過程與對國家地方事務的見解來看晚明當時社會文化與政治背景，同時瞭解士人與地方的關係。

最後，復以陳繼儒從晚明至民初的形象變遷，說明隨著各個時代的側重方向不同，對於陳繼儒的看法亦隨之有所改變。當中以清初至乾隆時期對陳繼儒看法轉變最為關鍵。目前陳繼儒等同晚明無行山人的印象即為此時確立的，由於當時社會文化與統治者的因素，使得晚明流行的文藝社會與山林清雅文化，成為明亡原因，以山人為墮落無行者，並且以陳繼儒、趙宦光、周履靖等明代隱居山林者為矯言幽尚

學問人品皆不佳的山人。藉著陳繼儒形象變化，說明明末至清中期這段時間，晚明文化的轉變與學術思想與士人心態變化，以此表達陳繼儒與當時社會的關聯，由小以觀大。

關鍵詞：陳繼儒、清閑與戒懼、山人、干游、名士、晚明社會文化

Keywords: Chen Jiru, hermit, figure change, elegant culture in the mountains, Defamation, personality



緒論

一、研究動機

在明代文人文集與晚明山人文化的相關研究中，大抵多推崇山人文化的清閑、適意與幽雅等飄逸脫俗的意境。所見大體呈現太平盛世之輕鬆自在，有種脫離俗世紛擾過著神仙般生活的意味。生活呈現「如畫」、「如夢」之理想化生活情景。然而，在陳夢蓮所撰的《眉公府君年譜》中，裡面有段話令人印象深刻，即陳夢蓮追述陳繼儒晚年對他說：「啓予足，啓予手，八十年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百千秋鳶飛魚躍」。¹從中，我們看到明人的矛盾性格，一方面心懷戒懼，履薄臨深；另一方面又享受逍遙閑適的生活，抱持鳶飛魚躍的灑脫心態。以此為基礎，我發覺在描繪陳繼儒的處世待物態度上，多以「妙得老子陰符之學」為主，有小心謹慎特色。²

以清雅悠閒為旨的山人文化，在陳繼儒身上可謂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然其內心卻是時時懷著謹慎戒懼的心態，使人對陳繼儒所包含的矛盾內涵感到好奇。我打算藉著陳繼儒與山人文化的關係，看山人文化如何形成以及其當時社會風氣的關聯；復假借陳繼儒身為大名士大山人這一特點，探討山人這一群體的內涵為何；以及陳繼儒如何憑藉其詩文書畫與刊刻書籍，成為晚明最負盛名的大名士，並以其聲名崛起過程說明與當時社會文化的關聯。最後再以陳繼儒於後代的形象變化，藉說明陳繼儒形象的改變，來看晚明社會文化於後人的變遷。希冀由陳繼儒觀察晚明社會文化的種種現象與陳繼儒跟山人之間的關係。

陳繼儒(1558~1639)，字仲醇，號眉公，松江府華亭縣人，被明清兩代文人視為

¹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第53冊，頁488。

²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台北：世界書局，1985），丁集下，〈陳徵士繼儒〉，頁637。除此在計六奇《明季北略》、鄒漪《啟禎野乘》等記載，亦有相關字眼，多以陳繼儒處事謹慎、小心為主等字眼說之。

山人佼佼者。獨掌晚明清雅、閑適為主的山人文化多年，自少至老一直為時人所知曉、仿效。其依山隱居的生活，一直為時人所稱揚，甚且有所模仿。³他的穿著與生活行事也成為仿效對象，為當時流行風潮所在。身為時人注目的大山人、大名士，以及為後世學者視為晚明山人習氣、山人幽雅文化、閑適生活推動的佼佼者，陳繼儒在內心竟是如此謹懷戒懼、時時謹慎；對地方事務、國家要事充滿熱情，卻又不介入當中紛爭，抱持一種有所保留的態度。

晚明以追求清閑、優雅與如畫般的詩意生活大受歡迎的山人文化，在陳繼儒身上發揚光大；然而，其內心與處世態度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謹慎小心，令人覺得矛盾。我打算從「狷者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心態切入，討論陳繼儒此種性格與當時山人、士人之間的關係，以此為基點，說明陳繼儒清閑與戒懼的心態，使其成為晚明大山人名士。我想從對清閑生活的追求與內心謹慎的關係看陳繼儒此人，旁及其文化人格與當時山人的契合之處。亦從時人對陳繼儒之讚揚與批評看山人在社會與文化上所據地位。最後以明中晚期至清中期，對於陳繼儒形象的變遷，說明陳繼儒與當時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關係。

論文寫作方向則以藉陳繼儒的清閑與戒懼心態，說明狷者心態對晚明文人的影響。看出陳繼儒得享大名是否與其戒懼心態暗合當時士人心態有關，從這一觀點去看晚明社會的山人崇拜，討論陳繼儒的聲名形成與形象轉變以及其與當時環境的連結。

二、研究史回顧與徵引文獻探討

明代中晚期以降，社會上興起一股以清雅為尚，追求舒適生活與遠離塵世喧囂

³ 在此要注意的是，陳繼儒的山居生活其實並非完全的棄絕塵世入山自守，不是傳統意義上真正的隱士，其實是一種半隱居狀態，其足跡少入城市，並且又由於「交遊幾遍天下」，所以書信來往不絕。但卻又有與同時代山人不同的特點，諸如不入城、居住在山中、少主動干謁與品德較高尚等等，所以成為山人的典範代表（或稱理想仿效對象更恰當）。

環境的社會風氣。當中，士人以自身文化素養與文名才藝，力圖以山人、名士風範示人，這種現象，可稱為山人文化，也可稱作名士風尚，也有人稱之為文藝社會云云。當中陳繼儒正是代表性人物，以下從前人研究山人群體、山人文化與陳繼儒相關前人研究討論陳繼儒與山人如何被呈現，復以本文寫作所用原始史料，說明本文如何取舍與面臨的相關問題。

(一) 前人相關研究回顧

1、山人身份解析

由於山人在晚明並非一個固定團體，充其量只算是一個鬆散的群體，彼此沒有太大向心力與組織性，所以山人成員極為複雜、多樣，前輩學者有許多相關論著以討論山人的定義與界定範圍。首先，以日本學者鈴木正〈明代山人考〉對山人的定義最早，也最為後人所信服。其對於山人的定義主要區分成「冠帶山人」與「布衣山人」兩種類型，主要從山人名號的釋義、考察，加上以山人命名的文集，說明山人一詞在明代的意思。文中提到山人是先有用山人號做為標誌自身高調的「冠帶山人」，之後才有「布衣山人」的出現，文中認為「布衣山人」才是真正代表山人文化中的隱逸精神者。⁴文中的脈絡主要強調山人對晚明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因為當時學界似乎認為山人對晚明沒有影響），文中透過山人名號的使用、以山人命名文集、山人組成說明山人的定義，具有開創之功。

然而，鈴木正認為「布衣山人」才是真正代表山人文化中的隱逸精神者，這卻是有所誤解的，姑且不論鈴木正對「布衣山人」的定義為何，若認為「布衣山人」

⁴ 關於「冠帶山人」與「布衣山人」兩個名詞，前者主要代表有官名、屬於士大夫階級的山人（即屬於縉紳階級者），這類山人通常是把山人名號當成是一種雅號、一種對於自然嚮往、標榜自身的工具；「布衣山人」則是後於「冠帶山人」出現的，指的就是沒有功名的庶民、社會地位較低的士這些人。鈴木正認為這些人才是真正代表了山人的刻苦、隱逸精神。見鈴木正，〈明代山人考〉，《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大安株氏會社，1962）。

代表真正的山人隱逸精神，則與明代文人批評的假山人（也即布衣山人）有所矛盾。不過文中對於山人名號、源流、使用等方面的敘述，仍給予後輩學人極大啟發性。關於山人群體研究，除了鈴木正的首創外，以金文京用力最為深厚。

金文京對於山人群體的論述可謂詳盡，運用明人文集、筆記小說把山人群體加以擴大，認為山人除了指縉紳、生員、文人外，也指醫、卜、星象、命理、勘輿、倡優一類具有特殊才藝者。豐富山人群體的涵義，凸顯山人群體的多元化、複雜性。在其〈晚明山人俞安期的活動〉文內，更以俞安期為主線，條列其一生事蹟，以山人的主要活動為干謁、出版、悠遊士夫群體間，藉此看山人對晚明影響。⁵對於山人的定義比鈴木正更進一步，同時也注意到了晚明士人如何看待山人。

不過，金文京似乎傾向把山人的原始定義當成醫、卜、星象一類有專業技能工商技工者，認為山人的隱逸意思是明人所加，與早期士夫自稱山人名號有所牴牾。大體上，金文京對於山人群體的劃分、山人活動的研究與山人在明代的種種影響的說明可謂詳盡，對於初進此領域者可謂幫助很大。⁶再者，日本學者還有大木康、酒井忠夫等人研究明中後期後的善書、功過格、出版事業、俗文化等等，也都間接與山人文化有所關連，由於筆者不懂日文，故先表明有此研究，希冀有朝一日能進一步加以研究。⁷

⁵ 見2006年10月6~7日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的City Life in Jiangnan: From Late Imperial to Early Modern China會議，當中金文京所發表的〈晚明山人俞安期的活動〉一文。

⁶ 金文京的〈晚明山人之活動及其來源〉，《中國典籍與文化》，1997：1，頁37~42，以講述山人的主要活動來說明山人的主要構成者為擁有專門技藝的人。另外金文京在〈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知識人の性格——明代の山人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日)中國史學》，第7號，〈思想、文化史專號〉，1997，頁193~198，從近代知識份子的文化性格來溯源至晚明時期的山人活動，以為現在的喜好雅文化、悠閒過活、海派陸派之爭等問題，其實都與明代山人有關。文中對於山人的定義也有一番解釋，但大抵與其他學者差不多，只是更加強調山人作為專門技藝者的意涵罷了。

⁷ 大木康主要是以戲曲、話本、民間山歌等題材研究明代俗文化，當中若干有提及文人由於雅俗交流與出版事業發達，加以商人推動，使大批民間文人進入這一領域，大肆編寫相關民間讀物。同時也與文人日益俗化有所關連。同時，大木康在1991年發表的〈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研究〉也是開創明代研究出版事業的先驅。其從諸如書籍流通、資訊流布、文化流傳等方面來看晚明出版業。其所著《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都：研文出版，2004）則是其近期集大成之作。酒井忠夫則是主要以善書、功過格為主要材料說明明代士人與百姓正逐漸彼此融合，同時由功過格也能看出鄉紳教化百姓的意涵，說明明中期以後，士人藉著功過格、善書的流傳來宣揚教化精神與加強其與地方百姓的流通等等，兼及城隍廟的論述。從其研究中，可得知當時通俗讀物對於士人百姓的影響，以及儒

至於在台灣地區的學者，對於山人定義的辨析亦不乏其人，譬如陳萬益在《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一書中即有提及有關山人組成的份子。⁸不過關於山人群體分析卻大多被歸於所謂晚明文人當中，以致於並無突出說明。其說大抵不出鈴木正等人的觀點，認為山人階層的出現與當時文學轉向清新飄逸的小品文有關，把山人的研究依附於小品文學之中，雖然對於山人的組成份子定義與認定有所釐清，但是卻無法擺脫山人清新飄逸的面向，無法看到山人其他面向，以為山人只有清新飄逸這一面向。

而大陸學者，則以張德建對於山人的辨析最為清晰。張德建在《明代山人文學研究》中，分成兩部分探討山人，上編主要講述山人的形成與定義，主要以布衣山人為主，並且從明初到晚期分成三階段說明山人演變過程，除了說明山人與當時社會文化的關係，復藉山人與文學的關係，說明山人如何藉小品文的流行使自身成為晚明時尚；而下編則是藉小品文與山人所著詩歌類型，討論山人心態以及小品文與山人的關聯。書中對本文最大啟發在於其對山人的解釋與分期，把文學解析與山人心態結合在一起。只是在描述陳繼儒方面，雖有提及其戒懼一面，卻無更進一步的深入討論，且以為陳繼儒的隱乃是藉隱搏名，強調陳繼儒的山人行徑，沒有把陳繼儒的清閑與戒懼等同重視，而這也正是本文所努力的目標。

另外，其他相關學者像李斌、吳承學、張靜秋等等也都著力於山人群體的相關說明，⁹當中，陳寶良的〈晚明生員的棄巾之風及其山人化〉即述說科舉名額僧多粥少，使生員棄巾之風日盛，加以當時生員以干謁、書畫謀生，並以山人號自稱，說明生員由於謀生的轉型，使生員山人化盛行，提供本文關於山人經濟與生員山人化

釋道三教融合的相關資訊。如酒井忠夫的《增補中国善書の研究》（東京都：國書刊行會，2000）所云。關於此類資訊，由於筆者才力有限，姑且舉此二人說明之。

⁸ 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

⁹ 以上諸位前輩學者對於山人定義也大體與鈴木正、金文京所述說的山人群體劃分差不多，不過在細節上則比較傾向於是山人原意為山中之人（即隱士）之義。

的啓發。¹⁰

綜上所述，在山人群體的研究中，對於山人定義最大的困難即在於成員的複雜化、思想背景的駁雜與不統一、社會對其褒貶不一，最重要的還是真假山人論辯的出現，所以要給山人群體下一明確定義可說是這一領域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本文希冀能從前輩學者的成果中綜合所述並加以盡量參照新資料（諸如尺牘、筆記、戲曲等等）來使山人定義更為清晰。

2、山人文化相關研究

此部分是現今山人研究中最為熱門的領域，相關研究之多與詳盡可謂豐碩。並且由於山人文化為明代中後期的主流風氣，牽涉到社會、文化、思想、生活等多方面，台灣學界近年來研究晚明社會文化的前輩學者，如林麗月、巫仁恕、王鴻泰、王正華、蔡玫芬等，在不同領域中都有提及晚明社會文化的轉變。例如巫仁恕的〈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徑與新問題〉即為檢討明清消費文化的研究回顧，認為晚明流行的雅文化與古物市場的流行、清閑優雅的生活方式等等，可用文化消費來說明這種消費文化的產生，而此種藉由古物市場流通的文化消費為山人文化中以清閑優雅為尚所衍生的現象。¹¹

研究晚明社會文化佔有一席之地之王鴻泰則以注重文人流動與城市、青樓的關係，另闢蹊徑說明文人交遊網絡、名士風範形成，為山人研究提供一新角度。王鴻

¹⁰ 陳寶良〈晚明生員的棄中之風及其山人化〉，《史學集刊》，79（2000），頁34～39。另可參見劉曉東，〈「地位相悖」與「身份懸浮」——生存狀態視角下的明代士人社會地位芻議〉，《社會科學戰線》2003：02，頁97～102；與王春瑜，〈明代山人面面觀〉，《紫禁城》，2007：08，頁28～41；以及劉曉東，〈世俗人生：儒家經典生活的窘境與晚明士人社會角色的轉化〉，《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7：5（2001），頁121～126等文章。

¹¹ 巫仁恕，〈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徑與新問題〉，《新史學》，17：14（2006），頁217～254。亦請參見林麗月，〈晚明的消費與文化〉，《明清史研究》（漢城：明清史學會），20（2004），頁197～215；與林麗月，〈《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收於陳國棟、羅彤華主編，《經濟變動》（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05），頁244～259。

泰近年來注重文人人際脈絡的交會、形成，提出文藝社會論點，強化文人網絡的研究，如〈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以晚明社會因生員變多，士人謀生不易，且當時社會文士以詩文交游為常，士人在面臨科考屢次失利的壓力下，因經濟因素與政治社會及心態等影響，選擇以詩文結社悠遊於富商文盟之間，藉由人際關係的擴展，使自身得以安身立命，表現出當時文人以詩文作為人際網絡經營手段盛行的現象。當中，有提及山人乃是此種風尚的主要群體。¹²對於本文於描述山人以詩文與結社經營自身人際關係上有許多啟發；然而，關於山人詩文干謁的心態與真假山人之辨則無進一步討論，此亦為本文所想補充之處。

從物品流傳與書畫鑑賞等藝術史角度說明當時社會文化者，有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借討論陳洪綬此人，以其書畫所呈現的人物形象與氣韻，討論當時晚明社會風氣流行的復古風尚。以其人物肖像繪畫的寫實，說明當時以書畫為生的情形，以書畫餽贈說明當時文人交遊與文物消費市場現象。從中，可與山人文化相配合，文中優點即於此，給予本文一些啟發。¹³

上述這些研究成果都是卓然有成，都有或多或少提及山人文化，表示晚明社會文化的變動以及相關轉變，固然對於文化研究上提供多觸角、豐富研究題材，但是卻易流於過於強調文化本身而忽略了創造文化的山人主體，對於雅文化、文藝社會、消費文化、視覺文化著墨多且詳盡，但卻忽略人對文化、社會與大環境的相互影響，這也是我想加以改善之處。

¹² 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2005），頁1~54。亦請參見王鴻泰，〈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錯雜〉，《新史學》，17：4（2006），頁73~141。

¹³ 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0（2002），頁1~57。另可參見王正華，〈從陳洪綬的〈畫論〉看晚明浙江畫壇：兼論江南繪畫網絡與區域競爭〉，《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頁329~379；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與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等書，以物品的流通說明晚明流行的清賞文化與奢侈消費，以及古物市場的運作等等。

大陸學者們則與台灣學者有相同弊病。不可否認，前輩學者對於雅文化、江南社會文化的種種研究之透徹令筆者獲益匪淺，但總停留於閑雅生活描述、優雅文化的具體書寫、把雅文化與大環境相連結看文化現象等等，或有遺珠之憾，對於文人雅士生活、文化的書寫更是如此。近來部分學者開始探討文人心態與社會文化之間的聯繫，如趙軼峰〈山人與晚明社會〉一文，即提出山人在宋明末期皆有出現，但由於明末士人的末世想法與狂疏風氣，使士人以隱名相高，甚至公然炫耀自身的隱風。其以為山人群體盛行，正體現晚明士人的狂疏風氣，更以當時社會風氣與山人群體作一連結與說明，充分表達出山人在明晚期的重要性。¹⁴

然而，對於山人引發的晚明特殊現象，停留在敘述階段，並無就山人本身因所處角色與時人認同的矛盾性格，一方面因疏離感而漠視社會，注重個人享樂；另一方面又因本身與社會風尚及文化牽扯深厚，使山人內部亦有所分類作詳細解說。其對本文的重要貢獻在於點出山人為晚明特殊社會現象，與山人群體的邊緣性與疏離感。本文擬從此基礎上，利用陳繼儒作關於山人邊緣性格與矛盾性格的深入討論，以期從更深入的手段看明代山人對於自身角色扮演所引發的矛盾心態與對世事的看法。

而張德健的〈隱士、才子、名士、山人——明代山林之士的群體變遷及其文化意義〉一文中，以隱士、才子、名士及山人這四種群體說明明代從明初至明末的社會文化變遷。以為晚明山林文化的形成，除了山人名士群體大興外，復與山人本身對社會的疏離感有關係，以為明中期以降山林文化的興盛，除了有向下延伸趨勢外，亦有非正統性的原因於當中。¹⁵張德建藉著說明隱士、才子、山人、名士的關係，點出明中期以降的山林文化變遷，使筆者能從另一角度來看山人文化。然而，在山

¹⁴ 趙軼峰，〈山人與晚明社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1，頁8~16。

¹⁵ 張德建，〈隱士、才子、山人、名士——明代山林之士的群體變遷及其文化意義〉，收於羅宗強；陳洪主編，《明代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頁33~43。

人群體變遷中卻著墨不多，點出山人的邊緣性卻無進一步討論山人中的真假山人問題與山人的不同面向，此一部分正為筆者想補充之處。

而徐林〈明代中後期隱士與山人之文化透析〉中，則以明代中後期隱士與山人之間的區別，說明隱士山人本為一體，然而在明中後期以降卻因社會變遷與文化上的影響，使得山人多以詩文交遊為樂，而隱士亦外出與人相交，不復傳統躬耕閉戶的生活。文中提及隱士與山人的分別不在避居山中以及少與人交遊與否，而在經濟謀生上的區別，以當時社會隱士山人習與士人相交，說明明中期以降的社會交往與社會風氣。當中重要者有隱士山人皆與名士相交，且可成為時人注目的名士，並且提及晚明尚隱風氣，對於明中後期社會風俗能更進一步闡釋，為其優點所在。¹⁶然而當中對於山人與隱士之間的關係沒有進一步去討論其心態與時人對山人的評價，並且對於山人的敘述偏向於負面述說，忽略山人亦有熱心地方事務與關懷時事的另一面。總之，對於明末社會文化與山人文化的缺失，一言以蔽之，即為重於實體表象的說明，而忽略了時人心態及背後形成的精神背景。雖說研究明代文人精神心態、思想者大有人在，然而這兩者卻沒有一溝通連結的橋樑，殊為可惜，這即為筆者於文中所要努力之處。

至於國外學者，則可見 Craig Clunas 的名作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專門探究晚明流行文化，書中主要以文震亨的《長物志》為主要論述對象，述說晚明社會背景後，提出優雅文化的風行，有賴資訊流通與文化為大眾所重視，甚至這種對文化、精神的追求成為一種文化的消費，當這種對文化的消費逐漸流行後，復變成了消費文化風潮。本書以藝術史觀點評論《長物志》中許多物的運用與意境的營造，由物的流行與物被賦予文化上的意義成為文化消費，說明晚明特殊文化風氣的形成。消費文化這一觀念主要透過物的追求與物被賦予文化意義的過程，說明晚明流行文化的背景。大體上說，其對於山人這

¹⁶ 徐林，〈明代中後期隱士與山人之文化透析〉，《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4（2004），頁 137～141。

一群體沒有過於注重，不過對山人文化的內涵卻是提出一些啓發性的研究角度，可供筆者參考。¹⁷

卜正民的《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一書中以張濤《歙縣志》把明代分成冬、春、夏、秋四部分，以冬天的靜謐、春天的勃發、夏天的繁盛與秋天的由盛轉衰討論明代的商業興起與文化變遷。當中在夏秋兩部分即討論明代中期以後，在商業影響之下，社會文化逐漸朝向奢侈與古物流行方向邁進。卜正民在書中以探討明代商業對於社會文化有何影響為主軸，對於商業與社會發展和文化上的關聯做詳細比較，提供本文一個對於明代社會變遷與商業關係的圖景。¹⁸

綜上所論，有關山人文化研究部分，大體上，名家輩出，且相關研究非常成功與豐碩，對於明代社會文化皆有深刻與詳細介紹，當中觸及消費文化、文人文化、山林文化與雅俗文化交流等等，皆敘述清晰，博引資料。唯表面實體上的述說雖多，然而，有關士人、文人的內在心態、精神對於社會文化的關係說明不多，對於山人群體的邊緣性與特殊性以及心態方面亦沒有多做說明。並且連結兩方面的著作更是少見。從這一出發點，筆者希冀能為此一部分做一努力填補彼此之間鴻溝的工作。

3、陳繼儒相關研究

陳繼儒，晚明著名的大山人、大名士與大文豪，只要提到小品文與山人文化皆會想到陳繼儒。我們可武斷的說，晚明文化的代言者即為陳繼儒，一點都不為過。關於陳繼儒的相關研究，最早可以溯至 1930 年代本名錢德富的阿英〈明末的反山人文學〉一文對於山人與反山人群體的討論。文中以明末之時，士人多嚮往隱逸以避世，發展出似魏晉時期的清談與名士崇拜，阿英稱此種人為山人；而此時亦有不滿

¹⁷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¹⁸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繁體譯本請參見方駿、王秀麗、羅天佑等譯，《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山人此一行徑的，即為阿英文中的反山人群體。有趣的是，阿英認為山人與反山人兩者的習性並無差別，兩者皆以名士風流為尚，只是差別在手段的粗細罷了。阿英藉此以古諷今，譏刺 1930 年代當時的「新山人」不應拿陳繼儒作為擋箭牌來遮掩自身，替陳繼儒抱有不平。¹⁹承上，阿英其實藉描寫陳繼儒來以古諷今，譏諷當時新山人的逃避現實。

對陳繼儒的研究，以其小品文居多，在 1970、80 年代最盛，以陳萬益的《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中的〈論李卓吾與陳眉公〉為代表。文中視陳繼儒與李贄為晚明兩種小品文寫作風格的代表人物，以李贄與陳繼儒做比較，藉兩人對「異人」看法的不同與欣賞阮籍角度的不同，加上性格的差異，且兩人皆為晚明聲名大噪的人物，從以上幾點述說陳繼儒與李贄各代表晚明兩種生活方式與士人心態的代表典型。陳萬益對於陳繼儒的敘述，主要著重在陳繼儒年少即棄青襟與歸隱山林堅臥不出這兩方面；在陳繼儒的性格描述上，又點出陳繼儒謹慎戒懼的性格，也述說陳繼儒如何以一介布衣謀生江南，初步勾勒出陳繼儒逸民形象，提及陳繼儒用逸民形象行清閑外貌，同時又不脫離俗世，對於國家賦役制度與時事亦持關懷態度，以陳繼儒為「逸民」而非「隱士」。²⁰初步勾勒出陳繼儒的多樣性形象，替本文研究陳繼儒山人形象與清閑與戒懼的心態立下基礎。其不足之處則在於有些地方無深入探討，諸如陳繼儒與山人之間的關係、陳繼儒形象的轉換與其性格的關聯，以及陳繼儒於當時及後世的評價變遷等等，這也是筆者所要進一步深入講述之處。

而第一本專門研究陳繼儒的著作，則是 1984 年李鳳萍的《晚明山人陳眉公研究》。其除了延續文學史研究，以小品文為主的研究路徑外，亦為首次較為系統地考證陳繼儒的生平、交遊、著述、文學觀念等議題，開始注意明清時期，時人對於陳繼儒評價轉變的問題。復將陳繼儒視為山人進行研究，亦開啓後人以山人研究陳

¹⁹ 阿英，《阿英文集》（香港：三聯書店，1979），第一冊，〈明末反山人文學〉，頁 164～167。

²⁰ 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論李卓吾與陳眉公——晚明小品作家的兩種典型〉，頁 85～116。

繼儒之先聲。²¹然而，文中對於陳繼儒的描述可謂簡單，缺少深入探討，對於明清時期的社會文化背景的論說停留在敘事階段，有照本宣科之嫌。文中對於某些問題的討論，亦有商榷與論述的考量，如陳繼儒的山人定義與文中對於陳繼儒的描繪及山人看法；以及其採用的傳記式寫法，皆使得其文對於陳繼儒的描寫停留在資料的積累之上。但整體言之，《晚明山人陳眉公研究》為一篇比較全面研究陳繼儒的論著，不僅繼承了文學史研究一貫的內在研究路徑，而且開始注意時代背景等外在問題，值得重視。

另外，吳承學的《晚明小品研究》中亦有述及陳繼儒，其以陳繼儒為晚明最負盛名的山人名士，以為陳繼儒為人所重的部分在其清新小品與以山人之名隱居山林，以及屢為朝廷徵辟的堅臥不仕。文中點出了陳繼儒成名過程，以陳繼儒非傳統隱士，以隱名動天下。復以《安得長者言》、《巖栖幽事》、《讀書十六觀》等清言小品為例，說明陳繼儒表現其清閑一面，成為晚明文人的代表，以清中期《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對於陳繼儒的描述，認為其之所以聞名天下，乃是其生活態度深契當時文人理想，故時人以陳繼儒為其理想生活與性格的典範。最後以蔣士銓《臨川夢·隱奸》作為陳繼儒自身表述例子，以為此乃明清人眼中的陳繼儒形象，以為雖誇張卻距事實不遠。²²吳承學於文中雖對陳繼儒成名與其清閑優雅一面做出精密敘述，然而對於陳繼儒屢拒朝廷徵辟的心態與關心國家大事和地方事務上卻無敘述，單純以為陳繼儒為晚明山人清閑優雅代表，忽略陳繼儒的另一面，殊為可惜，此乃筆者要補充之處。

到了 80 年代以後，隨著大陸社會經濟的進一步改革開放，社會上興起了一股享樂風潮，愈來愈多學者對陳繼儒的關注，不再侷限於文學上頭，開始關注其清閑優雅的文化表現；復受新史學思潮影響，也關注陳繼儒清閑與戒懼雙面性格的議題，更有以陳繼儒看晚明江南社會文化變遷者。如張德建〈末世的名士風度——陳繼儒

²¹ 李鳳萍，《晚明山人陳眉公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²²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陳眉公小品〉，頁 92~107。

芻議》即以《陳眉公文集》與陳繼儒小品為例，述說陳繼儒以清閑飄逸態度，謹慎處世、交遊圓融並且冷眼旁觀世事的處世模式，為晚明士人提供一理想生活樣式，不同於李贄的激烈與狂簡與屠隆追求空虛怪異的苦悶。

文中以陳繼儒對國家地方無何建樹卻得享大名，跟他「妙得老子陰符之學」與當時晚明流行風尚有極大關聯。²³張文在陳繼儒清閑生活態度以及其與士人的共鳴上，述說詳細，頗得當中三昧；然而，在陳繼儒戒懼心態與其跟國家地方的關係上，以及陳繼儒於歷代的形象變遷，過於強調陳繼儒於蔣士銓《臨川夢·隱奸》的形象塑造，忽略陳繼儒對地方政治的瞭解及參與程度。因此，才有文末對陳繼儒「哲學上不如李贄，文學上不如袁宏道，才氣不如徐渭，繪畫不如董其昌，可偏得大名，享清福」評價出現。此為張文遺漏之處，亦為本文所想強調的重點。

而吳承學、李斌〈明清人眼中的陳眉公〉一文，則以陳繼儒在晚明至清中期於時人眼中的形象變遷，藉著明清人如何認知陳繼儒，說明陳繼儒山人身份與徵君身份的差別，配合晚明至清中期的社會文化變遷加以說明。以晚明人多稱陳繼儒為徵君而非山人，實與當時山人名聲在士人眼中極差有關。復述說陳繼儒在某些行為如以詩文干謁、以詩書畫聞名於世，強調山林優雅生活方式等符合山人行徑，被時人歸類為山人；然而，陳繼儒屢拒薦舉與「恥作山人遊客態」，以及豐富學養則又顯示其與一般山人的不同。故基於尊敬，明人皆稱陳繼儒為徵君，而不用有貶義的山人稱之，此種趨勢延續到清初，直到清中期蔣士銓《臨川夢》與四庫館臣對陳繼儒的評價才有所變化。文中以四庫館臣把陳繼儒視為晚明文化代表者，忽略其徵君稱號與濟世行徑，視陳繼儒為晚明山人文化代表，極力抨擊；而蔣士銓則以誇大陳繼儒成名過程與謀生行徑以醜化之，視其為晚明醜惡山人代表。²⁴

文章對於陳繼儒於明清人眼中的形象轉變述說清楚，立論清晰，對於本論文有

²³ 張德建，〈末世的名士風度——陳繼儒芻議〉，《中州學刊》，151（2006），頁224～227。

²⁴ 吳承學、李斌，〈明清人眼中的陳眉公〉，《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3：1（2003），頁1～7。

極大啓示。然而，在述說山人與陳繼儒之間的關聯，以及山人為何於晚明評價如此差的原因，卻無詳細說明，單純以陳繼儒非晚明惡名昭彰的山人之流帶過，忽略了晚明真假山人問題以及山人於晚明所引發的社會影響。同時，以為蔣士銓抨擊陳繼儒乃是美化湯顯祖，更是把問題簡單化，沒有從清初至清中期士人對於明亡反省的討論與明亡原因角度視之，殊為可惜。筆者於論文第四章即專門討論陳繼儒形象變遷所帶來的與社會文化的關聯，以補充吳文之不足。

而李斌〈晚明「山人」與晚明士風——以陳眉公為主線〉則偏重在說明山人與晚明士風有何關聯，以及晚明到清中期陳繼儒形象受山人一詞所影響的論述。李斌認為陳繼儒之所以被清中期士人所抨擊，是因為其山人身份；然而，陳繼儒又非晚明為時人所唾棄的山人，但其山人身份卻又無庸置疑。因此，李斌以為陳繼儒在晚明之所以聲名大噪與成為山人中的佼佼者，乃是因為其與一般山人的「不同」，如不任意干謁、經濟自主、品德高潔，熱心地方事務等等，再再與晚明社會所唾棄的逐利求名的山人不同。所以，晚明士人幾不稱陳繼儒為山人。然而，到了清中期，陳繼儒由於與山人之「同」，如依靠詩文等特殊技藝謀生、雖居山林卻交遊幾遍天下，以及召集困苦文人為其編輯刻書以出版牟利，以及對於地方事務有極大影響力等等，成為清中期士人認定的山人，受到士人批判，使陳繼儒成為晚明山人文化的替罪羔羊。李斌為陳繼儒抱屈，以為陳繼儒站在抨擊晚明山人社會亂象，於晚明士風實有貢獻，然而卻因其盛名所累，成為清中期批判晚明文化的代罪者，以此來看山人與晚明士風的關聯。²⁵

老實說，文章標題為山人與晚明士風，然而對於山人與晚明士風的說明卻不甚多，對於山人中的真假山人問題以及山人定義語焉不詳。然而，文中對於晚明社會所引發的山人批評論述上，資料運用豐富，對於山人於晚明社會的影響有所貢獻，

²⁵ 李斌，〈晚明「山人」與晚明士風——以陳眉公為主線〉，《學術月刊》，38：6（2006），頁142～147。另外，與本篇相似的，亦可參見吳承學、李斌，〈隱逸與濟世——陳眉公與晚明士風〉，《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春之卷，頁68～81。

提供本文觀看山人在晚明社會的基礎。對於陳繼儒的形象變化亦點出陳繼儒與山人之間的同異，以此為後世評價變化之因，可謂新穎。只是過於強調陳繼儒為山人中的佼佼者，以致在論述陳繼儒山人身份時過於比賦，忽略了山人群體的複雜性與時人對於山人不同方面的評價差別，對於陳繼儒與晚明士風的關係亦沒有耙梳清楚，只講述陳繼儒與山人的同異而沒去耙梳陳繼儒與同時代士人的異同，在講述晚明士風流變上有所缺漏。筆者在論文第二章即以此為基礎，以豐富李斌文中所談，力求說明陳繼儒與山人跟當時士人之間的同異，來看陳繼儒於晚明社會文化的影響。

張靜秋〈陳繼儒的文化性格及其成因〉以陳繼儒圓通處世態度、強烈憂患意識、嚴格道德自律與清醒的審慎態度四項特色，探討明中期以降的政治社會文化背景，以為陳繼儒受到當時商業發達與儒商相混影響，使謀生態度有所轉變；復因萬曆天啓年間政治混亂與征戰連連，使其抱持謹慎圓滑態度行事。以陳繼儒性格的養成與江南自古以來的文化背景有關，以陳繼儒清閑生活與盛大聲名以及憂患時事的意識皆與當時晚明江南社會產生的自由學術風氣、古物市場流通，以及士商界線模糊有密切關係，以此說明陳繼儒文化性格的獨特性。²⁶

此文把陳繼儒的戒懼特色分成四點討論，與當時社會文化配合討論，對於本文描繪陳繼儒戒懼方面有所助益。然而，在描繪陳繼儒與晚明社會文化的連結時，無深入說明，沒有就陳繼儒對當時社會文化的看法以及把當時士人與山人做比較，雖然明白看出陳繼儒審慎憂世的情懷；然而，對於陳繼儒性格的形成與當時文人化社會以及王學影響和政治關係沒有多做說明，對於陳繼儒為何持冷靜審慎視世的原因亦無詳加著墨，沒有從陳繼儒對於自身角色定義的角度來看陳繼儒如何看待自身山人名士身份。此一部分，本文將於第二章描寫陳繼儒戒懼性格部分與第三章描寫陳繼儒與晚明社會關係部分做補充。

²⁶ 張靜秋，〈陳繼儒的文化性格與成因〉，《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6：1（2000），頁91～94。

綜上，可見近年來對陳繼儒戒懼濟世一面描繪愈來愈多，亦有學者開始對陳繼儒山人身份做出解釋。可惜大多仍單純視山人為惡名，以晚明時人少稱陳繼儒為山人，說明陳繼儒非惡名昭彰的山人，區隔山人與陳繼儒。如趙楠於其碩士論文《陳繼儒——晚明士風的一項個案研究》中，以陳繼儒於 29 歲時放棄舉業隱居山林為開頭，以此作為陳繼儒聲名崛起要因，從中討論其放棄舉業之因與其個性。復於第二章討論陳繼儒在棄青襟隱逸山林後的謀生方法，說明陳繼儒以隱逸之姿，行教書為生與著書販售等中低層文人謀生方式，導出陳繼儒聲名崛起之因，從中說明陳繼儒與晚明所謂山人的同異之處，認為陳繼儒的謀生方式實與山人不同，以時人皆不以山人稱陳繼儒，認為陳繼儒山人稱呼出自清朝，且清中期時人稱山人陳繼儒乃以貶義為主，認為以山人稱陳繼儒是清人污名化結果。最後，第三章則強調陳繼儒的經世思想與他在地方國家所行，來看陳繼儒與松江地方社會的連結，說明其與晚明江南社會文化的關係。²⁷

趙楠一文中，對於陳繼儒棄科舉一事，從當時科舉制度、社會文化與士商關係，以及學術環境等各方面詳細說明之，對於本論文幫助極大。其文點出陳繼儒於晚明時人口中多以徵君稱之，而清中期士人則以山人目之這一現象，啟發本論文第四章，以陳繼儒於晚明至民初形象變化的述說，以陳繼儒形象的轉變說明其與時代變化的關係。然而，趙文以陳繼儒從無自稱山人且時人亦不以山人視之，加上陳繼儒所行與聲望皆與當時惡名昭彰的山人無關，斷言陳繼儒不是山人。此說有武斷之嫌，且陳夢蓮於《眉公府君年譜》中，記陳繼儒幼時曾私號半石山人，且晚明文人如沈德符亦有稱陳繼儒為山人之事，可見趙文的缺漏。同時，其以山人為朋比為奸、肆口奸謀與追求聲色為晚明現象代稱，只見時人抨擊山人之處，忽視抨擊者身份與同時代他者如何看待抨擊者，忽略了真假山人的問題，導致其以偏頗印象看待山人，影響其看陳繼儒其人的角度，因而其對於陳繼儒清閑與戒懼的雙面性與多樣性人格掌握不清，復於文後附錄所整理的四庫館臣對陳繼儒著作之抨擊亦有所誤判，殊為可

²⁷ 趙楠，《陳繼儒——晚明士風的一項個案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惜。此亦為本文所要加強之處。

近年，西方學者亦有相關論述陳繼儒之著作，如Jamie Greenbaum的*Chen Jiru (1558-1639) : The Background to Development and Subsequent Uses of Literary Personae*一書中，即以陳繼儒生平與隱逸生活為例，配合其謀生方式與刻書出版，說明陳繼儒聲名遠播之由。復以陳繼儒在晚明至現今時人眼中的變化，以陳繼儒的著作於當時的興衰，說明文人文化於各個時代的影響。以《小窗幽記》為主要討論對象，藉著說明一本本非陳繼儒著作的清言小品，如何成為陳繼儒最著名的代表作品且影響後人深遠，以此討論與陳繼儒同類型文人的謀生方式與評價，藉此說明晚明江南社會如何孕育陳繼儒此類文人，以及此類文人如何影響江南社會文化。²⁸

當中，關於清中期對陳繼儒的看法上，Jamie Greenbaum以為陳繼儒於清中期與晚清的評價，主要以私人抨擊與官方讚美兩方面為主要論述。在運用史料上，舉《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尋樂編》與《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建文史待》說明中央對於陳繼儒的評價為正面的，不顧《四庫全書總目題要》中眾多對於陳繼儒乃山人的抨擊，對於史料選擇有偏頗，使其在論述過程中有遺漏之處。復以「布衣」為不受官祿的精英，以為陳繼儒身屬士人精英一員，但布衣一詞實乃陳繼儒於棄青襟後，用以自表自身平民身份的一種稱為罷了。由於作者在陳繼儒的角色定位上有所問題，因而對於陳繼儒自身山人與隱士身份認同的心態沒有把握到，使得在論述陳繼儒山人問題上把山人認為是隱士的一種，又以陳繼儒不是晚明惡名昭彰的山人，與趙楠一文所述的陳繼儒非山人一樣，犯了偏頗弊病。不過，書中提出清中期與晚期士人對陳繼儒看法與承認清朝統治相關的看法，立論新奇，對本論文有所啟發。

在眾多關於陳繼儒研究書文中，仍有一些文章是筆者無法看到的，如徐麗莎的

²⁸ Jamie Greenbaum, *Chen Jiru (1558-1639) : The Background to Development and Subsequent Uses of Literary Personae* (Leiden ; Boston : Brill, 2007).

碩士論文《陳繼儒(1558~1639)及其繪畫思想》、²⁹李復滿《陳繼儒(1558~1639)《晚香堂小品》研究》、³⁰還有李斌《陳眉公研究》等等。³¹在此先羅列書目於文中，容後有能力再進行參閱。

最後，綜上所論，大致上可見今人對於陳繼儒的興趣逐漸轉移至其多樣化的面貌，不再以單樣面貌視陳繼儒，對於陳繼儒的山人、名士與隱士、才子身份轉換亦有濃厚興趣。從中，亦可見當今對於文人形象的描繪不侷限在單方面上，開始深入討論文人於不同場合有不同面向的出現，可見文人如何在晚明社會生存與其價值觀的變化。而此亦為陳繼儒研究之所以漸轉為關懷其清閑戒懼以及其與晚明社會文化關係之因。

(二) 文獻回顧與問題

本文主要藉研究陳繼儒討論明末至清中期的社會文化的變化，希望以小觀大。由於陳繼儒乃當時大名士，許多人皆與之有所往來，故引用陳繼儒史料主要以尺牘為主，以此入手，藉以觀看陳繼儒與當時社會文化的關係。又陳繼儒所編輯、著作之書極富，書商借其名偽刻之書亦頗多，且從其所著書內亦可見當時清雅文化流行軌跡，從中瞭解當時流行重心；因此，也會用陳繼儒的些許著作以資討論陳繼儒對當時流行風氣的影響。

首先，本文主要所用陳繼儒相關史料，絕大部分出於陳繼儒的《陳眉公先生全集 六十卷》，此為門下弟子吳震元與子陳夢蓮，根據陳繼儒遺留存稿集結所成。前有范景瀾與方岳貢的序，陳夢蓮於凡例中提及陳繼儒生前著作繁多，打算分甲乙丙丁四集刊刻陳繼儒著作，而《陳眉公先生全集》即為第一部份，只是限於明末鼎革

²⁹ 徐麗莎，《陳繼儒(1558~1639)及其繪畫思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1999）。

³⁰ 李復滿，《陳繼儒《晚香堂小品》研究》（香港：香港大學碩士論文，1996）。

³¹ 李斌，《陳眉公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03）。

之際，在刊刻第一部份後，之後三部分就沒有出版，亦無下落了。現存刊本，以崇禎 12 年華亭陳繼儒家藏刊本為主要版本，而台灣收有此集之處，總共有國家圖書館善本室、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以及故宮博物院這三處。集中六十卷內容主要分成書序、壽序、祭文、詩歌、人物傳記、題詞、與他人尺牘與策議文章這幾部分。

當中，以陳繼儒與他人交遊的書信尺牘，以及為他人所寫的書序題詞，還有表現陳繼儒經世觀點的策議類資料最能體現陳繼儒生平特色。尺牘可使我們知道陳繼儒與當時社會上發生的事情有所交集，可以看出陳繼儒與國家地方的關係。又可從尺牘中陳繼儒對於當時社會風氣的抨擊，看出晚明社會風尚與士風的變化，對於瞭解晚明社會風氣變遷，尤其是江南地區的社會風氣變遷幫助極大。而書序壽序部分，則可從陳繼儒替人寫的書序、壽序中看出當時文人的流行刊物為何，從中斷定當時社會風尚；與陳繼儒藉替有名文士與官員撰寫書序、壽序，使其聲名提升，對於其謀生需求亦有所幫助，看出晚明山人如何藉書序書寫的互相吹捧，與壽序祭文等墓誌銘體類的書寫，攫取金錢與聲名。而題詞一類文體，則可見當時晚明賞鑑風氣與文人雅尚的風氣，藉著題詞書畫以餽贈友朋，間或獲取名人題詞以提高書畫價值以賣人，對於晚明賞玩文化與古物市場的瞭解有所助益。

而最爲人所注意的，當爲陳繼儒的傳記碑刻與策議文體，不僅能從中看出陳繼儒對於明代大事的清醒認知與建議，其在地方賦役財政與水利建設亦多有提及，對於江南地方士紳社會的研究有極大幫助，對於釐清陳繼儒山人身份，以及其與地方官員士紳之間的關係有極大助益。可以知道陳繼儒在清閑外貌之下，其濟世熱情隱藏在冷靜審慎的態度當中，對於江南地方的關懷與地方財政賦役改革的貢獻可謂極大。在農田水利、兵役改革與賑濟救災，甚至城中建設都有陳繼儒的影子，而陳繼儒的策議內容就是挖掘這些議題的寶庫。由於陳繼儒自述一生從未過錢塘、揚子二江，爲土生土長的江南人，加上聲名之大無人可比，其所留《陳眉公全集》可謂珍

貴異常，藉著這些第一手資料，對於描述陳繼儒可更加充實，對於江南地方社會的研究可獲更進一步的精細，可知陳繼儒全集的重要性。

此外，還有使用陳繼儒的《陳眉公集 十七卷》（萬曆 43 年刊本，續修四庫全書本），當中所用資料主要以詩歌和尺牘為主，藉此描繪陳繼儒與當時社會文化的關聯，如藉與他人所通尺牘談論之事，說明當時社會風氣與發生大事等。裡面有些資料乃是《陳眉公全集》沒有蒐羅到的，尤其是在關於書畫題詞語受人餽贈的資料上，《陳眉公集》可謂對本文助益頗大。另外《白石樵真稿》（崇禎年間刊本，四庫禁毀書叢刊本）、《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崇禎年間刊本，日本內閣文庫本）以及陳繼儒其他相關著作如《妮古錄》、《安得長者言》、《巖栖幽事》、《筆記》等收錄於陳繼儒所編的《寶顏堂秘笈》中也是本文所用資料來源之一，這些資料裡頭有許多提及陳繼儒清閑優雅一面的相關敘述，可資本文參考。藉由上述資料看陳繼儒與當時清談、名士風度盛行以及市場流行復古風潮的關聯。

另外，本文復參看當時文人文集如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錢伯城箋校本）、李贄《李贄文集》，藉此與陳繼儒比較來看彼此心態差異。復以與陳繼儒相熟文人如董其昌《容臺集》（崇禎 3 年董庭刻本，四庫禁毀本）、王衡《王綏山先生集》（萬曆 45 年刊本）等述說陳繼儒與之交遊關係，如書序提寫、壽序的恭賀以及詩歌往來，皆能從中對陳繼儒的交遊得到些蛛絲馬跡。至於一些明清筆記小說與文集如《萬曆野獲編》、《菽園雜記》、《明季北略》、《王遵巖先生集》、《安雅堂文集》、《靜志居詩話》、《柳南隨筆 續筆》等等，則是用以補充陳繼儒於時人與後人眼中的形象以及時人對於晚明當時社會風氣的敘述。明人筆記小說有一特點，即非常喜歡記時事、對時事加以批評，同時對於社會變化也敏感的紀錄下來，當然筆記小說資料繁多，本文打算以人為單位蒐集資料，雖說不甚完備，然亦可集中討論本文主題。

另外，在敘述山人相關背景的資料運用上，由於山人流品複雜，且明代後期刻

書成風，幾乎人人有一文集，使得山人文集（主要種類為詩集）存世頗豐；復因晚明山人大多以詩詞干遊公卿，故詩詞評論類的書籍都會提到山人。³²當中，筆記小說也是一大重要資料，諸如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王世貞的《藝苑扈言》、朱彝尊的《靜志居詩話》、錢希言的〈戲暇〉等等。山人到了明中後期後，由於成品流雜、成員素質不一，所以出現真假山人現象。這種情形，往往許多批評最烈者被時人認為是真山人，藉此類資料說明山人群體的複雜與多元尤為恰當。³³

接著，由於本文主要是以陳繼儒為主軸，搭配同時代著名山人來觀察晚明社會文化與山人崇拜，因此對於山人定義要清楚，筆者打算藉陳繼儒的人際脈絡看晚明文人網絡，說明山人群體的流動，並藉尺牘、序文、墓誌銘等材料盡可能蒐羅資料，說明陳繼儒是否有哪些與山人相同處、哪些相異處，才會被時人認為是真山人。筆者自知才力不逮，說明不甚清楚，以後在進一步蒐羅資料會加以調整。我想強調的是，山人資料搜尋，原則上從山人文集、同時代筆記小說搜查山人條與文人尺牘（尤為山人尺牘）說明山人大概。打算以陳繼儒的文集與其好友文集、同時代著名山人（如宋登春、陳鶴、王穉登、張鳳翼、周履靖、趙宦光等）文集與傳狀來說明。³⁴

關於陳繼儒於時人評價的資料搜尋，筆者打算以明中後期至清初乾隆前，乾隆時期四庫館員這兩階段說明陳繼儒的評價問題。大致上說，陳繼儒的評價一直到清

³² 此部分可參見俞憲的《盛明百家詩》、朱彝尊《明詩綜》、《國朝詩評》、《明文衡》、《皇明二十四家詩選》等等，裡面都會或多或少提及山人詩，當中，影響最大、最為後世所重視的，首推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小傳》，此書乃集結《列朝詩集》前的小傳部分而成的，由於錢氏身處當時環境，加以又為明末清初人物、當時文宗，其《列朝詩集小傳》中對於人物品評、山人看法等等都能反映出山人當時在時人定義為何。對於後世定義山人群體可謂幫助豐厚。其他如文娛、小品類文集皆有提及山人，或為生平事蹟、或為褒貶之。

³³ 這類批評可見馮夢龍的《山歌》、張鳳翼的山人歌、錢希言的〈戲暇〉、俞安期對假山人的批評、薛岡〈辭友稱山人書〉、陳繼儒對山人的品評等，這些批評者或有以山人自居、有以山人號為恥、有的有山人行徑卻無山人號等等，不過其共同點在對假山人的猛烈批評，儘管他們自身或許不認為自己是山人，然而當世士人與後世士人仍將其視為山人一類。這種山人對山人的批評可以見到山人這一群體的多樣化。

³⁴ 由於陳繼儒聲名遠播，仿冒他作品者甚多，其中有其於當時即說明為偽作者、有後世考訂為偽作者、有別人集結其詩文稿出版者等等，不過不可因為其為偽作而不屑一顧，因為當中仍有些許資料可運用，目前主要以《陳眉公先生全集》作主要材料，旁及時人批評，力圖勾勒出大體面貌。

初雍正前都是好評居多，直到乾隆蔣士銓作《臨川夢》諷刺陳繼儒，四庫館員對山人習氣大肆批評，並以陳繼儒為山人習氣代表者，陳繼儒才開始惡評居多。這種評價轉變其實也是一個有趣的地方，關於這部分，打算以時人筆記、《臨川夢》、四庫提要、入清明人的筆記說明。

最後，由於明代山人具有複雜、多元特色，所以資料零散、駁雜、繁多，在資料尋找上勢必會有許多困難、甚且閱讀資料也會耗費太多時間，因此在資料篩選上可謂困難。同時在如何整合所讀資料也是一大難處，在這方面上，我打算以人為主去搜尋資料，加以運用。但是，若以人為主，則又會有另一困難處，即關於山人定義的明確與否，若山人定義不明，將會影響本文寫作，故這兩方面：即資料繁雜不好運用與山人定義問題是目前筆者所遇到的困難，希冀將來能獲得解決。

三、研究目的與章節安排

本文題目為〈清閑與戒懼——從陳繼儒見晚明江南社會文化與山人崇拜〉，其切入點在於藉觀察陳繼儒清閑優雅的生活情趣與謹慎戒懼的處事態度，察覺陳繼儒身上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心態，以此為基礎，觀察陳繼儒於明中晚期得享大名，成為名動天下的大名士、大山人，一直為時人與後人所關注。藉著對陳繼儒狷者心態與盛大聲名的討論，配合明中後期以降至清中期四庫館臣以陳繼儒為山人代表，大肆抨擊晚明腐敗的山人文化為結尾，討論此段時間的社會文化。當中主要以江南為主要地區，其涵蓋範圍與一般定義下的江南一樣，包含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後來由蘇州府劃出的太倉直隸州的八府一州範圍，也就是現在的江蘇浙江一帶，且由於陳繼儒自稱「生平足跡不過錢塘、揚子二江」，所以主要描述範圍就在這一地區之中。³⁵

³⁵ 關於江南範圍的定義，請參見錢杭；承載著，《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頁1。

明中期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發達，古典優雅文化的流傳為古物書畫市場打下良好基礎，使得文人依靠書畫買賣謀名求利成為可能；加上書籍刻印的方便，使得文人以著述為業，搶攻文化市場這一大餅，造成當時社會流行清雅悠閒的山人文化，使山人群體受到注意。³⁶並且此時政治混亂，士人無所適從，產生以仿效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的名士風範為主流的名士風潮。使得晚明山人成為一種特殊社會現象，並且使得整個社會出現單憑文名與清雅的生活品味，即可成為時人崇拜對象與靠其謀求聲名利祿的社會現象。³⁷

而本論文的章節安排為第一章主要藉著述說陳繼儒生平，旨在使讀者能大致瞭解陳繼儒的聲名與矛盾性格，藉此點出陳繼儒的特殊性。並以時人認為陳繼儒是大山人、大名士為引，延伸討論陳繼儒與山人之間的異同，主要分成山人構成、山人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評價這幾部分與陳繼儒做比較。點出山人現象為晚明一特殊社會現象，同時陳繼儒聲名的流播與後人對陳繼儒的評價，皆與山人崛起造成的社會現象有關，以此說明陳繼儒與山人之間的同異，得出陳繼儒表現的清閑與戒懼兩面性。³⁸同時，復從山人與陳繼儒的比較，討論晚明山人評價不佳，實與時人對山人認知有關，亦與山人自身於新舊價值觀轉變中，對自我的認同有關聯。

第二章以陳繼儒清閑與戒懼的雙面特殊性，說明陳繼儒與其他山人之異與同時代士人之同，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心態為主軸，舉李贄、袁宏道、陳繼儒三人為例，討論明中後期以降士人心態的變化與社會文化的影響。³⁹由李贄的狂者

³⁶ 關於古物市場的流行，可見當今消費文化的相關研究，如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以及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等著作。另外,關於出版文化方面,則請參見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Jamie Greenbaum, *Chen Jiru*與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等著作。

³⁷ 此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實當今已有許多學者從各種不同面向討論之,如林宜蓉,〈晚明文藝社會「山人崇拜」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39(1995),頁633~747;與王鴻泰,〈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錯雜〉,《新史學》,17:4(2006),頁73~141。以及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等著作。

³⁸ 可參見Jamie Greenbaum, *Chen Jiru*, 'introduction', 以陳繼儒聲名崛起說明當時晚明江南社會者。

³⁹ 可參見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與夏咸淳,《情與理的碰撞:明代士林心史》(保

心態到袁宏道的由狂入狷，最後以陳繼儒「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心態為結尾，說明陳繼儒此種冷靜平和的調適心態，實與當時士人在面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與明初不同的轉變時，思索自身價值地位所遇到的困境有關。以此說明陳繼儒的名動天下，不僅僅在於其書畫文名與刊刻書籍所形成的聲名遠播；亦與陳繼儒此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處世態度引發的清閑與戒懼生活面向，深契當時士人在尋求自身價值定位所遇困境有關。更進一步說明陳繼儒對晚明社會文化的滲透與影響，肯定陳繼儒與當時社會文化的關聯。

藉由第一章陳繼儒與山人關聯與第二章狷者心態與當時士人的關聯，肯定陳繼儒聲名與其對晚明社會文化的影響力之後。第三章著重在第一章點出的山人評價與時人對山人認知部分，藉時人對陳繼儒的評價，看他人眼中的陳繼儒是何模樣，以名士與徵君兩部分說明之。藉由他人描述陳繼儒聲名崛起記載，並與時人所謂山人行徑作比較，說明其所行實與時人詬病的山人行徑差不多，差別只在於陳繼儒清晰地瞭解自身山人身份，使自身干遊不過於氾濫罷了，而時人對於山人行徑抨擊的重心恰於此處，因而陳繼儒不被時人歸於山人之列。復以陳繼儒名傾朝野，除了與其文名與名士風度有關之外，亦與其熱心地方事務，關懷國家大事相關。以當時國家地方所發生事為實例，說明陳繼儒與國家地方的關係，以陳繼儒的策議和其與他人所通尺牘為主，來看陳繼儒所扮演的角色與時人認為的山人有何不同。

最後，第四章總結前三章所論，以陳繼儒自撰的〈空青先生墓誌銘〉，結合陳繼儒於晚明至清中葉的形象變遷，專門討論陳繼儒的聲名與評價問題，與晚明江南社會文化與清初風氣至清中期蔣士銓、四庫館臣對晚明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抨擊做一比較。並且下述至晚清民初知識份子對於陳繼儒的形象評價，以陳繼儒形象與評價變遷作為導覽，從中看出明末至民國初年這一段時間的社會、文化、政治、思想等變動。說明為何陳繼儒會從晚明的大名士、大山人、徵君隱者，變成清初朱彝尊眼

定：和北教育大學出版社，2001）等書，皆有提及明中期以後，王學對士人心態與當時政治環境對士人的影響。

中的名不副實之輩，再到清中期蔣士銓《臨川夢》的〈隱奸〉，與四庫館臣於《四庫總目題要》的晚明山人劣質文化的代表，再至晚清民初時期由於革新求變精神所致，陳繼儒於清中期形象再度獲得平反的一連串經過。從中看見陳繼儒於各時代人眼中所代表的含意，得出此時的陳繼儒已不是實質上的陳繼儒了，而是作為一種象徵意義的形象表述，作為晚明山人文化與文藝社會的結尾，與時人在以古觀今所舉例的表徵。





第一章 山人陳繼儒

第一節 晚明山人陳繼儒生平

陳繼儒，嘉靖 37 年（1558）至崇禎 12 年（1639）間人，松江華亭縣人，字仲醇，號眉公、麋公、眉道人、白石山樵等，幼時曾私號半石山人，為晚明著名文豪，在當世與後人眼中都是一位複雜的人。其身份有書畫家、鑑賞家、作家、書商、隱士山人與關懷民瘼的慈善家等，複雜成分比清代李漁更勝一籌，兩人在當時皆以生活美學家聞名。

陳繼儒一方面以山林隱逸、清閑優雅面貌示人，如萬曆 14 年（1586）29 歲科考二次失利即告呈郡府官員，謝去青襟，捨棄生員資格，以布衣自稱，隱居小崑山上，為明中後期入《明史·隱逸傳》記載兩人中的一個。其「隱居崑山之陽」，「足跡罕入城市」，表現出隱於山中、不輕易入城的面貌。¹其亦自述愛好古物，有云：「予寡嗜，顧性獨嗜法書名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瑗璧之屬，以為極樂國在此。」以自身喜愛古書畫及秦漢鼎彝玉璧為標榜，以為極樂國在埋首古物之中，表達好古一面。²在其清翫雅文化的專著《妮古錄》中，陳繼儒以為：「嗜古者，見古人書畫如見家譜，豈容更落他人手？見古人墟墓碑版，如見先壠間物，豈容更落樵採，不思呵護耶！」以古物喜好者要持細心呵護翫賞態度，對古物抱有敬重感，表達自己對好古者的看法。³

另外，若想對陳繼儒優雅風範有所瞭解，可見其好友董其昌所云：

¹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 298，頁 7631，〈隱逸傳〉。

² 陳繼儒，《妮古錄》序文，收於《寶顏堂秘笈》（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第 20 冊，頁 1a。

³ 陳繼儒，《妮古錄》，卷 3，頁 22a。

玄宰為余摹雲林一幅，題云：『陳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絕似嵇叔夜，求之近代，為懶瓚得其半耳。仲醇好瓚畫，以為在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韻人，了不可得。余為寫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駕。』⁴

董其昌以陳繼儒表現的氣息，如同嵇康那種不加修飾的自然氣息與悠閒懶散的風骨一般。⁵放眼近代，即便是元明最受文人敬重的倪瓚，也只得其半。陳繼儒之所以認為倪瓚的畫在同為元四大畫家的黃公望、王蒙之上，即因胸中有俗外清韻，看出倪畫中文人風骨的氣韻。董其昌以為陳繼儒心中有與其相應的清拔飄逸氣息，故才能深體倪瓚畫中韻味。最後，董其昌以嵇康和呂安兩人關係，對照其與陳繼儒的交情。董其昌對陳繼儒的描述，認為其與嵇康、倪瓚相同，皆為林下悠遊的高士，以此塑造其清雅飄逸形象。

然而，若以為陳繼儒是一個清閑自在、不食人間煙火的高潔隱士；其另一面卻涉世極深，與當時政治社會風俗息息相關。例如少時即因文才卓異引起首輔徐階的接引；諸生時，與董其昌同窗齊名；又被王錫爵招與其子王衡，同讀書支硎山下，與太原四王（王世貞、王世懋、王錫爵、王鼎爵）交好。當時文豪前輩如王世貞、陸樹聲亦雅重陳繼儒，使陳繼儒文名廣為人知。

政治上，陳繼儒捲入萬曆 35 年（1607）的王錫爵密揭案；亦有流言謗語稱他在王錫爵任首輔時與其同居京師官邸，操弄時政，作相門山人的勾當。當中最著名者，莫過於萬曆 36 年（1608）東南一帶大潦，松江受害嚴重，陳繼儒上書地方政府為人民請命，以開粥場賑濟等實際行動投入救災賑濟行列，運用官場人際關係與自身影響力救民撫難。另外，他對萬曆 29 年（1601）第一次蘇州民變，礦監、稅監之亂，與天啓 6 年（1626）的第二次蘇州民變等朝野大事均表示關懷。在此，陳繼儒

⁴ 陳繼儒，《妮古錄》，卷 4，頁 13a。當中，子久乃是元代四大畫家黃公望的字，山樵則是王蒙自號黃鶴山樵的簡稱。而呂安命駕一詞，乃以西晉呂安與嵇康善，每輒命人駕車前往相談的典故，說明董其昌以嵇康比繼儒，呂安比自身，說明兩人關係。

⁵ 劉義慶撰；徐震堦著，《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4），〈容止第十四〉，頁 335。

又顯現出其胸懷大志、關懷民瘼的經世儒者形象。與他給人的隱逸山居，過著清閑飄逸優雅生活，引導清雅山林文化，形成明中後期流行時尚的大名士、大山人形象有所差距。

然而，陳繼儒最為人津津樂道者，還是多次拒絕朝廷徵辟，對國事地方時事多有建白，被時人譽為山中宰相，有徵君美名之事。其聲名在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有云：

遠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詞章；近而酒樓茶館，悉懸其畫像。甚至窮鄉小邑，鬻糶市鹽豉者，胥被以眉公名，無得免焉。⁶

計六奇亦以「當啓、禎間，婦人豎子，無不知有眉公者。至飲食器皿，悉以眉公名，比于東坡學士矣。」說明其名聲之大。⁷即便如王穉登、張鳳翼、趙宦光等同時代的大山人、大名士，其聲望雖亦為眾人知曉，但說到聲勢之盛、名聲之好以及聲譽持續之久，依舊稍遜陳繼儒一籌。當中，王穉登的汲汲謀名於大學士袁煒，以相門山人自居，以及張鳳翼的狂異好色，更為人所詬病與譏嘲。

綜上所述，雖對陳繼儒複雜性格有一初步瞭解。若以為他是一個關心世事，富救世情懷的高潔隱士，生活品味高雅悠閒，舉止安詳，彷彿溫厚君子，則又忘了他另一個世俗面貌了。陳繼儒並非如我們傳統所認知的安貧樂道、耐寂安苦的山中隱士。陳繼儒在 29 歲放棄生員資格後，開館授徒為生，開始中低層知識份子舌耕筆耜的謀生手段，復以自身書畫天分，與董其昌齊名松江畫壇，在王錫爵、王世貞、包瑞溪等處館授為生，替他交遊知名文士立下基礎，使他聲名更盛。又以書商、著作家身份登場，「延招吳越間窮儒老宿隱約飢寒者，使之尋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所言僻事，薈叢成書，流傳遠邇」，藉著撰寫如《巖栖幽事》、《妮古錄》、《太平清話》、

⁶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台北：世界書局，1985），丁集下，〈陳徵士繼儒〉，頁 637。

⁷ 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陳繼儒卒〉，頁 265。

《安得長者言》等內容述及清閑優雅生活與清言小品的雅文化流行書物，與諸多經史古籍和小說的校訂，參與編纂科舉時藝等科舉參考書，使大家「爭購為枕中之秘，於是眉公之名，傾動寰宇」。⁸其謀生方式是利用文人網絡的交遊使自身文名提高，透過對藝術化生活的論述與佈置獲取名士美名，復以自身名氣獲取實質所需以養家活口，凸顯出當時中低層文人在科考失利後所開展的一條新謀生道路。

總之，陳繼儒展現的特色，為一種看似矛盾卻又十分和諧的調和性格。在清閑優雅的藝術化生活中，隱藏著戒慎謹懼的處世態度；看似沈迷於好古清幽的山林氛圍下，彷彿仙家飄逸般不問世俗，卻又時時關心政局，直言上書，以民瘼為懷；拋棄生員資格，放棄士子以仕宦干祿的謀生主途，以隱居山林為目標，卻又不依傳統躬耕弋釣的隱士生活模式，反以自身文名為恃，從地方官員、縉紳富家處尋求資助，以著述書畫館授為謀生手段。這種生活方式也為同時代人所擁有，陳繼儒與這些人都被時人稱為「山人」，且陳繼儒更被後人視為山人佼佼者。山人群體代表著一種明中後期的特殊社會現象。

山人，就字面上說，即為山中之人，在明代時人（尤為士大夫）認知中，山人代表的真正意涵乃山中隱士之稱。⁹明中後期以後，山人一詞漸被用來藉以哄抬自身文名與象徵山林隱逸精神的理想標榜，至明晚期則被用以張揚聲名以有利與人干游。靠詩文書畫等技藝謀生，尋求他人資助，藉山人隱士名聲來謀生，因為此類人

⁸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陳徵士繼儒〉，頁 637。關於陳繼儒的出版事業，見大木康的《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都：研文出版，2004）中第四章〈明末江南の出版人〉（頁 163~172）。

⁹ 關於山人一詞的定義，前人已做過許多論述，當中有以山人最早是士大夫作為雅號之用的，如鈴木正正的〈明代山人考〉。另如張德建《明代山人文學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一章〈明代山人群體的產生、構成與發展階段〉，頁 3~87 中，把歷來山人研究作一整理，並且按照時間順序把山人分成三階段。亦有就生員生計討論生員山人化、清客化的篇章，如陳寶良〈晚明生員的棄巾之風及其山人化〉，《史學集刊》79，2000：2，頁 34~39，即述說科舉名額僧多粥少，使生員棄巾之風日盛，加以當時生員以干謁、書畫謀生，並以山人號自稱，說明生員由於謀生的轉型，使生員山人化盛行，提供本文關於山人經濟與生員山人化的啟發。在此，本文傾向於把山人定義成，以陳繼儒為主，是一群與陳繼儒相似的中下層知識份子。因絕意仕進，放棄入仕為宦的謀生主途，轉之以詩文書畫技藝獵取名，以博名高，藉文名獲取富家與官員資助生活。而行此類行徑又冠以山人名號者，時人大抵皆稱之為山人，此為本文對山人的定義。

常自稱或他人稱之為山人，故以山人群體視之。¹⁰

近年來有把山人視為一邊緣群體，討論山人的邊緣性與疏離感，連結晚明相關社會現象，如趙軼峰〈山人與晚明社會〉。文中提出山人在宋明末期皆有出現，但由於明末士人的末世想法與狂疏風氣，使士人以隱名相高，甚至公然炫耀自身的隱風，使得明末士人皆稱山人以志隱，成為晚明特殊社會現象。趙文以為山人群體盛行，正體現晚明士人的狂疏風氣與尚隱習尚，以當時社會風氣與山人群體作一說明，充分表達山人在明晚期的重要性。¹¹

然而，趙文對於山人所引發的晚明特殊現象，停留在敘述階段，沒有就山人本身因所處角色與時人認同的矛盾性格，一方面因疏離感而漠視社會情形，只注重個人享樂；另一方面又因為本身與社會風尚與文化牽扯之深，使山人內部亦有所分類作詳細解說。趙文對本文重要貢獻在於點出山人為晚明特殊社會現象，與山人群體的邊緣性與疏離感。本文擬從此基礎上，利用陳繼儒深入討論關於山人邊緣性格與矛盾性格，從更深入手段看明代山人對於自身角色扮演所引發的矛盾心態與對世事的看法。

第二節 陳繼儒謀生方式

明中後期，隨著社會經濟日趨發達，士人謀生方式亦隨之改變。根據陳寶良〈晚

¹⁰ 如討論明代山人的定義、詩文干謁，藉此說明山人交遊與山人定義問題，例如金文京的〈晚明山人之活動及其來源〉，《中國典籍與文化》，1997：1，頁37~42，以講述山人的主要活動來說明山人的主要構成者為擁有專門技藝的人。另外金文京亦在〈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知識人の性格——明代の山人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日）中國史學》，第7號，〈思想、文化史專號〉，1997，頁193~198，從近代知識份子的文化性格來溯源至晚明時期的山人活動，以為現在的喜好雅文化、悠閒過活、海派陸派之爭等問題，其實都與明代山人有關。文中對於山人的定義也有一番解釋，但大抵與其他學者差不多，只是更加強調山人作為專門技藝者的意涵罷了。另外，如張德建的《明代山人文學研究》第二章〈山人的生存方式與文化品格〉，頁87~170中，就山人的謀生方式來說明山人文化性格的形成實與生然的生存方式相關，並且對其作一整理與說明。皆是對於山人交遊與山人這一群體的意涵有助益的重要參考文章。

¹¹ 趙軼峰，〈山人與晚明社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89，2001：1，頁8~16。

明生員的棄巾之風及其山人化〉的描述，可知當時生員因受不了官員迎送、生活困頓，加上無其餘謀生方式等因素，以棄青襟隱居山林，攫取高士美名，作為與人干游的資本，謀求聲名利祿。陳寶良以為山人由來多為布衣身份者，認為此乃山人本色。¹²對於山人成員分析、山人成為社會變化要點，有所陳述。然而，對於以布衣為山人主要成員與山人之所以成為明中晚期影響社會文化與政治的要點沒有深入討論。以下本節打算就陳繼儒謀生方式與山人暗合之處，以陳繼儒為例看山人部分謀生方式與明中後期社會變化之關係。

一、詩文干謁—人際網絡之經營與謀名求利之階：

明代中後期，自吳擴開始出現「挾詩卷、攜干牘，遨遊縉紳，如晚宋所謂山人者」的干遊特色，憑自身書畫詩文才能，四出交遊文人謀求所需。復因謀生不易，以四處館授為生，多有「暮齒遠涉，裹糧糲，躡嶺嶠風沙中，日行百里，如壯夫」的遠遊經歷。¹³

若把干謁視為山人經營交遊之道，以干謁為手段，透過名公巨卿提攜，在文壇上嶄露頭角以求獲名，用此角度討論明代山人如何藉干謁行其「遊道」，拿捏得宜者可使自身在文藝網絡上立於較佳地位。如王穉登所謂：「謁之道有二，上者流名譽，下者要貨賂。」¹⁴與陳繼儒的「恥作山人遊客態，嘗云：『王公布衣之交僅存一線于天壤，寧使其訝其不來，勿使厭其不去』」，¹⁵皆在說明「遊道」的拿捏。本段打算以山人遊道配合時代背景，討論山人在遊道拿捏上如何為社會認定。

陳繼儒一開始主要謀生來源，為四處館授。在《眉公府君年譜》中有云：

¹² 陳寶良〈晚明生員的棄巾之風及其山人化〉，《史學集刊》79，2000：2，頁34~39。

¹³ 上兩則見錢謙益著，《列朝詩集小傳》上冊，丁集上，〈吳山人擴〉，頁453~454。

¹⁴ 王穉登撰，《屠先生評釋謀野集 四卷》（美國：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攝製，2004），卷一元集，〈答大鴻臚張公〉，頁3b。

¹⁵ 見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495~496。

二十二歲，是年，館于范長白（范允臨）家，凡得糲，悉進大父母以贍菽水。

16

二十六歲，館于婁江王文肅（王錫爵）家，與辰玉太史（王衡）讀書支硎山，多倡和，得受知于琅琊太原四先生。¹⁷

三十歲，嗜長生之術。設館委巷，一時負笈者皆知名士。¹⁸

三十八歲，嘉禾包學憲瑞溪公，延廸鴻達、鶴齡二孫。¹⁹

以上四則依照年歲不同，可見陳繼儒早期以四處館授為主要收入。經由館授各地與王世貞、王錫爵等文盟政要交往後，以及董其昌、王衡等人相捧，使他文名遠播，加以陳繼儒在科考二次失利後，以 29 歲年少之際，毅然放棄仕途，隱居小崑山中，更是使其得享大名。陳繼儒在遊道拿捏上因名氣遠播，處於主動地位，與其他山人不同。

明中後期，由於經濟發達、交通便利加上士人熱衷結社擴充聲名，²⁰官員亦喜與山人衲子結交，除存有欲效法蘭亭修楔之風雅，亦有「(山人)借士大夫為利，士大夫也藉以為名」之功利意識存在。²¹此種交遊風氣影響到山人遊道形式，如李贄

¹⁶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 412。

¹⁷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 413~414。

¹⁸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 416。

¹⁹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 421。

²⁰ 明中葉後山人常常藉著仗義救友的形象出現，如謝榛在盧柟被陷下獄時，於公卿間大呼「生有一盧柟，視其死而不救，乃從千古惘惘，哀沅而弔湘乎？」（錢謙益著，《列朝詩集小傳》上冊，丁集上，〈盧太學柟〉，頁 426）；沈明臣在胡宗憲死後門客星散，千里往弔；王穉登於袁煒死後千里赴喪，還有王世貞子有難，王穉登鼎力相救等事蹟，可見其好友習氣。然事有兩面，其未嘗不是藉此豎立良好形象以求自身聲名，如王穉登往袁煒家赴喪時所做之《客越志》，即大量記載名士、名衲二十多人。

²¹ 永瑤、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臺灣商務，1965）第 6 冊，萬有書庫本，卷 180，集部 33，別集類存目七，〈牒草〉，頁 3971。

〈又與焦弱候〉內，即舉黃生故事說明黃生從林汝寧遊，至麻城向李贄匡騙與高官同遊嵩少，欲與李贄談道，無奈高官器重，當擇日再來云云，藉此抬高自身身價，李贄以「名同山人，心同商賈」批評之，十分透徹表現出山人出遊的功利性。²²薛岡〈辭友人稱山人書〉亦提及山人「一聞好客，百計求交，耿耿貴人以為奇貨，甫擅交歡，反謗介紹」、「偶然邂逅，退即造門，懷刺遍投，唯日不足，執禮孰恭從閤人始」與「年無老幼，刺總晚生，交無深淺，皆稱知己，沾沾向人，誇其道廣」把山人出遊遊道的汨濫與干謁嘴臉描寫十分透徹。²³

這種現象，使一些名山人與社會大眾採取批評態度。如陳繼儒在〈題吳鳳麓傳後〉提及今之客的惡處，有云：

一旦幸其得志，輒倚為外府，投謁不厭遠，乞覓不厭數，劫制不厭橫。甚則市權販勢，置人雲霧中，此尚復有髮許交道乎？……凡好客者，昔以憐才，今僮父稱客矣；昔以敦故，今不識面、不傾蓋稱客矣；昔以急窮交，今冠劍車騎貴人稱客矣。²⁴

說明干游汨濫的弊病，如干謁者的狐假虎威、不厭其煩的四處投謁，以及反客為主的驕橫等等。復感嘆當今粗鄙無文的僮父、無關係者都能稱為客，表明當時遊道的汨濫，感嘆今人忘卻重道義的精神。陳繼儒對於以詩文干遊者亦持「邇來文章之公器，變為情面之私交，心竊駭之」看法，認為詩文本是抒發個人情感，不屬用於人情功利交往，認為將詩文用於私交干求，令人驚訝與難過。²⁵又以「邇來大雅道喪，游名大人者如飛鳥投兔，面目可憐」說明陳繼儒雖然可憐干遊士人，認同其作為旨

²² 上述事蹟請見李贄撰，張建業主編，劉幼生副主編，《焚書》，《李贄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卷2，〈又與焦弱候〉，頁45。

²³ 薛岡，《天爵堂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陸輯第25冊，卷18，〈辭友人稱山人書〉，頁657~658。

²⁴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影本），卷51，〈題吳鳳麓傳後〉，頁38a~38b。

²⁵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8，〈答劉乾所〉，頁9a。

在謀生，但是看到遊道因而氾濫，仍感嘆大雅道喪，詩文完全被用來逐利謀名，喪失怡情養性的性能，心中不無感慨，知曉其對於當時遊道氾濫的看法。²⁶

明中後期對此種行徑，多投以寬容態度。一方面，士人知道謀生不易，把治國謀生作等價觀；另一方面，士人、富商假山人清逸形象襯托自身愛賢、風雅名聲，以謀求自身於社會上的美譽。干謁之道亦即交遊之道（即所謂「遊道」），已經較不受歧視。加上山人在詩文干謁上，若本身文名高、才華夠，加上不顯要貨賂的功利心態，做到以清新飄逸形象交遊，立於不求人之地，才能無往不利成為人人敬重的名士，雖有干謁之實而無干謁之譏。如同陳繼儒於〈答畢白陽〉所說：

往承台臺垂念山澤故人，遠寄奏議水俸，即欲修謝以展感激之誠，會中外告密，雖有魚鴈不敢逗入網中。²⁷

文中以感謝畢自嚴（畢白陽）顧及友情，寄了部分俸祿給自己，因為當時政局動盪，沒有馬上回信表達感激之情。顯示自身接受畢自嚴的金錢資助，卻不顯露金額與卑下之意，回信給畢自嚴時，以好友口吻點到為止，且關心時事，沒在上頭多加著墨。

在遊道的世俗化、氾濫化後，逐漸衍生出對山人行徑譏彈風氣。在瞭解干謁定義一開始為士子間互通名謁，屬於交遊的一種後，山人在干求聲名利祿時，必須考慮對方身份地位、喜好，與自身文名高低、遊道拿捏，做到上下相需才能無往不利。如陳繼儒在〈與馮文所〉中云：

不肖妄庸居人間，蓋在梁之驚耳。而門下採此溝斷，將無敬其枯木槁株，抑亦所謂仲尼謬雞黍之客耶？居恒自笑某之忝於公卿大夫，譬之秋山紅葉一點

²⁶ 陳繼儒，《陳眉公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80冊，卷12，〈送蕭兵憲〉，頁175。

²⁷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6，〈答畢白陽〉，頁4b。

畫圖，而好事如門下者，復拾之以裝山冠田衣，亦可笑也。²⁸

藉自謙之詞，說明如何使遊道掌握恰到好處。陳繼儒清楚明白自身山人角色，如同圖畫中藉著楓林紅葉以襯托秋天山林氣息。瞭解自己山人身份是爲了配合馮時可(文所)之類的好事者，以山冠田衣的山人身份，襯托他們自身嚮往山林隱逸風尚的陪襯角色。把干謁者藉著自身山林飄逸形象，與好事者士人附庸風雅情形描繪出來。做到以清新優雅形象滿足好事者，不輕易露出世俗貪財醜態；而被干謁的士人也知道藉著山人山林飄逸形象獲取美譽，所以才有「(山人)借士大夫爲利，士大夫也藉以爲名」的情況出現。²⁹

此時文社發達，時人開始仿效與追求細緻文化；且政治黑暗，使似魏晉時期的清談與名士風上大盛。山人以名士風範爲包裝，藉與文宗巨商交遊以求聲名溫飽；士人富商亦藉此獲風雅名聲，提高身價。山人遊道氾濫飽受抨擊，時人亦假借接納山人、舉辦文會以獲美名，使其得以盛行下去且愈演愈烈，到「挾一冊一卷，師一先生，投謁數名公，即號某，吾師也；某公，吾知己也，贈計數通，評言滿紙，以此誇人」的今之遊者現象。³⁰當社會大眾接受此種干游之道後，使其氾濫化，但因其有附庸風雅意味，商人仍會勉力而爲，接受此種現象。故仔細觀察可知反彈山人遊道氾濫最烈者，是士人與山人佼佼者如陳繼儒、王穉登等，一般大眾反倒懷著「奉驕子」心情，既想藉山人攫取好客美名又不想被無行山人敲詐。可得知干謁此一行爲實與明中後期社會風俗、大眾心態與當時對於遊道拿捏分寸觀點相關。而陳繼儒清晰掌握自身山人角色的扮演，成功把遊道完美發揮出來，這一點正是他與其他山人不同之處。

二、筆耕、賣文—謀生主道：

²⁸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與馮文所〉，頁 29a。

²⁹ 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牒草〉，頁 3731。

³⁰ 曾異撰，〈送林守一重游吳越序〉，收錄於黃宗義編，《明文海》(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 3 冊，卷 296，頁 3077。

大部分山人因屢困場屋，家無餘糧供應，「以舌代耜，以筆代耕」的開館授徒謀生方式成爲山人謀生首選。明代科舉在明中葉後，由於士人以博雅相高，旁學時文、詩詞、度曲，孜孜以才子形象爲目標，琴棋書畫、詩詞曲文、博奕樣樣涉獵。使士人成爲博雅文人；然而，卻也造成士人科考準備不專心而屢次失利的弊端。在多次失利後，這些士人投身大眾市場，以詩文書畫養家。山人在筆耕謀生方式主要爲開館授徒、販售書畫牟利、爲人作傳序墓銘收取筆潤，以及以譜詞度曲爲生這四種，除了館授較少受批評外，其餘皆有士人加以抨擊。然而社會大眾卻趨之若鶩，使得有些名山人頗受「文通之苦」，以「四方征文無片刻停止」爲折磨。

館授謀生向爲傳統士子遵行，一方面可求溫飽；另一方面也可繼續鑽研學業，以期下次榮登金榜，故士人與大眾一般對山人以館授爲生不持負評。館授時間一般都爲半年至一年，往往各地奔走開館，造成遊走四方結交友朋，對山人文名提升自有幫助。但是，一來館授所得不多；再者，對於山人名聲積累亦有限，雖然少受時人抨擊，但爲滿足生活所需仍稍嫌不足。不過，在明中葉以後，隨著經濟發達，社會興起好古潮流，使藝術品販賣成爲可能。山人中善於書畫者即運用自身才華，賣文過活。³¹然而，書畫本爲文人抒發性情之作，一旦落入販售首先就有標價不易情形發生，太詳細擬定價目表反得士人恥笑。一般說來，因賣畫所得較高，加上在生活藝術化與市場好古風氣操弄下，書畫販售成爲山人攫取聲名利祿的主途之一。然而，若想成功打進士人社交圈中，仍須藉詩文參與文社與士人交遊爲主要媒介，故賣文書畫在實質利益上較聲名誘人。

另外，幫富商、地方官員、士夫作序傳墓銘也是山人謀生方式之一。中國自古即有托名人寫序傳、墓銘的習慣，例如韓愈即因墓銘筆潤收入太豐被譏爲「腴墓」。

³¹ 如祝允明、唐寅、高濂、徐渭、周天球、吳孺子、童佩、陳繼儒等皆爲山人兼書畫家者，《明畫錄》一書即有眾多記載。然書畫販賣雖能使生活過的更愜意，但前提必須先有一定文名吸引買客上門才行。故前提幾位山人都是有名的山人。

到明代中後期，隨著經濟發達，社會掀起仿效上層士人潮流，且人死後有墓銘、行狀以傳世，本屬士人間的產物。在山人藉此謀利，大眾藉此謀名下，使其為之氾濫。有趣的是，山人藉撰寫墓銘傳序謀生，在社會上亦有不同評價。陳繼儒在〈答鄭鴻達〉說：

先施專啟，頓令汗浹鬚眉；捧誦新編，不覺香生齒頰；金題玉（足熒），泳遊五色之蠹魚；母鼎仙爐，飛動八公之雞犬，但才同汲綆，且倦怕含毫，若容歲時日月之寬閒，庶幾文字語言之報効，八十歲老子其肯憐而點頭乎？五百里賢人恍亦笑而覲面矣，謝公束帛，摳我短衣。³²

以鄭鴻達拜託陳繼儒寫序，陳繼儒自謙自己才思愚鈍加上年老體衰，希望能寬以時限，文末提及感謝鄭鴻達的潤筆費。對於自己接受鄭鴻達餽贈一事，僅以謝公束帛四字帶過。此乃因自身文名遠播，鄭鴻達使人求序；且對接受餽贈一事僅一筆帶過，絲毫無洩金額多寡，不顯要貨賂痕跡，故士人對此不易反感。

但亦有山人因幫太多平民商人撰寫墓銘，而被斥為「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³³與「江南銅臭之家，與朝紳素不相識，亦必夤緣所交，投贄求挽」譏彈。³⁴可知山人撰寫序、傳、墓銘本身是被寬容的，只要不太過氾濫，士人也不會批判太過，此亦為山人成名一大佳機。³⁵當時，能請名士為己撰寫墓銘、序傳、行狀等是件令人光榮之事，已成為共識。個人能否成功打入名流圈中，端看撰文者聲名高下與對其評價如何。正是此種社會氛圍的出現，使本來流傳於士人圈中的墓銘、神道碑等，經山人推廣與社會大眾的追求，成為一種品評個人名聲的標準之一。

³²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3，〈答鄭鴻達〉，頁 4b。

³³ 唐順之撰，《荊川集》，收於盛宣懷輯，《常州先哲遺書》（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第 15 冊，卷 7，〈答王遵巖〉，頁 7。

³⁴ 陸容撰，李健莉校點，《菽園雜記》，收錄於《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 1 冊，卷 15，頁 527。

³⁵ 如陳繼儒年少即有名於鄉里，經過王世貞、陸樹聲指明陳氏寫壽序與文傳，使陳繼儒揚名士人中。此種朝中文士與在野著名山人相互標榜也是當時風氣之一。

上述應用文體的世俗化也在通俗刊物中體現。明中後期，大批文人投身詞曲小說，藉編寫詞曲、戲曲與小說抄寫流傳，擴充社會影響力。士人間亦流傳聽戲看劇、傳閱小說，甚至把小說與孔孟史籍作等價觀。此種士人俗化與百姓仿效雅化的搭橋人即是山人。山人藉刻印書物、百科類書供人民參考，士人與百姓逐漸同化。處於此一環境下，通俗刊物與戲劇編寫成了山人謀生途徑之一，梁辰魚的〈江東白苧〉、〈續江東白苧〉即大量收錄替人代做的贈妓助興之作。陳繼儒亦有贈妓之作，如〈贈金陵汪妓〉「新燕才命子，水桃初著花，王昌爲主舍，宋玉是東家」，³⁶以汪妓有才氣與美容貌爲述，又以王昌宋玉等文人才子作爲襯托，可知此汪妓乃金陵名妓之一。

另外，爲使書籍更爲暢銷，求名人寫序亦爲當時習尚之一，如陳繼儒〈答范質公（范景文）〉說：

儒七十九老矣，暑瘡甫瘳，執筆如杵菊花，時勉撰數行，附報近刻毛詩古音，堪與世說作對，明公賜一敘傳之海內何如？³⁷

〈復顧徑陽（顧憲成）〉云：

史者，天地間第一大帳簿也。此帳簿皆是六經註腳，幸諸郎君留意焉。外讀書十六觀呈覽，並希是正之益。³⁸

上述二則都是陳繼儒爲自身所編書向他人求序。此種求序行爲，除了有提升自身名聲作用外，也是當時文人相交的一種交往手段，藉由請名人爲己寫序，打入所處社交圈，建立雙方良好關係累積自身實力。另外，與文士相酬唱的記游文也同樣凸顯

³⁶ 陳繼儒，《陳眉公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1380冊，卷4，頁45，〈贈金陵汪妓〉。

³⁷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6，〈答范質公〉，頁8b。

³⁸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4，〈復顧徑陽〉，頁12a。

明中葉後社會瀰漫一股好游、附庸風雅之風；此時山人大量「雅文化參考書」著作在民間流傳，可視為雅俗交流的顯例。³⁹

總地來說，山人在上述謀生方式中，大體仍為時人接受。但在日益俗化與氾濫的結果下，引起士人反彈與山人內部自清；然而，一般大眾仍多採容忍態度，或與明晚期社會上瀰漫的雅文化風潮造成文化消費相關，也與士人間以才子、名士形象相標榜有關。由於此時個人評價主要來自外在輿論與同社友輩的唱和標榜、名士提拔、清閑優雅形象的包裝、詩文書畫等文化涵養，再再顯示不論士人、山人或大眾，若想打入晚明文藝交遊圈內，努力學習詩文、遊道拿捏得宜、名士加持與社會人望的積累都是缺一不可的。

風潮愈演愈烈後，一般平民與商人被社會風尚所制約，配合遊戲規則，即便對氾濫的山人行徑不滿，為追求社會認可的文士交遊圈，也只好勉力接納。甚至主動接納山人以圖自身能晉升當中，故山人筆耕賣文謀生方式與干謁行徑雖時被抨擊，但仍為社會所容忍。當中亦有如魚得水者，如陳繼儒即為一例，陳繼儒以其盛大文名，配合清晰瞭解自身身份，對遊道拿捏得宜，使其與士人交往關係密切，加上書籍刊刻復使其文名更大，成就其全國聞名的名聲。

三、文學活動一藉結社增加社會聲望與人際經營之道：

嚴格來說，與其說山人假文學活動以牟利，不如說藉以謀名更加貼切。明中後期社會將傳統士人視為雕蟲小技的詩詞戲曲、琴棋書畫、文社酒宴等事，視為表現名士風範之手段。時人汲汲於其中，積極加入社團拓展人際關係，通過文士稱揚，建立自身人脈達到獵取聲名目的。山人主要文學活動在於往來各地文社與憑詩文干

³⁹ 如高濂《遵生八箋》、程羽文《清閒供》、屠隆《考槃餘事》、陳繼儒《妮古錄》、費元祿《晁采館清課》等等皆是以推廣細緻文化，體現清閑細膩生活為主的書刊。另外，善書與類書的流行也是一大助力，當中以《三才圖會》最負盛名，內容包羅萬象，上至天文地理、行兵打仗，下至婚喪喜慶、官司訴訟文書皆收錄其中，亦收錄簡單書法、繪畫鑑賞與介紹，以及粗淺的古物圖編。

游士人上。山人結社熱潮主要與明中葉的復古文學運動相關，山人藉文社倡言復古以依靠茶陵派、前七子，以交結文壇名公為務，假李東陽、李夢陽、王世貞等文壇盟主加持，使聲名提升，憑詩文尋求文士巨卿資助。⁴⁰山人藉文社凝聚自身實力，以詩文干遊搭配三不朽「立名」誘惑，使山人結社蔚為風尚。

山人在文人圈日益拓展人脈，使山人在復古運動所具位置日益重要。通過古文、詩文創作，以摹古、擬古相尚，其文學地位亦隨之提升。當中，太白山人孫一元、四溟山人謝榛更是箇中翹楚，李夢陽甚至以不得見孫一元一面為憾；謝榛在前七子中是唯一布衣身份者，名聲與李東陽並驅。其他如王穉登、沈明臣、王叔承、俞允文亦富盛名。《明史·文苑四》云：「布衣、山人者以詩名者十數，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尤為時所稱，然聲華烜赫，穉登為最。」正為山人於文學活動中的活躍下一絕佳註腳。⁴¹在《列朝詩集小傳》中，錢謙益甚至以無緣拜見王穉登為憾。⁴²至於聲名最高的陳繼儒則以「遠而夷魯土司，丐其詞章；近而酒樓茶館，悉懸其畫像」傾動朝野，甚至「直指使者，行部薦舉無虛牘，天子亦聞其名，屢奉詔徵用」屢為朝廷徵辟，成為晚明首屈一指的知名人物。⁴³

從山人在文學活動的經營，可見當時社交網絡與山人在其中的地位，如俞安期「嘗以長律一百五十韻投贈王元美，元美為之傾倒。已而訪汪伯玉於新安，訪吳明卿於下雒，皆與結社，後門韋布，頗依諸公以起名」，以參與文社，展現自身詩文才

⁴⁰ 以王逢年（王舜華）曾寫信向王世貞述說家中遭竊請求世貞援助一事即可資佐證：「得足下書知懸罄之室復為盜憎，僕亦遭此，僅餘一犀巨羅、兩玉環，……弟兩子貲可三千金，僅十之二存耳。墓田事俟詰得其詳方可奉復，餘不盡。」（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十七冊，收於沈雲龍輯，《明人文集叢刊》第一輯（台北縣：文海，1970）第22冊，卷182，文部書牘，〈王逢年〉，頁7a）。另見同書〈王舜華〉「得書知為廣陵游者半歲，甚適，歸而有漂搖室家之嘆，……自庚辰委身道民，付業兒輩，月責十金，則一切衣食讌會酬酢之費，皆取給於此。……今搜索得二金，佐一醉之資，勿罪菲薄。」，頁10a~10b。裡面敘述王逢年因家遭竊賊，寫信向王世貞求助，世貞以自身亦遭竊，同時又於信中大吐苦水，最後勉強資助二金給王逢年佐買醉之資。

⁴¹ 張廷玉奉敕撰，《明史》，卷288，〈文苑四〉，頁7389。

⁴² 請見「昔王弇州自言，少與文侍詔周旋，而意殊不滿，晚年為作傳，可當一懺悔文。余當世而失伯穀，其悔有甚於弇州。」之敘述。出自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冊，丁集中，〈王較書稚登〉，頁482。

⁴³ 上兩則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冊，丁集下，〈陳徵士繼儒〉，頁637~638。

能，吸引文壇大佬注意，使自身文名得以顯揚。⁴⁴而反例則為徐渭，徐渭生平從不結社，名聲不揚於鄉曲之外，聲名不顯，直至袁宏道訪得其佚稿，大肆宣揚才使徐渭聲名大噪。⁴⁵可知山人的文學活動主要在揚名以牟利，山人若想過舒適生活，須得先得大名才可「四方征文不斷」，文宗巨卿也才會樂於結交以供其所需，如陳繼儒即為一良好例子。山人汲汲營建自身人際網絡的行徑可視其為謀生方式之一。萬曆後期，由於公安、竟陵派興起，文風轉為清靈飄逸的小品文與清言，山人復以其清新飄逸之姿成為清言小品代言者，成為流行重心，出現如陳繼儒「性喜獎掖後進」之流，擴大其於社會上的影響力。

值得注意的是，山人於文學活動的謀生中，面對不同對象往往有不同相應方式。如在士人交遊圈是謀名重於謀利；在富商巨戶中則謀利重於謀名。此時素封之家為求擠身士人交遊圈以獲美名，經常設置佳餚美酒與采金，舉辦文會以招徠山人文士參與，冀望藉資助文士山人獲取風雅美名。在此情況下，山人會把謀利視為第一要務，因而此種文會常具雙面意義：一方面，文士山人齊聚一堂，以詩文切磋、飲酒作樂做為經營彼此人際關係的重要時刻；另一方面，此時也是山人得以藉文會召開，以詩文書畫向席間富戶尋求資助的時刻，可謂謀名牟利兩相混了。綜上所述，山人結社大體應仍視為以謀名為主謀利為輔，畢竟謀利是在加入文社，且人際網絡建構完成後，自身文名高了之後才被山人所重。

第三節 陳繼儒與山人評價關係

明人認知的山人以隱者為主要意義，如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山人名號〉所說：

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鄴侯僅得此稱，不意數十年來，出游無籍之輩，以詩卷

⁴⁴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冊，丁集下，〈俞山人安期〉，頁 630。

⁴⁵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冊，丁集中，〈徐記室渭〉，頁 560-562。

遍贊達官，亦謂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歲，吳中友人遂有作山人歌曲者，而情狀著矣。撫案藩臬大吏有事地方，作檄文以關防詐偽，動稱山人星相，而品第定矣。按，今廣西、貴州深僻之地，跼伏箐莽中，不夷不漢，粗納糧稅者，呼為山總山老，其部落則名山人。正德間郁林州土夷韋觀敬上疏求入貢，直署其銜曰山人某，更屬可笑。然南宋講學盛時，如白鹿洞等書院，主其教者亦稱山長，故元尚沿之，蓋山派不同如此。

唐太僕卿韋觀，為巫所挾，哀懇曰：「願山人無以微言。」則巫覡亦稱山人。後唐莊宗后父劉叟，以醫卜自稱山人。又金元虜俗，凡掌禮儀相亦稱山人。⁴⁶

沈德符以「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鄴候僅得此稱」，認為山人是必須要像李泌那樣輔佐君王立下救國大功的賢者才配得的稱號。⁴⁷但是，其於文後感嘆「不意數十年來，出游無籍之輩，亦自謂山人」，以為連外出干游士人與無學問的幫閑無賴者亦以山人自稱，使得山人一詞已變質了。可知山人名號在明士人眼中起初應是尊稱，到了嘉靖年間開始為人所濫用，至萬曆年間達於高潮，為時人與地方大吏所詬病。以致於抨擊山人聲浪如「吳中友人有作山人歌曲者，而情狀著矣；撫案藩臬大吏有事地方，作檄文以關防詐偽」大表不滿之意，顯示此時士人大眾對於襲用山人號者的鄙視與不滿。這種鄙視感除了有山人號被無行之輩濫用外，以詩卷遍贊達官的汨濫遊道行徑也引起士人不滿，才有上述張鳳翼作山人歌譏諷山人的情況產生。

沈德符也提到「今廣西、貴州深僻之地，……租納糧稅者，呼為山總山老，其部落則名山人」，與「南宋講學盛時，主其教者亦稱山長」、「唐太僕卿為巫所挾，哀懇曰：『懸山人無以為言。』則巫覡亦稱山人」、「後唐莊宗后父以醫卜自稱山人，又

⁴⁶ 沈德符撰，楊萬里校點，收錄於《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3冊，《萬曆野獲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23，〈山人名號條〉，頁2512。

⁴⁷ 李泌是唐玄宗至德宗時人，性好道術，隱居於山中，早年以詩名聞天下，曾上書玄宗建議國事，後來輔佐肅宗、德宗，數次建議軍國大事，對於中唐以後的國政影響甚大，時人稱為山中宰相。見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等合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139，頁4631-4640，〈房瑄張鎬李泌傳〉。

金元虜俗，凡掌禮儀相亦稱山人」等敘述，以為山人稱號如此混雜，實乃「山派不同」，語多譏笑，卻也顯示山人名號的多樣化，看到山人群體的複雜性。

由上，可見對於山人的評價上，沈德符其實對於山人原本意涵表示推崇，對於當時山人汨濫現象卻是大肆譏笑抨擊。可見山人評價的好壞實與山人本身能否瞭解自身山人角色，與是否瞭解社會上對於山人角色認知的關係。以下就政治、社會、經濟三方面，以陳繼儒為例說明山人評價與角色認知的關係。

一、山人在政治上的角色認定與評價：

在嘉靖萬曆時期的山人，多為科舉屢試不第的失意者構成，對科舉抱持愛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屢試不第與政治環境日益昏暗，對現實失望，萌生遷居山林想法，取山人號明志；另一方面又希冀有朝一日能立功揚名，屢次應考。此種豔羨功名利祿的實質利益與傳統兼善天下抱負所造成的科舉熱，在科考屢次挫折下，使士人有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心態。在面臨仕隱抉擇的矛盾情形下，部分士人因謀生壓力，憑自身詩文才華，干游地方大吏與名卿縉紳，另闢途徑獲取生活所需；亦有許多山人藉入幕、入京交遊相門與達官貴人實現其心中立功理想。另外，山人多屬低層生員，舉人進士者不多，在政治上處弱勢地位。因太祖寶訓清楚訓示生員不得議論國事，當山人以生員身份結交官員妄論時事時，人們對其評價之差可想而知。山人在政治上備受士人與大眾批評，應與時人對山人角色扮演定義的認知有關。

在時人眼中，山人應為隱居山中，過著儉樸與世無爭生活的山中逸士。當山人以詩文干游公卿攫取聲名利祿，居於城市，流連青樓酒館，扮演著清客、幫閑角色，成為競逐聲色銅臭之徒，「名為山人，心同商賈」成了此時大眾對山人的批評。⁴⁸因行為與大眾認知相差極大，才會對山人作為有所微言。

⁴⁸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2，〈又與焦弱候〉，頁45。

政治上，在山人積極介入、交結大官名卿，使自身陷入政治漩渦中，難免有「妖言惑眾，肆口奸謀」的惡評，從萬曆年間多條驅除山人詔中可知一二。⁴⁹因山人「身處江湖心懷魏闕」的情形，使社會大眾認為其有操弄朝政之嫌，對於「相門山人」的鄙視與欣羨亦為時人對山人的態度之一。一方面，平民百姓豔羨山人遊走權貴府中，享有極大聲名與利益，使得有百姓投身其中，希冀藉以獲取聲名利祿；另一方面，在部分士人眼中，山人應為品德孤高狷介的隱士，遠離俗世紛擾，追求與自然融為一體，怎可以怡情之詩文交結朝貴，以獵取聲名利祿。故產生厭惡感，認為此群山人玷污士傳統優雅細緻文化，使孤高純潔的隱士（山人）成為為求利祿，奔走宦門之徒。

這種因明中後期以後，山人在政治上的行徑與角色扮演造成的「四處干謁，追逐銅臭的利競之徒，往往自稱山人」現象，使社會大眾（尤為士大夫）大肆抨擊，認為此時山人玷污了傳統山人標榜的隱逸精神，針對交遊太過與活躍相門府中的山人發出筆伐口誅，以假山人、山人愚妄、好利無恥之徒稱之。但於萬曆以後，隨著山人對現實政治日益失望，加以經營出版事業與文社徵文為經濟主途，使藉詩文干求利祿的行徑不明顯，所以在黨爭最烈時反而不見其蹤影，人們看法也日趨改觀。在社會文化上創造風潮，透過自身改造與不介入政治的前提下，重新打造一套山林清逸飄俗的生活品味，贏得世人追求，再創山人新形象。

由上可知，若想自身評價優良，山人必須做到不濫交遊、不顯貪財好利形象，亦需擁有冷靜審慎心態，以自身飄逸形象尋求時人認同。在這方面上，陳繼儒可謂

⁴⁹ 諸如萬曆 19 年的樂新爐事件「江西人樂新爐，與湖廣胡懷玉、福建王懷忠、徽州汪鈺，俱托山人，影借權貴，詐騙財物。……」（見《明神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243，頁 4530，萬曆 19 年 12 月 9 日辛丑條）、萬曆 31 年的妖書案「陝西道御史康丕揚，因妖書事發疏，請速結楚獄。大概言：姦人肆志，由法紀凌夷。……山人遊客、僧道亡命，勿得隱藏禁地。……」（見《明神宗實錄》，卷 390，頁 7351，萬曆 31 年 11 月 18 日庚午條）。上述關於妖書案、樂新爐事件另可參見《萬曆野獲編》中《補遺》，〈山人飛語〉，頁 2819~2820（說明樂新爐事件經過）與〈葵卯妖書〉，頁 2824~2827（說明妖書案的經過）。

十分成功。他 29 歲就放棄生員資格，自稱布衣，一來避免生員干政之嫌，一來亦表明自身志向。如〈告衣巾呈〉云：

某齒將三十，已厭塵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拈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所慮雄心壯志，或有未墮之時，故於廣眾大庭，預絕進取之路。伏乞轉申。⁵⁰

以自身厭倦於科考打滾，表明自己絕意仕進。接著，以放棄生員資格，表明自身決心與隱居心意。陳繼儒一方面因無生員資格的忌諱，可憑藉布衣身份評論國事；另一方面，復以自身絕意仕進，隱居小崑山的形象，展現山林隱逸樣貌，使得時人少有對陳繼儒評議國事表示惡感。但是，仍有流言以陳繼儒為相門山人毀謗之，如〈復周懷魯撫臺〉中說：

某自丙戌年即裂青衿，里居教授，生平未嘗渡揚子江。且有謂太原公當國而不肖同在京邸者，尤為可笑也。⁵¹



陳繼儒在與周懷魯書信中，說明自身在王錫爵任首輔時，並無隨往京師作相門山人。除看出當時陳繼儒為謗言所擾外，亦點出相門山人不良聲名的現象，所以陳繼儒才急著闢謠以說明自身的清白。而陳繼儒之所以急著闢謠的原因，除了愛惜自身聲名外，其實也有戒懼謗言的原因在內，下章容後詳述。

復以王穉登與袁煒交好被譏為例，見沈德符於〈王百谷詩〉中所說：

近代詞客寥落，為王百谷巍然魯靈光，其詩纖秀，為人所最愛，亦間受譏彈。


⁵⁰ (清)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3，頁183，〈陳眉公告衣巾〉。

⁵¹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復周懷魯撫臺〉，頁 27a。

如其初入京，試內閣紫牡丹詩，中一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煙」，極為袁元峰煒相公所賞，因成知己。同邑周幼海長王十年，素憎王，因改袍為脬、殿為屁以謔之，兩人遂成深仇。⁵²

以王穉登的詞極受時人喜愛，但因品德問題，使他備受抨擊。例如依附袁煒並且藉袁煒力量想進史館，雖後來因袁煒失勢而沒成真，但是此舉卻給時人山人鑽營高官門下的壞印象。以周幼海（周履靖）譏諷王穉登的詞，可知山人汲汲營於權貴門下在士人眼中的形象有多差。

另外在妄言國事上，陳繼儒雖有許多關懷政事之文，不過由於寫的入情入理，非一般山人只為利益而造謠生事所能比，故少受抨擊。如其於〈惠桂二王祿米議〉云：



頃下部文，惠桂二王祿米分派蘇松常三府，依運送府交納。夫派米一千，加耗有五百餘石，車腳水腳有三千餘金。近則災邑難堪，遠則復何底極。松田瀕海，米色粗嫩，從來有次白而無上白，不派親王祿米，此載在會典可察。……勒措不已，必至借貸那移，顛踣道路，生有破家之虞，死無還鄉之望。長吏之催科，受督考課被牽，寧有窮期乎？……目前邸祿之派亦宜蘇松各分其半…糧長之援例哀求非無據而云然也。⁵³

陳繼儒假借敘述希望政府減免松江人民負擔惠桂二王祿米，引舊例證明親王祿米不派松江一府。之後，又說明百姓因徵米所帶來的困窘，希望能打動政府，減輕百姓負擔。文辭充滿憂患百姓的胸懷，加上並非假政事建言行謀名牟利之舉；所以陳繼儒在時人評價上不似其他山人飽受抨擊。這是他成功的原因，也是時人認同的山人

⁵² 沈德符撰，楊萬里校點，《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3冊，《萬曆野獲編》，卷23，頁2513，〈王百谷詩〉。

⁵³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9，頁6a~6b，〈惠桂二王祿米議〉。

形象。

二、山人在經濟上所處地位與評價：

嘉萬時期，山人以出遊為名，假詩文四出干游，在謀生上處求人狀態，使遊道汨濫備受譏彈。陳繼儒對遊道的闡述，與對遊道汨濫的看法，可見其於〈紀遊稿序〉中所說：

昔遊有二品，今加三焉：賈之裝遊也，客之舌遊也；而又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於風騷，而陰實其裝於稠橐，施於今，而遊道辱矣。……今遊士非獨產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子長氏以為遊祖，馬蹄車轂，凌兢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稅駕（歸隱、退隱之意），而耽長安中如深帷臥榻。青蓮（李白，號青蓮居士）有云：「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遊道之賤也。⁵⁴

陳繼儒以當時遊道有三種：客商往來各地謀求利潤之商遊，文人騷客憑自身學識結交各地文人以謀名的舌遊；以及綜合前兩者，以風雅示人為表，暗地裡攫取利祿的出遊，及李贄所謂「名同山人，心同商賈」的山人遊道，陳繼儒以為此種山人之遊使當今遊道受辱。復以此種「遊士」並非吳地蘇松一帶特產，許多出遊士子往往祖述司馬遷，假借外出遊歷增進知識，以交結富戶名士謀求名利為主，甚至還有以山人名卻不歸隱山林而居於都城謀名求利者，陳繼儒以李白詩句「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諷刺此輩假山人隱逸之名，行終南捷徑之實，認為遊道因此輩而變賤，明白表示自身對於市隱與以隱搏名的鄙視。

其實，歷代知識份子並非沒有從事筆耕賣文，士子一旦科舉失敗，其首要謀生

⁵⁴ 陳繼儒，《陳眉公集》，《續修四庫全書》，1380冊，卷6，〈紀遊稿序〉，頁78。

方式即為開館授徒，以館授為生。山人在謀生上引起時人抨擊，是山人把賣文筆耕的範圍擴大，同時又把傳統遊道賦予牟利性質，使士大夫無法忍受的結果。傳統士人以仕宦為主，賣文只是人際往來的一種手段，且以前乃富商豪貴主動求文，士人在經濟上有自主權；反觀明中葉，士子因仕途不順，以官俸為主要經濟已不可能，賣文筆耕成了主要謀生方式，有違傳統儒家致君堯舜、兼善天下理想。此類士子假詩文為工具，四處干游結交各地文士以謀名利，使本屬雅文化的詩歌創作成了逐銅臭工具，乃山人備受譏彈的主因。可謂山人賣文與藉詩文干遊，把傳統雅文化「俗化」了，引起士大夫反彈。不過，晚明戲曲、小說等通俗讀物之流播，卻幫山人在雅俗文化交流下立一註腳；也使山人因戲曲、小說的流通，使得刻書事業也隨之盛行，形成社會上以著書獲取文化美名風尚。

此時，晚明山人亦有注重立名之特色，因其科舉失利與現實環境使其不可能有立功機會，而守貧耐寂、追求品格高尚的立德亦無法做到，只剩著書萬言成一家說的立言，有可能也有機會達到。憑藉著書美名，除可假刻書出版以獲取豐厚利潤與良好聲名外，更能擺脫因四處干遊為人所輕的惡名，可謂名利雙收。因其在經濟上有獨立地位，不再依靠原屬士人雅文化部分的東西謀求聲名利祿，加以此時山人開始注重自身聲名塑造，使大眾重新評估山人了。像陳繼儒即有大量求序與他人求序之文，在〈三才圖會序〉中說：

學憲洪洲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故不辭為之序。⁵⁵

陳繼儒在〈答應天沈學博〉中也說：

⁵⁵ 陳繼儒，《陳眉公集》，《續修四庫全書》，1380冊，卷5，〈三才圖會序〉，頁61~63。

弟近撰《讀書鏡》，頗以古人方醫今人病，但未竟而友人付之災木，謹呈清覽，《安得長者》一卷并祈批教。前示李白甫丈，尚未相晤，不知何時入秀州也？先此附謝，尚容修候不一。⁵⁶

以上兩則，一為陳繼儒替王圻《三才圖會》寫序，一為陳繼儒託沈士哲替自身《讀書鏡》與《安得長者言》寫序。陳繼儒有眾多序文編於其文集當中，可知此種求序文或應酬序文乃當時社會一大特色。這也使得他可以藉書籍印刷，既獲美名，又得許多名士相捧，加上所編著書籍極為暢銷，「流傳遠邇，款啓寡聞者，爭購為枕中之秘，於是眉公之名，傾動寰宇」，⁵⁷成為晚明首屈一指的名人。

綜上所述，明代中葉後，山人由於謀生方式與傳統士人不同，既不同傳統士人以仕宦為主，也不似傳統隱士般甘苦耐勞，居於山中以老鶴寒梅為侶。自稱山人，身份多為布衣或生員，行徑卻與時人認知的傳統山人極不同；交遊遍天下，藉詩文逐銅臭，以此交結公卿，以傳統雅文化的詩為打響聲名的工具。就連以前文人視為雅事的臨帖作畫也被用來販賣以圖生活所需。隨著詩文書畫日益俗化，傳統士人紛紛發難，強烈抨擊山人。追根究底，即為山人謀生方式侵犯到士人細緻文化象徵，使庶民百姓只要有錢皆可享受到表面士文化的待遇，故急於分別士人主體與百姓，才會發出「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的不平之聲。⁵⁸

從山人在經濟方面的評價可見社會流動與百姓追求同士人相似的雅文化生活傾向，雅文化正逐漸假山人手向下延伸，可將山人視為雅俗交流的重要推手。從中知曉明中後期社會乃是個文藝性社會，在社會經濟允許與大量士子投身其中，以塑造自身飄逸形象與佈置藝術性生活，加以名士風度流行，使之成為可能。而陳繼儒正是在這一基礎下，利用其先天優勢與明白自身角色扮演，於明中晚期社會文化佔

⁵⁶ 陳繼儒，《陳眉公集》，《續修四庫全書》，1380冊，卷12，〈答應天沈學博〉，頁171。


⁵⁷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冊，丁集下，〈陳徵士繼儒〉，頁637。

⁵⁸ 唐順之撰，《荊川集》，收於盛宣懷輯，《常州先哲遺書》，第15冊，卷7，〈答王遵巖〉，頁7。

有一席之地。

三、山人於社會上的評價：

萬曆中期以後，隨著刻書出版等文化事業在山人謀生比重中逐漸增大，加上山人對自身形象的包裝與改良之下，時人對山人的批評比嘉靖至萬曆中期時要好多了。當中，也與當時政治黑暗，人們避世心態日趨嚴重，以及士人日益俗化等大環境相關。大致上，山人最被詬病之處有：以詩文干遊權貴；追逐銅臭，無絲毫尊嚴；士風低落，毫無風骨；縱情聲色，近跡荒淫；學問不足，見識低下等等。以薛岡〈辭友人稱山人書〉所述最詳細，其認為「今日遊客，動號山人，以為無位者之通稱」，以當時干游士人皆以山人為號，把山人視為無謂者的通稱，貶低了山人歸隱山林意涵，使得「有志之士，咸恥斯名」。⁵⁹接著，在〈辭友人稱山人書〉中，舉十事說明山人定義。有云：



君侯獨不聞今之為山人者耶？其說有十，請悉言之。身匪章縫，家起卑陋，難親顯貴，故盜美名，思溷衣冠以徼盼睐，一也；既盜美名，頓忘本相，未通章句，亦議風騷，詰其所學，茫無應聲，二也；薄操一技，雜處嘉賓，月席花筵，旅進旅退，揖讓坐作，居之不疑，三也；一聞好客，百計求交，耽耽貴人，以為奇貨，甫擅交歡，反謗介紹，四也；察其喜怒，委曲迎合，得其意旨，婉轉趨承，日事左右，以求聲譽，五也；偶然邂逅，退即造門，懷刺遍投，唯日不足，執禮足恭，從閭人始，六也；年無老幼，刺總晚生，交無淺深，稱皆知己，沾沾向人，誇其道廣，七也；既稱山人，略無野致，輕衣肥馬，廣夏侈庖，馳騁國門，以明得意，八也；貪借厥寵，舌可舐癩，稍拂我情，口常罵座，自取貴人，署門免見，九也；其最甚者，交好陽密，陰伺隱微，滿腔機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長，快我齒頰，十也。今之山人，此

⁵⁹ 薛岡，〈辭友人稱山人書〉，頁 657。

其大略，人有此類，殃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⁶⁰

由上文所舉十事，可知薛岡抨擊的山人是身世卑微，學問低落，卻羨慕美名，假借山人名號干游各地，參與文人雅會，卻又表露出嗜利樣貌，為利祿委曲求全；在干求權貴時又毫無風骨，媚主求利。自稱山人卻無山人隱居山林的高潔氣息，加上態度狂傲，喜道人短長，薛岡以此類人為當今自稱山人者，認為山人名號被此輩丟光，無不透露出對此類山人的輕蔑。從中，可知薛岡對於山人看法應偏於正面，只是因為當時許多無良之輩冒名山人，使得山人原本名聲被攪爛，所以才有「人有此類，殃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的感嘆，與前文所述沈德符對於山人定義看法相似。

有趣的是，薛岡本人也「游梁、游洛、游燕、趙、關、陝者凡三十年」，被他人視為山人。但是，他對山人批評之深，刻畫形象之生動卻是無人可比的。而諸如錢希言、張鳳翼、陳繼儒、俞安期、王穉登等當時名士，亦為時人稱為山人之流者，他們的言論也持批判意見，可知山人在社會的惡評基本上與其干游汨濫，謀求利祿行徑過顯，以及不居山而城居生活有關。故陳繼儒以山居生活標榜，使時人對其批評不顯，不以薛岡、沈德符等輩目為今之山人以稱呼之，如〈巖栖幽事〉自述：

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僧、牛店、服馬驛也。⁶¹

以山居生活勝於城居有八好處，以山居生活標榜，說明自身與其他城居山人的不同，表達對城居者干游汨濫、好說謠言等現象的不滿。如陳繼儒此輩名山人之所以會持如此批評態度，與上節提及山人藉參與文社、文學運動而獲取名利，使許多百姓紛

⁶⁰ 薛岡，〈辭友人稱山人書〉，頁 657~658。

⁶¹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 4a。

紛效尤，以山人之名謀生現象有關。故錢希言、沈德符等皆有「星象、醫卜、百工、嫖薄子弟皆稱山人，令人絕倒」的記載，說明山人成員因社會環境改變，使得大量平民投身當中，造成組成份子複雜，出現「假山人」現象。

換個角度想，針對此種現象，推知在萬曆中期以後，由於文藝社會的活絡與社會上形成山人崇拜現象，使許多平民投身山人行列當中，使山人本就不好的形象更糟。山人爲了自救與排除濫竽充數者，發起批判呼聲，除反映社會大眾對山人干遊汨濫及其所造成社會現象反感外；亦藉此重新塑造社會大眾對山人的認同。當中，也與山人們歷經嘉萬年間的摸索，找出一條民眾既不反對又適於自身的謀生與生活途徑，所以爲了確定遊戲規則的運作，排除汨濫充數者，即成爲必要工作。

起初，社會大眾對品德高潔的傳統山人十分崇敬，但隨著清苦幽寂的山居生活無人能忍，使晚明山人開始塑造稽阮式的放浪豁達或明初畫壇四大家的半隱狀態，以既求生活舒適復得清靜之樂的生活爲尚，連帶影響社會大眾對山人的評價。仔細觀察，可知時人對山人隱居認定並不嚴苛，反而對在城市間四出奔走干游，逐利求名的遊走山人感到厭惡，在抨擊山人重心上，亦多在其市隱濫遊行爲上。時人對市隱採取有限度容忍態度，只要營造得宜，品味表現得當，大眾也會欣然接納；反倒整日庸碌，假山人名號招搖撞騙，獲取錢財的假山人，成爲時人批評目標。

綜上所論，山人在社會上的評價變化實與山人行徑與時代背景相關。嘉靖至萬曆中期當中，此時山人以入幕、筆耕謀生，等而下之者，更有柔媚娛主的清客、幫閑，干游各地文人官員頻仍。世人對山人認知尙處傳統山人與明初山人印象中，故山人此時多受抨擊。值得注意者，此時抨擊者多朝中士大夫，一方面喜山人「率多儂巧，善迎意旨，大多曲體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矣」；⁶²另一方面又惡其愚妄、干遊無道，對其口誅筆伐，欲除之而後快。此時山人處在仕隱與雅俗之間，無一明

⁶² 沈德符撰，楊萬里校點，《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3冊，《萬曆野獲編》，卷23，〈山人愚妄〉，頁2515。

確定位，加上時人用傳統隱士標準抨擊山人，使其對自身充滿疑惑，處於轉型期內心矛盾苦悶的狀態，故表現出疏離感與邊緣性特色。與明中期政治黑暗、士風為皇權摧折，士人普遍苦悶矛盾相符。此時，其一方面有著苦悶矛盾心態，社會上因經濟發達造成社會等級失序所帶來的雅俗交流亦於其身上體現。可知此時山人大增與備受物議實與時人在政治、社會上所遇處境相關，此又為此時山人行徑盛行開路，但是，由於時人一時拋不開傳統對山人的評價，故藉批評相同處境的山人來摸索自身價值與如何轉型。

萬曆中期後，隨著王學興起，個性解放與雅俗交流呼聲頻仍，社會出現享樂主義和世俗化現象，其謀生方式亦有所轉變，轉以文化出版達名利雙收，與前期山人主要以干遊各地，謀求利祿不同。此時山人以包裝自己使聲名高揚以攫取利祿，運用「名士」名聲求取所需。由此，可理解為何此時批評山人最烈者反以山人佼佼者以及名士文人為主。此輩既靠聲名以求所需，故極愛護自身聲名，同時有意識地使自身名揚朝野，希冀透過良好形象包裝，以攫取聲名利祿。而江南地方文社、文會眾多，士人流動各地，以文會友，使此輩得以憑詩文與得宜的遊道，一舉躍升為名士。加上其所倡言的清閑生活為社會所崇拜，使得許多平民投身當中，假山人名號遊走人間，使山人形象受損，進而抨擊假山人與其劃清界限。可知山人在社會上評價轉變，與整個大環境相關。而陳繼儒就是因為清楚自身山人角色，不過分干遊，以著述出版為謀求聲名利祿之梯，利用社會崇尚清閑文藝風尚，標榜自身，使自己得以成為聞名當時的大名士。

四、山人於明中葉後在文化上的地位與評價：

相較前述山人評價多為負面，山人在文化上的地位與評價卻備受時人推崇。山人文化成為明中後期社會風尚主流，獨領一代風騷。此種絕對優勢可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晚明風氣中得出端倪，亦可從明人筆記小說中窺知一二。

明中後期，隨著各地文士用結社以宣揚自身文學理念，文人結社之風興盛，山人因干游之便常參與各地文社，藉社中有力者吹捧，達到聲名外揚以攫取聲名利祿的效果。⁶³加上，自弘治李東陽茶陵派復古運動，至李夢陽的前七子再至王世貞獨領文壇風騷，文學運動以復古摹古為主。且李王皆有意使自身文學理念成爲一股勢力，如〈明史·文苑三〉對王世貞的敘述，有云：

世貞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⁶⁴

由文意可知當時王世貞獨操文壇權柄現象，復從其前七子、後七子、嘉靖四十子等稱號，搭配上文「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所述，可見世貞以文社集會擴大自身的文壇影響力。

山人以詩文干遊結交文人富戶謀生，熱衷文社參與以求名利。當時文學運動以前七子爲主，故山人多入復古詩社，藉與社中文士相交，成功打入當時高層士人交遊圈中，使山人在文學人際網絡中得以積累實力。然而，亦有不與當時主流相標榜者，如陳繼儒即對復古運動不以爲然，其〈汪希伯詩敘〉有云：

吾嘗與山中友人夜談，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路太熟耳」，昔王元美論菘，止拈易所云：「日新之謂盛德。」余進而咲曰：「孫興公不亦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故川上之嘆，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逝者爲窠臼、爲糟粕，而寧戀戀于已嚇之腐鼠、不靈之芻狗為哉？」……彼于向來熟處，步

⁶³ 例如俞安期「嘗以長律一百五十韻投贈王元美，元美為之傾倒。已而訪汪伯玉於新安，訪吳明卿於下雒，皆與結社，後門韋布，頗依諸公以起名。」即為一顯例。見錢謙益著，《列朝詩集小傳》上冊，丁集下，〈俞山人安期〉，頁 630。

⁶⁴ 張廷玉奉敕撰，《明史》，卷 287，〈文苑三〉，頁 7381。

步求離，刻刻不住，此謂真解脫，此謂真喜捨，此謂日知其所無。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首詩無一雷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即自己思路亦一往不再往。……蓋詩道之至新也，新則變，變則傳。⁶⁵

上文以詩文最忌思路太熟，表達詩文不可太過摹擬，並且舉孔子「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的川上之嘆，感嘆過往事物的消逝，認為詩文要追求創新，不去摹擬過往，即便過往乃美好事物，一旦陷入摹擬，只會步步為營。舉王羲之、杜甫為例，說明王杜二人之所以享有大名不是摹擬前人，而是自抒新意，力求創新，才能成就其大名。最後，提及詩文要新才能變，才能流傳於世。反對摹擬復古，強調詩文創新、獨抒性靈，從中可見陳繼儒對於詩文寫作的見解。

萬曆中期後，由於政治黑暗、黨爭嚴重，士人普遍持避禍心態，且心學強調內省重要性，使士人轉向內心追求。又逢此時享樂風尚興起，使士人注重生活享樂。然而，傳統「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的隱逸思想亦並未被士人所拋棄，仕隱之間的徘徊成為士人心中的矛盾處。因當時士人多不耐山居清寂；故山人此種介於出世與入世之生活方式得到認同，且山人在生活佈置的高雅化與細緻化，講求清、閑、雅、淡，營造山林隱居生活情境為主的特色，既得山居之趣，復享城市之樂，此套重在體現山林生活情境的生活空間佈置廣受士人愛好。

山人也於此時藉飄逸脫俗形象塑造自身，以空間精緻佈置體現傳統優雅高貴的文化品味，區別富商與士人本身。揉合世俗享樂風尚與傳統文化閑情雅致之精髓，展現脫離塵世使人忘懷俗世的夢幻般生活，擄獲士人的心。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許多教導大眾過優雅生活的書籍，使大眾能藉由簡單佈置，享受優雅生活的氛圍，使士人與大眾對此趨之若鶩。通過對「清」字的詮釋，山人發展出一套清閑生活模

⁶⁵ 陳繼儒，《晚香堂集十卷》，《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 66 冊，卷 2，〈汪希伯詩敘〉，頁 557。

式，體現山人生活方式。⁶⁶

經過山人雅化、細緻化，使此套山人文化獲得時人喜愛，配合名士風度流行江南社會。經由山人的鼓吹，使社會流行一股崇尚山林清雅文化的熱潮，對於優雅生活與藝術化佈置趨之若鶩，因此有黃宗羲於《思舊錄》中所云：「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工賈倡優，經其題品，便聲價重於一時。故書畫器皿，多假其名以行世。」⁶⁷的現象出現，可以知曉當時人對於清閑優雅的山林文化的推崇程度。

山人清雅文化的流行，與當時山人形象塑造成功有關，亦和社會喜新逐異的風尚相關。明中後期，社會風氣一變再變，民眾易接受新潮流，加上商人與山人的推波助瀾，利用蘇州文化優勢與經濟發達等因素，運用山人本身文化優勢與自我清閑形象的塑造，搭配商人推動，使大眾追求古物書畫的清賞，且加以仿效。如王士性在《廣志釋》所云：



姑蘇人聰慧好古，亦善倣古法為之，書畫之臨摹，鼎彝之治淬，能令真贗不辨。又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其賞識品第本精，故物莫能違。⁶⁸

以蘇州人聰慧與擅長仿製古物，說明蘇州人在古物市場的地位，加上擅長操弄流行風尚，使其引領吳地一帶的優雅風尚。其原因則在蘇州文人本來即擅長鑑賞，所以識見高人一等，說明了明中後期以後，為何山人多集中在蘇松一帶的緣由，因為此地形成一依靠古物風雅文化謀生的市場。同時，這一市場還逐漸變成流行時尚中心，

⁶⁶ 如山居清供、士人間話語中的清譚、清言小品，仿效山居樸素飲食的細緻山家清味，穿戴清雅放達的山人服巾等各方面，藉以體現與俗人的分別。在多處明人筆記小說中皆可見到，此處僅舉程羽文《清閑供》的「晨起，芰荷為衣，傍花枝吸露潤肺，禺中披古圖畫，展法帖臨池，晌午，脫巾石壁，據匡床，談齊諧山海，倦則取左宮枕，爛遊華胥國」為例。見程羽文著，《清閑供》，《筆記小說大觀 五編》（台北：新興，1974），第5冊，頁2788。

⁶⁷ 黃宗羲撰，《思舊錄》，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85），第26冊，頁6~7。

⁶⁸ 見王士性撰，呂景琳點校，《廣志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2，〈兩都〉，頁33。

可見山人與蘇州古物市場的依互關係。

綜上所論，山人文化的優勢與時代背景及山人形象塑造密切相關。明中後期的山人懂得運用先前積累的在文社人際網絡，進行形象改造，以清閑飄逸的山林名士風度登場。復因對政治失望，害怕黨爭攻訐及醜惡輿論的謗言，使山人與社會大眾轉以經營自身，希冀藉飄逸清閑的脫俗生活佈置，短暫逃避現實之苦悶。此種普遍逃避與內心苦悶的心態，使山人藉雅緻的藝術生活佈置，體現優雅氛圍，在「清」的情境佈置下，忘卻現實黑暗。此種以清閑優雅形象展現於人的特色，除了影響晚明社會文化風潮，也影響了後來部分山人眼見國事益不可為，更加沈迷於清閑生活之中，完全隨波逐流，也給後世批評晚明山人習氣的口實。社會大眾亦因所處境遇相同，使山人文化得以與大眾共鳴。若把山人文化於明中後期之地位與評價置於大時代環境下觀看，更可明瞭為何山人文化會被後世認為是晚明特色以及為何會被強烈抨擊了。



小結：

在敘述陳繼儒的生平時，從其 29 歲棄青襟，隱居小崑山以後，以四處館授謀生，與王錫爵、王世貞、陸樹聲、王衡、董其昌等名人交遊，使他成為江南知名文人。之後，復憑藉其清閑飄逸形象，表現山林文化中飄逸與藝術化生活佈置的優雅品味；配合其關心地方事務與國家時事，對國家地方多有建白的經世形象，說明陳繼儒的複雜性。點出陳繼儒清閑與戒懼的兩面性，以清雅飄逸的山居幽雅文化獲取社會美譽；復表現出謹慎戒懼心態，對於國家地方大事採取有選擇性的建議，在與權貴交往時，保持不沾鍋性格，冷靜旁觀，以此說明陳繼儒的人格特質，從中瞭解陳繼儒如何成為晚明最富盛名的知名文人。以陳繼儒的謀生方式與成名過程，說明陳繼儒所行謀生方式與成名途徑實與當時山人謀生與成名有驚人相似，點出兩者的關聯。之後，以此種藉詩文干遊士人，躋身上層文化交流圈，使文名提升達到社會聲望的

上揚，使之能衣食無缺滿足生活所需，述說何謂山人，表達了山人群體的內涵與謀生方式，而陳繼儒的正為此下一註腳。

藉著陳繼儒與山人謀生方式的討論，點出了為何同樣謀生方式在陳繼儒與山人實行下，時人卻對持評價兩極化。用雙方作比較，得出「干謁有道」即為最大原因，討論時人對於遊道的看法與山人看法，認為若遊道拿捏得宜，即可做到上下相需而不受時人抨擊。衍生出時人對於山人的評價問題以為陳繼儒在成名經過與謀生交遊方式皆與山人所行差不多，但山人於晚明卻備受譏彈，實與山人角色認知有重大關係，分成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方面說明。

以陳繼儒在政治上，不似其他醉生夢死的山人，鎮日沈迷享樂，且不鑽營官邸，不作相門山人，故社會聲名較佳，時人少有惡感。在經濟上，又因自身以出版與館授謀生，經濟自主，加上文名既高，求文者眾，且終生隱居山林，幾不入城，沒有四處主動干游士人謀求餽贈，以及作幫閑清客之事，給時人感覺有傳統山人隱居之風。在社會文化上，則利用時人對魏晉名士風範的嚮往，以山人身份推廣清雅飄逸的山居幽雅文化，一時聞名全國。

得出明中後期山人之所以受時人抨擊，與時人對山人的認知有極大關係。通過對明中後期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描繪與思想轉變，看出山人與傳統士人有極大不同。通過山人評價的觀察，看到山人其實正代表一群生活在與前期社會不同的現在變動社會上，有著對新社會的矛盾與困惑心態的一群中低階層士人，一方面摸索著如何憑自身文名才華拓展人際關係，以滿足自身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又須忍受時人尚未脫離山人即代表隱士高人的認知，抨擊山人，並以為山人代表當時社會的亂源。而隨著社會大眾逐漸接受新社會的轉變時，又要因應更多人投入山人這一群體，以自身聲名干求聲名利祿，但是卻又因組成份子混雜，使得遊道失據變成汨濫，復使時人對山人評價更差，因而力圖自清，才有許多被時人與後人目為山人的名人大肆

抨擊山人行徑，而這種種皆與時代有密切關係。

陳繼儒在此轉型期所達到的聲名與美譽，除了其遊道拿捏得宜與清楚明白自身山人角色與大眾於此時對山人的認知外，亦與陳繼儒本身所具備的清閑與戒懼兩面心態有所關聯，這種表現可用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精神加以體現，更能看出陳繼儒的特殊性與山人士人的異同。以下第二章將以此為主軸加以發展。



第二章 清閑與戒懼——陳繼儒的狷者心態

第一節 清閑優雅下的陳繼儒生活品味

一、林下隱逸之風與文化生活的顯現

明中晚期，山人以山居隱逸形象示人，然而，此時山人不像傳統隱士般以躬耕山林為主，正如陳繼儒《巖栖幽事》中自云：

古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釣弋，余禁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苦飢，四不能。乃可能者，為嘿處、淡飯、著述而已。¹

以四不能說明自己無法像古時隱者一樣刻苦耐勞，其欣羨的生活非山中自力更生的夷齊式貧苦生活，反而像自魏晉竹林七賢以降至元末明初的倪瓚、顧瑛等的林下優遊式的清閑優雅山居生活。既不放棄世俗享樂，復享隱逸高名，如錢謙益評陳繼儒「聲華浮動，享高名，食清福，古稱通隱，庶幾近之。」²被時人譽為比美南朝梁陶宏景與唐代李泌的山中宰相。³陳繼儒以山居生活得享高名清福的特色，在乾隆時人蔣士銓「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筆下，一語點出此一特色。⁴此種著重在山林生活的清閑優雅，不再強調山林隱逸的貧苦與清寒，利用時人對傳統清雅文化的欣羨，推動清閑優雅的藝術生活情境，正為中晚明社會風尚的特色，亦為山人文化的核心。⁵

¹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收於《寶顏堂秘笈》（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第21冊，頁8a。

²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頁638，〈陳徵士繼儒〉。

³ 出於「陳徵君繼儒宅門有額，曰山中宰相」，見王澐著，《雲間第宅志》，收於《百部叢書集成》（台北：藝文印書館，1968），564冊《藝海珠塵》13，頁5b。

⁴ 蔣士銓撰，邵海清校注，《臨川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齣，頁19，〈隱奸〉。

⁵ 關於中晚明社會風尚研究，近年來諸多學者多於此領域有所斬獲。如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

陳繼儒又以喜談種花植樹、安穩本色的生活方式，表現其山居清閑之風。既看不出為生活所困的貧苦，亦無仙家修仙的飄然，著重花草栽植佈置，以淡雅為主。⁶又以山居有八德勝城居，說明山居清閑幽靜的好處。⁷其體現的山居生活並非傳統山居清貧寂苦、足不出戶的景象，而是以山居清閑幽靜、少受俗人打攪的悠閒生活景象為重，強調山居的清靜閒適。其特點在於意境的呈現，旨在呈現一種平和沖淡的氛圍。⁸可見陳繼儒以淡宕悠閒心境去體會生活中的悠閒風雅意境。

陳繼儒嚮往的隱居形式為林下悠遊之風，極欣賞嵇康、王維、白居易、蘇東坡、趙孟頫、倪瓚、顧瑛等高士。在《妮古錄》中，即以嵇康、倪瓚林下悠遊為榜樣，以高士自詡。⁹在塑造林下悠遊高士風範上，陳繼儒以清雅飄逸為主要表現形式。通

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2005，頁1~54、〈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錯雜〉，《新史學》17：4，2006，頁73~141、〈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新史學》11：3，2000等文章。在士人文化上，以任俠、雅文化、藝術生活經營等子題為主，描繪一個文藝氣息濃厚的社會，文人在當中以詩文優遊其中，透過文人之間的相互交遊，架構出一個以文人文化為主的流行文化。把中晚明雅文化的流播作一論述，本文擬從這些基礎上，以山人這一群體來重新詮釋文藝社會與當時文人交遊結社的情況。在關於社會文化上的好古仿古消費風尚，以巫仁恕的消費文化為主，見巫仁恕，〈明代士大夫與轎子文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8，2002，頁1~70、〈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頁87~144、〈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向與新問題〉，《新史學》17：4，2006，頁217~252等文章。藉著市場仿古風氣與文人好古風來看雅文化如何被消費，同時這種消費文化又如何促進了社會上對於雅文化的狂熱；在文人旅遊中，則藉著文人的旅遊方式與描寫，表現出當時文人好遊之風。本文打算就文化市場的消費觀念來深入討論山人於其中的位置，與山人對江南雅文化市場的影響。另有大木康在其《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提及江南出版文化的盛行與當時書籍傳播的關連，建構出一套出版市場的通路出來，並且利用媒體傳播觀念來看此時的出版文化；以及金文京一系列關於山人相關論述，主張從事專門技藝與干謁手段的才是山人，並且利用當時山人的活動來與政治經濟作連結。最近，張德建的《明代山人文學研究》可說是大陸學者山人研究中，算是把山人作一總結與系統整理的一部著作，雖有細處的遺漏，然而對於山人的大觀念掌握可謂有所貢獻，而諸如李斌的〈晚明山人與晚明士風——以陳眉公為主線〉，《學術月刊》38：6（2006），頁142~147、夏咸淳的〈論晚明隱士陳繼儒〉，《天府新論》117（2004），頁131~135、趙軼峰〈山人與晚明社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89，2001：1，頁8~16，都對山人群體與陳繼儒作一基本且不錯的介紹。本文打算著重陳繼儒清雅生活的體現，說明陳繼儒之所以為時人目為山人佼佼者，與山人文化至此達於高峰之經過，以其從另一角度觀看明中晚期的社會文化變遷。

⁶ 見「然山中亦不能如道家保鍊吐納，以齋餘年，即佛藏六千卷，隨讀隨輟。惟喜與鄰翁僧談接花藝果種秫劬苓之法。其餘一味安穩本色而已」（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4a）。

⁷ 見「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僧、牛店、服馬驛也」（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4a）。

⁸ 見「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杓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3b）。

⁹ 陳繼儒，《妮古錄》，卷4，頁13a。

過述說著經由細密安排山居生活佈置下，體現親古拔韻的雅風，以植花栽樹、杖入老林、竹林靜臥、觀古畫書帖等方式外露，向世人展示其清閑飄逸生活態度。如陳繼儒於其《巖栖幽事》所云：

余每欲藏萬卷書，襲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牕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果爾，亦天壤一異人！』¹⁰

以藏異書表達對傳統士人藏書好古風氣，又以茅屋蘆簾、紙牕土壁顯現其清淡意向，復以嘯咏其中體現魏晉林下風範。陳繼儒在其全集中，有數量頗多的描寫山居田園詩作，如〈山居集蘇帖字〉所云：

竹高樹深，谷窈泉甘。
既安且閒，南山之南。
俯仰百歲，消磨豪傑。
何如此中？飲冰聽雪。
裂石介嶮，老木陰廬。
上德不德，左圖右書。
簡欲剗名，休養生息。
疏鑿畎畝，以樂賓客。¹¹



詩中以描寫高竹深樹，深谷甘泉的山中景象，效法陶淵明種豆南山下的安閒意境，消磨一生。過著飲冰聽雪、圖書常伴左右，逍遙自在並與同好相聚以樂的生活，藉詩歌表達自身對悠閒意境的看法。如他在〈山行〉所云：

久不出山中，信杖轉谿壑。

¹⁰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 6b。

¹¹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27，四言古詩，頁 1a~1b，〈山居集蘇帖字〉。

壑泉鳴淙淙，回互抱峯巒。
絕壁骨朱藤，藤花開復落。
下有擁膝人，孤吟自如昨。
此意誰與言？幽猿能領略。¹²

詩中以表達山居幽人形象為主，通過敘述山居倚杖入深壑，立地絕壁間，獨身欣賞藤花以猿猴為伴，孤吟當中的幽寂，表達其眼中的閑靜幽雅生活。另舉陳繼儒的〈新秋·其四〉¹³、〈山中雜詠·其三〉¹⁴、〈山中雜詠·其四〉¹⁵三則詩文，說明陳繼儒以吾本山中人自述，通過閒挂、閒揮、心手無事與愛說山中話等，表達其山居生活的清閑與幽雅，其山居生活重心在營造閒適無憂的清閑境地，顯示其山居生活的厥意與清雅。



陳繼儒的詩甚少描繪山居苦悶生活與躬耕日子，多以清閑悠然自得示人，營造一股山居清閑風氣出現。譬如《巖栖幽事》所云：

箕踞於斑竹林中，徒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書，或校讐四五字，或參諷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短琴無曲而有弦，長謳無腔而有音；激氣發於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以上，定亦嵇阮兄弟之間。¹⁶

表達出攤書隨觀、清閑隨意生活，比之羲皇上人與嵇康阮籍的林下悠遊之風，表現自身清閑風尚。另外，陳繼儒亦通過山居舟游描寫，既得舟游樂趣且兼顧呈現閑雅

¹²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27，五言古詩，頁 19a，〈山行〉。

¹³ 見「偶搖白羽扇，閒挂青松枝。心手多無事，況欲秋聲時。」（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28，五言絕句，頁 4b，〈新秋·其四〉）。

¹⁴ 見「閒揮白羽扇，一讀赤霄文。世外無生客，胸中有活雲。」（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28，五言絕句，頁 5a，〈山中雜詠·其三〉）。

¹⁵ 見「吾本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28，五言絕句，頁 5a，〈山中雜詠·其四〉）。

¹⁶ 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 12b~13a。

意境，表達脫俗又優雅的山居藝術生活。¹⁷使得陳繼儒山居生活成爲眾人模擬對象，成爲山人中的佼佼者。

在飲食上，陳繼儒以清淡儉樸爲尙，稱之爲山家清供，由飲食表現出山居生活的清淡高雅，以之爲山居清雅飲食標準。以不嗜奇珍異物，在山林田野中尋求常人所不知的清雅風味，把飲食與對清雅的詮釋結合在一起。故在敘述中常以郡志不載、爲山林野人所食等用語來強調其獨特清淡風味。利用飲食宣揚清雅文化意境的塑造。¹⁸

總之，陳繼儒的山居生活，以清閑優雅爲主，營造一種清閑雅淡的生活境界，以飄逸清雅的內涵，表達自身山人形象，以清、淡言行生活表露自身志向以及向時人展現自身形象。然而，此類以清閑飄逸示人的山中生活，實與山人汲汲生計奔波塵世形象不符，又與陳繼儒自身四處館授遊玩形象有所抵觸，成爲時人對山人一大詬病，也是山人現實與矛盾的苦處。爲因應此種情境，生活藝術化佈置與強調心的美感體驗言論於此時出現，如文震亨於《長物志》〈位置〉所云：

位置之法，繁簡不同，寒暑各異，高堂廣榭，曲房奧室，各有所宜，即如圖書鼎彝之屬，亦須安設得所，方如圖畫。雲林清秘，高梧古石中，僅一几一榻，令人想見其風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韻士所居，入門便有一種高雅絕俗之趣。¹⁹

¹⁷ 見「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菹脯。近則峯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 18a）。

¹⁸ 見「吾鄉苻菜爛煮之，其味如蜜，名曰苻酥。郡志不載，遂爲漁人野夫所食，此見於農田餘話。俟秋明水清時，載菊泛泖，膾鱸擣橙，並試前法，同與蓴絲薦酒」（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 17a）；與「三月茶笋初肥，梅風未困；九月蓴鱸正美，秫酒新香。勝客晴牕，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無過此時」（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 17b）；和「吾山無薇蕨，然梅花可以點湯，薈葡玉蘭可以醃麵，牡丹可以煎酥，玫瑰薔薇茱萸可以釀醬，枸杞鹿蔥紫荊藤花可以佐饌，其餘豆菜瓜蒞菜苗松粉又可以補笋脯之闕，此山癯食譜也」（陳繼儒輯，《巖栖幽事》，頁 23b）。

¹⁹ 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卷 10，頁 411，〈位置〉。

強調位置擺設可以呈現出個人品味，透過擺設觀看個人的韻味境界。因此有韻之士所居不必定在深山野壑，只要屋內擺設得當，也能體會出高雅絕俗的風骨，顯現幽人高士風致。這套位置擺設理論，以陳繼儒所行最為著名，其以佈置閒雅清淡又不落俗套聞名，因名氣甚大，使後人有云：「陳眉公每事好制新鮮，人則效法，其所坐椅曰眉公椅，所制巾曰眉公巾，所食餅曰眉公餅。」²⁰以陳繼儒所製事物，高雅新樣有古意，博得市民喜愛。另從蔣士銓譏諷陳繼儒的記載中，亦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²¹陳繼儒在生活佈置方面，旨在依據擺設位置，呈現好古意境，如其於《太平清話》有云：

瓶花置案頭亦各有相宜者。梅芬傲雪偏繞吟魂，杏蕊嬌春最憐裝鏡，梨花帶雨香閨斷腸，荷氣臨風紅顏露齒，海棠桃李爭豔綺席，牡丹芍藥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開笑語，幽蘭一把堪侔離。以此引類連情，趣多合。²²

藉花的擺設事宜，賦予花文化意涵，藉不同種類的花與傳統士人風雅文化意境結合一起，表現一種藝術涵養，從而建構一種文化藝術空間。陳繼儒亦在《太平清話》中，藉述說雅文化生活的準則，表現其清閑優雅品味，以某些事乃為一人獨享的樂趣，藉指定某些行為並搭配文人傳統文化意涵，以此為雅，以行此動作並仔細品嚐當中韻味者即為富文化涵養與優雅者。²³而在《巖栖幽事》中，則假借對各種事物的描寫，進一步賦予物事特定文化意涵，以視此事物時即為品嚐優雅意涵，表達自身對於雅文化看法。²⁴

²⁰ 柴萼撰，《梵天廬叢錄》，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 十七編》（台北：新興書局，1977），卷35，頁6391~6392，〈眉公馬桶〉。

²¹ 請參「把飲食衣服器皿各件東西，設法改造新樣，騙那市井小人，遂至財源滾滾，所以古有東坡之肉，今有眉公之糕；古有李斯狗枷，今有眉公馬桶」（蔣士銓撰，邵海清校注，《臨川夢》，第2齣，頁19，〈隱奸〉）。

²² 陳繼儒輯，《太平清話》，《寶顏堂秘笈》（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第21冊，頁17b~18a。

²³ 如「焚香、試茶、洗硯、鼓琴、校書、候月、聽雨、澆花、高臥、勘方、經行、負喧、釣魚、對畫、漱泉、支杖、禮佛、嘗酒、晏坐、翻經、看山、臨帖、倚竹，右皆一人獨享之樂」（陳繼儒，《太平清話》，頁18a）。

²⁴ 見「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

然而，在清雅優閒生活蔚為時尚時，亦會有人附庸風雅，東施效顰，以致出醜露乖。陳繼儒於《安得長者言》云：

人有好為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為富態而反貧者，有好為文態而反俗者，有好為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為淡態而反濃者，有好為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為奇態而反平者。²⁵

以社會在清閑雅淡與好古尚奇的盛行下，有許多東施效顰者紛紛加以仿效，只是因自身文化底蘊不夠以及過於做作等關係，適得其反，反為人所笑，表達他對附庸風雅者的譏諷。其實，這當中所批評者，正是當時社會所抨擊的山人汨濫現象，由於此時許多人自稱山人，卻無絲毫雅態，汲汲營於牟利求名，偏又附庸風雅以干游名士權貴，陳繼儒以此感言表達其內心對此輩看法。經由上述論述，由此通過對文化意境的掌控，詮釋雅俗之別，以確立自身對清閑文化生活的主導權。

總之，陳繼儒藉著自身隱居山林的優勢，以山中人自居，把傳統隱士的疾苦耐貧轉換成致力表達清寂飄逸，把重心放在「清」、「趣」二字，努力把隱士轉向逸民，並且在對外示人的過程中，以清閑優雅與好古平淡示人，展現出悠遊林下之風。²⁶配合物品擺設與器物鑑賞，賦予物品文化意涵，承襲唐宋文人鑑賞風雅習氣。通過空間與物品佈置，呈現如畫氛圍、好古意境，以之作為文人雅士表現風雅的媒介；亦滿足大眾附庸風雅的形式。透過以山林飄逸清雅示人，既受士夫青睞，復受時人崇拜，成為山人佼佼者，並且使山人在山人文化的推行上引起社會極大共鳴。以自身

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鼎彝令人古」（陳繼儒，《巖栖幽事》，頁 2a）。

²⁵ 陳繼儒，《安得長者言》，《寶顏堂秘笈》，第 22 冊，頁 8a-8b。

²⁶ 見「居山有四法：樹無行次，石無位置，屋無宏肆，心無機事」（陳繼儒，《巖栖幽事》，頁 25b）；與「不能卜居名山，即于崗阜迴複及林水幽翳處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苑為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床。著亭下挾書研以伴孤寂，攜琴奕以遲良友，凌晨杖策，抵暮言旋，此亦可以娛老也」（陳繼儒，《巖栖幽事》，頁 26b-27a）。

對於傳統文化與林下風範的掌握，利用清、淡、閒雅等社會流行創造自身名聲，以逸民文宗面貌立於人前。

二、清談與清言小品

明中後期，政權紛亂不斷，內廷與外廷相互傾軋，閣權與部權相爭、憲臺與閣權相鬥與宦官亂政等事，使士人心境趨向對政治失去熱情。加以中下層士子因久困場屋，謀生不易，紛紛外出干游謀名求利以養家，適逢此時江南經濟發達，文化事業蓬勃發展，出版文化鼎盛，山人提倡的山林優雅文化流行，出現許多清言雋語小品，更加確立時人對清雅優閒文化的推崇，使「清態」成爲山人標榜外在行爲以博名高的手段。



當中，以陳繼儒表現堪稱典範。其山居清閑優雅面貌，透過清言小品與出版傳播，使其隱逸山林、清雅閒淡形象爲人知曉。如費元祿於《小窗幽記》序文所言：

負一代盛名，立志高尚，著作等身，……語帶煙霞，韻諧金石，醒世持世，一字不落言筌。揮塵風生，直奪清談之席；解頤語妙，常發斑管之花。所謂端莊雜流離，爾雅兼溫文，有美斯臻，無奇不備。²⁷

可知陳繼儒在時人眼中是以立志高尚，著述繁多，且清言妙語，字字珠璣，以清談、清言小品的詼諧與冷靜醒世態度爲人所推崇，塑造一類似魏晉竹林七賢的林下高士風範。如《小窗幽記》中藉淡薄性格須從濃豔地方試驗，用以說明市隱、心隱論述；復以鎮定操守須看破紛擾環境，說明鎮定之操也能在紛擾環境中得到的，用以說明並非定要在山林中才能有淡薄鎮定操守，表達對雅俗生活與林下高士風範論述。²⁸

²⁷ 陳繼儒，《小窗幽記》，頁1，〈序文〉。

²⁸ 見「淡薄之守，須從穠艷場中試來；鎮定之操，還向紛紜境上堪過」（陳繼儒，《小窗幽記》，卷1，頁2，〈醒〉）。

陳繼儒復以雅俗分別爲主旨，以本屬文人雅事的書畫鼎彝鑑賞，受俗人仿效，使之過濫，則變俗事，批評當時過度附庸風雅風氣，以爲不可太過沈溺當中，要保持若即若離的態度才好。²⁹另外，亦通過由細緻近乎瑣碎的場景編排，表達理想優雅清閑的生活環境，清晰顯示生活佈置圖像；藉著由遠至近的場景編排，加上山居閑適情景之表述，清楚描繪出一幅山居幽遠淡雅之生活圖繪。³⁰

通過清言小品描繪自身形象的手段，陳繼儒身上可見多重面貌。如費元祿《巖栖幽事》敘文所云：

先生架學區中，揚才甸外，婆娑經典，不求浮世，人知放浪形骸，且寄高文，自探量晴雨，時出名言，聞參禪妙，如是而已。³¹

陳繼儒以飽讀經典，適世不避世，放浪形骸的魏晉高士形象爲人所知。參照前面欲藏萬卷異書的異人形象，可知其以異人、不羈的形象示人。另一方面，復以妙語清談廣爲人知，透過遊人、達士賞悟與窺境描寫，及與深山老衲、詩人騷客相清談、相戲，表達世外之感以凸顯自身飄逸清雅的高士面貌。³²

²⁹ 見「書圖受俗子品題，三生浩劫；鼎彝與市人鑒賞，千古奇冤。脫穎之才，處曩而後見；絕塵之足，歷塊以方知」（陳繼儒，《小窗幽記》，卷1，頁7，〈醒〉）；與「山栖是勝事，稍一縈戀則亦市朝；書畫鑒賞是雅事，稍一貪痴則亦商賈；詩酒是樂事，稍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豁達事，稍一為俗子所撓則亦苦海」（陳繼儒，《小窗幽記》，卷1，頁8，〈醒〉）。

³⁰ 見「門內有徑，徑欲曲；徑轉有屏，屏欲小；屏進有階，階欲平；階畔有花，花欲鮮；花外有牆，牆欲低；牆內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樸；亭後有竹，竹欲疏；竹盡有室，室欲幽；室傍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橋，橋欲危；橋邊有樹，樹欲高；樹蔭有草，草欲青；草上有渠，渠欲細；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寬；圃中有鶴，鶴欲舞；鶴報有客，客不俗；客至有酒，酒欲不却；酒行有醉，醉欲不歸」（陳繼儒，《小窗幽記》，卷6，頁111，〈景〉）。

³¹ 費元祿，《巖栖幽事》，頁2b，〈敘文〉。

³² 見「草色花香，遊人賞其真趣；桃開梅謝，達士悟其無常」（陳繼儒，《小窗幽記》，卷1，頁21，〈醒〉）；與「竹外窺鳥，樹外窺山，峰外窺雲，難道我有意無意；鶴來窺人，月來窺酒，雪來窺書，却看他有情無情」（陳繼儒，《小窗幽記》，卷3，頁48，〈峭〉）；以及「斜陽樹下，閑隨老衲清談；深雪堂中，戲與騷人自戰」（陳繼儒，《小窗幽記》，卷3，頁52，〈峭〉）。

陳繼儒也藉與他人對答形式，以清談風度示於人。如《巖栖幽事》自云：

客過草堂扣余巖栖之事，余倦于酬奮，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曰：『得閒多事外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籙、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寥寂？』，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³³

藉客問主答形式，仿效《世說新語》的問答體，以得閒事外、種花、春掃雪、看籙、夜焚香等，呈現清閑逍遙一面；復以研田書畫買賣為利養終老之道為其謀生方式，並以有客相訪通名，與客閒談，閒臥窗下自為羲皇上人，享受山中悠閒自在的生活。

通過清談、清言小品表現雋語妙談，陳繼儒一方面以此營造山林高士清新飄逸形象；另一方面又藉此對傳統山林隱逸文化進行改造，運用豐富文化內涵，使自身山林高士形象不致流於矯揉做作的表面形式。此種運用清談表現清態，以搏高士名之手段，其實也被當時山人群體在干游文士建立形象與自身文名時所用。然而，若無深厚文化根基輔助，則清言往往流於膚淺、矯揉，正如《小窗幽記》所云：

茶中著料，碗中著果，譬如玉貌加脂，娥眉著黛，翻累本色。煎茶非漫浪，要須人品與茶相得，故其法往往傳於高流隱逸，有煙霞泉石磊落胸次者。³⁴

以煎茶加料其中會翻累本色，適得其反。煎茶要與人品相配合，若非人品高尚、胸懷高人者，是不會泡出好茶的，把煎茶一事賦予文化意涵。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及本色一詞，由於萬曆朝間李贄童心說與三袁性靈說一出，文壇轉而以直抒性靈、以本色論文為主流，強調我手寫我口、用筆清新飄逸、新奇清爽，以自身率性自然

³³ 陳繼儒，《巖栖幽事》，頁 3a。

³⁴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 7，頁 132，〈韻〉。

為重心。山人在當中為主力，以陳繼儒清言小品最為清新飄逸，為當中佼佼者。³⁵當時狂禪風氣、僧衲文人化亦頗盛行，明中晚期，學術漸向三教合流發展，僧人喜作詩不避世外，文人亦大多喜談禪理，以與山人羽客高僧相清談為雅事，受到魏晉玄學清談影響甚深。然而，若與之相比，明代清談少有精闢哲理論述，反多詩文唱和與禪法討論罷了。明代清談反像宋代蘇軾與佛印相交的那種戲謔、風雅氣息。

陳繼儒憑藉清談與清言小品，以清閑優雅示人，配合本身深厚文化素養，在崇尚山林隱逸風潮下，以清閑為媒介，揉合魏晉名士風流與宋代風雅文化，經由日益發達的印刷事業與山人小品文學發達鼎盛，建構一套以清閑優雅為內涵，經由精緻清雅的日常生活與言行風度表現，塑造高士逸民風範的遊戲規則。這一套遊戲規則經由文人、山人間相互吹捧，並為社會大眾接受，成為當時社會風潮。以山人為主力，對山林隱逸、風雅文化、山居理想一系列敘述，一方面抒發心中隱世遯居山林理想；另一方面又以山居清雅閑淡生活外示社會大眾以搏佳名，為大眾所崇拜。當中，陳繼儒為最成功的例子，把清閑優雅與自身豐富學養完美結合在一起，成為山人佼佼者，使大眾留下深刻印象，名震江南。

陳繼儒又透過清言小品著作的流傳，推廣大眾對清雅文化的喜愛，利用自身享譽極高的文名行出版清雅文化書籍與接受地方官員資助，以供生活所需，重新包裝自己，以山林高士、清談妙語形象出現。在陳繼儒清閑優雅外貌下，蘊含了山人在之前為自身角色定位所做反省與嘗試，從陳繼儒身上完美融合清雅自持的心態與清楚知曉清閑生活展示的分寸，使陳繼儒能成為山人中的佼佼者與當時清雅文化的典型的地位。關於此點，站在批評角度的蔣士銓，見解可謂透徹，在《臨川夢》〈隱奸〉中以陳繼儒「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名盡力誇，獮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鍾鼎潤煙霞。」³⁶一針見血的把陳繼儒藉山林隱士身份，

³⁵ 關於明中後期小品文興盛之因，歷來眾多學者皆已提及，大體皆認為山人為小品文主力構成份子。可參閱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與張德建《明代山人文學研究》等著作。

³⁶ 蔣士銓撰，邵海清校注，《臨川夢》，第2齣，頁19，〈隱奸〉。

提倡清閑優雅的生活情趣，使自身文名提高，復以著述流傳倡言清言小品，以新奇清冷的言談，享譽晚明文壇，成為當時社會山林文化流傳的代表者。蔣士銓十分清楚明中後期當時社會背景，雖貶意十足，但仍把陳繼儒這種表演山林清雅外貌與著清言小品謀生情形描寫十分透徹。此種展示清雅外貌的特色正是山人文化流行一大助力。

第二節 戒懼心態——陳繼儒冷眼時局與畏謠心態

一、八十年來履薄臨深——陳繼儒之懼

陳繼儒在他人眼中，一方面以清雅飄逸之姿展現於他人之前；另一方面卻在與他人書信往來或自身文集語句間，以憂懷國事、履薄臨深、時時戒懼謹慎形象出現。細讀其文集，多感嘆士風躁熱、士子人云亦云，人品低下，以當時謗言流傳為戒。如陳繼儒說：「聞京師謂太原二揭，弟為床頭人，此說極可笑！」³⁷以萬曆三十五年（1607）王錫爵密揭案中，陳繼儒遭中傷，認為密揭是他替王錫爵草擬，並說他在王錫爵任首輔時，與之同住京師官邸，為相門山人，操弄朝政。³⁸陳繼儒對於此種惡意謗言充滿無奈與戒懼，時時以自身身居山林，安分守己為例，深恐為人所陷，此種深恐自身名聲過大而牽涉政治漩渦的謹戒正是陳繼儒的另一大特色。

明代自嘉靖以後，講學成風，士人言路大開，形成一股輿論壓力。然而，在歷經張居正的箝制言論、毀書院、禁講學後，言路逐漸走向激昂，漸被利用成黨爭工具，故有妖書案、續妖書案、山人蜚語案等。到了天啓魏忠賢亂政，政治愈加黑暗，言路受壓迫與沈默，使士人對政治漸趨失望。到崇禎年間，剪除魏闖，言路為之一

³⁷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6，頁49a~49b，〈與戴悟軒〉。

³⁸ 關於密揭一案，若想知道當時謠言內容，可參見沈德符撰，楊萬里校點，《萬曆野獲編》，收錄《明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冊，卷9，頁2147~2148，〈王文肅密揭之發〉。筆者於下文會有所著墨。

新，復逢此時國家內憂外患日趨嚴重，使激昂救國言論出現，愈到後期，愈辭出不窮。此時，中央官員內受皇帝剛復自用、猜忌個性困擾，外又有過於理想甚且流於偏激的言路輿論，使中央官員以致仕為重，不想待在政府任事。³⁹形成在野士人以入仕救國為重，朝廷士大夫以避禍致仕為主的局面。

陳繼儒的懼乃是對世局失望的體現。其在諸多著作中，多有提及對社會、政治與言路的看法。如他在《安得長者言》說：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為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⁴⁰

以士大夫心浮氣躁，專為立界牆全體面互相爭鬥，不去探討學問精義，專就門派正統加以爭辯；對於國家地方事務，則不講制度本質，專就表面東西加以爭論。以「士大夫有門戶之爭，故國家有門庭之寇」，⁴¹表達對門戶相爭的厭惡。復於〈答馮楨卿〉中呼籲在朝士大夫不要太過專注門戶爭鬥，以免被人從中得利，呼籲當時東林士人、楚黨、浙黨等士大夫不要拘泥於門戶之別，要以國事為重，做到中行不倚，行中獨之道以救國。⁴²

³⁹ 以上可參見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中提及張居正與當時明代中後期政局的關係，以及居正死後，其對明代中後期政局的影響；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則提及晚明當時社會風氣充斥一股戾氣，士人心態過於激昂且有人云亦云的情況出現，同時言路盛行與經世之論瀰漫於社會當中，但是士人卻都對從政不敢興趣。當中亦提及有關士風、遊道的一些檢討。至於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第三章至第七章，提及明中後期士人心態由徘徊世俗尋求新準則，到末世情懷徘徊救世與隱遁之間的矛盾。以上諸書皆有提及明代中後期士人心態的轉變，同時對當時政局社會演變亦有不錯言論。大致可知明中晚期政局不穩、社會上漸由士商混合、文人探索出新生活模式與社會風氣漸向文人化與雅俗交融邁進。

⁴⁰ 陳繼儒著，《安得長者言》，《寶顏堂秘笈》，第22冊，頁5b。

⁴¹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8，頁36a，〈答馮楨卿〉。

⁴² 參見「若門戶二字膠粘如故，鵝蚌兩持，漁人起而收其利，其在中獨乎？中行獨復，中立不倚，微獨人品攸繫，亦抑國事所關」（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8，頁36b，〈答馮楨卿〉）。

上述門戶之爭對明中後期政局社會影響甚大，其一開始乃源於講學上意見不同，所造成門戶相爭情形，所以陳繼儒對於講學門戶之爭亦表達其不滿之意。如在《安得長者言》云：

講道學者得其土苴，真可以治天下。但不可專立道學門戶，使人望而畏焉。嚴君平買十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今之士大夫不可不味此意也。⁴³

以講道學本為匡濟天下，不可在門戶上涇渭分明互相爭論，使人望而生畏。舉嚴君平（嚴遵）言行舉止為例，說明講學不可徒具表面，要注重實際內容，始有講學之實而無講學之名。陳繼儒〈答潘昭度〉亦云：

竊聞皇上以廉潔望人，欲其清也；以擔當望人，欲其任也；以公平望人，欲其和也。而諸君獨清於門戶、任於門戶、獨不和於門戶，雖堯舜奈之何哉！

44

以士人身處朝廷以致君堯舜為己任，朝廷亦以廉潔、公正、擔當為擇臣標準。然而，在朝大臣卻只專注在清理門戶，以門戶黨爭為己任，面對此情況，陳繼儒身處邦野亦發出感嘆，對於士人熱中門戶之爭深感無奈。

由於門戶爭鬥關係，使得當時士人互相攻訐以維護自身門戶名譽。在陳繼儒文集的尺牘部分中，大體提及時事社會狀況者，多提及社會上瀰漫一股纏言中傷風氣。言路輿論在長期政爭惡鬥下淪為門戶爭鬥工具，民間士子亦以謠言傳播、中傷為手段攻訐他人。如〈復馮文所〉所云：

⁴³ 陳繼儒，《安得長者言》，頁 6a~7a。

⁴⁴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頁 39a，〈答潘昭度〉。

近者，吳越之間，雌黃之口、玄黃之血，蓋焦龍矣！先生去鄉一步，便是上天百尺；去鄉一日，便是避世百年。俟異日而知鄙語之菲謬也！⁴⁵

說明近來吳越流言謗語增多，地方充斥中傷風氣，勸馮時可（馮文所）別回鄉以免落人口實受人攻訐。此種對於謗言的恐懼源於自身於萬曆 35 年(1607)，因密揭案爲人中傷，險些招來殺身之禍有關。他在〈復于中甫〉說：

此揭發時，弟之大兒就婚，小兒就試，略不知一毫影響。悠悠之說既云：『撰之自不肖，洩之自澹生。』真可大笑！妖書波及於吾丈，賴海內忠賢不平；密揭波及於弟，賴吾丈忠賢力辯。不然，弟且不知死所矣。⁴⁶

又在〈與戴悟軒〉中云：

聞京師謂太原二揭，弟為床頭人，此說極可笑！此公失而又失，若弟與聞必且救，正王澹生每向人云：『正謂不遇眉公，故納此敗闕』。若此揭自弟，攻者四起，此老方跳躁痛恨之不暇，而復聽辯揭乎？此故可以無辯，但恐以訛傳訛，非獨傷品，實且招禍。吾鄉賢者知，必笑而白之矣！前楊公薦疏，弟謂可懼不可喜，天道忌盈，人情責備，此大非佳事。自此疏一出，或忌或謗，信乎！好事不如無也。⁴⁷

文中以萬曆 35 年王錫爵上密揭給萬曆，以當時言官流於意氣之爭，認爲國家大亂與此輩脫不了關係。但此密揭被李三才所揭發，使得王錫爵被輿論所抨擊，牽連到陳繼儒，以爲陳繼儒正是手擬此揭者，抨擊陳繼儒干預朝政。陳繼儒寫信爲自己辯解，復以楊廷筠向萬曆推薦自己一事爲例，認爲自身受謗言騷擾，其實緣於眼紅嫉妒者

⁴⁵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30b，〈復馮文所〉。

⁴⁶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32a，〈復于中甫〉。

⁴⁷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頁 49a-49b，〈與戴悟軒〉。

嫉妒自身名高所誣。在文末發出身處此時好事不如無，以免惹禍上身的感慨。另在〈與王季重〉中亦提及對於士大夫相互讒言相害表示畏懼，且因對於謗言流佈有極深恐懼，產生強烈避世感嘆。⁴⁸

在陳繼儒對門戶爭鬥、謗言傷人感到畏懼與感嘆的同時，雖也有避世逃名念頭，但對國家大事、社會風尚卻仍持冷靜透徹看法，不像其他山人抱著自我享樂心態，如陳繼儒於〈復許繩齋郡侯〉云：

去冬旱，今春夏木棉至四五十文錢得斤許，田家終月洗手堅坐，如歲朝新婦，俗呼為少年荒。民間大袖尺八寸，腰間白練帶至三尺餘，甚有寫詩畫者。士民不揣良楛，試少，卻昇神明投郡閣前，蜂屯蟻聚，數日乃已。山澤之癯，只合閉門面牆，不忍見此咄咄事！⁴⁹

文中表達因木棉大豐收，使棉布價格大跌，致使服制因棉布價格低廉使得服飾樣式華麗不定；復因士子試少好湊熱鬧，抬神像前往郡署前胡鬧，陳繼儒以此為咄咄怪事，體現士風躁浮的一面。另亦可從陳繼儒回信申玄渚，以「邇來人情惡薄，反面操戈」之嘆，⁵⁰對於當時人情淡薄，人際關係險惡表示自身感覺，其於時事亦有評論。陳繼儒於〈答畢白陽（畢自嚴）〉云：

自來軍興則疆場之地苦，搜括則財富之地苦。今東南困荒、困役、困累年宿逋，富者貧，貧者竄，枵腹待盡之民與橫目不逞之輩所在而有。⁵¹

⁴⁸ 見「今浙中差強人意，然以開報復之門，不無隱憂。戰勝不與同賀，後日亦不與同弔。尺蠖潛龍皆明公綽綽餘也，屈申寧在眉睫間哉！」與「山築一椽，半匝溝沼，驅率兒輩蒹草種葯，一習墳史。此外，惟閉戶飽睡，東坡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頁 22b~23a，〈與王季重〉）。

⁴⁹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9a~9b，〈復許繩齋郡侯〉。

⁵⁰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36a，〈復申玄渚〉。

⁵¹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頁 4a，〈答畢白陽〉。

說明當時東南一帶所遇困境，以為這樣下去將使政府經濟命脈受到大打擊，使國家遭到災難。又在〈答陳默菴〉說：

今海內多故，其兵之始餉之終乎？物價之貴而不復賤也，錢法之賤而不復貴也，人情士風之好動而不復止也，好尖刻而不復長厚也。⁵²

說明當時世事每下愈況，不但兵餉調度有問題，物價愈貴而幣值愈賤，且社會風俗趨於浮動焦躁與尖刻。呈現出陳繼儒對社會當時看法，以為風俗如此差乃「世道詭隨」，而「詭隨者，第不顧是非而妄隨人耳」。⁵³為詭隨下一定義，以當今社會人云亦云且躁動刻薄。陳繼儒身處享樂風潮與門戶相爭激烈時代中，一方面因名高遭謗，感嘆時局士風澆薄，有懼名避世之感；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時局變化，提出許多見解，對時局有一透徹分析，但最終似仍以逃名為主要中心思想。

綜上所述，陳繼儒畏懼心態主要體現在：對言路輿論瀰漫一股毀謗風氣感到畏懼；對朝中門戶相爭、不勇於任事、閹寺干政與士大夫顛倒黑白感到失望；以及社會上充斥著詭隨風氣，人云亦云，穩健厚重之風已失，代之以浮躁、誇大風氣。又因舊價值觀已逝，新價值觀尚在摸索，社會價值多樣化，使許多前所未見的風氣出現，人心浮動，人們對未來充斥一股焦慮感。

陳繼儒身處當中，一方面以山人隱逸自居，隱士意念不曾忘歇，對政治亦有失望感受，多次有避世逃名之感；另一方面，因對政治、社會言路、士風有極深畏懼感，使其能冷靜、深刻的去觀察當時狀況。然而，其雖有避世逃名之感，卻沒有如隱士般的棄絕人世，也不似當時山人般沈浸自身優雅文化小天地中，對世事漠不關心。相反地，反而以其畏懼心態，在塵世間伏匍前進，除了冷靜的敏銳觀察時局，也不時對政事、社會提出建議。此種因畏懼心態而清楚認識自身，並努力適應生活，

⁵²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頁 16a，〈答陳默菴〉。

⁵³ 以上兩條見，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頁 16a~16b，〈答陳默菴〉。

正是陳繼儒人格一大特色。⁵⁴

二、陳繼儒冷眼旁觀時局的謹慎

陳繼儒，一方面以清雅山林文化實踐能手聞名當時，獨領風騷多年，為當時山人仿效對象；另一方面又以「雅尚高致，博學多聞，人皆老成足備顧問」⁵⁵的形象為人仰慕，有山中宰相之譽。⁵⁶後者名聲奠基於屢拒朝廷徵辟基礎上，此又與其戒懼心態相關。因對時局混亂心懷謹慎，明白須以圓通處世態度為主，免禍當代。此種由懼生慎的謹慎冷靜態度，使陳繼儒在時局觀察上比他人多了些清醒與冷靜。因其用謹慎心態看待時事，明白自身所處環境，以及明瞭時人對山人的認知與角色扮演，所以對於自身行為採取謹慎態度，不輕易作有傷自身名聲之事，同時也不輕易涉入政治泥潭，保持自身獨立性，與政治社會保持若即若離態度。以下就陳繼儒對政治社會的評論作一討論。



1、訛言謗言盛行：

陳繼儒對謠言傳播的畏懼，在上節已有諸多論述。關於謠言氾濫程度，另可於其著作中所表現的感嘆以得之。如《安得長者言》說明吳地風俗好謠言景象，並且以為這是游閒小人入門之漸，是非口舌聚集之地，陳繼儒認為地方如果無新聞可說，

⁵⁴ 關於繼儒的隱士討論與他人對繼儒的描寫，可參見張德建，〈末世的名士風度——陳繼儒芻議〉，《中州學刊》151，2006，頁224～227。文中對繼儒以隱士裝飾自身的享樂作討論，並且以為其乃浪得虛名之徒，其之所以受時人歡迎乃是其生活方式表達了當時大眾心中理想罷了；而李斌的〈晚明山人與晚明士風——以陳眉公為主線〉則採對繼儒隱士風範誇獎與肯定繼儒的論述；另外夏咸淳的〈論晚明隱士陳繼儒〉則以為繼儒的確有隱士風範存在，且與其他同時代士人相比，有一股憂世救國風範，既肯定繼儒憂世熱情，也不忘提及其清雅生活的享樂。不過，大抵上仍把繼儒個性分成兩面來討論，強調繼儒隱士風範者，會刻意忽略繼儒世俗的一面；而討論繼儒山人市儈一面者，又會忽視繼儒冷靜觀察時局與救世情懷的一面。筆者打算努力呈現繼儒這兩面性格以完整顯示繼儒。

⁵⁵ 陳夢蓮編，《眉公府君年譜》，頁479～480。

⁵⁶ 見崇禎10年，江西巡撫解學龍對繼儒的稱讚「本經術而翼古起衰，昌黎功遠，文章命世，真稱鄒魯之干城；匡濟填胸，不愧巖阿之宰相。」（《眉公府君年譜》，崇禎10年，頁481～482）可知當時繼儒確有享山中宰相之美名。

就是好風俗好世界。⁵⁷在〈復周懷魯撫台〉又云：

不曷嘆息是非倒置一至於此！某不特致疑今日之白簡，且轉疑古人之青史矣！某自丙戌年即裂青襟，里居教授，生平未嘗渡揚子江。且有謂太原公當國，而不肖同在京邸者，尤為可笑也！⁵⁸

以自身被訛言傳與王錫爵同在京師，干預朝政，作相門山人的勾當，嘆息社會上訛言謗言四出，不但今日官員的奏章不可信，就連史籍亦不可信，表達對世道紛亂的看法。在〈答錢彥林〉一文中，以「近來熒惑下降，赤舌燒人，朝野何止于此，雖一時未便請卹，久當自明。」⁵⁹說明當時政局混亂，謗言四起，對於明代後期訛言汨濫現象，陳繼儒對此抱著批評角度，抱著：「蝮螫空山，杜門杜口，百不與聞。……言外惟有感嘆！」來個冷眼旁觀。⁶⁰然而，此種退縮態度實有戒慎成分於其中，陳繼儒藉此安身遠離謗言風波。

這種對於社會上謗言四起，肆意攻訐的感嘆，可以陳繼儒於萬曆 35 年因為密揭案，被牽涉其中，連續向多人寫信以表示自身清白為例。陳繼儒以為王錫爵密揭案的爆發，跟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同時也幫王錫爵與王士騏（王澹生，王問伯）闢謠，駁斥坊間認為王錫爵密揭案的爆發與王士騏不滿王錫爵有關，認為密揭是王士騏賄賂王錫爵家僕並串通李三才所致。陳繼儒以王士騏在密揭案爆發後替自己辯護與兩家交情為辯，認為王錫爵的密揭在洩密後引起言官反彈，正是沒有與自己商量結果，陳繼儒對密揭內容深感不以為然。感嘆當時社會的訛言謗言威力，以為自身獲高名卻時時面對謗言的騷擾，深感戒懼，表達出陳繼儒對於訛言的觀感。⁶¹

⁵⁷ 見「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媾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蓋訛言之訛，化其言而為訛也」（陳繼儒，《安得長者言》，頁 7b）。

⁵⁸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27a，〈復周懷魯撫台〉。

⁵⁹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頁 42a，〈答錢彥林〉。

⁶⁰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頁 4b，〈答畢白陽〉。

⁶¹ 以上所言參見本章頁 53 註 46、47，以及《萬曆野獲編》，〈王文肅密揭之發〉，頁 2147~2148。

2、對講學看法：

陳繼儒對當時講學氾濫、言論空疏不切實際，多有批評，尤其對於講學家以門戶之別相爭不下，表示唾棄，以為把精力虛耗當中，無益當時日益危險局勢。多次表明門戶之爭不可有，講學不如講實務之主張。其對講學看法為：「吟詩劣于講書，罵座惡于足恭。兩而揆之，寧為薄幸狂夫，不作厚顏君子。」⁶²以為講學家雖孜孜以君子自勵，但在陳繼儒眼中看來，反不如一個胸懷鬱積的狂夫。因為狂夫至少表現出自身真性情，而人有真情乃真豪傑是晚明社會流行看法，諷刺道學家以君子自居，卻厚顏以虛名自重，把講學末風表露無遺。在〈復馮文所〉中，以講學產生弊病作一詳細解說為例：

憨山，今之洪覺範也。塵尾相難，使人流涎。不肖妄謂講學之地未免帶情識、粘名位，侈口而談，違心而應；涉世味饒，出世諦少。不若宗門老胡無眼棒頭尚能撼諸君子。⁶³

以為講學家不如佛門憨山大師的禪法講談，以講學之地「帶情識、粘名位」，「侈口而談，違心而應」，充滿求利虛偽的氣息，喪失學問探求的熱情與神聖性，不如佛門清言談禪來的清靜。復在〈答錢龍門〉中，以「縉紳講學不如實實講賦役，當道清詞訟不如實實清賦役」的呼聲，⁶⁴以為與其專注講學、清詞訟，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解決地方賦役問題，把賦役弊病解決掉，表現出務實治學觀點。

再者，陳繼儒對當時講學活動抱著不積極加入態度。以〈答耿邑侯〉云：

拓子游故祠，倡道學雅會，橫經主席皆當代之諍友諍臣，環堵觀風，絕方外

⁶²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3，頁47，〈峭〉。

⁶³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4，頁30a~30b，〈復馮文所〉。

⁶⁴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6，頁44b，〈答錢龍門〉。

之異聞異見，一變至道。……某幼學雕蟲，長漸畫虎，漱流枕石，投閒山林之間；入室升堂，未窺廊廡之末，何圖過聽，懷之好音。⁶⁵

以自身山林野人身份不去參加常熟縣令耿橘在虞山書院主持的講會。文中雖肯定講學雅集論學性質，以為多正人君子參列其中，但自身仍不輕易前往講會。此一審慎態度也表現在拒絕顧憲成東林書院講學邀約，如「槩川東林招講學，謝不往」。⁶⁶

其之所以對加入講會抱持此種謹慎態度，與當時環境有關，於〈與戴悟軒〉云：

前東林、常熟、杭州皆以書院相招，弟皆不敢赴會。非有異同，正為賢人君子相聚，一語之出皆有關繫。且縉紳多布衣少，豈可廁足其間以招攀緣之誚！

67

明白表示是因講學成員多縉紳，自己以布衣身份廁身其中，有干游諸大人之嫌，以及同列當中，若言語稍不慎，即可能惹禍上身的憂慮。另在〈復許繩齋郡侯〉中也以招講學不往，是因「知者以為畏大人，不知者恐以為遊大人也」，⁶⁸表現出畏與大人遊的謹慎態度。

3、社會風俗與士人習氣的憂患：

明萬曆後，社會風氣由奢華變為尚奇好異，且此時清雅休閒的山林文化亦漸領江南流行風潮。標榜山林文化的山人階層大興，以清閑優雅風度為時人所賞，使大眾崇拜山人，以為名士風度在此。此風所及，士人紛紛以好清言、清閑優雅生活態

⁶⁵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3，頁 9a~9b，〈答耿邑侯〉。

⁶⁶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9b，〈復許繩齋郡侯〉。

⁶⁷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頁 52a，〈與戴悟軒〉。

⁶⁸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9b，〈復許繩齋郡侯〉。

度與干遊文士名人以求名高等行徑為主。⁶⁹此種狀況下，陳繼儒復以藉閑居好處說明當時交接頻仍、世態炎涼與言論囂染的社會現象。⁷⁰

由陳繼儒對遊大人的謹慎態度，參照與他人尺牘往來語句中，顯示對社會習尚與士風敗壞的感嘆心情。如「俠之一字，昔以之加義氣，今以之加揮霍，只在氣魄與氣骨之分」，⁷¹表示當時任俠風氣流於狂放形式，只注重表面任俠氣魄，無前人任俠重義內涵。又藉當時「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妄生是非，故知無事人好事」⁷²的干游歪風，說明當時干游者變多，以好生事非、好詞訟生事為主。此種干游氾濫的風尚，似與山人詮釋的山林清閑文化盛行引起仿效，以四出干游仿效山人人際網絡有關。如於〈答劉乾所〉所云：「邇來文章之公器，變為情面之私交，心竊駭之」。⁷³又與在〈答錢仲芳〉所云：

邇來車騎連門，竿牘咽戶，便標作第一流人物。然易戒比匪，詩刺詭隨，二三多上，離上九亢悔，此不當兢兢恐懼，而乃沖沖而來乎？⁷⁴

以干游風氣盛行，文章成干游名士文人獲名求利的工具，文人藉詩文相互吹捧謀名，表示驚訝。認為此風使詩文變成個人交際與聲名獵取工具，讓詩文本為怡情養性的公器性質蒙羞。其認為干謁應抱著謹慎態度應對，怎可興致沖沖以詩文詭隨遞交？表現出他對干謁看法。

陳繼儒在士風觀察上，記載也非常多，以士風與世俗同化、士習充斥焦躁不安、社會附庸風雅者眾，以及好刺人隱私等感嘆為主，且因干游風氣過盛、文人相通，

⁶⁹ 如「奔走於權幸之門，自視不勝其榮，人竊以為辱；經營利名之場，操心不勝其苦，己反以為樂」（陳繼儒，《小窗幽記》，卷5，頁94，〈素〉）。

⁷⁰ 見「閑居之趣，快活有五：不與交接，免拜送之禮，一也；終日觀書鼓琴，二也；睡起隨意，無有拘碍，三也；不聞炎涼囂染，四也；能課子耕讀，五也」（陳繼儒，《小窗幽記》，卷5，頁96，〈素〉）。

⁷¹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1，頁9，〈醒〉。

⁷² 陳繼儒，《小窗幽記》，卷1，頁9，〈醒〉。

⁷³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8，頁9a，〈答劉乾所〉。

⁷⁴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8，頁19b，〈答錢仲芳〉。

互相吹捧，造成明後期名士風度流行，士人趨之若鶩。關於明後期名士熱現象，陳繼儒在〈答張紹和〉中以爲：「名士使少年後進如蠅聚羶而蛾赴火，不赴丘園高蹈科，則走不求聞達科。愧死矣！愧死矣！」⁷⁵說明名士熱引發士子希冀以山林逸士形象，或棄絕仕進形象，以山人之名來博得名士美名，求聞達於社會的現象。陳繼儒以爲後進士子爲一登名士之列，把山林高士逸民形象拿來炒作，真是世風日下！另在〈答朱滄起〉以「今朝野好學語、學步軍，竟是奴非主、是小兒非大人」，⁷⁶藉當時社會以《世說新語》、阮籍言行舉止爲尙，以爲名士風度在此。諷刺此爲邯鄲學步，畫虎不成反類犬。

關於士風弊病則以陳繼儒〈答錢龍門〉爲楔子，來看當時士風的衰落：

東南華其外而枯其中，管仲所謂：『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慾多，而民心燥。』今民心凋弊，不敢燥、不能燥，病在士大夫好廣田宅。豪者封釘扛臺，庸者因循苟且。絕不肯講求賦役為桑梓計，為子孫計耳。⁷⁷

說明東南地區的民困財窘，是因爲縉紳士夫好廣田宅，不顧財賦差役弊病叢生，以自身爲主，不考慮社稷將來。綜合上述種種社會風俗現象，可用陳繼儒〈答鄒愚谷〉中的一段話作總結所云：

大抵吾輩胸中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落意氣二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蓋騷雅既成新歡，則舉業淡矣；意氣若落故奪，則德性浮矣。目前惟有端居遵養，熟繙古史，兼閱新報，洗發洞達，肆力于場事，作少年科第、經世大儒，是所願耳。⁷⁸

⁷⁵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頁 2a，〈答張紹和〉。

⁷⁶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頁 30a，〈答朱滄起〉。

⁷⁷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頁 44a，〈答錢龍門〉。

⁷⁸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頁 44a，〈答鄒愚谷〉。

提及士風浮躁、空疏，跟胸懷騷雅與意氣有關。明中後期，士子對舉業熱情不再，加上山人以山林文化詮釋清閑優雅生活引起風潮，使士子紛紛以自身詩文才華干游權幸文士，以結文社、入講會為手段，交結同社會友，以相互吹捧求名為尚。加上王學興起，士人個性有所寄託，以心為主體，使自我意識變強。且王學以心性修養為主，強調一切行事準則以心中良知為判斷，不似朱子學以格致之道為重，強調依據外在經驗為判斷。雖然王學不排斥由外入內以修養身心，並且在王陽明講學時，也認為藉讀書以觀心性修養也是修心求良知手段的一種。不過，到再傳弟子如江西王學、泰州學派等，變成以心性論述為主，不再強調讀書靜心，遂有王學末流束書不觀的弊病產生。而且，講學本為經世宣教之用，但至後期，隨著愈來愈多投機分子進入講會以求名高的現象氾濫，使講學也成了李贄所謂「口談道德，志在穿窬」的表裡不一現象。⁷⁹

又自萬曆中期以降，隨著爭國本與言路喧囂日益嚴重，大部分士子受政治黑暗、社會混亂影響，心中有所焦慮、疑惑，不清楚自身價值在哪，使士風浮動，出現所謂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情況發生。陳繼儒以為若要改變此種人心浮躁狀態，須從習靜觀書入手，以靜由內修養心性，使心定之後，再以多讀史書以知古鑒今，培養幹練政事手段，立志重回科考熱情，以仕宦救國的經世致用學問為主。可知陳繼儒在看待士風浮躁過程中，持謹慎心態，對士風的看法與建議。

4、時事觀察與政局瞭解之實用態度：

陳繼儒在明中後期以山人布衣身份獨領風騷多年，除了其山林清雅形象塑造外，其對政局透徹地瞭解與關懷時事發展的胸懷亦為原因之一。在其文集中多次顯示對時局混亂、政局危險的關心，如〈復許繩齋郡侯〉所云：

⁷⁹ 李贄撰，張建業主編，劉幼生副主編，《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2，頁45，〈又與焦弱候〉。

目前朝局一似劫基方熱，冷眼旁觀，以厚薄定心地，以靜燥定人品，以吉凶定事業。⁸⁰

認為目前政治環境像一盤危機重重的險棋，此時若想挽回大局，必須用冷眼旁觀清醒態度看清事實，以敦厚心地、沉穩態度與趨吉避凶的謹慎本事來濟世。充分表達陳繼儒欲以沉穩、敦厚、謹慎濟世的想法。另在〈復楊弱水鹽臺〉中，則以「目前時局，爭殿之虎，戰野之龍，近者窺，遠者意。故逃禍莫如逃名，無譽乃所以無咎也。」⁸¹藉時局混亂說明與其費心躲避災禍，不如使名字不留人間以求完全避禍，認為人無過份美譽自不會招忌惹禍，既表達逃世觀念，又說明當時由於政局惡化，人心趨於失望遁逃的情況。此種對政局絕望態度，與當時環境有關，如陳繼儒在〈答徐霞客〉所說：

今寓內外故，堯舜在上，猶有水旱夷狄盜賊之憂，此無他也。遇豐稔，則吏梳而官篋之；遇流劫，則寇梳而兵篋之。⁸²

以當時雖有勵精圖治的聖主，但由於王朝體制已壞，百姓於豐年時，不僅被胥吏剝削，還被官員壓榨；在荒年時，則除驚怕賊寇打劫外，復怕官兵洗劫。顯示明晚期吏治敗壞與士兵腐敗弊病。也因此，他才會於〈答曹長卿〉中感嘆曰：

古今最怕者，夷狄、盜賊、水旱、災傷。今皆雜出於堯舜之世，可勝愁皇。去春伏枕半年，今秋閉門半月，不茶飮、不葯餌，幸而僥倖強起，然善忘善臥善嗔。⁸³

以自身病軀剛癒為背景，說明此時內憂外患、水旱災四起，表現出當今世界充滿憂

⁸⁰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10a，〈復許繩齋郡侯〉。

⁸¹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14a，〈復楊弱水鹽臺〉。

⁸²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頁 21a~21b，〈答徐霞客〉。

⁸³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頁 18b，〈答曹長卿〉。

愁與驚惶之意，心中充斥憂愁茫然心態。

由於對上述對政局不穩持著憂愁態度，使陳繼儒對時事觀察偏於實用取向與謹慎態度。他說：「弟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成何事？蓋行有行之事，非謀與懼不成；藏有藏之事，亦非謀與懼不成。」⁸⁴以為不論將大行於世或藏身世外，皆須以謹慎戒懼心態應對，才可成功活在當下。可知他看待時事是以冷靜旁觀態度加上切中時要的評論為主。例如萬曆 16 年（1588）東南大水，陳繼儒上書王錫爵，在〈上王荊石相公〉中云：

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即雨，隣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簑帶笠，倍添衣食奔走之勞；忍濕受饑，漸釀疾病死亡之禍。⁸⁵

藉水漫街市，人民為水阻隔，衣食頓成問題，且饑濕交迫下，有疾病產生之危險的敘述，說明水患嚴重情形。他又說：

獨是堤岸一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為僥倖數日之謀。而淫雨不休，泥土易敗，築於此潰於彼矣，成於尺敗於丈矣。況西北大風不時起發，太湖蒼雪之水滔滔東下，頃刻之間，頓至沒脛，則尚安有毫髮之望哉！

86

以水患嚴重，使人民被水隔絕於世，且大雨不止，使修築堤岸防水一事受到延宕。一方面因連日雨不止，使土壁不牢易毀；另一方面又有太湖河水滔滔東下之虞，使地處低窪的蘇松地區，在積雨未疏浚的情形下雪上加霜，人民苦不堪言。

⁸⁴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頁 22a~22b，〈與王季重〉。

⁸⁵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1b，〈上王荊石相公〉。

⁸⁶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2a~2b，〈上王荊石相公〉。

對於此次水患之所以如此嚴重，陳繼儒於〈上王荊石相公〉云：

辛酉以前，催科尚緩，風俗尚儉，民戶尚實，水勢尚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小民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鬧。此今日之水有加於嘉靖四十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繫舟楫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畱工本而濟餘喘。今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即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即欲播穀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花荳，花荳化為朽株矣；所恃者，瓜菜，瓜菜沒於草莽矣。⁸⁷

以為水災嚴重原因是社會習俗的改變與節氣因素。一方面，認為嘉靖 40 年（1561）以前，科捐少、風俗儉樸、人民從事本業者多，水利修築完善，使災情不顯。然而，如今（萬曆年間）隨著朝廷花費日趨侈靡、社會吹起奢華風尚、人民財力日益虛耗，水利修築逐漸敗壞，使災情損傷慘重，百姓負擔加重，人民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復因水災發生於五六月間，正處穀物青黃交接時期，稻穀半生不熟。遇大水肆虐，使人民在穀物尚未熟透無法採收與節氣不合無法重新耕作下陷於兩難局面。剩下可以倚恃的食物如花荳瓜菜，則又化為朽株不可食用，起不到充饑效用。

眼見此一情形，陳繼儒認為朝廷若不採斷然手段，以馬上賑濟災民為急，則人民將因饑饉鋌而走險作亂，故於同引文中云：

京師財富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早潦節調，風雨時適，則百姓猶得偷其耒耜桔槔之暇，以從事於桑麻杼軸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出畝田，水則守築河堤，赤足垢體惟恐不及，尚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尚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為丐，強

⁸⁷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1b~2a，〈上王荊石相公〉。

者不為盜乎？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則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顧乎？⁸⁸

以東南乃朝廷財賦重地入手，說明蘇松經濟上的重要性。人民平常由於能藉耕織並重應付朝廷稅收，但水患導致人民因忙於整田修堤，無暇負擔賦役，影響人民生計。文章採漸進式敘述，說明人民在無暇藉紡織易薪米下，將坐以待斃，進而只求生存結夥搶劫，在官府律令下，因進退皆死，因此可能不顧一切引發叛亂。藉著描述人民困境，警惕當權者注重此事，以賑濟災民、蠲免賦役為第一優先。

另外，亦可從〈與聶井愚使君〉所述萬曆 36 年（1608）陳繼儒親身參與賑濟活動，瞭解其對賑濟看法為何：

巨浸無門，萬民如在水牢中。水退之後，聚而求食，尚多隱憂。正如小兒痘症又不知幾變也。⁸⁹



認為水患初退，百姓於此時四出求食，在處理善後事宜中需多加小心謹慎，以處理小兒痘症的謹慎態度去面對。文章敘述其主持粥場賑濟事項，其云：

前承密諭，已默為料理久矣。第天馬山，華青搭界，比各鎮不同，故不得不精細以應嚴命。令粥冊以內不敢過減，稍汰其有田產、有生理者幾人而已；粥冊以內不敢過增，稍添其無戶籍、無控告者幾人而已。又恐人眾無統攝，必明白開寫於各畝之中。畝大有混擾，又明白分領於十甲之下。⁹⁰

陳繼儒在所居天馬山中，首倡開粥場賑濟災民。由於天馬山地處華亭青浦交界，災

⁸⁸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2b，〈上王荊石相公〉。

⁸⁹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4a，〈與聶井愚使君〉。

⁹⁰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4b~5a，〈與聶井愚使君〉。

民四出游食之際，名目混雜。其處理方法為繕寫粥冊，對照戶籍生計，把有能力生活者剔除賑濟名單，再將一些無戶籍遊民與無前科貧民加入粥冊賑濟。在秩序維護上，採分區排隊，細分籍地以求方便統攝。

上述，陳繼儒對此看法與實行態度，以關心民瘼、熱心地方事務為主。在處理賑濟事項與上書當道時，亦以謹慎態度呼籲當道關心人民生計為主要手段。另外，在〈與韓鵬南使君〉一文中，又以萬曆 36 年的青浦大水，建議青浦縣令韓原善均派縣內賦役，使人民平均分攤，不使里甲一甲民眾負擔過重，修築堤岸減輕水患損害。⁹¹對於賑災評論與建議事項，皆能冷靜審慎觀察。以為賑災為最要緊事，要先賑災以安民心，再以均派賦役或蠲免田賦為手段，與民修養。

陳繼儒除了對地方大事如東南大水表示關心外，對於流寇、滿州入侵問題亦有所關懷。例如孔有德攻登州一事，即在〈與朱敬韜〉一文云：

春寒甚於冬威，戰守將士，逃竄難民，其苦更可念也。孔賊勾虜，山東是其熟路，登州是其出路，至天津之米、德州之布不暇，剽掠視如囊中物耳。⁹²

以崇禎 4 年（1631）孔有德奉登萊巡撫孫元化命令，援助遼東大凌河之役。因天冷缺糧，復與守將不合，發動吳橋兵變，領兵攻打山東登州，後兵敗降清。又於同文中提及當時滿蒙合勢對明朝影響，云：

目前東虜與西虜合，遼事可知；安氏與蘭氏合，黔事可知。獨中州士大夫議論件件，意見相離。夫外合而內離，小醜合而君子離，天下事又可知！神旺者，欲談兵，何處下手？膽怯者，欲避兵，何處安身？⁹³

⁹¹ 相關事件請見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頁 15a~16b，〈與韓鵬南使君〉。

⁹²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頁 25a~25b，〈與朱敬韜〉。

⁹³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頁 26b，〈與朱敬韜〉。

以東虜與西虜合，指出滿州與蒙古結盟，帶給遼東防衛極大困擾，又指出當時西南貴州土司叛亂一事，因安氏與藺氏首領相合流，使氣勢更甚，造成明朝於此地圍剿的困難。但是，在此險惡環境下，朝中士大夫卻依舊熱衷黨爭傾軋，議論相左。陳繼儒以為外患合而朝中士夫離，對天下大事毫無幫助，心中言語充斥無奈。

陳繼儒也對當時剿撫政策決議上有所意見，如在〈答王念生〉云：

寇是撫局，奴是守局，此大段綱領。不能剿即不能撫，不掃寇則不能靖奴，此就中先後看。但寇之乞撫似真，奴之求款非實也，須看得分明講得透徹，痛快眉毛。兵口頭餉豈容易致其死命耶？今天下不必求文武全才，但求文武同心，如制撫、道總是也。⁹⁴

傾向先安內後攘外，主張對流寇剿撫並用，以剿逼撫；對滿州則先以守局為重，等待內部流寇剿滅後，再全力對付滿州入侵。文後亦提到如今之際不必硬求文武全才之士，只須文武將領同心即可。表達出對當時邊境文武官員不團結的感嘆。除此之外，文章又提到：「撫之一字，誰信而誰任之，誰始而誰終之，惟千慎萬慎為主。」⁹⁵表達招撫政策實行，在選擇人才時，要謹慎小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表達自身對於當時朝政用人存疑的風氣的看法。

在陳繼儒時事觀察與政局瞭解所表現的實用態度上，其態度上以冷靜謹慎地提出建言為主。他雖然關心國是，卻不熱中投身政治當中，反而表現出若即若離的審慎態度。然而，此種謹慎態度並不妨礙其於著作中提出大量策議，表達自身救世理想。諸如陳繼儒收錄於《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9、60 的策議內容，當中多涉及田賦、稅役、士風與時事，如〈清花詭議〉中提及田賦詭寄弊病，認為若要清除此弊，必

⁹⁴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頁 27a，〈答王念生〉。

⁹⁵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頁 27b，〈答王念生〉。

須要任用誠實幹練者，清查土地，把土地名目弄清楚。而〈辨惠桂二王祿米議〉中，則以松江府人民要負擔惠桂二王祿米為由，認為與其選用松江次白米，不如從上游運上白米以供二王使用，認為祿米若由松江府出，一來米差、二來人民用錢換糧多此一舉，建議直接從上白米處運至惠桂二王處，運費可由松府人民負擔，如此則既省力又便民。其他如〈縣總議〉以縣令下設一縣總以方便處理縣內事務，然須選用得人且可輪值任用，以免擾民；〈布解議〉、〈布稅議〉則以松江府負擔朝廷用布運送問題，提及運途遙遠與布料材質不佳，希望能折錢代替等等，皆可視為陳繼儒對時事、地方人民的關懷，在下章將會著重描述之，以彰顯陳繼儒關心時事的一面。陳繼儒於〈建州考〉中，詳述女真風俗，並對女真起源有所考證，且提及對付滿州方法與七大恨由來等。他所表現之冷靜審慎態度，使其能以實用取向議論當中，正因其謹慎態度，使陳繼儒得以用旁觀者的冷靜態度分析明代此時種種現象。

第三節 李贄、袁宏道與陳繼儒——狂者到狷者的調和

王陽明於正德年間在貴州龍場驛倡良知學，內容雖駁雜且摻入釋道思想，但仍以儒家立德立功濟世思想為主要核心，以成聖、濟世為王學最初訴求。王陽明之所以提倡心學就是見當時世風日下，人情日偷，想通過克己之道德修持與知行合一，以狂者胸次的極大熱情成大事、救社稷。⁹⁶如王陽明於〈年譜〉中自云：

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回護，才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⁹⁷

強調自身體悟到狂者積極進取精神，不顧世俗批評、直心而行，不作媚俗鄉愿，表現極大自信與熱情，以心中良知為形式準則，以狂者進取態度為主。

⁹⁶ 關於王學形成與其最初訴求，可見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第二章，頁126~271，〈王陽明心學品格與弘治、正德士人心態〉。

⁹⁷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35，頁1287，〈年譜三〉。

本節打算透過李贄、袁宏道、陳繼儒三人心態與處事態度，以自正德王學初興，歷經嘉靖、萬曆朝演變，於上述三人身上體現出一種由狂者積極進取精神漸向狷者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調和精神轉變趨勢。因為這三人皆活躍於萬曆時期，加以名氣皆極大，在社會上亦各有其影響力，藉此用以表述部分士人精神趨向。以李贄的狂傲、袁宏道的自適與陳繼儒的調和，描述由狂者熱情進取到狷者選擇性退縮精神的士人精神面貌轉變，以討論明中後期政局社會對士人思想的影響與陳繼儒久享大名原因。

一、李贄的狂與真

自王陽明以狂者自居，力倡心學後，歷經王艮、顏鈞、何心隱等泰州學派學者的闡發與拓展，使王學中狂者形象益加張揚。至李贄則以率性而為、絕假純真的言行態度，與積極進取、莫大自信及熱情的狂放心態，被時人目為異端教主，風靡一時。李贄，字卓吾，泉州人，生於嘉靖 6 年（1527），卒於萬曆 30 年（1602），為明中後期士人個性解放、崇尚真情的先驅者，亦為泰州學派發揚光大的主要人物。學者對李贄複雜人格、生平事蹟與思想的討論十分豐富。⁹⁸在此，僅以李贄的狂與真二部分來看其與中晚明政治社會的互動，凸顯其狂者形象。

從孔子《論語·子路》「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⁹⁹以為若無中行者時，以狂狷者為友猶可成君子，透露出狂狷者於孔子心中地位。至明人蔡清藉劃分中行、狂、狷三等，說明其看法，其於《四書蒙引》中云：

⁹⁸ 參見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第五章，頁 265~343，〈心學另類之人生悲劇〉；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第四章 第二節，頁 545~601，〈李贄——陽明心學轉折的標誌〉，以及史小軍《復古與新變：明代文人心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等書中所述。其對李贄思想傳承自泰州學派、好名心態與自由不受羈絆的心態多有著墨。另外，對李贄之死一事在思想史上有何意義亦多有解釋。

⁹⁹（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漢民整理，《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 23 冊，〈子路 第十三〉，頁 202。

大抵天下好人有三樣：一等，志極高而行不掩者，是之謂狂；又一等，智未及而守有餘者，是之謂狷；又一等，有狂者之志而所行又精密，有狷者之節而所行又不至于過激，此則所謂中行者也。中行者，其上也；狂者，其次也；狷者，又其次也。¹⁰⁰

蔡清以狂者代表志向高遠、充滿熱情與大無畏精神；狷者代表才力稍遜，開創不成而守成有餘，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選擇性態度處世，潔身自守。中行者則既有狂者才識與熱情，復具狷者審慎清醒態度；有狂狷者之優點，無狂狷者之缺點。蔡清以中行者為上等人格，狂者次之，狷者又次之，代表明人對中行者與狂狷者的看法。狂者比狷者好，是因為狂者具有志高遠與行不掩的積極精神，代表君子救世出位之思與任俠尚氣的狂傲風度，使人聯想晉人狂簡風範。

王學與泰州學派中皆以狂者自居，主張救世不二人選為狂者。蔡清在敘述狂狷者時，其劃分依據在才識高下，以為狷者智不及而守有餘，對於狂狷者的劃分較注重在狂者氣習，把狷者視為狂者稍遜。李贄亦有對狂狷者定義的闡釋，於〈與耿司寇告別〉云：

狂者不蹈故襲，不踐往跡，見識高矣。所謂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誰能當之！而不信凡鳥之平常，與己均同于物類，是以見雖高而不實，不實則不中行矣。狷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如夷齊之倫，其守定矣。所謂虎豹在山，百獸震恐，誰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獸，是故守雖定而不虛，不虛則不中行矣。¹⁰¹


李贄認為狂者是不依世俗既定規則行事，才力見識極高的智者。但因才高而自視過

¹⁰⁰ (明)蔡清撰，(明)莊煦編，《四書蒙引》，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1983) 206冊，卷7，頁316~317，〈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¹⁰¹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1，頁25，〈與耿司寇告別〉。

高，狂傲視物，以為自己與凡人不同，落輕狂疏放之弊，學問人品易不切實際。而狷者，則是嚴守道德本分，不因利害義，其品德節操就如伯夷叔齊一般高潔。然若過於注重自身道德修持，去人欲太過，將變成對事物過於苛刻、不知變通，犯了個性過偏急弊病。李贄認為狂者之疏放以致不實與狷者之太苛以致不虛都不切合中行，以為中行乃結合狂狷二者所成的中庸人格是最好的。此處，李贄所論的狂狷者不以智力高低定優劣，以為狂狷者乃不同處世態度所形成的人格，認為中行者乃狂狷者的綜合體，乃中庸之道的代表。李贄對狂狷者之間的優劣似無明白劃分，但仍以中行者為理想人格，以此作為明士人精神面貌的轉變與特質最為適合。

細觀李贄行事，知其處世態度偏向不依舊套的狂者風格。其以自身論人不從舊觀，體現張揚性格，如〈讀書樂·引〉所云：



天幸生我大膽，凡世人之所忻艷以為賢者，余多以為假，多以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以為可托國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矣昔人如此，非大膽而何？¹⁰²

文中，李贄自我張揚個性、口無遮掩性格躍然紙上，當中且隱含自明中期以後，社會標新立異風氣意味。此明白體現於李贄於七十歲時所做〈豫約〉上，其自云：

我愛書，四時祭祀必陳我所親校正批點與纂集鈔錄之書於供桌之右。……但我愛香，須燒好香；我愛錢，須燒好紙錢；我愛書，須牢收我書，一卷莫輕借人，時時搬出日頭晒晒，干便收訖。¹⁰³

明白表示李贄自白自己好書、好香、好錢等嗜好，將身後事如此瑣碎呈現紙上，除顯示其率真個性，亦可見其標新立異心態。其強調嗜書如命，要門徒以己書為供，

¹⁰²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6，頁213，〈讀書樂·引〉。

¹⁰³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4，頁169，〈豫約—早晚守塔〉。

按時祭祀；又要門徒牢收己書不輕易外借、更要時時愛護之，表現對自己著作的執著，與對立言事功的重視，為好名與立異標新的最佳體現。這也與當時文集氾濫，士人皆以刻書留名為潮相符。

李贄更進一步講述自身狂者特性乃是：「兄（鄧石陽）精切于人倫物理之間，一步不敢放過；我則從容於禮法之外，務以老而以佚。」¹⁰⁴以逍遙率性為主。李贄另在〈自贊〉中表達摻入狂痴妄為的面貌，如其自云：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繩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孔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¹⁰⁵

以自述一方面個性褊急、傲色視人、言詞粗鄙、思想狂放且有痴癖，加上行為不受傳統拘束，對待友朋則少交遊多真誠相待，旨在表現自己是一個率性而為又不蹈傳統之狂人。因其狂，故個性衝動有話直說；又因其狂，使其具高度自信且以天下為己任，有恃才傲物習性，堅信自身理想而痴迷當中不自覺，表達狂痴頑固的一面，把狂者特立獨行、不同流俗特色表露無遺。另一方面，又述說自身志求溫飽卻自視為夷齊高士之流；本性為齊人乞食他人，驕己妻妾，言行不一，又自認為飽道飫德的賢者；分明一介不與，卻如有莘氏般找藉口攻打夏領地；分明一毛不拔，卻又說楊朱學說賊害夫子仁道。李贄用此種反面諷刺說法，反襯自身狷介性格與譏諷滿嘴仁義道德、存理去欲卻言行不一的假道學。


¹⁰⁴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1，頁5，〈又答石陽太守〉。

¹⁰⁵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3，頁121，〈自贊〉。

上述，可見李贄另一特點，即求真。李贄在〈童心說〉中，即以不作偽爲主旨，認爲如果失去童心，失去對事物抱持真誠熱情與探求的赤子之心，人將有所蒙蔽，變的虛偽，迷失自身，無法以心爲良知追求知行合一的道德自持。若無真心，人亦無法顯露真切情感，亦將虛偽待人了。¹⁰⁶在此種理路下，李贄〈讀若無母寄書〉云：

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動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無必然與我同也，未有聞母此言而不痛哭者也。¹⁰⁷

以若無母寄信給若無，敦促早回，表母思子之情。李贄以此種真情流露，假真心訴諸文字當中，必然使人感同身受，發人肺腑。他對「真」的追求與嚮往，以其〈復焦弱侯〉一文所云知之：



弟嘗謂世間有三等人，致使世間不得太平，皆由兩頭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捨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內。此其人頗高，而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爲富貴，而外矯詞以爲不願，實欲托此以爲榮身之梯，又兼采仁義道德之事以自蓋。此其人身心俱勞，無足言者。獨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講學便講學，不喜講學便不肯講學。此一等人，身心俱泰，手足輕安，既無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表揚之丑，故可稱。¹⁰⁸

李贄把天下人分成三等，即處仕隱矛盾者、以隱搏仕者，以及仕隱相融者三類。當中，李贄以自身爲仕隱矛盾者，既想仕宦經世，又不耐官場黑暗，欣羨隱居自適生活，徘徊仕隱矛盾中。李贄最看不起者，乃是以隱搏仕者，認爲此種人「名爲山人

¹⁰⁶ 詳見「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3，頁92，〈童心說〉）。

¹⁰⁷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4，頁132，〈讀若無母寄書〉。

¹⁰⁸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2，頁42，〈復焦弱侯〉。

心同商賈；口談道德志在穿窬」，¹⁰⁹心裡虛偽不堪，不足與論。最佩服者，乃是心境上已完全調和，以「適世」為主，在仕隱之間率性而為，誠實面對心中感受，不再有所疑惑與矛盾，屬仕隱相融者。可見李贄的「真」主要在「做自己」，以心中直率想法達到言行合一，不再有所虛假與困惑。這與下論袁宏道陳繼儒對於仕隱看法相同，可作為當時士人對於仕隱出處的定位。

李贄十分痛恨言行不一、言敏於行的假道學，此種對真誠的信念促使李贄狂者面貌益趨明顯。因心中對真的追求與知行合一的實踐，使其擁有高度自信，狂者胸次與真心更使其成為狂痴文人代表。此種狂、真結合的特色，使他在假道學看法上，給予相當尖銳批判，如〈因記往事〉云：

嗟乎！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于泥塑，以為雜念不起，便是大聖人大賢人矣。其稍學奸詐者，又摻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為能明哲。¹¹⁰

在李贄筆下，講學者專務講學，不理時事與言敏於行的弊病被生動描繪出來。言行不一的假道學以講學為謀名逐利手段，視講學為利祿晉身之梯。正如他於〈又與焦弱侯〉所云：

今之所謂聖人者，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與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却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却聖人而以山人稱。輾轉反復，以欺世獲利，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志在穿窬。¹¹¹

¹⁰⁹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2，頁45，〈又與焦弱侯〉。

¹¹⁰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4，頁146，〈因記往事〉。

¹¹¹ 李贄，《焚書》，收錄於《李贄文集》，卷2，頁45，〈又與焦弱侯〉。

李贄把時人所稱聖人與山人皆視為欺世盜名之徒，以為兩者差異在手段不同，言語中顯露對時人虛偽的厭惡。以「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志在穿窬」一針見血指出當時山人假山人名號以干游謀名逐利；與講學者以講學，搏名求利，形成山人、講學家龍蛇混雜的弊端。

只是，李贄個性褊急執拗，雖見解精闢，只是常流於疏狂，有以偏蓋全之嫌。袁中道在論李贄《藏書》有云：

……于是上下數千年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為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多在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矯往之過，不無偏有輕重。而捨其批駁謔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竅之處，大有補於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為得罪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¹¹²

袁中道以別出心眼視李贄，以其狂真性格恣意評論且從實用角度視事。如認為秦始皇乃千古一帝、五代安樂公馮道乃安民定邦的高人，稱之為吏隱，認為張巡許遠死守睢陽，以數百人命成數十人名，十分不值，見其論人獨樹一格之處。其以實用濟世角度任意評論他人，雖有偏頗，但仍可見其有極深濟世念頭，對於世道淪喪抱持極大振衰之念。

綜上對李贄性格描述，顯示其狂放不拘、才氣縱橫與率性而為的一面，而其最愛之人——嵇康亦為狂放自恣且充滿真性情者。李贄一生雖倡言百姓日用即是道，以邇言為真理所在，並且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十足異端形象。但是，其實李贄與嵇康皆為以從容世俗禮法之外的曠達態度，隱藏其反思孔子真意的儒者。諷刺的是，兩人最後皆以名教罪人為政府論死。這或許乃狂者的積極進取精神，使之

¹¹² 袁中道，《珂雪齋前集》第四冊（台北：偉文，1976），卷16，頁1621，〈李溫陵傳〉。

有濟世之念，認為振世起衰捨我其誰，有吾一人往矣的豪俠氣概，所以會有「剛腸疾惡，輕事肆言，遇事輒發」的氣魄，¹¹³心中秉持絕假純真、嚮往原始單純不受拘束的生活，以從容禮法之外、率性而為之形式外露，卻不被時人所容視為名教叛徒的悲哀。

李贄狂真結合的狂者性格，一方面使其欲以豪俠任事自詡，以真情濟世；另一方面又厭惡宦海虛偽，人心狡詐，欲隱遁山林率性生活。故此種厭偽性格亦使其對假道學有極大批評，把狂者積極狂揚特點發揮淋漓盡致。故以李贄為晚明士人尚俠、任事濟世的狂揚心態代表，為積極入世狂者性格代表。

二、李贄之死——袁宏道的狂者向狷者過渡

在述說袁宏道自適態度前，先提萬曆 30 年(1602)李贄以名教罪人被逮至獄中，自縊身亡之事對當時士人有多大影響。由於李贄以狂放進取態度行事人間，直心而行，提倡日用即道、不以孔子是非為標準，以狂放行徑為士人所羨。但是，由於過於張狂，為當權者所不容，以致死於獄中，使崇尚狂者進取濟世精神的士子受到打擊。加上萬曆後期，隨著張居正過世，新政漸散，申時行柔媚侍主與神宗長期不上朝的影響下，加上稅監礦使橫行、爭國本問題，使朝中士夫紛爭不斷，朝政惡化。

面臨此種政事，士人除失望外，亦逐步喪失狂者從政濟世的熱情，轉向自身逸樂為主，故有袁宏道的自適態度與逸樂癖好出現。可謂李贄之死，使士人對狂者張揚性格進行反思，與思索自身如何在政事不可為與濟世不敢為的矛盾下做一抉擇，重新尋求自身價值觀。因此，才有自適論點出現，以尋求自身安逸舒適，舒緩內心的焦慮與苦悶。

¹¹³ 嵇康撰，崔富章註譯，莊耀郎校閱，《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1998），卷 2，頁 137，〈與山巨源絕交書〉。

隨著愈來愈多士人把對政治的進取精神轉向自身生活經營，除了造成山人以山林文化詮釋的清雅文化流行之外，也造成青樓名妓等情慾風尚興盛。更為重要者，由於士子專注於自身，使狂者內涵發生變化，由原本積極進取的外向濟世熱情變成狂放恣意的自我享樂，袁宏道正為狂者內涵逐漸轉化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他三度出入仕隱之間，除有其經濟因素，亦可見其仍有濟世理想；另一方面，又以「癖」作為真性情的寄託，以為「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¹¹⁴且不諱言自身縱情聲色的逸樂，象徵狂者依心而行的胸次漸向自身癖好轉化，亦包含狷者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退縮意涵於其中。可見袁宏道「自適」、「癖」的提出有其時代背景與特色。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生於隆慶2年（1568），卒於萬曆38年（1610），明代公安派領袖之一，提倡自適與癖的生活。其三度出入仕隱之間即被認為是自適態度的體現。¹¹⁵筆者以為此事亦可視為袁宏道由狂者至狷者過渡的要點，象徵士人對仕隱取舍的轉化與漸對政治失望的表徵。袁宏道與李贄相同，皆認為適世乃人生最高理想，他在〈徐漢明〉云：

弟觀世間學道有四種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諧世、有適世。玩世者，莊周、列禦寇、阮籍之徒是也。上下數千載，數人而已，已矣，不可復得矣。出世者，達摩、馬祖之屬皆是。其人一瞻一視，皆具鋒刃，以狠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行雖孤寂，志亦可取。諧世者，司寇以後一派措大，立定腳跟講道德仁義者是也。學問亦切近人情，但粘帶處多，不能迴脫蹊徑之外，所以用世有餘，超乘不足。獨有適世一種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為禪也，戒行不足；以為儒也，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於世不堪一務，最天下不緊要人。雖于世無所忤違，而賢人君

¹¹⁴ 張岱撰，于學周、田剛點校，《陶庵夢憶》（青島：青島出版社，2004），卷4，頁111，〈祁止祥癖〉。

¹¹⁵ 如史小軍於《復古與新變：明代文人心態史》頁212~225中，即認為袁宏道三度出入仕隱乃其自適生活的體現，表現出袁宏道不受拘束的曠達心態。

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人，以為自適之極，心竊慕之。¹¹⁶

以適世之人隨心所欲生活，悠遊於禪、儒與諸般雜藝間，任何事物均有涉獵，於世間卻不堪一務，無法托以重任，乃是天下最不緊要的閒人，於世間無所忤違的過日子，既無狂者濟世抱負，也無豪俠任誕激情，只是滿足於自我欲望、閒適自娛，沒有任何大起大落地過完一生。他的理想就是這種活於自身世界、不管外務的生活。這也與陳繼儒所謂「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的論點接近，以閒為主要生活態度，不再具有強烈濟世意願。由此，亦可見其適世理想與李贄的不同處。

雖說李、袁二人既為忘年好友，又同追求「適世」理想，但二人對人生態度有頗大差異。若以李贄為濟世狂者，則袁宏道即較偏向自身的任誕者。同時，李贄的狂乃是基於自身高度自信與積極進取的濟世精神，顯現其行不掩言的狂者胸次；與袁宏道偏於追求個人真心，以自適為主，經營自身小天地逸樂的退縮狂者，以個人高度自尊為主的人生追求有本質上的不同。這從其仕隱抉擇與對癖的闡發可窺知一二。

袁宏道在萬曆 23 年（1595）任吳縣縣令時，雖贏得「二百年來無此令矣」的美譽，¹¹⁷但袁宏道自己卻多次訴說吳縣任內之苦，以為做官乃是折磨人的事。如〈沈博士〉一文所云：

作吳令，無復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蟲，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圍之腰，綿於弱柳。¹¹⁸

¹¹⁶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 5，《錦帆集》之三 尺牘，頁 217~218，〈徐漢明〉。

¹¹⁷ 袁中道，《珂雪齋前集》，卷 17，頁 1707，〈吏部驗封司郎中郎行狀〉。

¹¹⁸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 5，《錦帆集》之三 尺牘，頁 219~220，〈沈博士〉。

認爲光處理縣內雜事與迎送上官就十分擾人，何況還有以詩文干游者與官府迎送等人情世故，使自身堂堂七尺身軀變爲柔弱如柳枝的軟骨頭，對此感到不習慣。在〈王以明〉一文則吐露無朋友可談心解悶之苦：

作吳令甚辛苦，然已知作令矣。吳中人無語我性命者，求以明先生一毫孔不可得，甚哉，法友之難也。¹¹⁹

向友朋訴說吳令雖公事繁忙，仍可忍受，只是無知心好友與自身暢談禪理，心靈無法脫離俗世，享受短暫脫俗之想。復向交好的兩位叔叔大吐身處繁華天堂卻無法享樂當中之苦，其〈蘭澤·雲澤叔〉云：

金閭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蕭鼓，歌童舞女，此豪客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陽，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遊客之樂，非令樂也。¹²⁰

以爲吳地雖然是士人夢想的花花世界，溫柔鄉與文化高潔景色優美之地，但是由於自己公務繁忙，撥不出時間細覽吳地這一花花世界，使袁宏道認爲吳令沒有想像中美好，無法同蘇軾、白樂天相同，在任內享受美好湖光與知心好友暢談的風雅。

在此種心態之下，袁宏道終於一次爆發地訴說吳令工作極苦處。在〈沈廣乘〉中自云：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

¹¹⁹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5，《錦帆集》之三 尺牘，頁223，〈王以明〉。

¹²⁰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5，《錦帆集》之三 尺牘，頁211，〈蘭澤·雲澤叔〉。

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惟有一段沒證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¹²¹

以作吳令種種苦處與自身受謗言中傷為理由，對吳縣感到畏懼與不耐。其所提吳令應對嘴臉，可用〈丘長孺〉一文，對官場迎送、交際之苦，做一總結視之：

作令備極丑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¹²²

把面對上官時，卑躬屈膝、盡心奉侍的奴僕樣；與面對往來公差，笑臉迎人，如侍奉貴客的妓女面貌；以及管理賦役時，一副錙銖必較、苛刻算計的低層雜吏一般；又必須如同媒婆般苦口婆心、舌燦蓮花地教諭百姓，把官場中虛偽、勞累面目生動呈現，於文後透露出自身不喜此種裝顏察色之事。

雖然袁宏道於上文敘述中，對擔任吳令一事大吐苦水，然而，他在任內卻備受百姓愛戴，為官精練公正，地方治理井井有條，可見其才幹。他也並非真想隱於山中做出世之想，從其三度出入仕隱間可以佐證。正如他本人於〈答王則之檢討〉所云：

京中有苦有樂，家中亦有苦有樂。京中之苦在拜客，家中之苦在無客可拜；京中之苦在閉口不得，家中之苦在開口不得；京中之苦以眼目為佛事，家中之苦以眉毛為佛事，兩苦相較，未知孰優孰劣。¹²³

¹²¹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5，《錦帆集》之三 尺牘，頁242，〈沈廣乘〉。

¹²²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5，《錦帆集》之三 尺牘，頁208，〈丘長孺〉。

¹²³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21，《瓶花齋集》之九 尺牘，頁741，〈答王則之檢討〉。

以仕隱各有苦處，當官有樂也有苦；山居家中亦有樂苦。袁宏道以為仕隱優劣各有千秋，不能抉擇。總的來說，即做官熱鬧不能享受片刻清閑；山居卻是想熱鬧也無法如願，清閑過頭反而孤寂。袁宏道對自身仕隱抉擇反覆曾作一自嘲敘述，於〈蘭澤·雲澤兩叔〉云：

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思閑靜，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樹下，則思量樹頭果；即在樹頭，則又思量樹下飯。往往復復，略無停刻，良亦苦矣。¹²⁴

在仕隱徘徊情形中，逐漸發展出自身處事態度的思索與調整，漸知曉自身喜熱鬧亦愛閑靜的矛盾性格，認為自己出入官場，雖心中以自適為主，但面臨濟世與出世的焦慮與矛盾仍覺無奈與痛苦。不過，他倒是明白表示自己以「自適」為理想，在〈人日自笑〉一詩中，袁宏道自云：

是官不垂紳，是農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隱不蒿萊，是貴著荷芰，是賤宛冠佩，是靜非杜門，是講非教誨，是釋長鬢鬚，是仙擁眉黛。條而哭寂林，條而喧囂闌。逢花即命歌，遇酒輒呼籩。一身等輕雲，飄然付大塊。試問空飛禽，澄潭影何在？曠哉龍屈伸，頽焉方外內。下惠本介和，夷逸乃清廢。

125

以追求自適生活的一面，表達其理想生活就是隨心所欲、不受任何拘束，嚮往似官非官、似農非農、似隱非隱、似儒非儒、似仙非仙的形象，動靜、貴賤與歌酒、屈伸之間的出處皆掌握在自身，此乃袁宏道在仕隱間，為排除自身矛盾痛苦所得出的

¹²⁴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5，《錦帆集》之三 尺牘，頁211，〈蘭澤、雲澤兩叔〉。

¹²⁵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33，《瀟碧堂集》之九 詩，頁1058，〈人日自笑〉。

自適論說。

由上述，可知自適核心在追求自我，尋求自身精神獨立。若將自適觀點與袁宏道提倡的有真癖才有真性情相搭配，以〈龔惟長先生〉的五快活為例，自云：

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烏，燭氣薰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蘆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鉢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¹²⁶

提及人生苦短，士人爲功名利祿所惑，身在苦中不知苦，提出真樂有五的五快活說。當中，除了第三快活表現出文人雅趣與偏向精神追求，其餘皆表露出對物欲的欣羨，以追求自身生活安逸快活爲主。當中也摻雜了雅俗交流訊息於其中，藉浮舟遊玩、歌劇鼓吹與列鼎度曲於堂等較屬文人趣味形象掩飾其對物欲露骨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敗盡家產，托鉢妓院行乞爲生也視作真樂之一，除表現其狂放態度與自適心態的調適外，更有一股任俠氣魄。只是，他把原本積極進取依心而行的狂者胸次，變成專注物質享樂上，任誕狂放的疏狂心態，與李贄狂者風度有根本上差異。

此種自我享樂的流露，除了代表面臨政治惡化，使部分士人轉而以佈置自身小天地爲寄託外，亦表現出自身真性情所在。如袁宏道在《瓶史》中以爲人有癖才顯

¹²⁶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5，《錦帆集》之3尺牘，頁205~206，〈龔惟長先生〉。

得有特色、有真心，具有磊傀僑逸風度：

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傀僑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沈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¹²⁷

藉歷來文士之癖，說明文士各種癖好為寄託其超拔高潔人品所現。在自身狂磊僑逸之氣不能抒發於外時，寄情於物成了宣洩內心焦慮苦悶出口。袁宏道認為一個有真性情、胸懷大志者必有所鍾情於某事物，即便犧牲生命亦不惜前往達成。

依照上述觀點，我們可假設袁宏道也把李贄入世情懷的狂者胸次也視為一種「癖」。李贄自身明白《藏書》、《焚書》的出版會給自己帶來麻煩，但基於好名與濟世心態，仍將書出版，或可視為一種「入世癖」或「好名癖」。只是此種「癖」偏向精神層面，與袁宏道的山水癖、青娥癖、酒癖、茶癖、花癖等重物質面的癖好不同。不過，雙方皆以真性情寄託自身於當中。此種「癖」的闡發，除了顯現士人對真性情的追求，亦代表部分士人以漸從經世救國的狂者理想，往自身小天地發展，希冀藉寄託各種癖中，當成麻醉自身對政局危亂的苦悶與宣洩內心仕隱矛盾心境的良藥。

袁宏道在生活處世上，一直以自適為主，以率真表現自我，使人們習於視其為晚明閑適文人代表。以其小品清新脫俗，對世事描述不多，沈湎於自身烏托邦中為定見。但他在〈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 其二〉云：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
邸報東作一筐灰，朝衣典與栽花市。
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字。

¹²⁷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24，《瓶史》，頁826，〈十好事〉。

旁人道我真贖贖，口不能答指山翠。
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
言既無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沈醉？
眼底濃濃一杯春，慟于洛陽少年淚！¹²⁸

詩意中所表現的，是眼賞春花美色卻以淚入酒，心中哀慟激發落淚；成束邸報皆投爐成了一筐筐灰燼；朝中大臣寧典官服以栽花養生，卻不理朝事；自身雖作千餘言風流可喜呈現悠然自在態度的新詞小詩，以清新飄逸示人，但他人如此認為時，自身卻是有苦難言，只好藉縱情山水以澆胸中塊壘。最後，在嚴密政治壓力與輿論橫行下，言語既無法真情流露，只好效法阮籍「口不擇人過」的謹戒心態，以醉待世了。一字一句道盡心中無奈與悲痛，同時也見到以自適為目標的宏道，依然沒有在心中仕隱、出入世的矛盾與對自身定義的焦慮下取得調和。

另外，袁宏道在〈猛虎行〉中，以強烈措辭直揭礦稅苛政，表達濃厚關懷民瘼之意，如其所云：

甲蟲蠹太平，搜利及丘空。
板卒附中官，鑽簇如蜂踴。
撫按不敢問，州縣被訶斥。
槌掠及平人，千里旱沙赤。
兵衛與郵傳，供億不知幾。
即使沙沙金，官支已倍蓰。
礦徒多劇盜，嗜利深無底。
一不酬所欲，忿決如狼豕。
三河及兩浙，在在竭膏髓。

¹²⁸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16，《瓶花齋集》之四詩，頁651，〈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 其二〉。

焉知疥癬憂，不延為瘡痂。¹²⁹

詩中描述萬曆時期礦禍嚴重，地方惡霸依附宦官斂財，為禍地方，撫按大官不敢過問，州縣長官完全管不著，敘述從三河到兩浙等東南地區皆受其害。詩意充分表達憂國憂民意涵，直揭「甲蟲蠹太平」，透露出國家處境如此，官員尚且粉飾太平，陰柔持政，表達其內心焦慮與關懷世道之心。

可知袁宏道雖以自適生活為理想，在仕隱之間達到率性而為，且不諱言自己有諸多癖好與當官實為金錢不足以供給花費的誠實態度。在生活美感經營上，有《瓶史》、《觴政》與諸多詩文敘述其藝術化生活情景佈置之書。乍看之下，袁宏道似乎為一悠遊林下的文人，但是，其仍保有部分狂者進取精神。在關懷時事與批評朝政的強度絲毫不輸李贄，只因他眼見達觀、李贄相繼因涉入政治事件而死，對朝政不明感到仕途前途茫然，開始在仕隱之間徘徊。

他在摸索過程中，提出「癖」、「自適」等理論，企圖找出在狂者「君子出位之思」的進取精神不被朝廷欣賞甚至引來殺身之禍下，如何替自身行藏出入定位。在面臨政治日益黑暗，狂者兼濟天下理想日難發揮的情形下，代之而起的，乃是轉向自身生活經營，希冀藉此寄託其苦悶感，使其有地方加以宣洩。在面臨自身仕隱之間的焦慮下，開始有放浪形骸如張鳳翼、張獻翼、王穉登等偏向世俗物質生活者；亦有如袁宏道、陳繼儒之流，由狂者義無反顧的積極濟世理想到狷者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選擇性退縮精神者。

袁宏道乃是由狂入狷的過渡型代表人物，雖然以自適出入仕隱之間，但內心卻因自身濟世理想礙於政局無法盡力發揮，持著自身定位的焦慮與兼濟天下理想無法達成的苦悶，雖以自適率性作為生活與處世態度的表率，但是依舊無法達到內心真

¹²⁹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13，《瓶花齋集》之一詩，頁581，〈猛虎行〉。

正的和諧。這種對於仕隱與濟世避世的焦慮與苦悶乃是同時代士人在大時代環境下所面臨共同特色，所以袁宏道的自適論與真癖說以及公安派之所以能風行明中後期，實與宏道由狂入狷探索文人自身定位有關。

三、 陳繼儒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心態

相較於處在仕隱矛盾，並對此有所焦慮的士人而言，陳繼儒一開始就把自身摒除在仕途之外。29歲科考失利後，放棄生員資格隱居小崑山中，以「隱」標示自身，對崇禎朝徵辟多次拒絕。因為一直是布衣身份，使陳繼儒沒有李贄、袁宏道那種有出入仕隱之間的困擾，心中不會有處仕途上卻見政局敗壞無力回天的無力感，以及既萌退隱山林之念後，復因強烈出位之思而又再度入仕的尷尬與無奈感，心中較為平靜舒緩，能心平氣和審視政事。亦因其心中較之李袁二人相對平靜，故能於童心說、自適說與性靈理論的實踐上，比二人更接近依心而行、自適閒散的生命觀。以自適為主，把山林文化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用自身山林生活作搭配，完美闡釋山林優雅文化精髓，表達山人文化中清閑優雅文化的特點，使其心態一直處於平和悠閒狀態。

然而，陳繼儒的山居生活與傳統隱士並不相同，其謀生方式非躬耕弋釣，而是以作家身分著書與評點出版各類書籍，藉以謀生。以文名建立自身於社會、士人間的地位，「聲名遠播，古之通隱，庶幾近之」¹³⁰成為明中晚期首屈一指的風雅大師。因有獨立經濟來源，可不為五斗米折腰，故心態上比袁宏道因老父期盼與經濟壓力多次出入仕隱；以及與李贄為養家活口而勉力為官來的平和與自重。這種心態也影響到他看待世事的態度。相較於李袁對時事激昂慷慨態度來說，陳繼儒乃為採取審慎態度視之。陳繼儒少對國家大事提出尖刻批判，看法偏向冷靜分析並委婉表達生民之苦與朝政之亂的感慨；在事情處理上不似李贄、達觀般狂放激揚，以大無畏精

¹³⁰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頁637，〈陳徵士繼儒〉。

神行事。他會優先考慮自身安危，思索在不危害自身下，達到改善朝政目標，體現一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精神。

關於狷者精神，顏元於《顏習齋言行錄》有云：

「狷者有所不為」，是夫子狀他一段謹飭古板意思。凡作想遇事，都向裏收斂，將來常常把定門關。凡欲非道非義，固斷斷不染，即遇人物亦若有不輕交、不願交、不敢交意。即遇道德功名事業，亦若有不輕做、不願做、不敢做意，故謂之「有所不為」。每當進時，亦好急流勇退；每當取時，卻是得舍便舍，是狷者真面目也。守有餘，只其中一意耳。¹³¹

以「狷者有所不為」指凡事考慮周詳，不輕易行動，遇時事不佳，則把持心念不同流合污，屬於嚴謹戒慎的處事態度。狷者面貌並非只是守有餘而力不足，在進取時能冷靜審視時事而急流勇退；取捨時則能看清時勢當機立斷，該捨就捨，把狷者冷靜審視、謹慎周詳特色描述一清二楚。在待人處事上，則以不輕、不願、不敢三不為特色，除了表達其內心戒懼謹慎外，也反映在處事上的圓通為其特色。

陳繼儒與徐階、王世貞、陸樹聲、王錫爵等交善，也與顧憲成、鄒迪光、顧養謙等有來往。其交遊之廣可從文集中的序文、壽序與尺牘窺知一二，幾乎所有知名文人名妓皆與其有所交遊。其文名遠播，使他人欲藉其名以晉升名士之階；對於來者皆不輕易拒絕，與其交遊態度以淡（不輕交）有關。

陳繼儒圓通淡交的處事方式，與當時言論毀謗成風、政治黑暗有關。明晚期社會上謠言成風，士子以謗言相害，使陳繼儒對交遊採取謹慎態度，以嵇康「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的林下高士風範自詡；以阮籍「口不論人過」為待人之道，少有激

¹³¹ 顏元撰，王星賢、張芥塵、郭征點校，《顏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顏習齋言行錄》，卷下，頁661，〈鼓琴 第十一〉。

烈批評他人之處。有趣的是，李贄、陳繼儒均以嵇康為其自身所嚮往的理想人格，但雙方著重點卻有極大不同。李贄喜愛嵇康純真狂放的一面；陳繼儒則注重嵇康悠悠忽忽的林下高士風範。由此比較，可知其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精神乃是不學嵇康表達鮮明政治立場與特立獨行，寧可學阮籍以「口不論人過」為保身之道，配合嵇康「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的高士形象，在不得罪當道下，行有為之事。

綜觀陳繼儒的行事，可知其以謹慎戒懼為主，不似李贄、袁宏道於詩文內強烈表達對政治的不滿。他在詩文中少有透露對當今政局混亂的不滿情緒，反以內斂表達方式提出，平和深沈地述說自身看法。其〈望歲〉云：

淮北炊骸食，江東獨晏然。

飛蝗渡河死，耕犢似人眠。

但問平安竹，無愁斥鹵田。

歲星今在斗，吳越定逢年。¹³²



詩中以淮北發生人相食的大饑荒，江東則一派蝗蟲不侵、耕牛悠閒景象，人們不愁糧食不足以開鹽地增加稻作，只問竹子栽種安否。最後提到觀測星象時，歲星在斗宿位，吳越地方來年定是豐年。文意中似乎以江南地方繁華富庶為描述重點，卻在「淮北炊骸食，江東獨晏然」一句，以強烈對比述說江南富庶情形，對江南只關心園藝栽種，不去憂愁開拓新田地表示憂心，可以最後一句雖說明吳越來年定是豐年，但也可說成陳繼儒經由豐年之測，提醒吳越地方人民要做好準備，以免當發生如淮北一樣的大饑荒時，重蹈淮北覆轍，詩意隱晦表達其憂患意識。

在〈移樹〉一詩中，則自述心境，以求安樂為主：

¹³²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30，五言律詩，頁 12a，〈望歲〉。

老悔浮名早，生憎見事遲。
無書通劔客，荷鍤學場師。
近得移花法，休使教樹知。
俄看春彩艷，造物豈我私。¹³³

詩中表達對名聲過盛的慎懼，以及認為自身見事不明的遺憾。由此二點，似可認為陳繼儒理想處事態度為謹名慎事、見事機敏，以保護自身為主，故詩後有學移花法蒔花藝草為樂的描述。此種懼盛名與謹事行的態度實與當時謗言成風、士習浮躁有關，造成陳繼儒向內收斂性格。在〈閉關 其二〉一詩，則表現另一種外在面貌，藉以隱藏他內心真意：

本是谷中仙，自稱谷中叟，
床頭酒十千，籬下菊重九，
青雀冠不簪，白羽扇在手，
客去獨焚香，高樓禮星斗。¹³⁴



陳繼儒以谷中仙自許，對外自稱谷中叟，以阮籍嗜酒、陶淵明採菊，與頭頂道冠、手持羽扇的林下高士示人；又以對客清談、焚香獨坐禮拜星斗於高樓上為表述。乍看之下，陳繼儒以清雅玄遠氣氛，營造其高士風度，彷彿陳繼儒為一豁達看破紅塵之世外高士。然若從詩題〈閉關〉與其行事來看，或可解釋成陳繼儒避名稱谷中叟自安；以阮籍大醉求避禍、陶淵明採菊東籬下以遠離政治黑暗明志；以道服示人卻不離世，以羽扇對客清談，避論時事以免落人口實。在內心謹慎心態中，以獨坐焚香禮拜星斗閉口為遠禍法門。詩題〈閉關〉可理解為在政局危亂、社會動盪時期，以安身保命為主，閉塵世險惡之關，用清玄飄逸形象藏避禍逃名之心，用此角度觀之，似可更貼切其戒懼與圓通的處事之道。另外，詩中用阮籍、陶淵明典故，除有

¹³³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30，五言律詩，頁 14b，〈移樹〉。

¹³⁴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30，五言律詩，頁 18b，〈閉關 其二〉。

高隱風度意涵外，亦包含兩者皆以眼見政局黑暗，欲避禍逃名以求全身之內涵存在。這一面亦為其狷者精神中謹懼有所不為之重點所在。

在狷者有所不為原則下，陳繼儒雖屢次上書當道，為民請命，但其所用方法皆以冷靜分析，在不得罪當道的安身保命下進行。在這一情形下，陳繼儒常託言逃名、賣痴呆以求全身。如〈花朝〉所云：

美滿春眠起較遲，五更常失杞橋期，
愁添白髮餐雲母，戲寫青山付雪兒，
暖玉棋消千日酒，冷金箋寫百花詩，
近來學得長生訣，一味賣獸兼賣痴。¹³⁵

以春眠不覺曉開頭，述說春日悠閒使人慵懶遲起，表現「懶」的悠閒與自適；再述餐雲母以修仙，以唐寅「閒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為榜樣，以書寫書畫付歌姬名妓顯示灑脫；最後，以暖玉棋、冷金箋表示山居閑雅生活。表面上，本詩似旨在抒發其山居生活閑適優雅之愜意，藉一連串典故運用與意境呈現表露出山居生活閑適清雅、超脫俗世之輕靈。但是，若從最後一句「近來學得長生訣，一味賣獸兼賣痴」著手，似又與其詩意中呈現優雅清閑風格有所扞格。

承上，若從陳繼儒有所不為的安身精神視之，可解釋成在描繪山居清閑生活下，身處政局社會紛亂中，欲效睡仙陳搏以睡待世；因愁時局而添生白髮，欲以餌食仙術修仙置身事外；用戲寫青山賣，不使造業錢的遊戲人生態度以表心中無奈處；最後以欲求長生平安於世，只有以獸、痴外貌處事以遠禍來解釋之。此處「獸」、「痴」當理解成陳繼儒賴以保身的處世方針。痴字，有痴迷、憨呆之意，明人習把癖、痴、癡三者並用，泛指沈迷事物的狀態，故痴字可指其欲以山居書畫營造藝術生活的理

¹³⁵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31，七言律詩，頁1a~1b，〈花朝〉。

想鄉，以之求脫離俗世紛擾以保身，此可從其大量山居詩、田園詩看出其以寄情外物，遠離當世紛亂政局求明哲保身。而獸字則有隱含藏拙之意，以口訥面樸示人，心懷戒懼心態，口不擇人過，用隨和憨厚態度處世。

綜上所述，陳繼儒因時局日益混亂，心懷出世之思，但心中仍有憂患時事之念，故藉寄情外物的「痴」試圖尋求自身在出處之間的位置；又用隨和藏拙的「獸」行濟時救民之舉，以消除心中空有濟世情懷而無法展開的焦慮感。加上萬曆中期以後，童心說、性靈說強調真心處世，以自適為目標，使其「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心態得到共鳴與發展，形成以「痴」、「獸」二字尋求自適生活與自身定位的處世方法。

在獸痴處世態度下，其對時事關懷不以慷慨激昂為尚，反以冷靜旁觀為主，如其過東林書院抒發黨爭一事的感慨為例，其〈過東林有感〉有云：

城隅歸羽夕陽時，不是深秋也自悲。

川上水流君子澤，窓前草護黨人碑。

魚龍混雜元難辨，玉石俱焚祇為誰。

獨有草堂三四柳，殷勤枝葉向東垂。¹³⁶

以感傷語調述說夕陽下座落城隅的東林書院，在黨人遇捕，碑前雜草掩埋黨人碑，獨留書院外江上水流如君子德澤般川流不息。面臨如此荒蕪景象，使人產生似深秋的哀傷感。對於東林諸君所遇，陳繼儒感傷之餘，也明白瞭解到此種意氣之爭，造成良莠不齊有投機者趁時混入其中的弊病。最後，於詩末發出「玉石俱焚祇為誰，獨有草堂三四柳，殷勤枝葉向東垂」之感語，表示雙方玉石俱焚只為誰？一開始都是抱著濟時雄心，只是隨著立場不同而紛爭愈加激烈，導致玉石俱焚罷了！以草堂

¹³⁶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31，七言律詩，頁 29a，〈過東林有感〉。

三四柳喻東林剩餘者，說明其仍心懷熱誠向君王所在東方等待救世機運，在詩文中流露一股憂時感懷的真性情。然而，若與李贄、袁宏道等近狂者心態士人相比，陳繼儒于詩中表達的仍為對時局的感傷，多了感性卻少了一股激情，少有抨擊政府蠹政言行，屬有所不為的退縮型狷者心態。

陳繼儒亦有感懷時局紛亂，欲退縮求自保之語，如其〈避暑〉所云：

避暑閒逢谷口樵，負薪城裏到家遙。

大都陳粟如珠玉，也有新聞說市朝。

行雨龍猶潛洞壑，食人虎豈問賢豪。

是非聒耳何時靜，我欲風前擲許瓢。¹³⁷

以自身巧遇谷口樵，邀返家談話，藉京城米價騰貴，時事新聞的談說，感嘆及時濟世的行雨龍賢才猶蜷伏草莽，未被發掘；暴政如猛虎食人，不論賢豪一律受到欺凌。面臨此種政局，感嘆是非攻訐何時能平靜，以許由掛瓢典故為例，說明自身欲隱居遁世的念頭。透露出自身既有說市朝討論時事之舉，但亦有許由掛瓢的隱世衝動，表達陳繼儒對出處身懷若即若離態度，呈現出其有所選擇的狷者精神。

小結：

藉由描述陳繼儒清閑與戒懼這兩種態度，討論其以山中人身份，隱居山林，闡釋山林文化，以清閑優雅為精髓，藉清言小品書寫、清談，以及對生活的講究，使山林文化流行於晚明，山人得以藉詮釋山林文化成為晚明社會文化流行主體。也因此，使陳繼儒成為山人佼佼者。並且，由於山林文化的盛行，使得平民自稱山人以謀名利的現象亦隨之氾濫，開始出現對於附庸風雅與強作清態等現象進行抨擊，

¹³⁷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31，七言律詩，頁30a，〈避暑〉。

形成晚明時人對於山人的抨擊。影響所及，連陳繼儒的戒懼心態，亦受影響。

關於陳繼儒戒懼心態描寫，以訛言謗言的興起、門派鬥爭與士風焦躁人云亦云為例，認為陳繼儒因高名所累，對於當時士風的訛言與謗言流傳深感畏懼，以密揭案為主力，說明陳繼儒的戒慎與恐懼，得出陳繼儒的懼高名與慎言行，由此討論其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精神。以李贄、袁宏道與陳繼儒為主，描繪由狂者向狷者心態變化的軌跡。綜合李贄到袁宏道再至陳繼儒的心態及其暗合的士人潮流，看到一股由狂者到狷者轉化的心態軌跡，與當時社會經濟、政局變動相互動。

以李贄代表狂者積極精神，一方面體現王學固有的狂者高度自信與濟世情懷；另一方面則體現於因社會經濟持續轉變，人心奔利，出現許多山人、講學家汲汲營利的局面，使有抱負士子期以改善世風；又因皇帝長期不上朝但仍有絕對權力，使首輔須揣摩上意勾結宦官以鞏固自身權位，形成柔媚持政，朝政混亂局面。面臨此種情形，士人由於尚有濟世熱情，加以王學激發，使李贄體現的狂者胸次呈為一時潮流。

隨著萬曆中期以後，政局日益混亂、朝中黨爭已見端倪、閣部御史不和等等，加上社會上謠言四起、輿論氾濫、山人與道學家四出奔利，使士人中有部分萌生退隱避世之念。加上李贄於萬曆 30 年以異端之名被逮至京師自縊身亡，與張居正死後遭皇帝無情清算，使濟世進取的狂者精神受到士子懷疑。既然明君不在，那自身價值將何去何從？此乃萬曆朝中士人所遇的困惑，故有袁宏道的自適與癖好闡釋，開始將注意力轉向自身經營，在仕隱矛盾中轉以注意自身自適為主。雖然對於朝政的日趨敗壞仍抱有強烈濟世念頭，仍會抨擊朝政，但不再以狂放進取、無畏世人目光的勇氣行事，而是漸向安身立命靠攏。雖追求自適，但其心中仍存仕隱矛盾的苦悶與自身定位的焦慮感。

到了陳繼儒的時代，隨著朝政日趨惡化，社會世風愈加澆薄，士人處在是非不明、唯利是圖的年代，在新價值尚未確立，且內憂外患不斷下，興起避世保命念頭。因此，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精神引起此時士人共鳴。隨著士子對狷者精神靠攏，出現了沈迷自身逸樂而不理時事者；亦有假藝術生活塑造，以寄託自身避世念頭；同時亦出現利用自身影響力上書當道，以獲取社會良好聲名者。當中，以陳繼儒所行最為成功，達到真正以自適為理想，在出世濟世間找到平衡點，使心態達到平靜、調和，對自身聲名追求與社會時事的真心關懷作等重觀，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精神為依歸，形成其清閑與戒懼同存的心態。以由狂到狷的心態變化，體現明中後期一連串的政治社會變化的軌跡，記錄士人於當中如何摸索自身定位的轉變。同時由於此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心態引發士子共鳴，其得享大名實與此有所關連。

透過對陳繼儒心態的觀察，得知其享有大名乃基於清閑與戒懼並存不悖的調和性格。而這種調和性格，正是陳繼儒得享大名與當時不被時人抨擊為山人亂象的原因。接下來在第三章，回復到第一章關於山人評價的討論，於其中補充陳繼儒如何表現其清閑與戒懼面貌，以時人對其評價與自身行為，更深入觀察其與山人以及當時社會的契合。



第三章 陳繼儒所處時代脈絡

第一節 名士陳繼儒與時代脈絡

陳繼儒，在當時與後世眼中，其文名遠播總是人們注意的焦點。他從一介平民至地方知名文人，最後成爲聞名全國的大名士，此一過程與明中後期社會上流行的名士風潮息息相關。配合上章由陳繼儒清閑與戒懼兩種處世態度所導出的狷者精神，以及陳繼儒與當時文人心態契合之處來看，可知其有所爲有所不爲的處世態度，與求自適、真我的自我意識覺醒乃是明中後期掀起仿效魏晉名士風度的因素之一。以下擬從陳繼儒與友人王衡、董其昌等交往的網絡，配合物品利用陳繼儒名號的現象，說明陳繼儒在當時社會上所達到的聲名盛況。

一、陳繼儒的成名過程：

綜觀史料，有關陳繼儒名聲盛大的記載，可謂浩瀚如海。其中，把陳繼儒名動天下的過程作簡明扼要介紹，且於後世具有代表性的資料，乃是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陳徵士繼儒〉：

繼儒，字仲醇，華亭人。少爲高才生，與董玄宰、王辰玉齊名。年未三十，取儒衣冠焚棄之，與徐生益孫，結隱於小崑山。……婁東四王公雅重仲醇，兩家子弟如雲，爭與仲醇爲友，惟恐不得當也。玄宰久居詞館，書畫妙天下，推仲醇不去口。海內以爲董公所推也，咸歸仲醇。而仲醇又能延招吳越間窮儒老宿隱約飢寒者，使之尋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瑣言僻事，薈叢成書，流傳遠邇。款啟寡聞者，爭購爲枕中之秘。於是眉公之名，傾動寰宇。遠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詞章；近而酒樓茶館，悉懸其畫像。甚至窮鄉小邑，鬻糶救市鹽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無得免焉。……交游顯貴，接引窮約，茹吐

軒輊，具有條理。……聲華浮動，享高名食清福，古稱通隱，庶幾近之。玄纁物色，章滿公車，動以康齋、白沙為比。……摘錄其小詩，取其便娟輕俊，聊可妝點山林，附庸風雅。¹

透過上引文，可知錢謙益眼中的陳繼儒，年輕時於地方即有才子名，可謂地方名人；29歲時，捨棄生員資格，聲明不再以入仕為主，與徐孟儒（益孫）隱居於華亭縣城附近的小崑山上，成為松江一帶的名士；再藉與王世貞、王錫爵兄弟相交，以及與董其昌、王衡的相往，使之更進一步成為江南地方的名士。此外，更假借刻書出版活動，以求序、寫序使陳繼儒自己的聲名隨之擴大，成為傾動天下的文豪。

錢謙益以遠至外族乞文，近到酒樓茶館懸其畫像招攬客人，甚至貨物皆掛其名號以招徠人氣的盛況，說明陳繼儒名聲遠播與受歡迎的程度。又以「交游顯貴，接引窮約，茹吐軒輊，具有條理」表述陳繼儒與顯貴交遊及拉拔寒素同儕後輩的人際交遊行徑，復記載其品評時事有條有理的清晰冷靜。最後以敘述陳繼儒盛名在外，享高名食清福的通隱特色，以其屢受朝廷徵辟，薦舉奏章紛飛，自比吳與弼、陳獻章，作為結論。又以陳繼儒詩文輕娟，用詩文妝點自身山人身份，附庸風雅。指出山人用詩文妝點自身以攫取聲名的特點；同時也表明錢謙益自身對山人的看法。不過，錢謙益仍肯定陳繼儒在社會流行的聲名，可見陳繼儒聲名之大。

另從《眉公府君年譜》中，其子陳夢蓮對陳繼儒生平的紀錄，更具體來看陳繼儒成名經過。陳夢蓮從陳繼儒21歲時徐階接見，討論所學，對其嘆服不已；到23歲館授王昇之家，與唐元徵、董其昌、方應選、何士端等人結成十八子社，互相切磋舉業；再到26歲館授王錫爵家中，與王衡相結交，同時結識婁東四王；29歲因科考兩次失利，作〈告呈衣巾〉放棄生員資格，隱居小崑山上，開始隱居生涯；30歲時「設館委巷，一時負笈者皆知名士」聲名開始外聞；34歲，與徐階子徐澤夫交

¹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頁637~638，〈陳徵士繼儒〉。

好，生活受其資助；37歲時「擬臨場十策」，開始刻書出版謀生；38歲時則館授於包瑞溪家，與錢御冷（錢士升）、沈玄海、項召等人相識，選輯文章出版刊刻，同時《秘笈》也出版刻印了；42歲時「選論膾刻於書肆」；43歲時，顧憲成邀入東林講學，被其婉拒；之後，直到老死，其謀生方式就是館授、刻書，與受大官餽贈，如50歲「得新壤於東侖」、「章工部公觀先生，割童山四畝相贈」。²最後，復以自中年後多次為朝廷所徵闕，名聲遠揚。

由上可知，陳繼儒成名過程有賴於徐階、太原四王、陸樹聲等前輩學者的提攜，加上同儕如王衡、董其昌與十八子社同社友互相交遊，藉刻書出版，使自身文名獲得擴展，成為全國知名文士，且復與當時江南其他名士如錢士升、沈玄海、項召等交善，對於打入名士文化圈有極大幫助。又因陳繼儒在國家地方大事上，發表許多精闢見解，造成社會聲名極佳，使崇禎朝屢次徵辟，陳繼儒得享大名。而陳繼儒此一成名過程，其主要內涵在於與文士名人的人際網絡建立上，為當時名士崛起的過程下一絕佳註腳。另外，由上亦可知陳繼儒與王衡、董其昌的交遊關係，為時人所津津樂道，以為陳繼儒聲名崛起與之相關，如王衡〈立秋日同仲醇集閑仲澹圃即事〉以自己與陳繼儒集會於王閑仲的澹圃，作詩表達遊玩以及有朋相談習靜的場景，以此作為陳繼儒交遊的一環。³而在〈七月望雨中同仲醇諸君子淮雲寺薦先次仲醇韻〉中，以友朋相約遊玩於淮雲寺，並以詩文唱和為述，提及文會舉辦與禪僧文士之間的清談，以之為陳繼儒參與文社聚會以拓展自身名聲一例。⁴

經由以上詩歌唱和，可知曉陳繼儒與人交遊的情況。隨著文名提高，陳繼儒在當時社會風尚亦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以錢謙益所述陳繼儒所刻之書流佈天下，人

² 以上陳繼儒自21歲以來的成名經過，請參見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411~433。

³ 見「朝霞閣不散，簾外薇花晴。樹色交交入，池光宛宛明。話深幽鳥出，局靜亂蟬清。不待庭陰暮，微涼暗自生。」王衡，《王緜山先生集》，收錄於沈雲龍選輯，《明人文集叢刊第一期》（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第27冊，卷5，〈立秋日同仲醇集閑仲澹圃即事〉，頁506。

⁴ 見「瓜果媚盤好，茵陳釘坐清。秋花僧共老，踈葉雨成聲。山鬼如投寺，村鴉亦避城。豈無留客處，多恐費逢迎。」王衡，《王緜山先生集》，收錄於沈雲龍選輯，《明人文集叢刊第一期》，第27冊，卷5，〈七月望雨中同仲醇諸君子淮雲寺薦先次仲醇韻〉，頁508。

人爭購；四方求文、酒樓茶館皆掛像招客；以及以眉公名作為標誌買賣貨物這三方面，說明陳繼儒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計六奇於《明季北略》〈陳繼儒卒〉中，以「當啓、禎間，婦人豎子，無不知有眉公者。至飲食器皿，悉以眉公名，比于東坡學士矣」，強調陳繼儒的影響力，提及時人以蘇東坡比擬之。⁵而蘇東坡在明人眼中，象徵將文人風雅趣味與優雅生活情趣溶於生活中的佼佼者，陳繼儒被比擬為蘇東坡，正可見他在時人心中的地位。

另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物帶人號〉云：「近日友人陳眉公作花布、花纈、綾被及餅餌、胡床、溲器等物，亦以其字冠之，蓋亦時尚使然」，以陳繼儒製作新樣，涵蓋食衣住行各方面，甚至連便器都以眉公名，除了表現調侃之意外，也說明此種以字冠自己所作物的作法，乃是當時好異尚奇的時尚風氣。⁶由上可知，陳繼儒於當時的聲名到達一種高度。最後以同樣以生活美學家聞名清代的李漁的一段話作為結尾，如〈飲饌部·肉食第三〉說：

至數百載而下，糕、布等物，又以眉公得名。取眉公糕、眉公布之名，以較東坡肉三字，似覺彼善於此矣。而其最不幸者，則有溷廁中之一物，俗人呼為眉公馬桶。噫！馬桶何物，而可冠以雅人高士之名乎？⁷

李漁以晚明陳繼儒名聲極高，糕布等物品皆冠以眉公號，名聲可比東坡肉。最後，李漁感嘆陳繼儒如此雅人何以名號用於馬桶買賣上，死後尚被羞辱，感嘆名士難為。以此作為當時陳繼儒聲名盛大，被冠以物品以召徠人氣之旁例。

二、陳繼儒成名所處時代脈絡：

⁵ 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陳繼儒卒〉，頁 265。

⁶ 沈德符撰；楊萬里校點，《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 3 冊，《萬曆野獲編》，卷 26 玩具，〈物帶人號〉，頁 2596。

⁷ 李漁撰；王連海注釋，《閑情偶寄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下冊，〈飲饌部 肉食第三〉，頁 282。

由上述陳繼儒成名過程的描述，可看出陳繼儒享大名的原因與其交遊與著述刻書有極大關聯。好玩的是，時人對於當時山人弊病，如以詩文干游、書畫買賣、著書出版等等，皆抱持批評態度；但是，陳繼儒之所以名聞當時亦是藉同儕前輩文士的吹捧與著書出版，並以題詞書畫贈送他人拓展自身文名，卻沒被時人詬病。以下就其所行與時代脈絡作一說明。

提及以詩文干游，晚明文人對於山人抨擊最烈者，即在元旦時以詩文獲取權貴的欣賞此種行爲。而陳繼儒對此看法，在《佘山詩話》中，自述：

元旦拜年，衣冠逐逐，大是可憎，不知起於何時。文衡山先生一絕真可撫掌也，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⁸

以元旦拜年，士人手持名片投謁權貴的風尚，表達可憎之意；又以文徵明詩「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表達自身雖然鄙視此風，卻也隨世風喜虛慕榮風尚，有限度地行此作爲。如陳繼儒〈與項東鰲邑侯〉中云：

某，草衣土室之人也，谿谷鳧雁不足有無，而明公春秋賜胙上計時，復以兼金為別，某未嘗躡屩而謝之。謁者，夫豈有胸無心一至於此，蓋今之士風薄矣，淺帶縫衣，日溷胥隸中，如掃落葉，旋去旋有，至使大夫之訟庭，鶴不得鳴而雀不得羅焉，則吾黨之羞也。男兒生不成名亦宜斐然自完，何至腥穢煙霞，點垢泉石！明公之門所以絕不肖之跡者，其亦可以原矣。……適養疴吳山，勢與心違，欲一奏詩歌次於折柳三疊之後，恐微類山人遊客，敬遣家弟縉儒具宋人馬遠水一軸、蘭花布二端以辱行李。水者，頌明公三年如水

⁸ 陳繼儒，《佘山詩話》，收錄於(清)曹溶輯；陶越增訂，《學海類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第19冊，卷上，頁1。

也；布雖綦縞，山龍華袞豈忘布衣之交哉。秋雲縹渺，望望歸依。⁹

陳繼儒稱自己乃山林野民，感謝當時華亭縣令項應祥（項東鰲）在京計大察之際，援助自己。顧慮當時士風澆薄，許多士人藉干游沾親帶故，與權貴門隸相混，形成汨濫現象，人數多到如秋天落葉一般，掃也掃不完。甚至有為利益而與士大夫互訟的敗類，陳繼儒以為此類人讓居於山中以鶴為伴門可羅雀的山人名譽受損，認為這是「吾黨之差」。因此，沒有立即親往答謝項應祥贈金高義，乃是為了避免「腥穢煙霞，點垢泉石」，怕弄髒山林之士的清名。以自己養病山中，遣弟陳縉儒送馬遠水畫一幅恭維項應祥任華亭縣令清名如水，以及蘭花布兩匹以示地方官員與布衣之交情，祝福項應祥上京順利。可見陳繼儒對於當時干謁汨濫的風氣深感憂慮，有意識地分別自己與他人的不同，雖然都是干游他人，不過陳繼儒因為介意吾黨之差，所以不會過於顯現貪財好利得一面。以自己身為山人為戒，不主動干游以玷污山人清名。

陳繼儒此種態度，使時人對其看法不似其他一般山人，以批評口吻待之。如鍾惺〈訪陳眉公於舟因共集俞園〉說：

相逢各不愧聞聲，一揖舟中見一生。

名士去來關耳目，高人語默遠機情。

禽魚於我心無隔，筆墨窺君道甚平。

自是出山時最少，閒遊未免致將迎。¹⁰

鍾惺以與陳繼儒相見如故，聞名不愧彼此作為開場白，稱陳繼儒乃名士高人，認為其於談吐之間能遠離世俗心機。且從筆墨中窺見陳繼儒平和態度，認為此乃陳繼儒

⁹ 陳繼儒，《陳眉公集》，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集部 別集類 第1380冊，卷12，〈與項東鰲邑侯〉，頁168~169。

¹⁰ 鍾惺撰；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10，〈訪陳眉公於舟因共集俞園〉，頁164。

甚少出山，筆觸談吐少染世俗功利氣息。最後以「閒遊未免致將迎」認為陳繼儒閒遊人間，免不了須從俗行干游迎送之事。認為陳繼儒雖有似逢迎行徑，只因真才實學，語氣高遠不落俗套，不以之為有愧山人名的盜名之徒。

而在藉書畫謀利上，明自中後期以降，此種文人藉書畫謀名求利的社會現象日漸增多，且成為當時社會風潮。如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假骨董〉有云：

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¹¹

以吳地多假骨董流傳一事，說明當時古物市場興盛現象。提及文士多藉偽造古物以糊口，當中提到的張伯起（張鳳翼）、王伯谷（王穉登）皆為當時著名大山人、大名士，可用以佐證山人參與文化市場的旁證。這種贗品市場興盛現象，可用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時玩〉云：

玩好之物，以古為貴，惟本朝則不然。……始於一二雅人，賞識摩娑，濫觴于江南好事縉紳，波靡于新安耳食諸大賈，日千日百，動輒傾橐相酬，真贗不可復辨，以至沈、唐之畫，上等荊、關；文、祝之書，進參蘇、米，其敝不知何極。¹²

沈德符認為玩好之物當以古為貴，而當時因為文人雅士與富商大賈（尤其是徽商）的操弄，使得著名書畫家如沈周、唐寅、祝枝山、文徵明、董其昌等人的書畫可以與唐宋名家相比。影響所及，使得一些被視為山人之流如莫雲卿、米子華、高濂、王寵等，亦趁時以書畫糊口且以此名世。

¹¹ 沈德符撰；楊萬里校點，《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3冊，《萬曆野獲編》，卷26，〈假骨董〉，頁2587。

¹² 沈德符撰；楊萬里校點，《萬曆野獲編》，卷26，〈時玩〉，頁2585。

在此風氣下，陳繼儒不像其他山人用書畫以賣錢，而是當成與人干游餽贈的工具。陳繼儒以圖畫為媒，用與徐標定交，他在〈答徐鶴州〉云：

長公詩如紳泉脩白，石劔高清，便當與十七子並傳，不恨不見思翁，恨思翁不見長公也。陳希夷墜騾圖一幅，奉祝天下太平之兆。¹³

陳繼儒復有本想以董其昌摹雲山圖贈與許維新，然因三難而罷一事，於〈復許繩齋郡侯〉云：

玄宰雲山酷得米虎兒筆意，奉供清玩。明公病後作書甚難；某病目，報書又難；數千里欲覓續使，又難，以此三難並在。¹⁴

另於〈題雲山圖〉說：

山高鳥不巢，水清龍不住，至人冥是非，一味模糊樹。¹⁵

從上述三則引文中，知曉陳繼儒對書畫運用手段，採取藉書畫餽贈、題畫跋書等方式，以交遊餽贈方式進行，並以此獲取文名。憑藉本身書畫才華，擠身文物市場當中，不露要貨賂的逐利心態，以求名為上，成功擺脫部分山人製贗品逐利的社會不良形象。相同手段亦可見於扇頭詩的題寫之上，如陳繼儒於〈與王季重〉以扇頭詩相贈，並欲請王思任為其門榜書聯一事，作為陳繼儒以詩畫相贈，以行交遊手段為例。¹⁶另在〈寄董玄宰〉中，以陳繼儒則向董其昌要畫以餽贈他人，如下云：

¹³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答徐鶴州〉，頁 24a。

¹⁴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復許繩齋郡侯〉，頁 9b~10a。

¹⁵ 陳繼儒，《陳眉公集》，卷 4，〈題雲山圖〉，頁 46。

¹⁶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與王季重〉，頁 23b，「扇頭詩：『帝欲見公公不見，蒙來求我我何求。』欲懇書一聯懸楣柱，望之！望之！」

忽得兄所寄金牋畫十幅，如得古人手跡。其示不支，由唐宋入元人不如元人入唐宋，譬之宗門老宿鑽討科儀，自與別比丘不同。今氣韻生色而復不廢精微，如此乃真大家。文沈之筆，自文敏（元人趙孟頫）伯駒（南宋人趙千里）血戰而氣衰矣，兄位置古雅，見之宛然耆舊，吾看其價必在石田徵仲上，所許挂幅敢徵陳惟寅例得寄贈，不特齋中生色，即附兄畫尾端，足不朽耳，勿謂得隴望蜀也。辰玉比相見否？問伯破家為國專以禦倭，弟與兄皆重之，今伊弟之客皆援之以自解，不知長安公論何如？想能動白，幸一申理之，如不聞，秘之可也。¹⁷

以得到董其昌餽贈的十幅金牋小幅字畫為開頭，認為董其昌在畫中所表現的氣韻高雅古典，並且以為其以元人文人畫法摹擬唐宋畫家，乃大家之筆。又以董其昌畫位置古雅，比沈周、文徵明更甚一籌，所賣價錢在文沈之上，以為董其昌深得文人畫風骨。文後，陳繼儒向董其昌討取仿陳惟寅（陳汝言，明初畫家）掛軸大畫以置書齋，且自謂題詞畫末以沾董其昌光，希望董其昌能作畫一幅贈之。可知此種書畫餽贈之風，實乃當時慣事。

復以錢氏《列朝詩集小傳》對陳繼儒「延招吳越間窮儒老宿隱約飢寒者，使之尋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瑣言僻事，蒼叢成書」的描述，加上陳繼儒多處於尺牘中有求序記載，見陳繼儒的著述活動。陳繼儒〈答范質公〉云：

儒七十九老矣，暑瘧甫瘳，執筆如杵，菊花時勉撰數行，附報近刻毛詩古音，堪與世說作對，明公賜一序，傳之海內何如？¹⁸

文中，陳繼儒向范景文求序，希望藉范景文的序文以求書傳之海內。這種求序風氣，乃明中後期常景，陳繼儒亦常常替人寫序文，且頗受文逋所擾。如〈甲秀園

¹⁷ 陳繼儒，《陳眉公集》，卷12，〈寄董玄宰〉，頁170。

¹⁸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56，〈答范質公〉，頁8b。

集序〉中以「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¹⁹敘述費元祿向陳繼儒求序之事。另以王衡爲陳繼儒所輯《古文品外錄》作序一事，作爲時人間序頻仍的佐證。如王衡於〈古文品外錄序〉中所說：

陳子仲醇選《古文品外錄》，既成，以示王子，王子曰：「余不敏，讀古人書如隙中數鴻毛而已，持敗橐囊雲霧而已，品內之不知，焉論外乎？」陳子喟然嘆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先正樸重，於古人之文類，論而不議，雌黃而去。取之自昭明文選始。」²⁰

陳繼儒另在〈與戴悟軒〉中，以「書坊所刻秘笈皆僞以弟名冒之」²¹提到有人假借其名冒刻一事，在〈復郭青螺〉又提及「秘笈方恨其龐賈亂行，何煩齒及。舊作數篇請正。」²²以僞書盛行不堪其擾，拜託郭青螺清查與幫忙訂正舊稿數篇。另在〈與王季重〉中，以「欲懇書一聯懸楣柱，望之，望之。近作三篇呈教，夢想之勤，如盼導師。未知八十枯木人尙能望見真正父母否於邑。」²³，託王思任題門聯給自己，又將自身三篇近作請王思任指正。由上述例子，可見陳繼儒著述活動以及與當時文人求序交遊之現象。

關於陳繼儒出版活動的討論，日本學者大木康在《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一書中，有專節講述陳繼儒出版事業。以錢謙益對陳繼儒的描述搭配其他文集中對陳繼儒所編著書寫的序爲主，認爲陳繼儒出版網絡的形成，有賴於與其他同樣有類似謀生方式的中低層文人，以及一些贊助者組成。文章以沈德先在〈續秘笈序〉中，以在刊刻《寶顏堂秘笈》後，覺得有所不足，復從陳繼儒書筐中，蒐羅書籍，編成《續

¹⁹ 陳繼儒，《白石樵真稿》，收錄於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 66 冊，卷 1，〈甲秀園集序〉，頁 33。

²⁰ 王衡，《王緜山先生集》，收錄於沈雲龍選輯，《明人文集叢刊第一期》，第 27 冊，卷 6，〈古文品外錄序〉，頁 583。

²¹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與戴悟軒〉，頁 50a。

²²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復郭青螺〉，頁 5b。

²³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8，〈與王季重〉，頁 23b。

秘笈》一部。大木康認為沈德先乃陳繼儒的贊助者，藉陳繼儒名編刻書目，同時文中亦提及陳繼儒編書形式乃是隨讀隨抄，積累文稿到一定程度在校訂出版。對於陳繼儒的刻書活動有一定描寫，可作為陳繼儒著述活動的一例證。²⁴

以上經由交遊文人、書畫餽贈買賣，與藉書序求寫看出版文化等方面，可總結當時文人視交遊為謀名求利之道，所交之人不論儒商，只要交遊有道，即是名士。如陳繼儒〈與汪先生〉云：

客歲奴子長干還，反承厚幣，此古人束錦薦縞之義乎？弟稻衣穀弁，潤飲木食，不復與海內賢豪長者游。……吾丈才情氣誼無可一世，世無識英雄人，遂使落落如故翠閣紅綃，金題玉躡，故是借此以降壯心耳。²⁵

陳繼儒以回信答謝汪然明厚幣相贈為開頭。以自己身處山林，不四處遊走，表達對當時干游汨濫的看法，文末以稱讚汪然明才情高明，因遇不到伯樂，乃假詩文書畫消磨雄心。乍看之下，或以為汪然明乃一懷才不遇之文人，但實際上汪氏乃徽州富商。因有詩名於外，被視為名士之流，可見當時交遊不以身份分，以詩文才情分的例子。像汪然明雖為徽州巨商，但因詩文創作深得文人意境，使得文人不以商人視之，反以文士才子視之。而陳繼儒與之遊，亦非表露貪財之意，反以對方贈財高義掩飾其受贈之實，可謂深得「謁道」，故時人不以干游汨濫抨擊之。陳繼儒亦於〈與某君〉中說：「不肖授經瑯琊，以一丸泥自封，不敢輒問姓名于通人長者。……素縞訂交，明鏡照膽，捧函循札，高誼敢忘，二扇謹承命書上」，以收到索題扇之邀為開頭，以自身館授王世貞家，自稱自己不敢輕易干游諸大人間，再以主人結交實乃自身之幸謙遜一番，附上題扇，看出陳繼儒在干游所採取的方法。²⁶

²⁴ 以上所述，請見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第四章〈明末江南の出版人〉，頁163～172，〈陳繼儒〉。

²⁵ 陳繼儒，《白石樵真稿》，附卷1尺牘，〈與汪先生〉，頁426。

²⁶ 陳繼儒，《白石樵真稿》，附卷1尺牘，〈與某君〉，頁426～427。

陳繼儒在交遊文人富戶之中，隨著對象不同與時期的不同，使得其應對方式亦有差別。在其文名達於頂峰時，有慕名前來干游者，使其成為被干求結交的對象，以致於「四方贅文者，履滿戶外」，²⁷「雖滇、洱、邛、樊，番落峒夷，咸知有先生，願獲寸縑片紙為殷盤孔鼎。」而享有盛名。²⁸然而，陳繼儒亦有為錢所苦而向友人哭窮之事發生，如在〈與徐長孺〉中云：

昨為士端少君轉拜，鼓吹沸耳，東家娶婦，西鄰妻女兒子空結七尺，無所聊賴，母氏慈悲低迷噪泣，老父剛腸亦復隕涕相對，夜分竟至罷飲。足下謂僕能堪乎？僕丈夫哉，而烏所戀戀家室足樂也？顧嫡母粗健，生母不脫床第者五年餘矣。而大公復六十有一，頽然阿翁，兒子日不進膳，歲不上壽，足下又謂僕能堪乎？僕中夜自計，竊欲從澤夫移貸三十金，歲償十金而益以子錢，蓋三年淹也，足下謂可不可？僕即不佞，寧敢負心？第澤夫愛我，愧非深交先生，道尊難以張口，所恃足下相知，與先生商其可否，為僕一再言之。春風漸融，桃夭始華，而婦翁多病，有相趨之意，天緣或在此也。稱貸錢帛，古人所醜。然僕齒過弱冠，而尚未歌車牽之章，聞雞鳴之警，窘歎可知鮑子惠我，當不以我為貪也，唯足下留意焉。

陳繼儒以好友娶媳熱鬧非凡，但自身卻因貧而無法為子女取媳，加上父母觸感生情，以致流淚相對，使場面難堪，陳繼儒以自己嫡母身體差強人意，生母又臥病在床已久，加上老父年老無人照顧，作為兒子無法使父母安養天年，反隨自己吃苦，以此向徐長孺吐苦水。復以自己打算從徐澤夫那借三十金以養家，計算每年還利息加本金十金，三年可還完，向徐長孺詢問意見。並且拜託徐長孺幫他向徐澤夫拜託寬延還錢期限。最後以自己亦知道「稱貸錢帛，古人所醜」，只是自己未求功名，遁隱山林，使得謀生困難，希望有鮑叔牙一般的朋友能知道自己不是貪財，只是為生活所

²⁷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495。

²⁸ 章台鼎撰，〈白石樵真稿敘文〉，收於陳繼儒《白石樵真稿》，頁6~7。

困而行此。完整表現出陳繼儒在面對生活困難與干游謀生的抉擇下，其一方面表示自身知道以干游攫利的壞處，另一方面也為自己所行找到解釋。可以看到陳繼儒干游的另一面。

最後，細觀陳繼儒成名經過，知其以棄科考隱居小崑山建立自身山林之士形象；復藉交遊文士，通過文社集會、社友彼此吹捧，建立文名，復憑高文名，行著述出版活動，使自身文名達到海內外皆知，出現日用百貨皆冠其名的現象。此種憑藉文名達到在社會、經濟、文化上的高地位的作法，乃當時中低層士子謀生求名的通用方法，只是隨著運用手段的高低之分，使得每人於社會上的評價有所不同。解釋陳繼儒雖有山人行徑，卻少被時人批判之因，亦能以此瞭解為何明代於萬曆後期會興起一股山人熱潮，使得時人多有以假山人目之，甚至大肆批評山人的行徑與現象。從陳繼儒此一成名過程，搭配其行徑，可看出當時社會流行清雅、飄逸的名士風尚，同時對於明中後期文人對山人的認知有進一步瞭解。

山人一詞，既代表品行高潔的隱者如李泌之流；復被時人用以斥責當時所謂山人行徑如干謁、販賣假骨董、附庸風雅等代名詞。透過陳繼儒，一方面其隱居山林，幾不入城，且博古通今，學養淵博，對於朝政大事亦有清晰及時瞭解與建議，有山中宰相之稱，符合文人對山人真義的解釋，可謂當之無愧；另一方面，又因其謀生，四處開館授徒，接受官員餽贈，以書畫詩文、文社雅集交遊文人，時人認為的山人行徑一樣不缺。然而，由於其掌握得宜，如《年譜》所云：

交遊幾遍天下，悉敢忽視一人、輕發一函、浪鼓一棹。每以錢塘、揚子為限，恥作山人遊客態。嘗云：「王公布衣之交，僅存一線于天壤。寧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躑躅公庭，必為雙鶴所笑」。²⁹

²⁹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 495~496。

可見陳繼儒對於山人遊客態是抱持引以為恥的態度，其處理方法並非完全脫離當中，而是有限度、有所節制的施行，並且注重與王公權貴交遊之間的分際，不落世俗所厭的山人行徑模式，故云：「躑躅公庭，必為雙鶴所笑。」表明自身對山人遊客態的實際態度，也表現了時人對山人行徑的觀感。解釋了為何陳繼儒於詩中稱己為山人與時人亦有稱陳繼儒為山人者，但卻不以山人行徑（或假山人）抨擊陳繼儒者。可知，只要能把握住當中分際，遊道把握得宜，即使有類似山人行徑，亦不會為時人所厭。

第二節 陳繼儒與中央地方的關係

在陳繼儒聲名塑造中，在與時人厭惡的山人遊客態作一比較，可見其因所行不著，與自身戒慎性格影響，使得其於行為掌握上較為注意，明白干游與被干游者的定位，達到遊道掌握得宜，不顯要貨賂心態，使得自己雖有干游之實，無時人詬病之弊。時人不將陳繼儒視為敗壞山人清譽，使山人行徑氾濫的「假山人」，反而認為陳繼儒為大名士。

在明人早期認知中，山人以隱士義為主。後來文人雖假山人名行干游行徑以獲名求利，但仍保有一定程度的隱者飄逸形象，如孫一元、趙宦光等，多以妻梅子鶴、飄逸雅淡示人，此亦為陳繼儒所繼承，故時人以陳繼儒為隱者。復因陳繼儒博學多聞、關懷民瘼，且多次拒絕朝廷徵辟，加上其雖避世，卻不逃世，對中央地方亦有所建言，人稱山中宰相、徵君。本節擬從時人對陳繼儒的描寫，看時人對陳繼儒的看法，以及陳繼儒與中央地方的關聯，從中來看陳繼儒與其他山人有何不同。

一、雅尚高致，博學多聞——時人眼中的陳繼儒

上節提及陳繼儒聲名遠播與山林清雅文化佼佼者的描述，除了其所行清雅文化

深得時人喜愛外，也與其豐富學養和清雅飄逸的山林習氣有關。章台鼎〈白石樵真稿敘〉云：

自婁江四部，新都太函後，無典章經濟之學。獨眉公先生名重一時，代兼異代，所著卷帙幾與身等，將藏諸名山奧壁中，迺大邑通都及四裔之內無不讀先生書、誦先生詩、寶先生之翰墨，其文章可得而聞也。先生故從經史子集、山經、地志、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淵源藪澤，究性命之微，通天下之故。為文率有關繫，凡典禮、建置、吏治、風俗、錢賦、河渠、興革，利弊時形，諸論著于忠孝、貞烈、廉耻、節義之事，頌誄、序記、誌乘尤致意焉。故金石碑版、大冊高文，四方徵請殆無虛日。時游觚為小草，競相鈔傳，碎金屑玉，流落人手。文非詭撰，盡屬雅言，茂先景純，自足名世。……大抵先生之文，婁江讓其精醇，新都讓其華瞻，文章家讓其典實，以有補世教。今所刻數種以足行世，而著述日益日多。³⁰

章台鼎認為自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汪道昆《太函集》以降，靠典章經濟學問名世者，當以名動天下的陳繼儒為最。陳繼儒著作等身，內容包羅萬象，上至經史子集，下至稗官野史，旁及釋老二氏之學，名聲顯赫，各地皆流傳其書與文章。除了著書豐碩外，在討論時事、典章制度也有所不俗，至於頌誄、序記、誌乘更是深得精義。即使是小品時文也是深受時人喜愛，眾人競相傳抄。章台鼎又以陳繼儒文章皆雅正之言，可藉此名世。最後又恭維陳繼儒文章比之王世貞、汪道昆還更勝一籌。

文中雖有所誇大，但是章氏之敘卻也點出了時人認為陳繼儒博覽群書，學問淵博的要點。陳繼儒多才多藝，學問翔實豐富的形象，陳子龍〈陳徵士誄〉云：

³⁰ 章台鼎撰，〈白石樵真稿敘文〉，收於陳繼儒《白石樵真稿》，頁4~7。

幼挺英邁，博游菴林，哲匠人宗，椒蘭是契。……又以致柔通變，老易為師，當塗之彥，味道之英，屏騶虛已，執經資敬，莫不勤誨宏誘，言近指遠，蓋公清靜之談，蘇門才識之語，德音有所被方之溥矣。至於強記多通，文章贍達，國典舊聞靡不鈎貫，如王粲之在魏朝，擬賀循之當晉代，清德雅宗，為時憲老。³¹

陳子龍讚揚陳繼儒才藝高超，名聞藝林，為眾人的楷模。復述說陳繼儒以圓柔通變手段處世，老易之學為師，為官者與有學問者皆虛心求教，陳繼儒皆諄諄善誘之。又說陳繼儒談吐似蘇軾式妙語問答，其清靜玄妙的清言亦為人喜愛。最後提及陳繼儒博聞強記，對於朝政典故也是嫻熟至極，將陳繼儒比擬為三國魏的王粲與晉代賀循，尊稱其為清德雅宗、時憲老。

可見時人對陳繼儒的評價可謂極高。以黃道周「雅尚高致，博學多聞，人皆老成足備顧問，則臣不如華亭陳某者」自謝不如陳繼儒一語視之，更能看出陳繼儒於當時的名望。³²其中「雅尚高致，博學多聞」一句，點出陳繼儒以布衣山人之身風靡一時的重心所在。

明代中後期以降，隨著社會經濟日趨發達，科舉取員僧多粥少，造成大量中低層文人興起，出現所謂「挾詩卷、攜干牘，遨遊縉紳，如晚宋所謂山人者」的干游謀生現象，此種稱山人以干游逐利的現象引起當時士人對於山人定義的討論。³³此種背景下，有提出心隱觀點者，以只要心境保持平和寂靜狀態，即便身處酒池肉林之中，亦為隱世的一種。然而，此種末流導致稱山人者有「今山人之跡，什九市廛」的弊病出現。³⁴為救時弊，開始出現強調德行與學養的論述，以品行高潔、學問淵

³¹ 陳子龍，《安雅堂稿》下冊，收錄於《明代論著叢刊》第三輯（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卷16，〈陳徵士誄並序〉，頁1095~1096。

³²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479~480。

³³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吳山人擴〉，頁454。

³⁴ 袁宏道；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54，〈題陳山人山水卷〉，頁1581。

博者爲尙。

但是，在明中後期享樂風潮之下，時人對於安貧樂道雖極力稱揚，卻因自身深受享樂縱欲風氣影響，無人可達到傳統隱居深山老林，躬耕自給的清苦生活，故少有抨擊山人干游行爲；至少在有限度的干游底下，時人多以寬容態度視之。同時，當時亦流行魏晉名士風流，以清談爲尙，結合唐宋以來文人風雅文化的傳承，更加注重優雅文化的體現與文化意境的展示，形成飄逸絕俗、優雅高尚的名士風潮，如王衡對王叔承的描述，於〈祭王崑崙山人文〉中說：

其樂也，興廣而志深；悲也，貌瘁而神怡。渺渺乎若春山淡冶而欲笑，翔翔乎若空絲綽約而自飛，未嘗縛小乘之律而祝巨子之尸固宜。……緬惟高尚，今誰庶幾，我愛孟子風流，我師昔之頌襄陽者曰：「文不按古，匠心獨妙；行不為飾，動求真適；游不為利，期以放情。」吾將借此頌君。³⁵


王衡以春日山中素雅秀麗景象與空中細絲無風自動的柔弱飄渺，表現王叔承飄逸悠閒風韻。復稱頌王叔承於文章寫作上匠心獨運；且行爲舉止以自適爲主，不作遮掩；外出遠遊時，以抒發性情爲主，不刻意逐利干游。把王叔承描述爲一個清淡玄遠又自適尙真的文士，而此種崇尚飄逸清閑、注重自身性情的風潮，實與魏晉時期所謂名士風度有所契合，與當時流行的仿效魏晉名士風尙之風氣有關。

在此種背景之下，學問涵養與自身氣質成爲名士判斷標準。所以陳繼儒的雅尙高致與博學多聞使時人以爲名士風度在此。就像董其昌在〈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敘〉所云：

余友陳徵君仲醇，避俗逃虛，志在五岳。晚而買山東余之麓，貯書萬卷，游

³⁵ 王衡，《王綏山先生集》，卷 19，〈祭王崑崙山人文〉，頁 1367~1369。

詠其中，經其門闥若無人入其室，其人斯在，幾與世相忘矣！……仲醇又不治生，即海內束帛加璧，干謁輻輳，筆潤有餘，遄遄與九族賓朋，全其饑寒，隨手散去，橐空而止，……（仲醇）簪屈子遠遊之冠，策盧敖鄧林之杖，凌華嵩而躡衡岱也。男婚女嫁，中壺足倚庸，詎如尚平畢世，次且老疾俱至而臥遊為乎？孺人今年六十矣，計其于歸以來四十年中，合符古賢媛而過之者有三：其始，當仲醇才名方噪，俛拾青紫之年，顧不難為孟光之勸，隱然而勤身家秉先廬無恙，不至寄居臯伯通之廡，此其賢一也。仲醇中歲，所謂同學少年爾汝交而金蘭好者，相繼登華貴有乘車戴笠之異，而孺人曾不艷稱焉，有似於王仲孺婦，然諸郎君皆浩然充然，無憔悴可憐之色，不至如仲孺子蓬頭歷齒，動父子情，其賢一也。晚歲則為龐公之偕隱矣，然龐公不入城，以全家往鹿門故，而仲醇之不入城也並不入室，孺人即屏居肅穆而有林下之風，又其賢一也。³⁶



董其昌以陳繼儒志在山林，求清靜無欲，表現一種與世相忘的境界。之後，董其昌把陳繼儒分為三階段，以襯托衛氏之賢：第一階段乃是陳繼儒年少時期，此時董其昌以陳繼儒因王世貞、陸樹聲、王錫爵等文壇宗主相推薦，名聲為人所知，高官顯爵唾手可得時，卻毅然棄青襟歸隱小崑山，衛氏能如東漢梁鴻妻孟光一樣與夫偕隱，且不至於如梁鴻一樣寄居富豪臯伯通廊下；第二階段則為陳繼儒中年之後，隨著交友圈越來越大，有高官顯爵前來拜訪者，衛氏像王閑仲妻子一樣不會豔羨之，子女也沒有露出可憐憔悴的模樣，不像王閑仲子女表現出蓬頭垢面的可憐樣子，歸功於衛氏教養有方；第三階段是陳繼儒晚年時期，隱居東佘山，幾不入城，學東漢龐德公隱居鹿門山中。只是陳繼儒除了不入城外，也不常入室，真正做到悠遊林下，比龐德公更甚一籌，且衛氏家居時亦有林下隱居的肅穆風範，可說夫唱婦隨。

董其昌在上引文中，主要以隱來呈現陳繼儒。這可表現在山居詩與崇禎朝屢次

³⁶ 董其昌，《容臺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第1冊，《容臺文集》，卷2，〈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敘〉，頁307～310。

徵辟陳繼儒等事蹟上，他在〈贈陳仲醇徵君東佘山居詩 其十三〉又云：

徵君名姓徹宸嚴，谷飲巖棲寶不貪，稱意沙鷗隨上下，論才竹箭美東南，盪胸震澤吞能九，開徑柴桑益有三，儘為草堂拈勝概，留將山史作佳談。³⁷

董其昌以陳繼儒名聲上達朝廷為天子所知，安於隱居山林、無拘無束的自適生活，才名有如東南之寶竹箭一般，享譽東南一帶。復以陳繼儒於東佘山中開闢草堂園林，美景引人入勝，其才名與隱德加上草堂美景，足以入山史美話中。陳繼儒才名享譽東南一帶，經由朝臣的薦舉，其聲名更傳至崇禎耳中。陳繼儒於萬曆年間，即有楊庭筠薦舉之，之後陸續有官員薦舉，至崇禎年間，聲勢更為浩大。如陳夢蓮在其父陳繼儒年譜《眉公府君年譜》中所云：

（吳永順云：）今之槁項巖穴誦讀堯舜者豈曰乏人？如松江布衣陳某淹通今古，聞達無干，比則廷臣楊廷筠、章允儒、何喬遠、吳姓、吳用先等各各開薦，非職私研讀不可一貫弓旌以襄盛典乎！³⁸

以崇禎朝給事中吳永順奏疏所言，以薦舉陳繼儒者有許多朝臣在內，如御史楊庭筠、給事中章允儒、南京工部右侍郎何喬遠、禮部尚書吳姓、兵部尚書吳用先等人。而薦舉陳繼儒者皆以「淹通今古，聞達無干」代表陳繼儒學問淵博、幹練政事為由，體現時人對陳繼儒的看法。下就陳繼儒精明幹練、關懷時事的一面，列舉詳細例子以說明之。

二、陳繼儒關懷時事實例

前文提及時人對陳繼儒的印象多在博學多聞、清雅高潔方面，視陳繼儒如南朝

³⁷ 董其昌，《容臺集》，第3冊，《容臺詩集》，卷3，〈贈陳仲醇徵君東佘山居詩 其十四〉，頁1529。

³⁸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468。

梁陶宏景、唐代李泌般隱居山中，遇國家大事時挺身而出，規劃政策的山中宰相。把陳繼儒隱士形象與經世儒者形象作一結合，從陳繼儒山中宰相美名可知一二。本段打算以國家大事與地方事務為實例，從中看出陳繼儒與國家地方的關係與他人如何看陳繼儒。

1、陳繼儒與地方荒政——以萬曆 36 年蘇松大水為例

萬曆 36 年，蘇松大水，松江一帶出現大飢荒。陳夢蓮於《眉公府君年譜》中說：

吾松十室九空，嗷嗷枵腹將有揭竿而起者，府君急告當路。請蠲不得則請賑，請賑不得莫若煮糜。于是，華青兩邑設粥局于鄉城，鄉紳、學博、孝秀皆董之。府君首倡天馬捐資作竈，一切所需雜件並脩橋梁道路，顧募執事五十餘人，自晨至未日給粥百餘鍋，水必清泉，米必瑩白，……喜有四方好義者，米豆之外，果餅、鹽豉種種樂助，比之它所更覺饒裕，共計四十日。竟事麥秋有望，農作將興，于是造冊送縣，每名給米二斗，四方沾恩者遠近十餘里。無破冒、無濫觴，即僉大戶何某僅稱備員而已，所餘米炭變價，買腴田若干以贍本圖之役，集有煮粥條議可案也。³⁹

陳夢蓮以萬曆 36 年松江發生大饑荒，百姓因飢餓以致將鋌而走險，陳繼儒看到此種情形，上書政府，為百姓請求蠲租、賑濟、煮粥救濟等措施。同時亦首先在華亭縣與青浦縣交界的天馬山中，設立粥場賑濟；復結合當地士紳與其他人，聯合救災，對災民進行賑濟、修橋鋪路等復健工作。並在秋收後，弄好賑濟災民戶冊，按人給米，維護秩序，使得災糧冒領、虛報災民口數等情形沒有發生。在結餘賑濟所餘物資上，把剩下物資變賣，買沃田當作義田以攤派差役，陳繼儒於此次救災行動上，著有《煮粥條議》表示自身意見。

³⁹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 434~437。

另在《陳眉公先生全集》〈與聶井愚使君〉中，陳繼儒與當時華亭縣令聶紹昌亦有討論救災書信，共有四次書信往來紀錄，主要講述災後賑濟相關事項，可分成災後處理賑濟手段與粥場賑濟兩部分。第一部份主要說明萬曆 36 年的蘇松大水過後，人民流離失所聚眾求食，主張救災一事「如虎啣子」，也如「小兒痘症又不知幾變」，呼籲聶紹昌小心處理。另對聶紹昌「一面措處銀米，遺賑他方；一面留至冬間凍餒相逼之時，煮糜平糶，尚可接濟三兩月」的手段，表示認同，同時議題出自己看法，以為除了賑災之外，也要防範災民劫掠，恩威並行，才能控制災後局面不至於使社會混亂。

第二部分，則為天馬山開粥場賑濟一事的敘述。陳繼儒先提出天馬山地處華亭、青浦兩縣交界，不同其他各鎮的地界明顯，處理方式「不得不精細以應嚴命」。在粥場造冊上，其作法為稍淘汰些有謀生能力者，增加些沒前科的無戶籍災民，希冀災民皆能溫飽。在粥場賑濟的秩序維護上，寫告示於各鄉村，以十甲甲長各自統領災民前往受粥。以同月廿五日即可將賑濟名冊製作完成，將呈覽於聶紹昌，以資參考。之後，講述粥場賑濟進行當中，自己同呂姓秀才一同準備煮粥賑濟事宜，只剩等待米糧能早點運到以舉辦鄉紳誓神典禮，宣示戮力賑濟。陳繼儒復向聶紹昌建議換遠地運來的劣質赤米為本地的糙米，以為本地糙米較甘滑香甜，災民久未食粥，希望聶紹昌能體恤災民換赤米為糙米。最後，敘述賑濟過後，以整個賑濟過程只花四至五日，米以給二斗為例，費米四百石，救活整個華亭縣西北一帶的災民。陳繼儒以層層分工合作、分畧分甲管理糧食的輸賑，使天馬山的粥場有效運用，活人無數。⁴⁰

在〈與聶井愚使君〉中，主要記載萬曆 36 年於蘇松大水的粥場賑濟部分，屬於最初水潦所引起飢荒的緊急手段。從中，可見陳繼儒如何與華亭縣令聶紹昌共同處理災民飢荒問題，也能見到當中有關鄉紳與地方合作賑濟、粥場準備工作、誓神儀

⁴⁰ 以上四部分，請見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與聶井愚使君〉，頁 4a~6a。

式等事項，能知陳繼儒在此次水潦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另從陳繼儒《煮粥條議》所述如〈委官不如委好義〉以官員救災因事物繁多亦分心，所以設廠賑濟成效不彰，不如委任地方名望服人的賢士與名人統籌，地方官監督，更能救濟更多災民；〈糶粥不如米粥〉以往時粥場煮糶粥時，常加入石灰與半生不熟的生米，導致有人食之致死，因全改爲以白米煮粥以保全人命；而〈給粥老人先於童壯〉、〈給粥婦人先於男子〉則以老弱婦孺飢餓已久不堪久等，要先給粥他們助其活命等粥場設置與賑濟相關事項，可見陳繼儒對於賑濟的安排與瞭解。⁴¹與此同時，王圻〈煮粥議〉中亦以粥場賑濟爲救災第一要務，視災民飢饉情形日給一食或二食，同時注重排隊順序與煮粥以白米爲主不以糶粥等等。⁴²與陳繼儒相比，陳繼儒更注重現場秩序維持與接濟災民上。如其《賑荒諸議》中的〈踏荒〉，以縣官巡視災區造成賑濟人員爲服侍官員或趁機邀功，反而造成災民賑濟的不便，認爲賑災當中，對於官員來訪應順其自然，不刻意營逢，不用過於費心準備茶點酒食侍奉。⁴³可見陳繼儒對於救災的態度。

在〈與韓鵬南使君〉中，場景換到青浦縣，陳繼儒則著重在力役與田賦徵收以及圩岸修築方面，說明青浦縣的救災與災後工作事項。開頭，陳繼儒以「役原非細事」說明役事的重要性，以「今里排之役，令以合縣計，歲以十年計，其關係利害非淺淺也」強調里甲制度在力役田賦徵調中的重要。復以「田糧派於各甲則少而易辦，并於一甲則多而易侵，且以均絕均荒、貼田貼米，里排可以少甦矣」爲例，說明糧長以十甲輪替徵收田賦既不易辦理且多有侵佔情形，不如均派於十甲之內，如此，遇到荒年之時，還可以修養民力。陳繼儒自己私擬田冊名單，進呈韓原善，以幫助韓原善處理田賦力役分攤徵調的問題。

文中中段則旨在說明青浦一地若要避免水患進一步擴大，要注意水利建設與刑獄民生的安定。以堤岸修築和水利灌溉爲重心，以爲圩岸的修築以快速爲優先，「待

⁴¹ 見方岳貢修；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卷13，頁370~371。

⁴² 方岳貢修；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卷13，頁360~361。

⁴³ 方岳貢修；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卷13，頁364。

赴縣求僉求牌」則失去防潦第一時間。所以要各地先自行修築堤岸、疏通河流，主張塘長有權處置工作偷懶、不共體時艱與肆言築圩無用者，維護當地安寧與工作的順利。主張鄉紳與官方合作，期許民間自發性力量先穩定時勢，等待官方進一步處理。之後，又以水災發生正值五月，為瘟月、耕月，乞求韓原善清獄、停告，穩定民心；以「里排方事督率，而水鄉又非船不行，一面田中脩救，一面城中往來，實難最苦」說明人民力役田賦徵調往返的苦處，希冀「徵比限期，或量免一二限」，使百姓能夠在水災發生之時迅速修好圩岸，防止災害擴大。最後，陳繼儒以韓原善將卸任青浦縣令，希望韓原善能上書申明青浦災情，並且同時進行一些亡羊補牢之法，以便接任者能承續其救荒措施，繼續接手下去。

最後，陳繼儒以「青邑目前有二事：水田無稻者，畝數不多，若造冊抽勘則徵比之荒熟易明公正；報役者，土棍甚眾，若先示不用則沿鄉之索詐可絕」說明青浦縣目前有兩件事要注意。因水災使田地無稻者，縣府應趁此時造地冊，明白劃分田界、註明田地的荒熟，以便之後田賦徵調的便利與公正；而力役徵調上，則需提防有惡棍趁機敲詐訛騙百姓。陳繼儒以上述兩件事乃「父老隱情」，上書韓原善，希望韓原善能留心於此。⁴⁴

陳繼儒於〈與韓鵬南使君〉中，以田賦力役徵調為重點，以五月青浦水災剛為患時，做好圩岸修築工作，以清獄、停告、免限穩定民心。在田界為水潦所毀時，重訂地界劃清田地熟荒之別，以十甲共攤田賦力役，使百姓得以舒緩。再來，以韓原善於卸任之時遭遇蘇松大水，勉以整理田賦力役、疏通水利和向朝廷報告受災情形勉勵之，以求後任縣令能方便接手處理災荒事項。可見陳繼儒於青浦縣發生水災之初所扮演的角色。

時間點轉到在萬曆 36 年蘇松大水後，陳繼儒寫給聶紹昌、韓原善兩位縣令的〈與

⁴⁴ 以上三段引文論述部分，請見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與韓鵬南使君〉，頁 15a~16b。

聶韓兩使君〉，看華亭、青浦兩縣在災後的情形。陳繼儒先以「天降時雨，花稻勃然」說明氣候已回復，百姓也開始恢復種植絲、瓜等經濟作物換取米糧日常用品的平常生活。以眼見輪替徵糧的甲長多舊戶，少有脫逃者；且地主大戶負擔力役科差的銀兩繳納，減輕百姓負擔，使其能負擔田糧徵調感到欣慰。除此，又推行均田均甲制，使百姓能平均攤分力役田賦，減少詭寄、力役索詐的弊端。

陳繼儒復說明由於災荒關係，官府代付一半以舒民困。而陳繼儒也建議採用十甲均攤共推一甲長主事，如果有積欠錢糧者，記名戶以待來年補齊。陳繼儒於文後又提起災後存在「積年荒田」與「無戶絕田」兩種人民隱患出現，而解決辦法則為「畧中見有積年荒田，必十甲分之，不忍一甲獨累賠糧；見有無戶絕田，亦十甲分之，不許一甲占作己產」以共同均攤利害來使田冊整理上清晰明瞭。通篇重點在於災後賦役的徵調措施與田冊整理的注意事項，以十甲糧長共同均攤賦額避免一甲獨賠，以致破家而繳納不出官府定額；復以清查積年荒田與無主田地，使十甲可以均攤利害，同時藉此動作重劃田地、徹查田地荒熟良劣，以求公平。⁴⁵

以上三條資料主要敘述萬曆 36 年蘇松大水所引發飢荒救災之事。從陳繼儒與華亭縣令聶紹昌、青浦縣令韓原善兩位的尺牘中，可見水災之後，飢荒發生時，陳繼儒於天馬山上首設粥場賑濟，行文當道請求救災賑濟事項，組織鄉紳官府一同投入賑濟行列。又於水患初發時，上書青浦縣建議縣令韓原善救災修圩築岸，以防災情進一步擴大，對於里排賦役的徵收給予建議。最後，復行文聶韓兩縣令，建議均田均甲，留心無主田地與荒田的利用，以為里排分十甲均派錢糧，其中無主田地由十甲均分，荒田所繳納不出的錢糧不足部分亦由十甲均攤。至於每年積欠的田戶，則先由十甲均攤，再記錄清楚來作打算。體現出陳繼儒對於災後重建的看法以及田賦賦役的瞭解。

⁴⁵ 上述兩段內容引文，參見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與聶韓兩使君〉，頁 16b~17b。

通過陳繼儒寫給他人的尺牘，可知陳繼儒對於地方事務一直抱有極高關懷，尤其是在賦役改革與災荒防範上，更是其關注重心所在。例如陳繼儒寫給應天巡撫徐式民的〈上徐中丞救荒書〉中即有提到萬曆 36 年蘇松水患發生時，湖廣江西一帶即囤積米糧，使米糧無法第一時間進入吳淞水患處賑濟，也使當地富戶劣商積穀待價，不肯出錢救濟貧戶，而佃戶因無力購米，也不肯出力修築圩岸，形成惡性循環，造成民窮盜起的隱憂。陳繼儒上書徐式民，拜託徐式民行文江西、湖廣、淮揚撫按解決商人積穀行爲，使吳淞米價下降。⁴⁶另於〈答嘉定胡中尊〉中，則以修築修築圩岸，整治河流爲主，以爲嘉定縣地處婁江、東江、吳淞江三江匯集處，有水潦與旱災危機，以爲地方凋弊實因於此。但是，雖有開濬之議卻因地方稅收催收成果不彰，加上人民好訟好逋，所以有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的隱憂。陳繼儒以爲可效法古人對告狀者先催繳其所欠錢糧，之後再准其訟狀的方法，解決人民好訟好逋的弊端。⁴⁷在〈答嘉善康中尊〉則也以修築圩岸、囤積穀物以備災荒爲主旨。⁴⁸

另外，對於災荒後引發的物價飛漲，與隨之而來的民亂，陳繼儒也有一套措施。如在〈復陶太守救荒書〉中，以災後物價高漲說明人民在此時最易受到煽動，演變成搶糧、民變，更甚者則以爲此乃輿情民憤，使得一二有野心的人操弄民情，陳繼儒於當中舉到萬曆 44 年的人民焚抄董其昌家事件，說明人民受煽弄的後果。而解決之道在於公平的田賦徵收與呼籲大戶接濟佃戶，先穩定人民基本生活，使之民情不會過於洶湧，再嚴辦惹事的刁民，體現出陳繼儒對於災後民情聳動的處理態度。⁴⁹

通過對陳繼儒救災態度的描述，知道陳繼儒對於救災的要旨在均田、均役、平糶與水利修築，這些看法與同時代的士人相一致，如王圻〈平糶給粟議〉中，亦有提及災荒過後，商人囤積米粟哄抬物價，王圻與陳繼儒看法一樣，皆認爲地方官員

⁴⁶ 陳繼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中國古代小品精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2005），第 9 冊，卷 23，頁 390~392，〈上徐中丞救荒書〉。

⁴⁷ 陳繼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 23，頁 395~396，〈答嘉定胡中尊〉。

⁴⁸ 陳繼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 23，頁 396~398，〈答嘉善康中尊〉。

⁴⁹ 陳繼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 23，頁 392~394，〈復陶太守救荒書〉。

應注重此事，以免造成救災的不便，不過王圻更提出運用災民有力者雇傭他們前往修堤防與修城牆等，一方面進行災後重建，一方面給予他們錢糧救濟，以免為奸人所煽動，這比陳繼儒所想更遠一步了。⁵⁰若排除陳繼儒流行文化佼佼者身份，單從其與地方的關係來看，此處，陳繼儒更像一個經世濟民的縉紳，透過粥場賑濟等地方慈善事業的施行，使陳繼儒在時人眼中除了其清雅文化佼佼者的頭銜外，又多了一個關懷地方民瘼的經世隱者稱號，這也是陳繼儒與其他山人不同之處。因此時人不把陳繼儒視為其所厭惡的山人，甚至可說，時人認為陳繼儒是真正的山人，是隱居山中品德高潔，於社會動亂時又會鼎力濟世者。

2、陳繼儒的田賦差役建議

在描述完萬曆 36 年蘇松大水後，可得知陳繼儒的救荒角色與當時其他地區中低層知識份子主出力運作，縉紳主聯絡地方官等統籌角色不同，陳繼儒是兩者皆一手包辦。以一介布衣身份，實行其濟世理想，其角色在此實與地方縉紳相混。關於田賦與差役問題，以下另從崇禎年間，陳繼儒寫給當時戶部尚書畢自嚴的〈答畢白陽〉來作為開頭，並以〈縣總議〉、〈布稅議〉等資料來看陳繼儒與地方關係。

陳繼儒在〈答畢白陽〉中，以「今東南困荒、困役、困累年宿逋，富者貧，貧者竄，枵腹待盡之民與橫目不逞之輩所在而有」點出當時江南面臨的問題在於災荒不斷、役法混亂與多年的積欠田糧，使得富人變窮，窮人成為流民，生活過不下去，野心家伺機而起。⁵¹而陳繼儒在其文集中的議部分，提出改革縣制、田賦與役制等解決方法。如〈縣總議〉所云：

縣總一節，止為吳中賦額煩重，田畝之推收、錢糧之出入，縣官勢不能自察、自算，於是設立縣總一名，專管數目。原未嘗以合縣支應累之也，及後，增

⁵⁰ 宋如林修；孫星衍纂，《(嘉慶)松江府志》(台北：成文書局，1970)，卷 26，頁 586。

⁵¹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答畢白陽〉，頁 4a。

減低昂，多出其手，飛詭洒派，變幻無窮，種種神奸，莫可致詰，遂有僉點大戶為縣總之議。⁵²

以縣總初設是因應吳地賦稅徵收繁忙，縣官無力承擔，故設立縣總一名專管錢糧稅收。然而，縣總初設之時，尚無管理全縣財政，後來隨著錢財進出皆經其手，種種弊病漸漸浮現，因此有用大戶人家為縣總來杜絕田賦錢財飛詭洒派弊端之意見出現，以為大戶自身家大業大，不會有舞弊貪污情況發生。但是，這又造成另一弊端出現：

大戶全不諳練，又不親至縣中，仍舊僱募積書代之，弊作積書，罪坐大戶，此利害之易見者也；大戶一僉縣總，指為奇貨，合縣公用及迎送上司、使客、嘎程，酒席送禮賞賜及公差犒勞之費，悉喚縣總支賠，少有不繼，小則呵詈，大則鞭笞。既要日日答應縣官，又要日日察理錢糧數目，一家之蓄積有限，一人之精神幾何，此亦利害之易見者也；又有宦家點僕代主充當，又有富室幫閒挨身奔走，或用一而指百，或用百而指千，溷開帳目，明欺紈綺，指稱官費，暗入私囊，此又利害之旁出而不可盡詰者也；若十年之查盤、千金之求脫，又特縣總之餘事耳。⁵³

縣總由大戶擔任，陳繼儒認為其弊病可分四方面。第一，大戶人家或有不諳錢糧財政工作者，即便被任命為管理錢糧的縣總，依然雇用熟悉業務人員，造成實際負責錢糧運作的依舊是以前舞弊者，形成了下人搞鬼而大戶作替死鬼的情形。第二則是大戶人家即便熟悉錢糧運作，亦會被官員壓榨，一切公用私用花費皆由大戶負擔，既要應酬各級官員，又要清查錢糧，如有缺漏更要貼補，使得家產與精力皆投入縣總這一無底洞中。復有第三乃是富家大戶底下的奴僕幫閒欺上瞞下，作假帳目，藉此中飽私囊，陳繼儒以這種情形當作是縣總衍生弊病。而最後則是縣總設立使得走

⁵²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9，〈縣總議〉，頁 1a~1b。

⁵³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9，〈縣總議〉，頁 1b~2a。

後門情況出現，這也是陳繼儒認為的縣總弊端之一。

陳繼儒以為縣總一職的設立，雖有減輕縣政負擔的美意，只是用人失當，加以制度不健全，使得縣總衍生出弊端。陳繼儒提出慎選繕寫人員與縣總下分官、圍、民三總的方法來避免上述縣總弊端：

今憲牌首革，不許陽革陰用，即考選慣算書手代充大戶，深為良法美意。夫既用書手，必先搜剔書手之弊，使之不能朋比為奸，而後他年之大戶乃不至炤前僉點，此又今日之所當亟講者。炤得松江三縣，每縣有縉紳書冊之田，號曰官甲，則宜立官甲之總；有歸併鞬集之田，號曰圍戶，則宜立圍戶之總；有零星小民之田，號曰民戶，則宜立民戶之總；三總既分，一覽具見如本總，田地若干、錢糧若干、徵若干、收若干、解若干、放若干、存留若干、完欠若干，官甲之錢糧不明，責在官總；圍戶之錢糧不明，責在圍總；民戶之錢糧不明，責在民總，彼不得挪此，甲不得飛乙，而要領全在五年方許田地推收始無紊亂耳。⁵⁴

陳繼儒以當今縣府願改革縣總弊端，要小心吏員陽奉陰違，就考選熟悉錢糧運作的繕寫人員以代替大戶任縣總一事而言，藉審查方式剔除繕寫人員舞弊，避免其於帳目中搞鬼。陳繼儒復以松江府轄下華亭、上海、青浦三縣為例，說明三縣有記載縉紳士夫田號的官甲、有田地緊連相并的圍戶，與零星分散的平民田地之民戶三種田號類別。在官甲、圍戶、民戶之下，各自設立官總、圍總與民總，各自處理自身錢糧田賦事務。使得縣總掌管全縣錢糧工作可藉此使之專業分工化，杜絕錢糧挪移飛詭弊端。

陳繼儒復於文中提及縣總權歸一人情形對人民、官府、富家大戶的影響：

⁵⁴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9，〈縣總議〉，頁 2a~2b。

向因合縣之大，止一縣總，縣總之勞，又止一人，一人而或僉及木偶不識字之鄉人及膏粱不諳事之子弟，權落積書之手，禍歸大戶之家，豈惟大戶，即小民亦有不勝其害者，如荒區混于熟區，舊欠混于新欠，少欠混于多欠是也。豈惟小民，即有司亦有不勝其累者，或錢糧之中不開起存，起存之中不開緩急，將徵完貯庫正額銀兩，扣除嘗例撮借雜放，日積月累，動欠萬千，夙逋由此而釀成，有司因此而參罰是也。凡此縣總諸弊，付之積書則機括熟而易為竇；付之大戶則積書全無干繫而其為竇滋多。惟將官、圉、民三項分為三總，除議工食外，凡經答應上司皆有向來公費錢糧，不許分毫差及三總，則三總既得悉心查算，又不能朋比挪移，似亦該縣之大端大本也。⁵⁵

陳繼儒以每縣只設一縣總，縣總又只命一人擔任，而擔任縣總者，不論是作為傀儡的不識字平民；抑或不諳財政的大戶子弟，實際負責管理者皆是縣總底下的辦事吏員。使得任縣總者徒有虛名且有連坐禍患。除了任縣總的空頭管理者外，一般平民也飽受禍害，如荒地混于熟地中以多收田賦、舊田逋混于新田積欠中以作帳，以及把欠田逋少的平民挪移至多欠上頭，使之多繳賦額，種種弊端，使得平民與狡猾之人得以上下其中，造成賦額不公的現象。這使得縣府在徵收田賦時因不清楚稅額多寡，造成收支混亂，加上辦事吏員的扣除慣例公費與雜用，使得新舊積欠愈積愈多，造成考核不佳，影響官府升遷與運作。

陳繼儒認為以上種種弊端之源，實因吏員熟悉相關運作，加上吏員們朋比為奸，把持賦額徵收，形成勢力以欺上瞞下所成。為斷絕此種情弊，陳繼儒認為只有在縣總下依田戶類別不同設立官總、圉總與民總三總，使之各任其事，斷絕吏員聲息相通之弊，並且規範辦事者，除了該給的工錢外，只要不屬田賦錢糧賦額部分者，皆不歸三總管。官府往來應酬與公費器用等錢糧，不准從三總內挪移，如此既可杜絕

⁵⁵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9，〈縣總議〉，頁 2b~3b。

吏員於當中挪移錢財、假造帳目，更能使縣總徵收田賦稅額的工作更清楚，不會再有位應付官府迎送應酬而導致破家的弊端。

由〈縣總議〉中，可看出陳繼儒對於地方縣政運作主要靠吏支撐，也知曉吏在通過群體合作之下，對於賦役稅額的徵收造成極大影響，有深刻瞭解。不同一般渾渾噩噩的山人，陳繼儒在地方事務的觀察上可謂精闢入理。相較於陳繼儒從地方設立縣總看出吏員舞弊地方，使賦役複雜導致稅收混亂，里甲縣總因而破家。同時代士人則多注重在因賦役收兌、櫃收等弊病上，如徐民式疏略中即以隆慶間吳中大戶因見官甲事務繁忙，所以以官甲自辦、自收、自兌完全交由地方人民自理，希冀使得官甲徵收賦役上能更方便與杜絕吏員舞弊。然而，經過時間演變，到萬曆時期，由於大戶不黯事，加上官甲自辦、自收與自兌所引發的諸如詭寄、花分、逃戶等現象，使得賦稅虧空與力役徵收不到人，使官甲要負責，造成官甲負責人多因此破家，所以徐民式以為不如廢除官甲自辦，以全縣均攤，按照田地多寡徵收賦役，以示公平。⁵⁶



下舉陳繼儒對於里甲方正所引發的賦役弊端之看法，說明陳繼儒對於地方編制的看法。陳繼儒〈革方正議〉云：

往年編審，先舉區中方正報役，最為第一大蠹。或假公濟私、或挾仇報怨、或賣富欺貧、或恃強凌弱、或曲庇親友、或借聽家僮、或受旨于鄉紳、或謀充于區棍，需索扇詐，如鬼如蜮，是百姓未得均役之利，而先受報役之害也。

57

陳繼儒以從前縣在造籍查戶口時，都會推舉各區的方正協助戶籍修訂，以方便日後差役調動為引，認為這是一大弊端。因為方正在清查戶籍人口時，易產生假公濟私、

⁵⁶ 宋如林修；孫星衍纂，《（嘉慶）松江府志》，卷 27，頁 599。

⁵⁷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9，〈革方正議〉，頁 4a。

挾怨報復、曲庇親朋等情形，又有幫助縉紳逃役、假借職務之便勒索等問題。陳繼儒藉著說明利用方正報役的種種弊端，說明百姓未能受到由田地戶籍定役的利處，先受到方正假權藉勢的弊害。基於上述弊端，陳繼儒於下同引文以不僉點方正為論，建議不僉點方正與重罰舞弊來杜絕役法不公的問題：

但炤田編役，田有多寡，則役有重輕；役有新舊，則年有先後，即公正，安所用之？先出告示，決不僉點方正以害鄉愚，其在城、在鄉，市猾有撞太歲等類者，許首出重賞減役，其罪犯炤指官誣騙，律一體治之。⁵⁸

陳繼儒以為按照戶籍編排差役有其弊端，故有照田地賦額攤派差役之議出現。復說明照田攤排差役雖然公正，但仍有役別輕重新舊問題，即便所行公正，但是差役新舊積欠問題與人民於差役負擔仍是一個問題。因此，陳繼儒以先出公告，宣示絕不點派里中方正負責編排差役，杜絕方正舞弊情況；再以人民舉發勾結官府惡棍傑出者，許以重賞與減役方式，並以律法一體處治犯案者，遏阻役法不公現象。表達出其對於役法不公的認知與處理方式，復云：

語云：「三人言，則從其二，以其同而公也。」既革方正，猶恐上不面審，下不親認，紛紛鬼報、鬼應終無已時，若將所定色役再三研審，不時抽點五六七人，或富或貧、或老或幼、或黠或愚、或鎖之後堂、或置之東廊西廊、或分之案前案後，將某區、某保、某人，應充、應豁、應增、應減，寫單呈來，智者不及謀，謀者不及合，取其同不取其異，是不用方正而人人方正也，是人人方正而不知誰為方正也。欲營求不暇、欲需索不能、欲暗報不及，至明日臨時別生變化，則眾役之偷心息而公論自出矣。⁵⁹

在去除方正編役之後，恐有上頭來不及細觀審查、下頭來不及攤派差役的問題，可

⁵⁸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9，〈革方正議〉，頁 4a~4b。

⁵⁹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9，〈革方正議〉，頁 4b~5a。

能會造成詭報後果。對此，陳繼儒以縣府將所定差役折色再三細審，再行頒佈；頒佈後，復不時抽查，使欲從中得利者來不及合謀。陳繼儒稱之為「是不用方正而人人方正也，是人人方正而不知誰為方正也」，以此杜絕有心人士鑽役法漏洞，使得役法折色的攤派與實行較公正。

陳繼儒對於地方事務的關懷可由上述舉例得知，其對於賦役改革的看法可謂精闢，中心主旨在杜絕縣吏朋比為奸或里中方正結合大戶豪猾合謀舞弊，藉著改革縣總、去除方正，使賦役徵收攤派公正化，避免過多損耗。另在〈禁編審臨期推收議〉中，以有人藉縣府調查戶口編定冊籍時，以買賣土地、過繼戶口使自身田產詭寄他人之處，藉此逃避田賦與力役。其以為若要避免此種情形，應禁止人民於戶籍編定期間隨意買賣土地，同時整理田籍，使田產歸屬劃分清楚，杜絕狡詐者利用此時分散土地、狡寄他處。⁶⁰陳繼儒於地方事務的關懷，屬於全方面的，舉凡田賦力役、農田水利修築、縣政改革等等，陳繼儒皆有涉獵。作為清閑飄逸的山人文化代表者，在清雅閒適的外貌下，陳繼儒並沒有忘記經世的熱情，同時也不像其他山人沈迷於逸樂，加上自身強大的人際網絡，使得陳繼儒於地方事務上，身兼發行者與出力者兩種身份。

通常這兩種身份分別屬於擁有官方人脈的縉紳，其依靠地方人脈與雄厚家產，屬於發行者身份，負責聯絡官府、出錢策劃；一般如秀才等中低層生員與部分山人則屬於出意見與負責實際聯絡、安排事項的出力者，可見陳繼儒於當中的特殊性。除了地方事務的關懷外，陳繼儒對於國家大事亦持有極大關注，也因此陳繼儒被稱為「匡濟填胸，不愧巖阿之宰相」，⁶¹下舉實例說明之，以其從另一面看陳繼儒之所以不被時人單純認為是假借山人飄逸清閑外貌之因。

3、陳繼儒對薩爾滸之戰與對朝廷影響的討論

⁶⁰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9，〈禁編審臨期推收議〉，頁 8a。

⁶¹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 482。

陳繼儒除了在地方事務多有建樹之外，亦十分關心國家大事。如陳繼儒於〈答孫子長先生〉中，以萬曆 47 年（1619）薩爾滸之戰，後金大敗明朝軍隊，撫順、清河等地淪陷，說明他對邊略的看法。如其中所云：

頃聞開原已陷，即熊芝老便難下手，蓋北關之不併，賴開原為擁護，開原之不破，賴鐵嶺李氏之家丁為之犄角。今李氏被疑，開原失守，將北關折入於奴，而東西之虜合矣。如何？如何？初，清河、撫順，特小堡耳，殘壞之後，本宜即時修築，多宿重兵，以示必不可再犯之勢；乃一味越境搗巢，不知貼防堅守，數萬之師，驅羊就虎。自古豈有如此廟謨、如此邊略也！⁶²

引文中以薩爾滸之戰後，開原、鐵嶺相繼陷落，熊廷弼接替楊鎬擔任遼東經略，由於北防先機已喪，所以熊廷弼主張以堅守為主。陳繼儒以為欲維持北防不被後金所併，有賴開原的駐防，而開原駐防又以李成樑、李如柏父子的軍丁為主，而此時由於李如柏隨軍征戰失利，開原、鐵嶺相繼失守，使得北防要地盡入後金手中，同時後金復與蒙古互為犄角，對明代北防構成威脅，陳繼儒對此表示極為憂心。

陳繼儒以為於楊鎬任遼東經略時，應以先鞏固撫順、清河兩小堡邊防為重，修堡駐重兵抵禦後金，使其忌憚明朝軍隊。然而，主事者楊鎬卻兵分多路大軍進攻，最後落得被個個擊破的下場，連帶使得北方駐防失陷，陳繼儒感嘆豈有如此廟謨、邊略，以為朝廷不審時事至此。陳繼儒復於〈與朱敬韜〉中亦提及東虜與西虜合的問題，對滿蒙合力入侵充滿憂慮。⁶³陳繼儒於引文後復敘述後金除了聯合蒙古內犯，更致書朝鮮，企圖削弱明代與朝鮮勢力：

⁶² 陳繼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 23，〈答孫子長先生〉，頁 414~415。

⁶³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6，〈與朱敬韜〉，頁 26b。關於此事資料，可見第二章頁 58 中的敘述。

即今奴貽朝鮮書，其計甚猾甚巧，聲言入犯，彼將自顧不暇，何暇顧我，我欲救之，則分中國之力，不救，則分朝鮮之力，一紙書頗具無限痛癢，而我特泄泄然隨手而應，其何以濟？⁶⁴

文中以後金致書朝鮮，威脅將入侵朝鮮，使朝鮮自顧不暇，無法幫忙牽制後金於遼東。同時，亦使明朝疲於奔命，若援朝則必分軍力，使後金有機可趁，北防危險；但若坐視後金入侵朝鮮，則一旦東北有事，將無法獲得朝鮮協助。陳繼儒以為後金只憑一張書信，卻使明朝朝鮮疲於應付，實乃高招！而陳繼儒於文後指出，明朝對此疲於應付，其實與當時環境有關：

且大江以北，四月不雨，麥穗焦枯，漕船擁於滿寧上下，大兵之後，豈堪大荒？祖宗設立淮上總兵，居重御輕，控制南北，正如車中之輪，而不解事者，奏撤之。及今遵制添設，猶可為中原他日緩急策應，浙中募兵，目前關係頗大，而招徠何法？安頓何地？督領何人？安家行糧何措？就中萬分調停，使此輩不聚不譁，使地方不驚不擾，非明公江左夷吾，又誰望哉？野老杞憂，臨楮不覺迂闊。⁶⁵

陳繼儒認為明朝對後金致書朝鮮感到難以應付，是因此時北方旱災，有災荒危機。薩爾滸之戰剛過，如又發生戰爭，恐有大饑荒發生，朝廷無法負擔。鑑於此，陳繼儒建議恢復淮上總兵一職，以為其控制淮河、溝通南北，居調應位置，方便地方調派與南北漕運溝通。最後，陳繼儒也針對當時朝廷欲募兵五千赴遼東提出意見，以為此時江淮一帶人民騷動，若處治不當，可能將引起百姓叛亂，提出「招徠何法？安頓何地？督領何人？安家行糧何措？」等疑問，以為一定要小心才行。

陳繼儒在面對後金努爾哈赤崛起的現象時，除了在〈答孫子長先生〉中以萬曆

⁶⁴ 陳繼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 23，〈答孫子長先生〉，頁 415。

⁶⁵ 陳繼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 23，〈答孫子長先生〉，頁 415~416。

47年薩爾滸之戰造成撫順、清河、開原、鐵嶺等北防重鎮淪陷表示遺憾，更對當時朝廷對此事之謀議與邊境策略的失當充滿感慨。陳繼儒亦清晰認知到後金在打下開原後，其與蒙古合流之勢更明確，加上對東邊朝鮮的進攻，除了有使明朝疲於奔命的意圖外，更有統合海西、野人女真的意圖存在。另外，就朝廷在浙中招募客兵以增兵遼東的議題上，陳繼儒更明白說出其對於兵員招募、後勤補給、統領將領的選擇等因素表示不確定，害怕浙中所募兵員不但解救不了遼東兵防，反而會引發投敵、哄亂等弊端，極力主張要小心應對。可見陳繼儒對國家大事的一番瞭解。

薩爾滸之戰對當時與後世影響皆甚大，如談遷於《國權》云：

成化間，李秉征建虜，分五路，楊鏞略仿之為四路。然建虜昔脆而今勁，踰于疇曩。說者謂出師日，星象赤霾，具咎徵宜止。非也，強奴驚伏，大軍雲集，不惟敵是求，更欲何待？第兵機宜秘，諸帥宜輯，而角幟競勝，又漏其期，疎莫甚焉。杜劉二宿將稍一慎重，當無全陷。馮壘自固，旬日間敵困於四應，左支右吾，勢且內潰。或彼徼天之幸，我亦無豐敗。今勇者躁，怯者遁，自是以往諱言出塞，甲士不復馳荒漠之外矣。⁶⁶

談遷以楊鏞力主征戰其實並無錯，當時大軍雲集，建州女真蠢蠢欲動，征戰勢在必行。楊鏞錯在仿效成化時期李秉的方法，分散兵力征伐建州女真，錯估此時建州女真實力。加上談遷以為行軍機要宜保密、將帥宜和睦，這樣方有致勝機會，但此戰卻將帥互搶功勞、行軍會合日期又耽擱，致使被敵軍有機可乘。加上談遷以杜松、劉綎二將軍若慎重一點，以防守為主等待援軍會合，包圍敵軍，即可殲滅敵軍，就算敵軍運氣好逃過一劫，自軍也不會如後來般慘敗。但是，結果卻是自軍慘敗，除了上述因素外，談遷認為也與當時勇猛者躁進、膽怯者逃遁情形有關，以為這是以往諱言出塞，使士兵素質低落有關。

⁶⁶ 談遷著，張宗祥點校，《國權》（北京：中華書局，2005），第5冊，〈萬曆47年3月庚寅〉，頁5134。

談遷以爲，薩爾滸之戰明軍大敗實導因於當時將帥不合與行軍草率，而更深層原因則在於朝廷的怯戰與長期士兵缺乏訓練所致。以爲薩爾滸之戰的發生是必然的積累，因此對於朝廷懼戰不認同。談遷亦對朝廷輿論有看法，以爲「自遼事棘，公車之牘日聞，俱朽腐不適用於用」，並且以「今言脫于口，尋肘掣之，凡所用人，欲卯出酉效，否且白簡隨之矣」說明遼東官員的難爲，感嘆朝廷用將疑人、欲求速效的心態。⁶⁷

與談遷相似，計六奇亦認爲薩爾滸之戰，劉杜兩將軍大敗實與指揮系統不良有關。不過計六奇更側重批評楊鎬的徇私與失處，以爲楊鎬與李如柏串通要置杜松於死地，故意不派遣援兵，讓杜松戰死撫順城下。以爲戰事失利，楊鎬與李如柏要負最大責任。⁶⁸計六奇對用遼人守遼與朝中對遼事關注程度亦有所意見，如〈遼彝雜誌〉云：

遼人守遼，策之得也，而廷弼以爲遼人必不可用，爾時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廷弼云然。數戰之後，遼人實可用也，如浙兵、秦兵、川兵皆可用，但問用之者如何耳。嗟呼！勝敗得失，但當擇將，乃云惟某地最良，古豈有此論也哉？……政府中樞尤皆庸庸，遼事所以益壞也。當江陵柄國時，九邊之事，如視諸掌，如某虜今將往某地，防其犯某邊，江陵必先知之，戒諭邊臣，故無敗事，後鮮有繼之者矣。一邊撫嘗語余曰：「葉臺山相國固不可及也，每邊臣上疏，必手書答之。此後止發一名東而已。」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哉？然猶未極壞也。周宜興當國，或以庇邊臣奏許，周力辯，謂「向來不與邊臣通書。」若謂邊事非閣臣所與知者，其敗不亦宜乎？⁶⁹

⁶⁷ 談遷著，張宗祥點校，《國權》，第5冊，〈萬曆47年11月癸卯〉，頁5144。

⁶⁸ 計六奇，《明季北略》，〈劉杜二將軍敗績〉，頁10~14；與〈楊鎬逮治〉，頁15~16。

⁶⁹ 計六奇，《明季北略》，〈遼彝雜誌〉，頁722。

計六奇以遼人守遼為對症策略，以為遼人之前雖因富奢，恐無作戰能力，但經過幾次戰爭後，證明遼人在防衛後金上不輸客兵，計六奇認為兵沒有不可用的，重點在於選擇良將。而良將的選擇上，不能以某地專出良將來以偏蓋全，必須慎選將才。之後，計六奇又提及當時政府對於遼事的態度，以為在張居正掌政時，朝廷對於邊防一舉一動瞭若指掌，對於邊區情報掌握沒有隔閡。但是在張居正死後，中央閣臣不知邊事近況，並且因為懼怕黨禍，竟以不與邊臣通書來自清。計六奇以為此種中央與邊防的隔閡，造成中央無法於第一時間反應，也造成邊防的敗壞，計六奇認為這才是遼事之所以日益敗壞的原因。

另外，查繼佐的《罪惟錄》亦有評論遼事，在〈熊廷弼傳〉曰：

論曰：襄愍，一字經曰：「守」。此時賤守字以為怯，至無可守而後思此一字，無及矣！李侍御清稱襄愍功不及忠肅而勞苦與冤以死相似，蓋用與不用之分也。余謂才相埒而一見，一不及見；一專任，一姑任之名任之。則用與不用兩法外，另一若難英雄，一法使萬世叫屈，嗟！黨事之所貽毒至此哉！……嗟！在朝以得寸為功，不知以不失寸為功，蓋用人甚難也。

又曰：襄愍負才使氣，誠有之，以是眾正咸與可而爾或有疵之者，如職方耿如杞主事、鹿繼差並拂經而擔撫，撫言戰，徑言守；撫言三岔河可駐全師，徑言巡徼必及；撫言扼險可奇勝，徑言兵潰可虞；撫言不事召募，經言必益兵；撫言款虜可恃，徑言不可恃；撫言孫李內應，經言間諜可虞，水火如是而廟算兼任之乎。⁷⁰

查繼佐以為朝廷之所以在對遼政策上處於弱勢，一方面是政策決定錯誤，以主攻為主，不思以守為重，直到無地可守才又改變方針以防守為主，然而查繼佐卻以為來不及了；另一方面則是任用官員上，經略與巡撫常意見不合，加上黨爭影響，使得

⁷⁰ 查繼佐著，《罪惟錄》，收錄於《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第16冊，傳11下〈熊廷弼傳〉，頁469。

朝廷地方意見不統合，造成紊亂。查繼佐最後又指出朝廷對遼政策的另一缺失，在於任人不明，常受黨爭影響，使得有將領因此被屈殺或被放逐。總地說來，查繼佐以政策失當、以主攻為主、督撫不合以及黨爭影響說明對遼戰爭的日益敗退，感嘆熊廷弼在當中被犧牲掉。

綜合上述四位對於在薩爾滸之戰後，整個遼東地區變化，各抒己見。在對於大局描繪上，四人幾乎沒有太大差異，雖然在戰守問題上分成談遷主戰，以為形勢使然；其他三人大多以守為主，以求不敗來應萬變。不過，在遼人守遼、中央朝廷決策不當、黨爭帶來邊臣與朝臣的互相傾軋，以及對於名將被屈殺的感慨等方面，倒是大同小異。值得注意的是，談遷、計六奇與查繼佐皆為事後回首遼事邊防一事，所以言語中大多以中央朝廷的昏庸與黨爭激烈，以及當時士風的急躁與盲從現象，把遼事當成是對明亡的一種反省。⁷¹而陳繼儒則是就事論事，除了大方向的感嘆外，還有許多切合當時情形的討論，如其在〈答錢仲舉〉中，以萬曆援朝在遼東一帶設立衛所駐軍，有利遼地邊防；但是廢除海運改以力役折銀，卻又使遼地物資運送不良而變弱。陳繼儒稱讚錢文薦援朝一事，不過對於防範建州女真一事，則表示除了恢復海運外，亦希望能復設淮上總兵一職，以溝通漕運並駐重兵以便隨時增援遼地與控制運河。⁷²

另在〈答聶巡漕〉中，陳繼儒以「論人才則分門別戶，論遼事則掃穴犁庭，何意末流之弊，遂至於斯！」說明朝廷內有黨爭傾軋，外則主戰喧囂的局勢，並以此憂心時局。提出以遼人守遼的看法，以為遼人因正面受後金威脅，為保身家財產，會死守遼地，若把招募客兵之錢餉挪至遼兵建立上，不只戰力更有保障，且也省下漕運費用，以為這是省兵省餉的好方法。陳繼儒復提出以聯絡蒙古與女真其他部落以牽制後金的看法，以為如此可分散後金兵力，又可節省士兵、糧餉的支出。最後，

⁷¹ 陳繼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 23，〈答蕭戶部〉，頁 411，「遼氛以後，群少年游談無根，如淮南王言漢治則怒，言漢亂則喜，即此風氣，其憂更當于建奴者。」表現當時士風的疏誕與盲從。

⁷² 陳繼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 23，〈答錢仲舉〉，頁 409～411。

陳繼儒提及目前明軍退守遼陽，要防範後金襲擊朝鮮，從海上登陸山東犯明，建議讓增援客兵在天津休息，以逸待勞，不可勉強客兵前往關外去寫戰後金。⁷³可知陳繼儒對於遼事的看法多從大方向著手，復於〈答楊學臺〉中，提出「遼左之局，大約虜合則強，離則弱；合則守，離則戰，使之離，不使之合，則機括全乎在款他酋，以置建酋」的看法，以為目前對遼政策要聯合其他部落以牽制建州女真發展，不使女真統一，如此才可進退有據、攻守可轉。⁷⁴

陳繼儒對於遼事的看法，不只從遼人守遼、將帥督撫不合問題著手，其更看到當時黨爭嚴重、社會輿論喧囂、客兵援遼，以及漕運控制等問題，可謂包含許多方面，所以對於局勢感受亦身有所感。既憂慮遼事帶給明朝的破壞，又擔心目前災荒、客兵、社會風氣等方面帶來的影響，言談中擔憂明朝將來。此既是陳繼儒作為山人與其他者不同之處，亦為陳繼儒為同時代士人所尊重的原因之一。其認為陳繼儒審慎政局的看法、對時事瞭解與大局的掌握，再再顯示陳繼儒不似其他肆口奸謀的山人，反而體現陳繼儒經世的一面。

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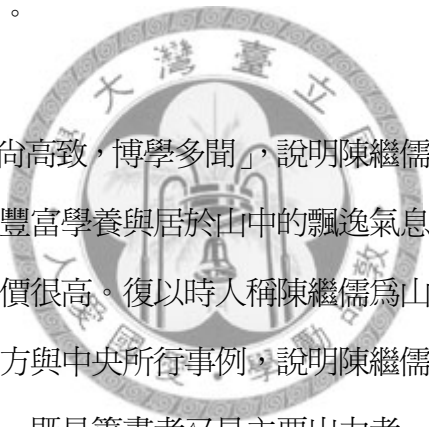
在有關陳繼儒於他人眼中的評價論述中，常見把陳繼儒稱為名士與徵君。稱陳繼儒為名士文豪者，多著眼於其清雅山林文化佼佼者與名聲遠播這方面；而稱其為徵君或山中宰相者，則又注重在其關懷民瘼時事的面向，並以此看其與當時政治社會的關係。而這兩種稱呼，其實正代表陳繼儒與當時社會文化緊密連結的兩種方面。藉著描述陳繼儒如何從一普通文人到地方名人，再到全國知名文士的過程，得知陳繼儒藉著文名與棄科舉使自己聲名更進一步，復藉結交各地文士，使文名進一步獲得提升，最後藉著刻書出版與自身優雅文化闡釋，成為全國知名文人。藉此說明當時文人憑自身文名與交遊，提升自身社會地位，並藉此謀求聲名利祿。從中看出明

⁷³ 陳繼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 23，〈答蕭巡漕〉，頁 416～418。

⁷⁴ 陳繼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 23，〈答楊學臺〉，頁 425～426。

中後期社會上形成所謂文藝社會風潮現象，以此討論陳繼儒於當時的關係。

以陳繼儒這種藉文名提升社會聲望以謀生與經營自身人際關係的行為模式為基礎，陳繼儒與山人干游謀生方式的相似，補充第一章有關山人謀生方式與評價的內容，點出干游之道的拿捏與陳繼儒熟悉山人於當時的角色定位。以不顯要貨賂心態，做到以清新飄逸的名士形象經營聲名以攫取生活所需。又藉陳繼儒與王衡、董其昌之間的書信往來與文社交遊，更具體說明陳繼儒在人際網絡上的經營。復以陳繼儒於文集中對於當時干謁汨濫、無行文人橫行等方面加以抨擊，看到山人被時人所厭惡之因，從中知曉陳繼儒與其他山人不同之處；又藉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山人〉對山人的描述，觀察時人對待陳繼儒與時人認知的山人的態度有極大差別，實與時人對於山人角色認知有關。



藉著描述陳繼儒「雅尚高致，博學多聞」，說明陳繼儒與時人認知的挾干牘遍遊權貴的山人不同。以其有豐富學養與居於山中的飄逸氣息，加上干游有道，所以時人不以山人視之，對其評價很高。復以時人稱陳繼儒為山中宰相，參考地方志與同時代相關奏議，舉其於地方與中央所行事例，說明陳繼儒在地方參與上所扮演的角色，介於鄉紳與山人之間，既是籌畫者又是主要出力者。從中看出陳繼儒與時人以及後世所認為的山人不同，點出陳繼儒雖居於山中卻不忘世事，加上朝中的屢次徵辟，使陳繼儒成為時人眼中的真山人，並獲得山中宰相的美名。藉著陳繼儒參與中央地方事務的細部描寫，補充第一章陳繼儒生平與第二章有關陳繼儒對於時局觀察的敘述。

由陳繼儒所表現的形象，看時人對陳繼儒的評價，得出時人眼中的山人其實有區分標準，而依據則在於遊道拿捏與聲名的高低，以及對於地方事務的關懷與政治評論的精粗。陳繼儒在謀生方式、干謁行為與一般山人並無大異，不過在自我認知上卻是技高一籌，復對中央地方事務的熱心關懷與精闢見解，使得陳繼儒成為山人

群中的佼佼者，並被時人譽為山中宰相。藉著陳繼儒成名過程敘述，結合其與好友王衡、董其昌的來往詩文唱和，看出其人際網絡的經營，從中得出晚明當時社會文化的經營模式。又以荒政處理、對地方縣政與賦役改革眼光，以及對於國家大勢的見解，看出陳繼儒與當時國家地方的關聯。並且，在此基礎上，在接下來第四章寫作中，主要以討論時人對陳繼儒的看法與陳繼儒自身對自己的審視，更進一步的思索山人與陳繼儒的關聯，以及山人清雅飄逸文化與山人佼佼者對時人的影響，見山人崇拜與當時社會文化的聯繫，從中看出陳繼儒於當中佔據何種地位。





第四章 陳繼儒形象變遷

第一節 山人陳繼儒的自述

明中後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達，文化流行從物質文化到奢侈風尚再至優雅文化，最後轉至結合文人文化與山林文化，以飄逸清新為主的山人文化。這一系列的文化流播，使得明中後期社會呈現一股依靠文名攫取聲名利祿以成名士的干游風潮。當中，假山人號干游士紳更是氾濫到時人大肆抨擊。本節打算以陳繼儒的〈空青先生墓誌銘〉看陳繼儒如何描繪自身，說明陳繼儒的自述與他人認知有何差距，而此乃陳繼儒得享大名的原因之一。

一、〈空青先生墓誌銘〉——陳繼儒自撰墓誌銘及其自我認知

陳繼儒，在前幾章敘述中，除了是個名聞遐邇的大文豪外，在時人眼中也是一個集清閑優雅與經世濟民形象於一身的名士，在後人眼中更是山人中的佼佼者。因陳繼儒本身清閑與戒懼心態，使時人在看待陳繼儒時，會不自覺的將其定位成隱居山林關懷時事、屢拒朝廷徵辟；與致力著述、完美闡發山林優雅文化，交遊幾遍天下的大名士，以此為陳繼儒主體。若從陳繼儒於萬曆 44 年（1616）自撰的〈空青先生墓誌銘〉來看，可見到陳繼儒如何認知或表達自身形象。就像文中開頭，以仿效陶淵明〈五柳先生傳〉自述生平所云：

先生姓陳，諱繼儒，自號空青公，不知其里居子姓，或云華亭人也。先生少好讀書，長長於詩歌，文辭頃刻萬言，晚嗜緇衣黃冠之學，悉舖其精華，已盡吐去。先生二十一，補諸生，二十八，裂其冠，投檄郡長，一郡之人皆驚，郡長勉留數四不能奪。退而結茅小崑山之陽，廟祀二陸主，乞四方名花廣植堂皇之前，曰：『我貧，無以娛二陸先生，月採花為先生供。』蘋蘩名乞花

場，脩竹白雲，焚香晏坐，其間豁如也。頃之，又就沈太僕荒園棲焉，又謝去，浪遊人間，稱性而出，適情而止。¹

以第三人稱述說自身經歷，從年少喜好讀書，至長大後長於詩歌創作，再至晚年沈溺佛老之學自稱吸盡精華。接著，提及 28 歲謝去生員資格，結廬小崑山，開始其曠達自適的生活方式。又於山中建乞花場祭祀陸機陸雲二陸，悠遊山中；又假萬曆 16 年館授沈氏荒圃處，說明自身謀生方式，提及自身「浪遊人間，稱性而出，適情而止」的生活特色，表現自身率性自適的一面。

接著，復以問答式的方式，述說自身對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作一評論：

或問：「先生曷不著書？」曰：「自伏羲一畫之後，太極碎而文字茲興，我方笑此老為千古後世釀成猖狂筆端，吾何褻裳而蹈之哉？天生人而與之以十指，寧盡今握毛錐子老也。」曰：「何不仕？」曰：「仕者如梓匠焉，規矩準繩靡不習焉，主人勿呼則退而束手，與妻孥老于蔀屋之下，有如思耀技能而身拾一椽一題，日剝而月削。曰：『吾工梓匠如是而何不以召我？』則非狂必愚。」曰：「先生曷不談長生？」曰：「嘻！有長而短者尋續之矣，有生而死者尋續之矣，吾師有云：『唯之與，何其去。』幾何？」曰：「曷不佞佛？」曰：「今瞿雲弟子善言佛者，以心為第一義，吾徵吾心十年而不得，心且不可得，而佛將安附？」曰：「曷不出而游五湖四嶽？」曰：「天下之山水在耳目與足，而耳目與足在我，無我，而耳目足之權去矣。目艱於遠討，足艱於濟勝，而耳又聾聾焉、聵聵焉，則山水之勝之權益去矣。且游而之於川，則多風濤蛟龍；遊而之於山，則多草木虎豹；遊而之於平陸，則白日而多魍魎蛇虺之屬。怒而射，笑而舞以戲我，我固不敢。」曰：「曷不為儒者？」曰：「儒，至人之稱也。我，學人而已。何事儒？」曰：「曷不他居而居於斯？」

¹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空青先生墓誌銘〉，頁 377~378。

曰：「吾貌癯削，而衣丹衣而冠山冠，以遊於縉紳中，則笑其太質；以入於鹿豕中，則疑其太文。我處於不質不文之間，是縉紳鹿豕交相迷失，而不知吾為若何人氏，我以此老矣。」²

陳繼儒以自伏羲立八卦而文字始興後，文字著述漸漸汨濫猖狂，自己寧手握毛筆終老，以此回答他人問其為何不著書之由。蘊含自身對於著述汨濫、文字書寫猖狂的討厭，亦有不輕易留一字一句的謹慎避禍心態於其中。又以仕宦像工匠一樣，主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沒有自由可言，且奢望依靠自身一技之長光宗耀祖，日益盼望被召用，陳繼儒以為非狂即愚，認為仕宦是種自討苦吃的行為，認為汲汲營求功名利祿，以自身學問充足卻無官作而失望者，非痴狂即為愚昧者，可見陳繼儒厭惡仕宦嚮往自在生活的一面。接著，又以死生有命回答為何不學長生術；以當時佛教以講心性為主，認為自己從儒家修心十年尚不可得，則佛教又安能撫慰自己，表現了陳繼儒不沈迷於長生不老術與佛教性命之學的一面。

此外，復藉他人問為何不出遊五湖四嶽，以為山水美景在耳目與足之間的賞玩，且自身目不良遠視、耳聽聾聵，加上足力不堪遠行，使得山水遊賞之情大減。同時，復述說出遊於川上、山林與平地遇到如風浪險惡、惡山惡水與道途中遇險及遭他人恥笑等種種麻煩，使得陳繼儒以「我固不敢」為由，表達自身對遊道看法。陳繼儒認為如果不能盡興遊山玩水的話，那出遊亦沒多大意思，且以平地出遊干謁受人恥笑，不敢行之。可見陳繼儒對遊道的看法，以為出遊在於遊山玩水，對於干謁出遊行徑抱著不敢為之的態度，顯露出對干游行徑的謹戒態度。陳繼儒的不敢為之，除了代表自身干謁看法，也代表對自身形象的維護，以不遊走說明自身對干游看法。

又假他人問陳繼儒何不為儒者，認為自身無法成為品德與學問皆至高的儒者，自稱自己是學人，體現其不求成為一道德完人，只求以學人自居的想法。最後，以

² 陳夢蓮，〈空青先生墓誌銘〉，頁 378~381。

他人問爲何居於此而不他居，以自己「貌癯削，而衣丹衣，而冠山冠。以遊於縉紳中，則笑其太質；以入於鹿豕中，則疑其太文」，道出自己「處於不質不文之間，是縉紳鹿豕交相迷失，而不知吾爲若何人氏，我以此老矣」的尷尬處境，此一處境實與當時山人在以山人號標榜山居飄逸生活，卻因生活需要在城市干游謀生，陷於徘徊矛盾的情形十分相似。

其後，陳繼儒復藉友朋交淺程度說明自身在他們眼中的樣貌，並以一則故事作爲結尾，如下文所云：

先生如是者。八九十年交先生者，或言先生迂；未交先生者，或言先生傲；深交先生者，以爲先生有大志、有大畧；狎而交先生者，以爲天下之無文者莫如先生也，以爲天下之無他亦莫如先生也。先生生於年月日時，卒于年月日時，未歿之前，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於是子孫賓朋雁行洗爵，而以次第現先生如俎豆狀，先生仰天大嚼叱曰：「曷不爲哭泣之哀？」於是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酒愈進歌愈合，先生喜而起舞，簪帽以花，婆娑挑達若小兒狀，必令人人盡醉乃罷歸。將暝之日，呼左右而告之曰：「人皆言死而有鬼物、有金銀臺召者，有笙歌幡幢連縹緲從雲端而來迎者，吾皆不見，若見皆幻也。」言訖，鼓掌大笑而逝。時堂中有白虹一道，印首飛指青天而去，眾莫不奇之。

3

陳繼儒以與他相交八、九、十年者認爲他迂腐；只聞其名者認爲他狂傲；與他交往深厚目爲摯友的又以爲他是個有大志向、大謀略的人；而與他親近的人卻又以爲他是個儉樸無文、專心無他的人，把陳繼儒矛盾多樣的性格表現出來。陳繼儒最後以子孫生祭的故事，表現出他灑脫的一面，呈現出陳繼儒希望給人的最後印象。最後，

³ 陳夢蓮，〈空青先生墓誌銘〉，頁 381~383。

陳繼儒在自為墓銘中，闡述自身希冀表達的形象予後人，如下引文所云：

銘曰：「昔先生賜姓以百而獨蒙姓以陳，於億萬百千之中而獨號空青，而若以自別於人羣。故其死也，人皆以為空青死；其生也，人皆以為空青生。而其死其生皆人，與我橫執而妄爭；而孰知燈破而燭之光愈明；而孰知鏡破而鑒之神愈清；而孰知空青沒，而死者不死，生者不生，如天河之垂象，空谷之傳聲，天下可得而見且聞，終不可得而知其名。嗚呼！其斯以為先生。」⁴

陳繼儒以「天下可得而見且聞，終不可得而知其名」作為自身遺留後人印象的看法。可見陳繼儒「不輕易留名於世間」的特點。陳繼儒認為這種既知名於天下，又藏名於天下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表達自己的期望。

透過陳繼儒的〈空青先生墓誌銘〉中陳繼儒對自己的敘述，可見陳繼儒在自己成為明中後期以降優雅清閑文化的佼佼者與全國知名文豪時，對於自己的認知乃是矛盾綜合體，既有瀟灑飄逸的清閑灑脫；也有戒懼謹慎行事不輕易留名於世的表述。陳繼儒此種清閑與戒懼的性格特色正是其與其他山人不同之處，而部分同時代時人，亦有注意到陳繼儒「妙得老子陰符之學」的現象，可佐證陳繼儒享名晚明的情形。以下就陳繼儒於〈空青先生墓誌銘〉所體現者，與晚明社會文化做一比較，以更廣闊的角度看陳繼儒於墓誌銘中的自我表述。

二、陳繼儒的自述與時代背景的關聯

在〈空青先生墓誌銘〉中，陳繼儒自述己身特點有二，一為藉虛擬問答說明自身形象的多樣性；二為「浪遊人間，稱性而出，適情而止」的飄逸生活與「天下可得而見且聞，終不可得而知其名」的低調方式。其中，第二點正與其清閑與戒懼的

⁴ 陳夢蓮，〈空青先生墓誌銘〉，頁 383~384。

雙面心態相合。本節打算就陳繼儒〈空青先生墓誌銘〉配合明中後期社會演變，說明陳繼儒與當時社會的緊密性，分析〈空青先生墓誌銘〉以求更進一步來看明中後期的社會文化變遷。

陳繼儒於〈空青先生墓誌銘〉中，述說自己好讀書、擅長詩歌、精擅釋老二學，以博雅學識示人。這與明中期政壇士夫如李東陽者以文學流派發展古文運動，詩文成爲士子謀名利之階；與心學興起，尤以王畿浙中王學主張儒釋老三教合流與王艮泰州學派主張的君子有出位之思，乃至李贄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等影響有關。此時士人出現文人化趨向，文人結社現象日益增多，使得明中後期社會形成一股憑文名交遊士夫文士可獲晉升社會名流的風氣，造成士人以博雅、詩詞相尚。⁵之後，再以陳繼儒自身棄青襟隱居，浪遊人間表現自適生活與館授謀生漫遊人間爲述。明中期後，由於科舉考試僧多粥少，大量士子仕宦無望，生員大增；因生員須每年面考、迎送學官，瑣事極多，生員不勝其擾，且受此時歸隱風氣影響，士人以隱相高，使生員紛紛自稱山人，以自身才華干游官員文士謀生。⁶

在上述陳繼儒形象述說中，以〈空青先生墓誌銘〉中藉問答形式表現者最重要。除體現陳繼儒如何認定自身外，復能看出他人提問所代表的意涵。例如，陳繼儒認爲著書造成猖狂筆端，以自己不著書握筆終老爲志，看似不以著書謀利爲主，只希望握筆自適終老一生；然而，陳繼儒卻以著述豐碩聞名當時，與文中自述有所差異。但是，若細觀文意，可知陳繼儒是以著書造成猖狂筆端汨濫爲慮，不想以著書惹事生非。陳繼儒的確著述眾多且少有狂放自肆言論於其中，其大多爲《妮古錄》、《安得長者言》、《巖栖幽事》等小品著作，即便有如〈建州考〉、〈金山衛議〉、〈塘長議〉

⁵ 關於此種風氣，可見林宜蓉，〈晚明文藝社會「山人崇拜」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39期，1995年，頁633~747。而對於文人化的述說，則可見商傳，《明代文化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第一章第一節〈明代文人與文化趨向〉與第三章第一節〈特定文化分野〉。

⁶ 此種現象，除了相關山人論述外，亦有專就生員棄巾之事論述者。可見張德建，《明代山人文學研究》，第一章第三節〈山人團體的構成〉；與陳寶良，〈明代生員層的經濟特權及其貧困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2，頁57~64；以及劉曉東，〈科舉危機與晚明士人社會的分化〉，《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頁103~108。

等與國家地方相關的策議，亦以理性冷靜筆調為主，不似李贄以狂放姿態行文。由上可知，陳繼儒的自身認定乃是以平和冷靜述事，不以激進猖狂筆端表達自我，此亦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心態之體現。

而陳繼儒的仕宦如梓匠般不自由的想法則與當時以隱風相勝、自適生活為尚的風氣相符。自萬曆中期以降，隨著萬曆的久不上朝與奏章留中不發，以及黨爭相爭跡象日漸嚴重，政治日壞；加上此時以山人號為雅號，嚮往山林生活的風尚亦於此時興起，士人多興起歸隱念頭；加上社會經濟日趨發達與心學興起，使士人在對政治濟世熱情不在之時，尋求自我個性解放，追求自適生活，使得山林高士隱逸風尚流行當時，造成了明中期以後名士風尚的興盛。可以說陳繼儒對仕宦的看法不僅僅是個人抉擇，亦為當時氛圍的體現。⁷

而陳繼儒的不談長生、不佞佛，以死生有命不用強求，不專研長生之術；復以佛教精義在心，以「心且不可得，而佛將安附？」說明沈溺佛教無用。明中後期以來，由於陽明心學的產生與王陽明參合釋老思想有部分相關，加上致良知心性學的提出，使心學的出現為當時儒釋道三教合一提供背景。許多士人除了修習傳統儒家經濟思想外，由於政治的不安定，亦使士人嚮往道家飄逸自適的精神，而當時禪宗盛行，許多僧侶與士人相交，配合心學狂放的姿態，出現狂禪盛行的風潮，也使士人沈溺於釋老二學以求自身心境的解放。⁸陳繼儒自述己身不溺長生佛老之說，看似與他人相異。然而，陳繼儒著作內有關游仙詩與募塔建寺的書信往來實則不少，加上〈空青先生墓誌銘〉內，陳繼儒自稱精擅釋老二學精華，可見陳繼儒於道家老莊思想與佛禪修行下過苦功夫。

⁷ 此種不任的態度與歸隱風尚實與當時士人心態相關，可參見史小軍著，《復古與新變——明代文人心態史》，第三章〈晚明文人心態〉所述。

⁸ 此種心學與三教合一之間的關係，可見劉曉東，〈三教合一思潮與三一教——晚明士人學術社團宗教化轉向的社會考察〉，《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1，頁21～27。而關於心學的發展過程以及與佛道相容的敘述則可見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中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與王學之流變〉的相關敘述。

陳繼儒之所以以不求長生、不佞佛為標榜，其實乃是一種灑脫恣意的表現。其藉不求長生凸顯自身堪破生死的灑脫，又以不佞佛表示不為佛教徵心教義所綁，自在過活無拘無束。不過，陳繼儒亦並非不信佛教，在其父將逝時，陳繼儒即率子弟跪拜宣念佛號準備後事，有包含佛教中觀思想之意。⁹有趣的是，陳繼儒在其後事準備上，是以佛教、道教禮儀為主，且於遺囑後吩咐喪事不用按照時禮，以古禮行之，表現明中後期士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特色。¹⁰從中看出陳繼儒不求長生與不佞佛的真正意涵，即為樣樣都信而不沈迷於當中吧。

之後，陳繼儒於文中又以不出遊表達自己對遊道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陳繼儒以為平地出遊「多魍魎蛇虺之屬」，其「怒而射，笑而舞以戲我」，所以「固不敢（出遊）」，以魍魎蛇虺比喻出遊干謁者，因不想被取笑與毀謗，所以不敢出遊。從中，可與明中後期以降士人干游風氣盛行作一比較。陳繼儒的不出遊，與其說是真正的不出遊，不如說是有選擇性的出遊。綜觀其文集，可見出遊訪談朋友次數眾多，且陳繼儒亦曾自述自己生平不出錢塘揚子二江，可反面證明其出遊情形。那為何陳繼儒要說自己不出遊呢？可從「山水之勝之權益去」與「我固不敢」這兩方面來看。其一方面以自身健康不佳說明山水欣賞的樂趣減低，使自身不想出遊，這牽涉到明中期後「懶」的流行。明中期以後，社會上興起了仿魏晉名士的清雅悠閒風尚，士人以清閑相尚。時人認為懶代表著一種閑適優雅的氣氛，同時懶也代表一種飄逸悠遠的意涵，時人常以清懶作為所謂名士風範的一種代表特色。而陳繼儒的「臥游」其實正表現出其清懶悠閒的一面，以山水墨畫為媒，藉意境遊翫，呈現其清雅一面。

另一方面，陳繼儒又以游於山林川河與平地間的種種險阻麻煩之處，說明自己的不出遊。不過，其重點當在「怒而射，笑而舞以戲我，我固不敢」，以不想被譴責

⁹ 可見「府君曰：『年躋八十有四，此壽終也，不當以藥石攻，惟率子姓跪誦佛號以經濟後事為亟。』」見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428。

¹⁰ 可見「九月望後，命蓮延名衲於菜香庵誦經禮懺。至二十日，放焰口，……口喃喃但誦『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至廿三日申刻，左手結印，吉祥逝矣。」見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487～488。

譏刺與不想被嘲弄，所以不敢出遊，與陳繼儒「恥作山人遊客態」與自云「躑躅公庭，必為雙鶴所笑」的一貫作法相符。¹¹然而，若從另一角度視之，未嘗不可視為陳繼儒為捍衛自身山人與名士形象的高潔，不與干謁汨濫的無行文人相處。明中期以後，隨著文士交遊風氣日盛，干游日益汨濫，又因憑藉山林清閑氛圍的山人文化日漸興盛，使得萬曆中期以後社會上充斥著假山人號以干游者，使得部分士人群起抨擊。在這些批評聲浪當中，有經世士人亦有如陳繼儒一樣的名士山人，為了不使自身形象受到牽連，選擇與干游汨濫者劃清界線，以審慎態度面對干遊一事。¹²可見陳繼儒的不出遊，奠基在瞭解須以清雅飄逸的山人形象以行出遊一道，做到不被取笑譏諷，保持自身狷介的獨特性遊戲人間。如果山水玩賞可在清懶自適氛圍下呈現，則陳繼儒的出遊即無問題，如陳繼儒每每遊玩於松江峰泖之間，與友朋唱和遊玩就是這種心境的體現。再者，若做到自己不輕易步入衙門公堂，把握干游分寸，做到王公士大夫訝其不來而非厭其不去的交往手段，不被時人譏笑辱罵，那陳繼儒亦敢出遊於平地之間，如同自身與達官文士交往一般，體現出陳繼儒與同時代人對於出遊一事的看法。

在關於陳繼儒的身份認定上，陳繼儒自謂不敢稱儒者，以學人自居，以為儒者乃是對品德事功達到至高的至人稱呼，自己不敢當此美譽，亦與當時氛圍有所關聯。明中期以後，政治日益昏暗、享樂風潮喧囂塵上，以及士人傾向自適快意生活，士人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重心上發生變化，認為在無法仕宦與現實環境下，立功既不可能，而立德則在享樂誘惑與難以效法古人躬耕自給的情形下，不易且不想達成。¹³所剩最有可能實現者，只有立言一途，故許多士人汲汲以著述為畢生事業，力求留名於世。¹⁴加上，社會上為文人與商人推動，產生以古物書畫為賞

¹¹ 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頁495~496。

¹² 關於干謁與文人之間的交往過程，可見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二章第二節〈士人社會交往的典型分析〉與第五章〈明中晚期士人社會交往與文化〉。復見 Jamie Greenbaum, *Chen Jiru*, 171~180。以中晚明士人對於山人的看法，配合其對陳繼儒的記述，說明陳繼儒的聲名，當中對於時人對山人的惡評有提及干謁的部分。

¹³ 關於此種士人心態轉變，可以陳繼儒於《巖栖幽事》的自述中得到完美呈現，見第二章註1。

¹⁴ 關於陳繼儒著作書畫的流傳與其聲名的關係，以及當時書畫買賣環境對陳繼儒聲名崛起的影響。其相關補充，見 Jamie Greenbaum, *Chen Jiru*, 180~195。

玩的雅文化流行風尚，許多文人以書畫買賣、模仿古物為生，學有專精，故以學人自稱更體現其學問技藝的專精一面。

最後，陳繼儒藉回答他人居住地點的問題上，自述：「吾貌癯削，而衣丹衣而冠山冠。以遊於縉紳中，則笑其太質；以入於鹿豕中，則疑其太文。我處於不質不文之間，是縉紳鹿豕交相迷失，而不知吾為若何人氏，我以此老矣。」¹⁵。此番言論與其說在敘述山居城居的差異，不如說是他對自我山人角色的認定。萬曆中期以後，隨著政治上礦監稅使的擾民、萬曆多年不上朝、閣部科道官三者相爭，以及黨爭的漸漸嚴重，加上萬曆三大征的出現，使得許多士人不再對國事報以厚望，轉以山人號寄寓隱逸悠閒風尚的現象。這種山人現象的流行，使得百姓與士子趨之若鶩，造成自號山人以干游權貴大戶的現象激增，被時人譏刺為「名為山人心同商賈」。

此一背景下，陳繼儒對自身山人身份與俗世干游的行為產生矛盾，用「處於不質不文之間」說明自身的情況。其以丹衣山冠表示山林隱士角色，放在縉紳之中恐怕引人干游逐利的非議；但若放在山林田野中則又有不似傳統隱士清苦寂靜的問題，以自己山人角色處在藉山林隱逸形象干游的舉動，表示有所感。故用「縉紳鹿豕交相迷失，而不知吾為若何人氏，我以此老矣」說明山林隱逸理想與現實干游謀生的差距帶來的迷惑心態。不過，正是這種清醒認知，使陳繼儒得以在干游時比別人更加明瞭自身，才沒被時人歸類在假山人之列。可以說，這種處在不質不文的體悟正是陳繼儒的一大特點之一。

通過一連串分析陳繼儒如何表達自身形象後，以陳繼儒於墓誌銘文末提及的「天下可得而見且聞，終不可得而知其名」作總結，除表達自己藏名特色外，亦有懼名留外的意涵，這與當時士風喧囂相關聯。陳繼儒與同時代士人一樣，對萬曆中期後社會瀰漫一股躁進風尚感到憂心，所以都不希望自身留名於外，成為謗言抨擊

¹⁵ 陳夢蓮，〈空青先生墓誌銘〉，頁 381。

對象，¹⁶以此作為陳繼儒戒懼心態的旁證，更加知曉他自身的想法。而〈空青先生墓誌銘〉以陳繼儒想表達自身的方式寫下，在後人眼中又是如何呢？後人眼中的陳繼儒是否與他自身認定的自己有所不同？以下將用他人為陳繼儒所寫墓銘及相關敘述來看陳繼儒在他人眼中如何呈現。

第二節 從聖代逸民到雲間鶴——晚明至清中期四庫館臣眼中的陳繼儒形象演變

上述，以陳繼儒自撰的〈空青先生墓誌銘〉闡述陳繼儒與時代背景關聯，和陳繼儒如何看待自己之後，本節打算按照時間先後，羅列後人對陳繼儒的記載，來看後人如何瞭解陳繼儒以及其形象與〈空青先生墓誌銘〉中陳繼儒自述有何同異，從中看其演變。明中期以後，社會上流行清雅風氣與名士風尚，出現貨物假借名士號以召徠販賣現象，而陳繼儒由於名聲卓越，加上喜制新物，許多東西皆掛其名以提高聲價。但是，在鼎革之後，這種名士風尚的崇拜被清初士人反省，至乾隆時期又因學術風氣轉為訓詁考據為主，士人面對此種名士風流特色採取抨擊態度。陳繼儒作為晚明清雅文化佼佼者，於此時被當成指標性人物抨擊。以下以晚明至清乾隆四庫館臣為例，說明他們眼中的陳繼儒，與陳繼儒自身的變化。

一、晚明時人眼中的逸民陳繼儒

陳子龍〈經陳徵士故廬兼問墓道〉云：

徵君池館一追攀，花滿中庭尚閉關。

綺季衣冠成故國，龐公衡宇在人間。

¹⁶ 此種士風躁進的相關敘述，除見本文第二章戒懼部分外，亦可見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第一章〈易代之際士人經驗反省〉與第四章〈關於「言論」的言論〉，同時亦可見其續編《制度、言論、心態》中上編餘論〈所謂士風〉。

白楊漫指東西路，叢桂空留大小山。

此日重翻耆舊傳，不勝清淚損紅顏。¹⁷

陳子龍以「綺季衣冠成故國，龐公衡宇在人間」感嘆美好時光已逝，斯人不在。陳子龍於鼎革之際，途經陳繼儒住所與墓地，以東漢隱居襄陽鹿門山的龐德公比喻陳繼儒，復視陳繼儒為年高德望的耆舊，表達淚灑想念之意。值得注意的是，龐德公為後世所知的特點乃是堅不仕宦與自在躬耕的山林生活，而這與陳繼儒屢拒朝廷徵辟，堅決不仕宦一樣。可知陳繼儒於此時依舊以故國勝流、隱君形象出現於陳子龍回憶當中。

時間往前推一點，陳子龍於陳繼儒 80 歲所做的〈壽陳眉公先生八袞序〉中，以聖代逸民稱之，藉文中答二客所問，述說陳繼儒高名遠播、獨領文苑風騷：

眉公先生壽既八袞，嶽降之期，海內人士及鄉大夫咸集。客有執爵而進曰：「先生博綜典墳，翔步菡苑有年矣，南自炎海，北至朔漠，莫不咏其篇什，仰其風流，足以為先生重乎？」予曰：「此非先生之所尚也。」又有執爵而進曰：「先生抗遐心於早歲，味太玄於塵表，高不事之節以保幽貞，為聖代逸民之首，足以為先生重乎？」予曰：「似矣而未見其大也。」夫君子御世之方不同，而濟世之心則一。或在上而整其治，或在下而輔其化。是故不被其澤，則聞其風德厚者感彌深，自然之符非苟為異也。而世有好奇尚誕之士必取夫晦形銷聲者以為高隱，且曰：「是乃憤世俗而求去之。」二者豈為通論乎！夫語言文章既無所見於世，而姓氏滅昧不可問，則其所謂道德者，我烏乎知之？若以悲世泪濁而憂憂焉逃乎禮俗之外，則是將率天下而畔先王之教也，且何以處？¹⁸

¹⁷ 陳子龍撰；施蛰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 15，頁 530，〈經陳徵士故廬兼問墓道〉。

¹⁸ 陳子龍，《安雅堂稿》上冊，《明代論著叢刊》第三輯，卷 6，〈壽陳眉公先生八袞序〉，頁 362~363。

以有客認為陳繼儒博覽群書，學問淵博，獨步藝壇多年，名揚天下，足以為世人所推重，陳子龍卻以「非先生之所尚」否定。又藉另一客認為陳繼儒年少歸隱，身處俗世卻寄託清閑飄逸之意於心中，堅不仕宦以保全自身的幽寂高潔品格，可謂當代逸民之首，憑此足為世人敬重。然而，陳子龍以「似矣而未見其大」回答。那陳繼儒為人尊崇的真正重點在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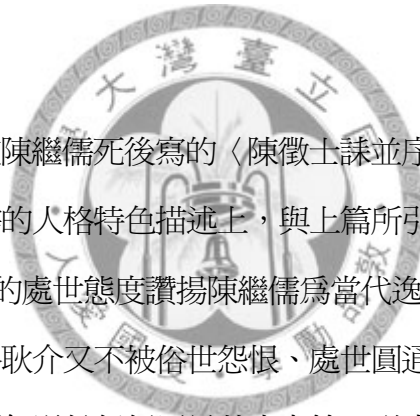
陳子龍以為君子處世方法或有不同，但濟世為民之心則無異；不論在朝在野皆以移風易俗為己任。但是，當時有士人以隱士是因憤世嫉俗對現實失望，遁隱山林完全銷聲匿跡。陳子龍以為完全銷聲匿跡之下，語言文字沒有絲毫流傳，則隱人的姓名事蹟亦將湮滅，又如何為人知曉呢？並且，如果避世是因憂患亂世而逃於禮俗之外，那又如何成為人民典範呢？所以，陳子龍以為陳繼儒的隱並非奇誕之士的憤世嫉俗之隱，而是身隱山林卻仍熱情時事的隱，才會回答客以「似矣而未見其大」。

上可知陳繼儒為時人推崇之因，在於學問淵博獨步藝林，與隱居山林堅不仕宦這兩項。然而，陳子龍卻都以為有所缺漏，其於〈壽陳眉公先生八袞序〉中，有提及自己認為陳繼儒名動天下的真正原因：

今先生生國家郅隆之朝，當六朝重熙之會，自人主以下無不矜式而願見焉，可謂盛矣！然先生非有詭激之行、恢奇之論也，不違親以為高，不絕俗以為貞，則汝南之操也；統六經之微言，彙百家之渺論，則高密之學也；群正臣而不同其險，宗俊傑而不共其功，則南州鹿門之風也，故遇之者，大至於國家之事，細至於農桑漁牧之間，無不各得其意以去。要其大旨，不近名、不喜事、清靜無為而物來自應，如此而已。是故，質者依其誠，文者尚其華，法者軌其介，通者樂其廣，晦者適其簡，達者貴其治。天下士無賢愚，仰先

生之風者，咸思進於道；俗無純駁，被先生之德者，咸思歸於厚。¹⁹

陳子龍以爲陳繼儒盛名遠播，不在陳繼儒特立激昂的行止、新奇宏大的言論，而在其似范滂稱讚郭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的高潔操行；²⁰以及可與鄭高密（鄭玄）彙六經百家集大成的淵博學識相比擬；又與東漢隱居襄陽鹿門山中的龐德公相同，皆有審時避險、澹泊名利的處世方針。陳子龍以陳繼儒從國家大事到農桑漁牧細事上都能使前往求教者各中其意，形容陳繼儒對於時勢的精密見解與博識。最後，陳子龍以「要其大旨，不近名、不喜事、清靜無爲而物來自應，如此而已」總結陳繼儒爲人敬重的根本在於陳繼儒不汲汲求名、不喜惹事生非與清靜無爲物來自應的精神，認爲陳繼儒乃爲一行事低調、崇尚清靜無爲者，與錢謙益認爲陳繼儒妙得老子陰符之學相符合。



另外，復以陳子龍在陳繼儒死後寫的〈陳徵士誄並序〉爲例，著重陳繼儒聲名崛起的重點事蹟與陳繼儒的人格特色描述上，與上篇所引壽序相補充。陳子龍在文中以直心而行、清白自守的處世態度讚揚陳繼儒爲當代逸民，以寡言使人不知其端、內心行事各達妙境、性格耿介又不被俗世怨恨、處世圓通卻不礙其操行、說話戲謔中帶有莊敬、交遊廣闊卻無過份行徑反見其定力等，形容陳繼儒爲人處事。以陳繼儒幼年即嶄露頭角，文盟宗匠如王世貞、陸樹聲、王錫爵等皆與之交遊，年未三十歲即歸隱山中，館授各地作育英才，以妙語清談爲人知曉，且博學多聞、熟悉典故，自神宗起屢被徵辟，盛名在外幾五十餘年，明白勾勒出陳繼儒成名經過。以陳繼儒爲清德雅宗、時憲老，點出陳繼儒品德清雅與文豪身份，對陳繼儒多爲推重之意。²¹

而以陳繼儒山林清雅隱名與濟世心爲主要敘述者，除陳子龍外，熊劍化〈陳徵君行畧〉亦云：

¹⁹ 陳子龍，〈壽陳眉公先生八袞序〉，頁 364~365。

²⁰ (劉宋)范曄撰，《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 68，〈郭符許列傳〉，頁 2225

²¹ 上述可參見陳子龍，《安雅堂稿》下冊，卷 16，〈陳徵士誄並序〉，頁 1095~1096。

隱士陳繼儒，字仲醇。仲醇，天下士，天下爭識仲醇無能名。仲醇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迫之不可救，去之又不能忘焉，其學無所不窺，而大槩歸本於孝弟。年三十而棄青衿以怡菽水，親死，負土為壘，名士來會葬者千人，弟之子、姊之孤賴仲醇得存。仲醇固貧而推解每及於道路，無意取名而輒居其實，眾人不知也。²²

熊劍化以陳繼儒為天下士，眾人爭相認識卻無可名狀陳繼儒本身。熊劍化以孝悌為陳繼儒學問根本，並以陳繼儒年三十就棄青襟奉養父母，舉其父母死時名士來參加葬禮者千人說明陳繼儒的影響力。與陳子龍相同，熊劍化也以陳繼儒「固貧而推解每及於道路，無意取名而輒居其實」，說明陳繼儒不好名的特色。此與陳繼儒於〈空青先生墓誌銘〉中的「天下可得而見且聞，終不可得而知其名」自述相同。熊劍化又更進一步舉例說明陳繼儒所行，以更強調其聞名天下之由：

松民以櫃收破家，仲醇白當事，易以里長，二十年來所全不知幾千戶。歲大饑，仲醇移書政府，是年得寬逋租之半。東南民以小息役，人苦徧累，顧正心捐數萬租以為義，士大夫所難其初慨然不疑者，行仲醇意也。役得助而正心得名，仲醇無與焉。其所著述有役議、荒議、金山議、吳淞議、以至軍興國計皆切時務。其他如秘笈、品外、子史百家靡不精討。借狂夫之言以懾世，而托長者之語以訓家，殘箋寸墨，嘔唾風雲，天下無不誦仲醇言，大者在革除死事。²³

熊劍化舉松江因力役折銀的櫃收問題，使人民受到影響，陳繼儒建議當事者，改役制成里長管理，使人民因此受惠。另有發生大饑荒，陳繼儒上書政府希冀蠲免租稅，使那一年的拖欠田賦減半；還有顧正心於萬曆 17 年（1589）捐租數萬以代替役銀徵

²² 熊劍化，〈陳徵君行畧〉，頁 385。

²³ 熊劍化，〈陳徵君行畧〉，頁 385~387。

收，而這件事也是陳繼儒在後頭策劃所成，說明陳繼儒關懷民瘼的一面。又以陳繼儒諸多關於國家大事的策議著述，與其他如秘笈、品外錄和其他諸子百家著作，以「殘箋寸墨，嘸唾風雲，天下無不誦仲醇言」的盛況說明陳繼儒聲名之盛。

熊劍化復以陳繼儒的清雅與交遊為例，表現陳繼儒一代文豪的一面：

諸公一史曰：「史待王元美，論文陸平泉。先生論人恒不許可一世，獨引仲醇以為小友，久而處之。師友之間，元美遺命必得仲醇讐其集；陸宗伯九十，海內壽者盡名流，必得仲醇序以為重。」嘗過三吳諸先達家，覘其四壁，唯有益松（穴勃）鬱，屏間落落，仲醇數語而已。所居峯泖之間，在水一方，築臺於二陸讀書處，封三高士墓，書石以志感。²⁴

以文壇名人如王世貞、陸樹聲引繼儒為友，極為推崇。熊劍化又以自身曾經過一先賢家中，見其家徒四壁，只有幾盆蒼松與陳繼儒數語字畫，由中可見陳繼儒聲名之大的情形。又以「所居峯泖之間，在水一方，築臺於二陸讀書處，封三高士墓，書石以志感」簡單數語道盡陳繼儒山林生活，營造清雅一面。最後以陳繼儒交遊處世作結，闡述陳繼儒對於遊道的掌握：

董玄宰先生嘗作來仲樓招之，周旋困危，十年如一日。江南偉人如顧、高、管、薛，倡明理學，招仲醇入講社，社中盡東南文章名節之士，仲醇曰：「願士大夫有此行，不必有此名。」諸公可聞而不可得見也。前太守李公師弦，三式其廬，仲醇謝不見，既李公以事罷去，乃追持千里外，勞藉如平生，無何，而李訃至，為位而哭之，辭甚哀，其與人託情深遠類如此。華亭四載，今未識仲醇而能言仲醇，然則今所言者皆道路所能言者也，言何能盡仲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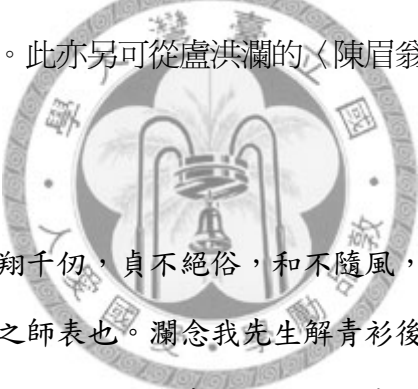
25

²⁴ 熊劍化，〈陳徵君行畧〉，頁 387~388。

²⁵ 熊劍化，〈陳徵君行畧〉，頁 388~389。

熊劍化以董其昌建來仲樓以招徠陳繼儒，並且接濟陳繼儒多年，說明董其昌與陳繼儒的關係。復以顧憲成、高攀龍、薛敷教等人邀陳繼儒入講社講學，陳繼儒以「願士大夫有此行，不必有此名」婉拒之，說明陳繼儒與縉紳名士交遊態度，補充陳子龍所述「群正臣而不同其險」的內涵。另外，從陳繼儒對李師弦的交遊態度亦體現其不輕易與士大夫相交的特點，以李師弦於太守任上三訪之，皆謝不見，在李師弦罷官後，陳繼儒才千里追送為例，除有陳繼儒於〈空青先生墓誌銘〉中述及「衣丹衣而冠山冠，以遊於縉紳中，則笑其太質」的顧慮外，亦有「知者以為畏大人，不知者恐以為遊大人也」的意涵。²⁶

關於陳繼儒此種以清名隱逸為主要敘述，佐以濟世熱情事蹟描繪的現象，乃是當時對陳繼儒的主要印象。此亦另可從盧洪瀾的〈陳眉翁先生行跡識略〉的述說窺知一二：



少年擴開風塵，騰翔千仞，貞不絕俗，和不隨風，非惠非夷，亦狂亦狷，真先民之鴻儀，後學之師表也。瀾念我先生解青衫後，絕不與戶外事，但有關旱、潦、轉輸事或大不便於民究竟大不便於國者，鄉衮或慮拂上意，囁嚅不遽出。先生慷慨弗顧，縷縷數千，言委曲辨析洞中肯欵，往往當事動色嘿奪其意而潛寢之，則先生之任也。先生向作平等，觀荐紳布素以及當路造謁者，俱以真率無異同。²⁷

以陳繼儒雖隱於山，但是其形象非似柳下惠般坐懷不亂，亦不似伯夷餓死首陽般堅貞的傳統隱士，而是和光同塵又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對於家國議論，則既有激昂狂放之語，也有審慎時事冷靜建言的狷者形跡。盧洪瀾以陳繼儒平時不輕易參與戶外事，但在國家大事與民瘼關懷上則慨然上書朝廷，勇於任事。復以陳繼儒對待縉

²⁶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卷 54，〈復許繩齋郡侯〉，頁 9b。

²⁷ 盧洪瀾，〈陳眉翁先生行跡識略〉，收錄於陳夢蓮撰，《眉公府君年譜》，頁 392~393。

紳布衣態度皆以真性情爲之，一律平等。表達出陳繼儒和光同塵的一面與身隱而心不避世的隱者風範。

盧洪瀾又於〈陳眉翁先生行跡識略〉，以種種事蹟述說陳繼儒的弘、毅、虛、介、定、仁、正的一面，在其眼中，陳繼儒待人溫厚、御家嚴厲、名高不驕反更謹慎小心、嚴守干游之間分際不輕受餽贈、受攻訐不怒，以及與人結交不藉其名，喜怒不形於色、學問純正不媚俗。²⁸復以連問六個「何以至此」述說一連串事件，說明陳繼儒聲名之大，最後以「神仙之骨相，才人之風格而載以聖賢之道德者」、「聲氣潛通，簞屨羣動，望如慶雲，就如春日」作爲總結陳繼儒形象表述。²⁹

此種對於陳繼儒抱有好感的描述，直到明末清初皆大體如此。如鄒漪《啟禎野乘》〈徵君陳公繼儒〉亦以「當天啓、崇禎間，婦人豎子，無不知有眉公先生，至飲食器皿，悉以眉公名，比于東坡學士矣。其與董宗伯，交最厚；在前喆中，又比沈石田之于王文恪公云。先是，王徵君穉登，文章翰墨妙天下，交遊在公卿間差似先生，而蒲輪不就爲巖穴光，先生加人一等矣」，以飲食器物皆掛陳繼儒名與蒲輪不就爲巖穴光形容陳繼儒的清雅通隱形象。³⁰計六奇《明季北略》〈陳繼儒卒〉亦持相同看法。³¹以上爲明末清初大多數人對陳繼儒的形象認知，雖然陳繼儒亦有以詩文書

²⁸ 盧洪瀾，〈陳眉翁先生行跡識略〉，頁 393~397。

²⁹ 如「向嘗從吳還，里客有過者，寒暄未畢，必首訊眉先生無恙」說明陳繼儒里中聲望極高；「遠近縉紳孝秀間有不畏名法、不礙長吏，舉事一不當，必曰：『眉先生得無知否？』」描述陳繼儒在士人間的威望；「都人士每一造作制度、器用、飲食以及斯文翰墨，靡不邀先生以爲奇，履先生以爲重」以陳繼儒名號在當時物品交流之盛況；「海內不乏文人才子，後先蔚起，獨先生無論名勳貴畹、朝紳野牧、窮涯僻壤、旃裘菁簞之國，靡不瞻仰丰采，至斷簡殘編，必什襲以藏，且不惜千金購之，前此名哲所未有也」以之說明陳繼儒聲名威望維持之久且盛；「峰泖荒丘耳，先生一築臺於小崑山以奉二陸香火則廟貌重輝，避客泖橋則廢剝鼎造。蓋嘗丙舍天馬、細林，晚則終老於東余，則倏而聚倏而都，山靈吐色陡成名勝之區，四時遊屐相錯，無不登拜。先生之窀穸咨嗟良久而後去之，即市魁野老皆然」以陳繼儒所居峰泖地方成爲名勝景地，說明陳繼儒個人魅力之大；「當少微星隕，哲人其萎，踈遠失色，親知失聲，若不忍出諸口，即數千里得訃音亦喁喁驚悼，傳語若不欲入諸耳。江南一片河山便覺冷淡」以陳繼儒逝世時，時人反應來看繼儒於時人心中的份量。上述參見盧洪瀾，〈陳眉翁先生行跡識略〉，頁 398~401。

³⁰ 鄒漪，《啟禎野乘》，卷 14，〈徵君陳公繼儒〉，頁 517。

³¹ 按：《啟禎野乘》，由序可知成書於崇禎 17 年（1644）冬天。而《明季北略》，由自序署以康熙 10 年（1671）推斷成書，則應在此年無錯。由於二文內容完全一模一樣，只是《啟禎野乘》的〈徵君陳公繼儒〉後有論曰二字，而《明季北略》〈陳繼儒卒〉則刪去論曰二字。筆者以成書時間先後爲判，認爲計六奇〈陳繼儒卒〉一文乃是抄錄鄒漪〈徵君陳公繼儒〉。然而，雖說計六奇完全抄錄鄒漪之

畫干游謀生、受人餽贈以及以著述刻書爲業等問題，不過時人大體上仍著眼於陳繼儒屢爲朝廷徵辟不就的高尙隱節，與其於家國民生大事上書朝廷當道關懷民瘼爲主，同時亦以其名聲遍天下、其名比於北宋文豪蘇東坡，獨領一代風騷爲描繪，其所認爲的陳繼儒正是以隱逸同俗、濟世熱情的「聖代逸民」與獨步文苑、鶴立藝壇的「一代宗工」這種形象爲主軸。以下續以清初時人遺老對陳繼儒又有何不同看法爲例說明之。³²

二、清初士人眼中學問有爭議但人品仍不錯的陳繼儒

隨著鼎革之際清初士人對明末社會風氣與思想的反思，以明末干游、附庸風雅情況氾濫，士人沈迷當中，不關心家國大事；加以黨爭嚴重，政治敗壞，尤其是對於心學束書不觀與當時文人著書不慎的情形更是抨擊連連，對於當時爲山人清雅文化佼佼者的陳繼儒有所微言，使得陳繼儒在清初的形象開始出現以附庸風雅、假處士虛聲博名高等言語稱之。然而，此時仍有一部份士人對於陳繼儒高隱風範仍持敬意，對陳繼儒依舊懷有思念之情；亦有部分士人肯定陳繼儒所爲，但以爲其聲名乃名士相捧，聊以附庸風雅而已。所以清初這段時間，陳繼儒的名聲處於轉變階段，開始出現惡評，但基本上仍以好評爲主。

以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陳繼儒〉爲例，他就認爲陳繼儒名不副實：

陳繼儒，字仲醇，松江華亭人，有《眉公全集》。仲醇以處士虛聲，傾動朝野，守令之臧否，由夫片言；詩文之佳惡，冀其一顧。市骨董者，如赴畢良史摧場，品書畫者，必求張懷瓘估價，肘有兔園之冊，門闈鷺羽之車，時無

文，但仍可以之作為計六奇對陳繼儒之觀感。畢竟計六奇應是認定鄒漪所描繪的陳繼儒形象，才會一字不漏的全錄於文中。

³² 此類對於陳繼儒聲名遠播的看法，亦可參見 Jamie Greenbaum, *Chen Jiru*, 27~59。篇章中對於陳繼儒隱居之名與社會事務的參與皆有描繪，並且以爲陳繼儒聲名即爲其特殊的隱居行事與社會參與所致，可資參考。

英雄，互相矜飾。甚至吳綾越布，皆被其名，竈妾餅師，爭呼其字。今遺集具在，未免名不副其實焉。³³

朱彝尊認為陳繼儒的聲名崛起乃是憑藉其處士虛聲，以當時陳繼儒聲名大到可臧否官員良惡、詩文優劣，又以精擅辨別骨董書畫聞名。復以撰寫淺近書籍、門口多慕名前來的後輩山人名士，甚至飲食器皿皆爭相掛陳繼儒名號，說明其名聲遠播。不過，朱彝尊對此種社會風氣表示不屑，以為此種風氣的盛行是因為當時沒有真正濟世英雄，這只是文人相互吹捧的產物。最後以陳繼儒遺集俱存，未免名不副實作為結尾，表明自身對於陳繼儒的看法。

朱彝尊此種看法實際上代表士人在明亡之後，反省晚明士風文化、社會風尚，以為盛行於晚明那套清閑優雅的山人文化，與重視奇、異、癖等審美觀所造成的自我個性張揚，使得朝中士夫以清雅自保為尚，而在野士人卻過於張揚。³⁴在此前提下，藉批評陳繼儒反省明末社會風氣；因此，會有意忽略陳繼儒隱居濟世的一面，故朱彝尊才以為陳繼儒處世聲名乃是虛名。

此種鼎革之際的反省，實乃明末清初士人的共通點。而作為當時以一代宗工、聖代逸民名揚於外，復因對政治採取冷眼旁觀角度的陳繼儒，即被清初士人視為批評對象。只不過在批評態度上，既有像朱彝尊完全以陳繼儒名實不符為抨擊，認為晚明社會風尚就是由此輩人吹捧誇飾造成尚虛名風氣，才會使士風浮躁，沒有具膽量擔當的真英雄濟世。亦有似錢謙益以陳繼儒的詩文小品為附庸風雅、妝點山林，

³³ 朱彝尊撰；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卷20，〈陳繼儒〉，頁601。

³⁴ 關於晚明社會風尚與山人文化的興盛，可見張濬秋，〈晚明山人的文化風貌與文化建構〉，《安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1：4，2002，頁41～44，當中以陳繼儒、王穉登等人為名山人大名士，以為晚明山人群體的文化建構呈現出的名士氣、商賈氣、才藝化、世俗化的特點，鮮明地體現了時代風氣的深刻影響。復以晚明特有對隱居觀點的解釋，說明晚明隱居不再像傳統躬耕自食，而是以一種清閑優雅的方式行之。表現出晚明社會風尚中，那種山人文化刻意追求的優雅與不問世事的氛圍。另見吳承學、李光摩，〈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文學遺產》，1997：6，頁65～75，以晚明流行的清雅、好奇尚異的風氣，說明晚明社會風氣的糜爛。

以爲陳繼儒的毛病即在於此，不可以用經世學問去指摘他，看似爲陳繼儒辯解，實則更加坐實陳繼儒不擅經世學問的指控。如錢謙益於〈陳徵士繼儒〉所云，以陳繼儒小品詩詞富有飄逸輕俊韻味，交遊遍天下，點出陳繼儒享高名食清福的通隱特色；而後，藉陳繼儒被時人比作吳與弼與陳獻章，以本朝正史虛席以待陳繼儒爲可笑之語。最後，錢謙益以有人以經史經世學問，引經據典抨擊陳繼儒學問空疎駁雜，以爲世上抨擊斥罵陳繼儒者，應從其附庸風雅、妝點山林的特點來看陳繼儒，以其爲人所詬病處正在於享高名食清福，以隱士清閑飄逸之姿附庸風雅。³⁵

錢謙益對陳繼儒的看法，與朱彝尊相似，皆以陳繼儒處士聲名爲虛名。只是朱彝尊以陳繼儒所得盛名與其所遺文集不符，認爲是因爲當時明末無救世的真英雄，使得陳繼儒才得以藉時人相互吹捧暴得大名；而錢謙益則是詳述陳繼儒成名經過，並以陳繼儒聲名遠播四方、名聞朝廷連連薦舉，以附庸風雅、妝點山林一語道破陳繼儒得享大名的根本原因，以當時社會流行妝點山林、附庸風雅的名士風尚與山人文化，著重在陳繼儒聲名崛起與當時社會風氣的關聯；並且以「二三儒者，必欲以經史淵源之學，引繩切墨，指摘其空疎，而糾正其駁，亦豈通人之論哉」，認爲陳繼儒本就以輕詞小文享譽文壇，不以經世學問著名，言語中充斥對陳繼儒學問不佳的看法。

此種出現陳繼儒附庸風雅、妝點山林的批評，著重在聲名描述，不再敘述陳繼儒對國家大事與地方事務的建樹，把焦點聚集在明末社會風氣的檢討，此乃明清易代之際，士人以陳繼儒作爲反省明末社會風氣的開端。而吳承學、李斌的〈明清人眼中的陳眉公〉即把明清士人對陳繼儒看法作一整理，從明清士人稱陳繼儒或山人，或徵君的稱號演變，說明晚明至清中期陳繼儒形象的變化。吳文以爲山人從晚明至清中期皆代表一種貶義，以晚明士人少稱陳繼儒爲山人，多以徵君、徵士稱之，除表達尊敬之意外，復有不以山人肆口奸謀、舟車干游行徑視之之意。復以胡應麟《少

³⁵ 錢謙益，〈陳徵士繼儒〉，頁 638。

室山房集》、李流芳《檀園集》、《明史·隱逸傳》等著作，從晚明至清初時人大體上依舊十分敬重陳繼儒，直至清中期乾隆其間，隨著蔣士銓《臨川夢》、四庫館臣對陳繼儒的批評，以陳繼儒代表晚明附庸風雅、著述空疎的山人文化，以此大肆批評。以為明清人眼中的陳眉公有兩種形象，即雅尚高致博學多聞的徵君陳眉公，與學識低陋人品虛假的山人陳眉公，並以此看出文學流變的不同。³⁶

吳文藉陳繼儒稱號的轉變，說明晚明至清中期時人如何看待陳繼儒。以陳繼儒受到的評價與明清人學術思想轉變以及文風變化相關，從明清時人對陳繼儒的稱號變化，說明其形象轉變。然而，未細究陳繼儒於形象轉變中，對於陳繼儒的描述與陳繼儒本身的比較，所以對於清初時人抨擊陳繼儒，刻意不談陳繼儒關懷民瘼等事；與晚明時人視為雅事的聲名流播與名士風範都沒太多有著墨。我打算以吳文為基礎，擴充清初士人對於陳繼儒的一些描述，以明白明末清初這段時間陳繼儒形象變化實與易代士人對明末社會的反省相關。

不過，如同吳文所述，清初有朱彝尊、錢謙益等抨擊陳繼儒者，亦有如陳貞慧、黃宗羲等，對陳繼儒還懷有情感者。如陳貞慧在《山陽錄》〈陳徵君眉公先生繼儒〉中，以陳繼儒「享上壽，巖棲谷，汲者五十餘年，妻梅子鶴」，且每天行文為樂的山中悠閒生活為述，與四方慕名人士紛紛前來，表示陳繼儒聲名之盛。復以「慧每刺船過訪余山，焚香煮茗，意得忘歸」說明陳繼儒給人飄逸自得的清淡感覺，以「人欽其和，余重其介」表明自身對陳繼儒狷介性格的景仰，且於贊辭中以「綠瞳秋水，人以爲仙；虬梅偃僂，人以爲禪」，用仙人、禪僧描繪陳繼儒形象。³⁷

陳貞慧對於陳繼儒的崇敬在狷介與陳繼儒似仙禪，並以「先生殆移我情矣」、「其在成連海水之間」，藉陳繼儒的狷介與仙禪形象表明自身於明亡之後，以僧人形象反

³⁶ 吳承學、李斌，〈明清人眼中的陳眉公〉，《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總181期，頁1~7。

³⁷ 陳貞慧，《山陽錄》，收錄於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91），第127冊，頁623~624，〈陳徵君眉公先生繼儒〉。

抗剃髮、以遺老自居，故嚮往陳繼儒狷介性格，才會說「人欽其和，余重其介」，表達自身心聲。此於明遺民於易代之際，藉逃禪、出遊、隱居等方式表達自身志意相關。³⁸陳貞慧藉緬懷陳繼儒，懷念過去美好時光，並以陳繼儒的狷介與逃於山中，作為自身移情作用與逃世想法的發洩。這又是另一種清初士人眼中的陳繼儒形象，以陳繼儒的高隱節操與精擅佛老的僧道形象，作為自身遺民身份認同的仿效。

黃嗣艾〈徵君陳仲醇先生〉一文，則以徵君稱陳繼儒，並於文中不具任何貶義。如下所云：

先生諱繼儒，字仲醇，華亭人。……三吳名下士，爭欲得為師友。先生通明高邁，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棄之，隱居崑山之陽，為廟祀二陸，構草堂數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時錫山文端顧先生講學東林，招之往，謝而不赴。親亡，葬神山麓，遂築室東佘山，杜門著述，有終焉之志。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聞強識，經史諸子術伎稗官與二家言靡不較覈。或刺取瑣言細事，詮次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徵請詩文者無虛日。性喜獎掖士類，履常滿戶外，片言酬應，莫不當意。暇則與黃冠老衲，窮峯泖之勝，吟嘯忘返，足跡罕入城市。……忠端公疏稱：「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繼儒」，其推許如此。御史吳甡、給事中吳永順、侍郎沈演等，先後論薦，謂繼儒道高齒茂，宜如聘吳與弼故事，屢奉詔徵用，皆以疾辭。……南雷公入京頌冤，遇之於西湖，畫船三隻，一頓襪被、一見賓客、一載門生故友，見之者雲集。陶不退先生挺謂先生曰：「先生來此近十日，山光水影，當領略徧矣。」先生笑曰：「迎送不休，數日來僅看得一條跳板。」……南雷公出頌冤疏，先生從座中隨筆改定。……侵晨，來見先生者，河下泊舟幾里許，先生櫛沐畢，次第見之。午設十餘席以款相知者飯後，畫扇亦不下數

³⁸ 關於明遺民心態可見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第六章 遺民生存方式〉。當中舉逃禪作為自身於明亡之後對自己於晚明社會風尚所做的反省與藉遁入禪門以自懺與反抗清朝的統治，以表願作世外之民而不願作清順民之意。

十柄，皆先生近詩。³⁹

文中描述陳繼儒聲名崛起與其他人相似，不過對於其參與地方大事的描述沒有著墨太多，反而以陳繼儒工詩善文、博聞強識、四方徵請詩文無虛日、性喜獎掖後輩等描述陳繼儒，以黃道周的「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繼儒」作為推崇陳繼儒的結尾。復以黃宗羲入京頌冤途訪陳繼儒一事，說明黃宗羲筆下描述的陳繼儒為平易近人、清閑優雅的名士，並以陳繼儒自嘲「迎送不休，數日來僅看得一條跳板」作為陳繼儒大名在外的例子。

大體上，明末清初這段時間，雖然開始出現對陳繼儒的抨擊，然而，陳繼儒所展現的晚明士人理想生活，如自適、清雅、冷眼旁觀等面向，依舊為清初士人所欣羨，所以其用陳繼儒以緬懷明末生活，並以陳繼儒歸隱山林、避名於世的特點因應清初遺民生活。此時對於陳繼儒的述說即少有提及陳繼儒於地方事務與國家社會有何建言，反而多陳繼儒聲名崛起與屢拒朝廷徵辟的隱士逸民生活，這也說明了當時時人面臨的清初博學鴻儒、山林隱逸科的徵辟困境。故才有藉表揚陳繼儒隱逸事情藉以明志的情形發生。陳繼儒作為一個明季名士，其鼎盛聲名、自適隱逸生活與冷靜圓通的處士態度，不僅代表當時晚明講究自適、逃離現實的時代氛圍。

張德建〈末世的名士風度——陳繼儒芻議〉以《陳眉公文集》與陳繼儒小品文集為例，述說陳繼儒以自我為中心，謹慎處世、交遊圓融並且冷眼旁觀世事的處世模式，正為晚明士人理想中的生活方式，故比李贄、屠隆更受時人歡迎。⁴⁰文章以陳繼儒無何建樹於國家地方，卻可得享大名，與其「妙得老子陰符之學」及當時晚明流行風向有極大關聯。然而，卻忽略了陳繼儒於國家大事與地方事務屢次建言，著有許多策議之文；因此，才有文末對陳繼儒「哲學上不如李贄，文學上不如袁宏

³⁹ (清)黃嗣艾，《南雷文案》，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85)，卷4 先正，〈徵君陳仲醇先生〉，頁388~390。

⁴⁰ 見張德建，〈末世的名士風度——陳繼儒芻議〉，《中州學刊》，151，2006，頁224~227。

道，才氣不如徐渭，繪畫不如董其昌，可偏得大名，享清福」的評價出現。⁴¹此種看法，可以康熙末年出生的王應奎《柳南隨筆 續筆》對陳繼儒的評價作為清初士人對陳繼儒評價演變的終點。如下引文所云：

陳眉公臨終時，手書影堂一聯，云：「啟予足，啟予手，八十歲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鳶飛魚躍。」遺筆囑諸子云：「內哭外哭，形神斯惑，請將珠淚，彈向花木；香國去來，無怖無促，讀書為善，終身不辱。戒爾子孫，守我遺囑。」又遺命葬佘山中，平土中，不封不樹，子孫默識其處而已。先生於去來之際從容如此，雖學問不無可議，而其人固不易及也。⁴²

以陳繼儒在臨終時自省一生履薄臨深，然而於生死之際卻表現得極為豁達，並遺命囑咐子孫不要為其逝世而痛哭，謹守家訓讀書為善，最後又要求子孫不立碑廬，僅以土塊葬之。王應奎認為陳繼儒在死生之際能如此豁達，實在不容易。以為雖然陳繼儒學問不無可議，不過至少在處世態度上比常人更勝一籌。

此種「雖學問不無可議，而其人固不易及也」持論的轉變，乃是由於學術風氣的變化所致。由於清朝有鑑於晚明心學末流學問流於空疏，所以明末以來即有士人提倡經世致用之學，至易代之後，隨著清初士人對明末的反省，講究由紮實學問致知的朱子學又再度興起，而樸學的出現，更使講究學問考證與讀書通經的重要性為人所倡，因此出現了以陳繼儒學問駁雜加以抨擊者的情形出現。

此種狀況除以朱彝尊舉陳繼儒詩，認為陳繼儒名不副實以外，更可以王應奎《柳南隨筆 續筆》中對於陳繼儒著作抨擊為例，如下二例所云：

⁴¹ 見上文頁 227 中所云：「他矜博識，逞小慧，說盡了便宜話，占盡了天下便宜，又表現得高雅自得。他在文學上並沒有太了不起的建樹，詩文一如其人，淡雅而舒卷自如；他筆下也經常有些看似平淡實則奇異的話，如『驚雀拱鼠』之喻、『曝鱗點額』之比等，非常形象，可謂絕妙。陳平原說陳繼儒哲學上不如李贄，文學上不如袁宏道，才氣不如徐渭，繪畫不如董其昌，可偏得大名，享清福，其根源就在於他實踐了晚明一大批文人心目中的一種理想生活方式。」

⁴² (清)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 續筆》，卷 1，頁 5。

偶閱陳眉公《秘笈》，有最誤者二處，聊一辨之。……今眉公云云，是《周禮》且未見矣。……目不識丁，而好著書以欺天下，多見其不知量也！⁴³

與

嘗見陳眉公《羣碎錄》，有云：「禮八十日有秩，故稱八十為八秩。」然則六十、七時俱不得稱秩乎？此語殊無稽。況《小戴禮》本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而眉公錯記九十為八十，荒謬至此，尤可一笑。⁴⁴

王應奎以陳繼儒的《秘笈》與《羣碎錄》說明其著書疏漏與錯誤的地方，以陳繼儒「目不識丁，而好著書以欺天下，多見其不知量也」，諷刺學問低陋；復以「眉公錯記九十為八十，荒謬至此，尤可一笑」嘲笑他讀書不精，學識淺陋。此種舉陳繼儒書中錯誤之處加以抨擊的情形，正與錢謙益所謂「二三儒者，必欲以經史淵源之學，引繩切墨，指摘其空疎，而糾正其駁，亦豈通人之論哉」相同，代表清初士人對於陳繼儒評價出現轉變的過程，從原本的尊崇到後來發出對其學問不嚴的抨擊。⁴⁵從陳繼儒形象的轉變，聯繫到清初學風與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變動對其的影響。

若細究之，更可從不同人對陳繼儒的評價看出清初士人在清初因自身身份所產生的焦慮感下，對於自身出處與明亡的反思，以及對於明末社會風氣的討論，在在都能從對陳繼儒的評論中看出端倪。此種轉變是漸進式的，其隨著個人心態與自身選擇的不同，對於陳繼儒的評價亦有改變。只是愈到清中葉，陳繼儒的評價就愈差。這也與清中期乾隆年間，當時主流對陳繼儒的抨擊相關，以下將討論之。⁴⁶

⁴³ 王應奎，《柳南隨筆 續筆》，卷4，頁78。

⁴⁴ 王應奎，《柳南隨筆 續筆》，卷4，頁82。

⁴⁵ 錢謙益，《陳徵君繼儒》，頁638。

⁴⁶ 以上關於陳繼儒於清初士人的評價上，Jamie Greenbaum 所著的 *Chen Jiru* 中的第七章晚明清初陳繼儒形象，則把其合併於一起視之，對於晚明士人的社會情形與陳繼儒聲名崛起的要素描繪清楚，且對於清初士人對陳繼儒的形象亦有所描繪，以陳繼儒的聲名與書畫戲曲創作，以及陳繼儒著作的流佈作為陳繼儒聲名的探討，可資本文參考。

三、乾隆時期大肆撻伐下學問淺陋人品低下的陳繼儒

隨著清初開始出現對陳繼儒學問空疏的批評之後，在乾隆時期，對陳繼儒的抨擊達到一高峰。以蔣士銓〈臨川夢·隱奸〉對陳繼儒大肆抨擊最為有名：

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盡力誇。獼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煙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⁴⁷

蔣士銓對陳繼儒的看法已沒有像清初抨擊陳繼儒者的「雖學問不無可議，而其人固不易及也」，以為陳繼儒學問雖不好，但至少人品還不錯。在蔣士銓的〈隱奸〉開場白中，陳繼儒已經成爲一個藉山林附庸風雅、以隱博名、人品虛偽、鑽營求利的十足小人，對陳眉公完全是負評，無任何正面評價。

蔣士銓於〈隱奸〉文中對陳繼儒的描述，說明清中期士子對陳繼儒形象的看法。蔣士銓以陳繼儒口吻自述己身，拿錢謙益的〈陳徵士繼儒〉爲藍本，說明陳繼儒的成名過程。然而，在陳繼儒焚棄儒冠宣示歸隱一事，卻以「非薄卿相而厚漁樵，正欲藉漁樵而哄卿相，騙得他冠裳動色」，以陳繼儒棄巾歸隱是以隱博名，說明其人品虛偽。又把陳繼儒藉著述謀生行徑加以誇大，以陳繼儒養地方窮儒，使之尋章摘句編纂成書，藉友朋相推崇，使書籍大賣，獲取豐厚利潤。於文後又以「你道這樣高人隱士，做得過做不過？」顯示在蔣士銓筆下的陳繼儒乃是一個人品虛偽，利欲薰心且善於包裝自己的無端士人。⁴⁸

⁴⁷ 蔣士銓，《臨川夢》，〈第二齣 隱奸〉，頁19。

⁴⁸ 謹錄全文如下：「老夫陳繼儒，字仲醇，別號眉公，江南華亭人也。少年頗工八股文字，作秀才時，與董思白、王辰玉兩人齊名學校。年未三十，焚棄儒冠，自稱高隱。你道這是什麼意思？並非薄卿相而厚漁樵，正欲藉漁樵而哄卿相。騙得他冠裳動色，怎知俺名利雙收。又得董思白極力推尊，更托王太倉多方延譽。以此費些銀錢飯食，將江浙許多窮老名士，養在家中，尋章摘句，別類分門，湊成各樣新書刻板出賣。嚇得那一班鼠目寸光的時文朋友，拜倒轅門，盲稱瞎贊，把我的名頭，傳播四方。而此中黃金白鐵，不取自來。你道這樣高人隱士，做得過做不過？」蔣士銓，《臨川夢》，〈第二齣 隱奸〉，頁19。

在描繪陳繼儒以隱博名、貪財形象後，復以好制新物、藉山人名義把持朝政等形象為端抨擊陳繼儒。蔣士銓云：

我又想道：單是士大夫敬重，弄錢畢竟有限。因而把飲食器皿，各件東西，設法改造新樣，騙那市井小人，遂致財源滾滾。所以古有東坡之肉，今有眉公之糕；古有李斯狗枷，今有眉公馬桶。竟弄得海外聞名，朝端推重。由他地方官、欽差官，薦舉爭來；自比康齋翁、白沙翁，徵詔不動。而且記私仇常時頃陷正人，藉清議暗裏把持朝局。⁴⁹

蔣士銓復以陳繼儒把腦筋動到飲食器物，藉制新樣冠上自己名號，匡騙市井小人以攫取錢財；且以陳繼儒屢受薦舉卻又徵詔不動，呼應前面「終南捷徑無心走，處世虛名盡力誇」的描繪，作為蔣士銓對陳繼儒隱逸行為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蔣士銓描寫陳繼儒逐利這一段文字，以「竟弄得海外聞名，朝端推重」作為陳繼儒聲名崛起的註腳。然而，為何陳繼儒如此作法可以導致海外聞名呢？從中我們能知曉，在蔣士銓眼中，晚明的社會風氣就是此種以隱士虛名博取美譽，且社會流行好奇尚異的怪誕風格，才因此說明陳繼儒如何藉隱士虛名，交結文士名人，並以此相吹捧，更藉刻書與時物製作以謀美名與攫取錢財。在蔣士銓眼中，陳繼儒的行為成了晚明社會風尚的微型體現。

在描述了陳繼儒的種種「劣跡」後，蔣士銓再以筆下的陳繼儒自得口吻說明自身隱逸事業的「成功」矇騙多少後人為述，表達自身對陳繼儒的最後定義。如下所云：

自古至今一個窮工極巧的買賣，竟被我陳眉公作化了！即使天下後世有人看破行藏，又當不得我的書畫實在精妙，他們也不忍一筆抹倒，何況我的香火

⁴⁹ 蔣士銓，《臨川夢》，〈第二齣 隱奸〉，頁19。

子孫布滿藝林。這一個隱逸之名，真個安如泰山、穩如磐石也。⁵⁰

蔣士銓以「買賣」比喻陳繼儒的隱逸行徑，又以其得意嘴臉說出這樁大買賣給自己做的巧妙無比，就算後世識破自己以清雅外表詐騙錢財的行徑，也因自身的確書畫精妙，受文人畫畫如其人的觀點影響，也不忍大肆抨擊；又說自己松江畫派徒子徒孫眾多，使得自己這隱逸清名當真穩如泰山，無人可翻案。

蔣士銓復以陳繼儒推銷自身書畫給毛文龍，卻被以區區山人不買帳，心懷怨恨，利用錢龍錫、袁崇煥除掉毛文龍，以及陳繼儒於王錫爵相府內見到湯顯祖，希望湯顯祖題聯卻被以「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譏刺依附王衡羞辱之，並以「山人何不居山，而居宰相府內」諷刺之，心懷不滿，慫恿王錫爵，使湯顯祖落榜，呼應前述「記私仇常時頃陷正人，藉清議暗裏把持朝局」之語。⁵¹把陳繼儒描繪成一個假借隱士清名牟取名利的奸詐小人以外，復把明亡與朝政敗壞的過錯推給陳繼儒承擔。

早在明亡之前，即有人以為東北形勢日益危急，與袁崇煥、錢龍錫合謀殺掉毛文龍有關；亦與當時社會輿論喧囂塵土，把持朝政有關。明亡之後，隨著遺老對明亡之因的反思，人們開始認為毛文龍之死在明亡原因當中佔有一席之地。當中開始出現錢龍錫就任大學士時，曾拜訪陳繼儒，其贈一語曰：「拔一毛而利天下」的論述，以為毛文龍之死，雖直接肇因於袁崇煥的擊殺，然而真正兇手乃是陳繼儒語錢龍錫的那一席話。⁵²而蔣士銓正是以此為基礎，擴大此說內容，把毛文龍之死歸罪於陳繼儒索銀不得挾怨報復，視陳繼儒為貪財卑鄙者。

最後，蔣士銓在〈隱奸〉中，把陳繼儒視為晚明山人典型，代表晚明當時社會流行的名士風尚，以名士相誇逐利謀名；與士子浮躁的輿論，以社會輿論干涉政治，

⁵⁰ 蔣士銓，《臨川夢》，〈第二齣 隱奸〉，頁 19~20。

⁵¹ 蔣士銓，《臨川夢》，〈第二齣 隱奸〉，頁 20~22。

⁵² 參見王應奎，《柳南隨筆 續筆》，頁 159~160，〈陳眉公條〉。

視陳繼儒為晚明習尚代表，以此抨擊陳繼儒，此種觀點與四庫館臣相同。而此種論述則是沿襲清初明遺老對於晚明社會風氣的檢討論述，以為明季社會充斥無行山人逐利之風、士人以隱相搏名、朝中結黨嚴重與在野士人的肆意批評朝政等習尚，加上一連串政治事件導致明朝的滅亡。尤其對於南明弘光朝的反思更是以士風敗壞與社會習尚澆薄為滅亡之因。⁵³

有趣的是，陳繼儒生前一直以士風敗壞、風俗澆薄為憂，屢次抨擊此種現象，並以自身時享大名為憂，一直強調自身的潔身自好。想不到至清中葉反而成為時人抨擊的過街老鼠。此種現象的轉變，可上溯至清初康雍之際的部分士人看法，到蔣士銓《臨川夢》加以擴大，至四庫館臣的《四庫題要》則形成系統性批評，成為後人普遍認知的陳繼儒形象。⁵⁴

而四庫館臣對於陳繼儒的抨擊，主要從明末士人學問空疏、儒釋道三教混雜與文學流行小品輕巧纖豔體裁，使得明末社會風氣呈現輕佻空泛，以清閑優雅逃離俗世為主。而四庫館臣以陳繼儒為當中代表，大肆抨擊之。如《四庫全書總目·續說郭》所云：

隆萬以後，運趨末造，風氣日偷，道學侈稱卓老，務講禪宗；山人競述眉公，矯言幽尚。或清談誕放，學晉宋而不成；或綺語浮華，沿齊梁而加甚。著書既易，入競操觚，小品日增，危言疊燭，求其卓然蟬蛻於流俗者，十不二三。

55

⁵³ 此種清中期士人對於陳繼儒的抨擊，可見 Jamie Greenbaum, *Chen Jiru*, 205~211。文中以為清中期士人私下對陳繼儒的抨擊起於顧炎武，經過呂留良、朱彝尊、蔣士銓等人的發展，形成一股主流，文中重點即在清中期士人在私底下，對陳繼儒多持激烈抨擊態度，至 19 世紀後才漸漸改變。

⁵⁴ 請參見趙楠，《陳繼儒——晚明士風的一項個案研究》，〈第二章 第三節清代陳繼儒山人稱謂的賦予〉。文中引用明末清初文人文集中對陳繼儒稱號的改變，以此說明山人號於晚明的污名化，與清初由於社會風氣與學術思想等變遷，造成陳繼儒名稱的轉變。以此衍生陳繼儒如何從一個被晚明時人所尊崇的隱士逸民，變成清中期人人喊打的明末不學無術與矯言幽尚的山人文化代表者。

⁵⁵ 永瑤、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5 冊，卷 132，子部 25，雜家類存目九，〈續說郭〉，頁 2739。

其以明朝自隆慶萬曆以後，風氣日漸敗壞，「道學侈稱卓老，務講禪宗；山人競述眉公，矯言幽尚」，說明士人在思想上受心學良知概念影響，專講心性之學；在社會風俗上則受當時以清閑飄逸為尚的山林文化影響，矯言幽尚。四庫館臣以李贄、陳繼儒作為此時風氣的代表人物，以為時人推崇魏晉名士風度，以飄逸、清言為尚，卻學魏晉不成反成清言狂放姿態；而此時小品文盛行，則以南朝齊梁盛行的綺麗文筆為主，甚至更加纖細穠麗，此正是四庫館臣抨擊晚明風氣的重心。至於選李贄、陳繼儒作為代表，乃因李贄的僧儒雙重身份與張揚狂放的行徑加上其盛大名聲所致，而陳繼儒則是因其名滿天下的名士風範與其清新俏麗的小品文風，使四庫館臣以此作為晚明社會風氣的表尚。

此種情形下，加上《四庫全書》的取書標準的影響，⁵⁶使得四庫館臣在評價陳繼儒上，視其為明代社會風氣敗壞的替代者，故多用「明季所謂山人者」、「語尤多輕佻」、「不脫小品陋習」等話語抨擊陳繼儒。如《四庫提要·梅墟先生別錄》云：

是編為嘉興周履靖作。履靖字逸之，能詩好事，與其妻桑貞白自相唱和，多刊書籍以行，夷門廣牘即其所編，蓋亦趙宦光、陳繼儒之流，明季所謂山人者也。⁵⁷

《四庫提要》以《梅墟先生別錄》為周履靖所撰，敘述周履靖事蹟，以為其與趙宦光、陳繼儒一樣，都是明末所謂的山人一流，把陳繼儒歸類為山人。然而，此條尚未有任何鄙視之意，只是以陳繼儒為山人而已。只是，在〈續說郛〉內四庫館臣已

⁵⁶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所云：「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幃、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騁，編刻酬唱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分別哪些該收哪些不收，顯示其擇書標準，可藉此看出其學術風氣與中心為何。見永瑤、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1冊，卷首，〈辦理四庫全書歷次聖諭〉，頁1。

⁵⁷ 永瑤、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3冊，卷60，史部16，傳記類存目二，〈梅墟先生別錄二卷〉，頁1326。

明白表露出對影響晚明社會風尚的山人評價；在其他方面上，四庫館臣亦表現出對陳繼儒的看法。如《四庫提要·史疑》所云：

是編取三傳、國策、史記、漢書及諸雜史，摘其事迹而論列之。如以項羽爲智士仁人，以漢高帝爲木偶之類，殊嫌乖謬，措語尤多輕佻。卷首題陳繼儒選定，則習氣所染由來者漸矣。⁵⁸

以宋存標作《史疑》，雜取春秋三傳、戰國策、史記、漢書與諸史，摘事評論。但是論述卻乖謬怪誕，言語充滿輕佻意味，立論不嚴謹。以卷首題陳繼儒選定，認爲此乃被陳繼儒所染，才會著述空泛怪誕、言語輕佻。把陳繼儒當成晚明士人著述以立論新奇爲尙的風氣代表者，以此看待陳繼儒。

陳繼儒被視爲山人矯言幽尙與立論淺陋、言語乖謬風氣的代表，其實與清中期學術風氣有關。清中葉，由於程朱理學再度爲國家士人所重，加上考據訓詁學的興盛，使得四庫館臣不喜晚明時期士人受心學影響，立論不拘一格，思想活潑的爲學方法；加上心學末流的好議論時事、讀書不嚴謹，言論空泛的弊病，使四庫館臣對此大加抨擊。所以，有明人以陳繼儒爲理學名家時，四庫館臣多抱以嗤之以鼻的態度。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性理會通》所說：「是書成於崇禎甲戌，卽性理大全，而增以明人之說。袁宏道、陳繼儒皆躋諸理學儒先之列，則其去取可知矣」，⁵⁹表現出袁宏道與陳繼儒都能被稱爲理學儒先之流則此書水平可知的含意，表達四庫館臣對陳繼儒學問的認定與看法。此種關於陳繼儒學問低下、言辭輕佻的看法，幾乎貫通全書，成爲四庫館臣對陳繼儒的主流看法。⁶⁰

⁵⁸ 永瑤、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3冊，卷90，史部46，史評類存目二，〈史疑四卷〉，頁1862。

⁵⁹ 永瑤、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3冊，卷96，子部6，儒家類存目二，〈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頁1997。

⁶⁰ 如〈史折〉所說的「其中可一兩言決者，必連篇累牘，覺浮文妨要；至於陳繼儒之淺陋，李贄之狂謬，復爲之反復辨論，更徒增詞費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3冊，卷90，史部46，史評類存目二，〈史折三卷續一卷〉，頁1866~1867）；與〈茶花譜〉云：「其文欲以新雋冷峭學屠隆陳繼儒之步，而纖佻彌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卷116，子部26，譜錄類存目，〈茶花譜三

最後，由上述種種可見四庫館臣對陳繼儒的惡評，基本上多基於批判晚明社會習俗的視角上，對陳繼儒的隱逸、關懷民瘼上書朝廷的行徑視而不見。然而，在《明史稿》與《明史·隱逸列傳》中，清廷對陳繼儒的看法則為既無明顯褒義，亦無明顯貶義，忠實的把陳繼儒於晚明的聲名記載下來。⁶¹因此，與其說四庫館臣批評陳繼儒此人，不如說其把陳繼儒抽象化，視陳繼儒為晚明惡俗的化身，以此抨擊晚明社會風氣。這也是自蔣士銓以來，士人抨擊陳繼儒最主要的原因。而正因此故，陳繼儒作為山人代表者深深影響了後世人對陳繼儒的看法，使得晚明時人抨擊的「假山人」與陳繼儒這種「真山人」通通成為清人眼中的山人一員，使山人在當代解釋即混亂不明的情形下，更加混亂與複雜。此種情形的出現正是陳繼儒形象自明末以至清中期所發生的形象變化引起的影響。而此種現象到了道光以後，復有所變化，以下即就道光以降陳繼儒在時人眼中的形象，說明之。

第三節 不應醜詆陳繼儒——道光至民初配合時代轉變的陳繼儒形象

卷），頁 2445）；以及〈爨下語〉所云：「每條俱以偶語聯比成文，頗似格言，而多雜以委巷之語，前有天啟壬戌陳繼儒序，知為繼儒一流人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4 冊，卷 125，子部 35，雜家類存目二，〈爨下語二卷〉，頁 2632~2633）等等，足可見當時四庫館臣對陳繼儒的評價。

⁶¹ 關於清中期對陳繼儒的看法，可參見 Jamie Greenbaum, *Chen Jiru*, 205~219。其中，作者對於陳繼儒於清中期與晚清的評價，主要以私人抨擊與官方讚美兩方面為主要論述。以為 18 世紀時，由於士人不承認滿清入侵的合法性，所以反思明亡原因，以陳繼儒為替罪羔羊，書中以蔣士銓《臨川夢》、朱彝尊《明詩綜》為例；而官方立場則是站在國家角度上，旨在把陳繼儒塑造成文化上的標準刻板，以《明史》當中對陳繼儒的稱呼與〈隱逸傳〉對陳繼儒的描述為主，搭配《明史稿·隱逸傳》，並且配合地方志列傳對陳繼儒的安放位置，說明官方抱持讚美陳繼儒的態度，去看陳繼儒的隱居，並把陳繼儒視為隱士。至於 19 世紀後，由於士人對清朝入侵的合法性爭辯已能平均分攤先人的罪過，故能較心平氣和看陳繼儒，不會再以偏頗角度視之，此為書中主要觀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書中以「布衣」為不受官祿的精英，以為陳繼儒身屬士人精英一員，但布衣一詞實乃陳繼儒於棄青襟後，用以自表自身平民身份，故與書中所論有所不同。書中提出清中期與晚期士人對陳繼儒看法與承認清朝統治相關的看法，立論新奇，對本節有所啟發。在運用史料上，其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尋樂編》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建文史待》說明中央對於陳繼儒的評價為正面的。前者以毛元淳喜讀眉公書討厭李贄言為例，說明陳繼儒不僅有山人身份，更為一種隱居行事的典型代表；復以李贄亦為接近道家的隱士說明之。後者則於描繪陳繼儒事蹟時以參考隱逸傳為由，復說明建文史待乃為陳繼儒所編建文一朝遺事作尾。作者以《明史》、地方志與上述二條《四庫總目提要》為引，說明中央是讚美陳繼儒的，與私人抨擊陳繼儒上持相反態度。

道光以降，陳繼儒在乾隆時期為蔣士銓、四庫館臣等污名化，隨著考據學日益衰微與清朝統治力的衰弱，使人們對陳繼儒的評價有所改觀。然而，仍有許多人以陳繼儒為晚明浮濫文化的代表與明亡禍首，對其持抨擊態度。如昭璉在《嘯亭雜錄·毛文龍之殺》云：

袁崇煥之殺毛文龍，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煥後死可憫，故爾掩飾其過，至謂毛文龍果有謀叛諸狀，非深知當日之事者也。……遂使孔定南諸將陰懷二心，反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國之大機。豈可因其後日之死，乃遂掩其過也。或曰毛文龍嘗求陳眉公繼儒作文，陳邀以重價，毛靳不與，陳深恨之，乃備告董文敏，言毛不法專擅諸狀。董信之，崇煥為董門生，任遼撫時嘗往謁董，董以陳語告袁，袁故決意為之。然則明代之亡，亡於善書者手也。⁶²

上文，昭璉以為明亡乃是袁崇煥擅殺毛文龍所致，此承襲王應奎、蔣士銓一派說法，以為毛文龍的死導因於陳繼儒向毛要重金不力，暗中動手角害死毛文龍，從而導致明亡，以「明代之亡，亡於善書者手」說明其對明末文人的看法。文中復以當時士人因袁崇煥死狀戚憫，替袁隱惡揚善，大肆抨擊毛文龍不法行為，甚至污為謀逆，昭璉替毛文龍抱不平，有為其翻案之意。由於昭璉乃鐵帽子王代善之後，其對毛文龍、袁崇煥與陳繼儒的看法實代表當時部分統治階級的意見，以為明亡之因在於君主昏庸與文人操弄朝政所致。⁶³另外，王有光的《吳下諺聯》則以陳繼儒山中宰相稱號為名不副實，表明其對陳繼儒的看法。⁶⁴

然而，此時亦有許多士人能夠正視陳繼儒，不再以偏頗角度視之。如陸以湑《冷廬雜識》〈新樂府〉中所云：

⁶² 昭璉，《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10，〈毛文龍之殺〉，頁363。

⁶³ 見昭璉，《嘯亭雜錄》，卷10，〈明非亡於黨人〉，頁326～327，以為明亡乃是君主昏庸加上魏忠賢屠戮大量朝中正士所致；與《嘯亭續錄》，卷5，〈明末風俗〉，頁512，以當今風俗敗壞導因於明末。

⁶⁴ 見「唐李泌以白衣入侍，肅宗強之入相，時稱山人，此山中宰相也。若宋之林逋，近時陳繼儒輩，世亦有以此品目者。不但未登台鼎，亦名不肖實」所述。王有光，《吳下諺聯》（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3，〈山中宰相〉，頁93。

山陰胡茨村觀察介祉，取明崇禎、弘光時事作《新樂府》六十篇，篇各有記，載述甚詳。顧往往有與正史異者。如〈諸公子篇〉，謂魏大中子學濂官庶常，汙甲申偽命，而略其死事一節。〈東江歎篇〉，謂毛文龍盛時，獲貂書幣，走津要如織。陳繼儒負盛名，方游輦下，獨不及，心銜之甚。適於錢龍錫座談東江事，言毛跋扈僭越當斬狀，錢因以語袁。禍釀於微細，而中於封疆，橫議之罪，真不容誅。不知此乃妄傳，未可據以為實。⁶⁵

文中以胡介祉著《新樂府》篇中所述多往往與正史相異，舉魏學濂投降李自成一事，卻對後來魏學濂自殺明志略而不題；復以毛文龍被袁崇煥所殺是因為其得罪陳繼儒，使陳繼儒慫恿錢龍錫唆使袁崇煥殺掉毛文龍。胡介祉以「禍釀於微細，而中於封疆，橫議之罪，真不容誅」表明自身對於毛文龍為陳繼儒所構陷一事做出評論。在其眼裡看來，陳繼儒代表晚明處士橫議的惡俗，肆意操弄朝政，致使明亡。

然而，陸以湑以為毛文龍因陳繼儒陷害為袁崇煥所殺，根本是子虛烏有之事，不可據以為實。能比較正面看待陳繼儒，不像王應奎、蔣士銓以及昭璉等人把明亡責任歸罪於陳繼儒一人，道聽途說以妄傳為實。加上此時社會風俗也出現似晚明縱樂奢侈的商業社會，文人聚會與商人文士交流以及風俗尚奢成為風尚。故對於陳繼儒於晚明所引領的名士風流亦有所感，不像四庫館臣般大肆抨擊。如陸以湑〈不繫園〉所云：

陳眉公先生題曰『不繫園』，佳名勝事，傳異日西湖一段佳話。豈必壘石鑿沼圍邱壑而私之，曰『我園我園』也哉？黃參議汝亨為作〈不繫園約〉，標以十二宜九忌。十二宜云：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妙香、洞簫、琴、清歌、名茶、名酒，般不踰五簋、

⁶⁵ 陸以湑撰；崔藩芝點校，《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2，〈新樂府〉，頁94。

却騶從。九忌云：殺生、雜賓、作勢軒冕、苛禮、童僕林立、俳優作劇、鼓吹喧填、強借、久借。⁶⁶

陸以活以陳繼儒題名明末著名徽商文士汪汝謙(汪然明)的舟爲不繫園爲例，以「佳名勝事，傳異日西湖一段佳話」表明自身對於此種舟游閒賞風氣的喜愛；復以黃汝亨〈不繫園約〉中的十二宜九忌說明當時文人表現的雅俗風範。從中，可見此時社會由於經濟發達，朝廷自乾隆時即喜愛文學、巧物，使得社會流行奢侈風雅文化，這也使得陳繼儒在此時評價不似乾隆四庫館臣與理學家以晚明社會風俗爲敗壞、腐化的觀點了，此時士人對於陳繼儒已能較平和對待，不會爲抨擊而抨擊，對於陳繼儒於晚明文化所佔地位有一較客觀認知。

綜觀清朝道光以降至民初時期，世人對於陳繼儒的評價，一方面仍認爲陳繼儒與明亡有關聯，故依舊以毛文龍之死抨擊陳繼儒；另一方面，此種反對聲浪卻日益薄弱，許多士人皆以爲毛文龍之死實與陳繼儒無關，此乃妄傳而已。這可從時人對於《臨川夢》的講評窺知一二。如平步青《霞外攬屑》〈小棲霞說稗·臨川夢〉云：

《潛丘劄記》卷4上跋《堯峯文鈔三》云：「錢牧翁評隲陳仲醇，謂『聊可妝點山林，附庸風雅』。人於鈍翁（汪堯峯，汪琬）亦云然。仲醇御物才神絕，鈍翁居鄉品高絕，士固不浪得名耳。」庸按：蔣藏園《臨川夢》院本《隱奸》一齣上場詩：「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蓋本東澗（錢謙益）語。其中描摹充隱奸險，不無過刻；至謂袁襄愍之殺毛文龍，因拒麋公粥文，而借香光以禍之，則《柳南隨筆》卷2同。張冠李戴，頗非事實。全謝山《鮚埼亭集外編》卷29〈跋東江事迹〉，已辨其妄。《嘯亭雜錄》卷10謂襄愍爲文敏門下士，非。傳奇中所演故事，寓言十九，不得謂藏園深文周內也。⁶⁷

⁶⁶ 陸以活，《冷廬雜識》，卷6，〈不繫園〉，頁315。

⁶⁷ 平步青，《霞外攬屑》，卷9，〈小棲霞說稗·臨川夢〉，轉引自《臨川夢》附錄三，頁233。

平步青先引清初人嚴若璩《潛丘劄記》對陳繼儒與汪堯峯（汪琬）的評價，以錢謙益認為陳繼儒「聊可妝點山林，附庸風雅」，認為汪琬亦如是。又以「仲醇御物才神絕，鈍翁居鄉品高絕，士固不浪得名耳」認為陳繼儒、汪琬沒有浪得虛名，對陳繼儒的妝點山林附庸風雅不抱任何負面看法。之後，平步青認為蔣士銓「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的描繪出於錢謙益描繪陳繼儒語，但是蔣士銓在〈隱奸〉中描述陳繼儒的借隱搏名、奸險貪利則又太過苛刻；復以毛文龍為陳繼儒所陷一事乃是張冠李戴並非事實。平步青認為蔣士銓的〈隱奸〉十九為寓言，以為蔣士銓對陳繼儒的描述為不根據事實肆意批判，有為陳繼儒抱不平之意。

亦有時人以為蔣士銓在〈隱奸〉中對陳繼儒的肆意抨擊，其實是在影射與蔣士銓同時代的袁枚，如蔣瑞藻《小說考證·拾遺》〈臨川夢〉中云：

尹文端再官江督，袁子才已罷官，被處士服，出入節署，又善以諧詞媚尹。材官騎士，折簡嘉招，蓋一日無子才不樂也。蔣心餘游江寧，文端招飲，坐客有子才及秦澗泉學士，分韻賦詩，澗泉詩先成，文端不以為佳。心餘次上，閱畢，不作一語。至子才時，則啟顏稱善。心餘陰有不嫌，所撰《臨川夢》，極詆眉公，云：「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名儘力誇。」又云：「翩然一隻雲間鶴，飛來飛去宰相衙。」隱然一子才也。錢受之《列朝詩集小傳》評眉公詩，取其便娟輕俊，聊可妝點山林，附庸風雅，心餘本此。牧齋稱眉公重然諾，饒智略，精心深衷，妙得老子陰符之術；又云：「交遊顯貴，接引窮約，茹吐軒輊，具有條理。」子才為人，亦頗近此。心餘雖以傳奇修文端私憾，實為子才作一重公案也。⁶⁸

蔣瑞藻以為蔣士銓大肆抨擊陳繼儒，乃是藉陳繼儒以諷刺袁枚。以蔣士銓遊走江寧

⁶⁸ 蔣瑞藻，《小說考證·拾遺》，〈臨川夢〉，轉引自《臨川夢》附錄三，頁238～239。

時，爲尹繼善所招，在文會中與秦大士、袁枚賦詩呈上尹繼善，卻被袁枚比下，心有不甘，作《臨川夢》〈隱奸〉以抨擊陳繼儒抒發自身怨氣。以〈隱奸〉所敘之陳眉公形象與袁枚十分接近爲由，認爲蔣士銓其實藉醜化陳繼儒而諷刺袁枚的行徑，以袁枚是個以隱搏名利的假隱士。當中，蔣瑞藻對於陳繼儒的看法不似前人只著重在「妝點山林，附庸風雅」的面向，其注意到錢謙益描繪陳繼儒其他方面，如重承諾、富謀略、心機深沈，深得《道德經》、《陰符經》謹戒大智若愚的養身之道，認爲陳繼儒與袁枚在某些方面很相近。

諸如此類說法，在清晚期有漸多之勢，此時士人不似之前士人把陳繼儒抽象化，將其視爲明末心學、附庸風雅社會與士風焦躁的代表人物，視陳繼儒爲明亡代表。此時能較心平氣和的看待陳繼儒，對陳繼儒於清中期遭到的刻意抨擊持著翻案態度，與清朝勢力衰弱，以及理學、考據學在乾嘉時期過於興盛，加上文字獄與四庫編修大量消耗讀書人精力，使得清晚期士人在面臨西方勢力入侵的壓力之下，有變革的觀念有關。對於許多人物評價多有重新考察，使陳繼儒於清中期的許多不良形象多有士子辯駁。且此時社會習尚由於鹽商於江淮的興起，與許多商幫的形成，使得社會風氣以商人品味爲主流，奢侈、古物收藏以及文人雅集流行於江南與京城一帶，使得此時社會有似晚明文化的跡象。時人對於陳繼儒的聲名亦不再認爲陳繼儒乃是一名不副實者，對於陳繼儒的雅致有所稱揚。

在此同時，隨著鴉片戰爭、自強運動、太平天國、英法聯軍等內憂外患的出現，當時救亡圖存之說喧囂塵上，士人自省，出現抨擊前人氣節、學問以砥礪反省自身的文字出現。而陳繼儒在清朝形象，以錢謙益所云爲人知曉，其作爲晚明社會妝點山林附庸風雅的典範，於此時被積極救國的士人當成標的以藉古說今。如方濬師《蕉軒隨錄 續錄》云：

宋神宗時司馬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倉臣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頤，敢言不如蘇轍、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倉臣許歸，乞依例致仕。」明崇禎時黃道周亦有七不如疏，以為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儒，樸心醇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鄴。愚謂光之所指諸人，皆正人也。揄揚諸賢之美，謙尊而光，頗為允洽。若道周所云不如者，陳繼儒不過裝點山林，附庸風雅，不知有何經濟，足備顧問。鄭鄴甫以罪誅，亦似不當陳之奏牘。錢謙益順治二年豫王入江南，首捧降箋，文章氣節掃地以盡。此論雖出之道周，然後世非皆無耳目人，究不敢為賢者諱也。本朝尹文端公繼善受知世宗，嘗召對，……嗚乎！有聖主，斯有賢臣。⁶⁹

方濬師以司馬光上疏宋神宗、黃道周上疏明思宗，以及清世宗召對尹繼善，說明有聖主斯有賢臣之意。以為黃道周七不如中的「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儒」與「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鄴」有過譽之嫌，認為陳繼儒不過是個妝點山林附庸風雅的文人，有何經世學問以備顧問；復以為鄭鄴、錢謙益品行有虧、氣節操守有問題，對黃道周的七不如有所疑問，以為後人都是明眼人，不敢替黃道周避諱。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舉君王皆有一共同點，即為都是勵精圖治，蓄意變革的君王，如宋神宗用王安石便法強國、明思宗的勵精圖治，以及清雍正的土地改革與埋首政事，可知方濬師的聖主標準在於有魄力的君王與有改革決心的聖主。並從其對陳繼儒、鄭鄴、錢謙益等人的抨擊，知曉方濬師希冀此時清朝有崇尚氣節經世士人為聖君所重用，以因應此時危局，以陳繼儒妝點山林、附庸風雅為厭，認為士人當經世致用、崇尚氣節，以富國強兵為主。

⁶⁹ 方濬師撰；盛東鈴點校，《蕉軒隨錄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2，〈不如〉，頁584。

大致上，清晚期士人對於陳繼儒的態度多持平視之，雖仍以陳繼儒為明末惡俗代表，但不會如清中期蔣士銓、四庫館臣般，視陳繼儒為萬惡根源，把一切明末社會惡俗歸於陳繼儒。可以清遺民劉聲木作為例證，以下舉劉聲木二則為例，如下云：

國朝程羽文撰《鴛鴦牒》，取古來男女不得其偶者，以意判斷，更為匹偶。……此等傷風敗俗之語，若出於口，人人唾棄，不謂竟有敢筆之於書，更出而問世。其倡亂導淫，有司當誅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以保存名教。……明季遭屠隆、桑悅、陳繼儒、祝允明、李贄、鍾惺、譚元春等狂徒，直欲蔑棄先王倫常，變更禽獸習慣。其流毒天下，深入人心，以致禍亂相尋，明社以屋。其流毒比之張獻忠、李自成，奚啻千萬倍。不待張李作亂，明季之人，心亡久矣，雖欲天下不亡，得乎。程羽文生當聖世，猶祖述其冀溺，奉為珍秘，以之搖感人心，穢亂天下。……其（王暉）非聖侮法，亦同於程羽文，仍沿明季狂悖之習，其人更可誅，其書更可燒矣。⁷⁰

劉聲木以明末清初時人程羽文所做《鴛鴦牒》為引，以其內容恣意配對古今男女，以成就才子佳人，認為傷風敗俗，以有司當燒書禁毀以維護名教。劉聲木以明末遭到屠隆、桑悅、陳繼儒等人提倡的率性真情與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影響，以為「欲蔑棄先王倫常，變更禽獸習慣」，導致「流毒天下，深入人心，以致禍亂相尋」，認為明末士人提倡真情與良知，使士人不以傳統為圭臬，導致明亡。甚至認為即便明末無張獻忠、李自成的叛亂，明朝也必定會滅亡。原因無他，即為綱紀禮教已失，根本既毀，國亡可待。

⁷⁰ 劉聲木撰；劉篤齡點校，《菴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隨筆》，卷4，〈論程羽文鴛鴦牒〉，頁71。

劉聲木生於清末之時，目睹清末危局與當時士人強調變法革新的混亂情況，於民國建立之後，以遺民心態緬懷清朝，以為清亡實與明亡一樣，皆亡於綱常敗毀，故藉批評陳繼儒等人，檢討清亡，寄託己心於其中。⁷¹然而，其對於陳繼儒表現的隱居山林一面則持讚賞態度，不會如清中期人對此視而不見甚至刻意抹黑，以較正面角度視之。如〈論臨川四夢不應醜詆陳繼儒〉云：

明末華亭陳仲醇茂才繼儒，當時與同邑董文敏公其昌同負盛名，以致論薦盈廷，屢次徵用。雖名過其實，學問文章，誠無足取，然其塵視軒冕，放浪山湖，復工書畫，亦未嘗無雅人深致。臨川湯□□□□顯祖《臨川四夢》中，極詞醜詆，殊為過當。茂才原與文敏齊名，文敏以書畫名天下後世，學問文章，實亦相伯仲，□□無一言詆毀，何歟？⁷²

上文，劉聲木以陳繼儒與董其昌齊名，且屢為朝廷徵用聲名遠播，雖然有名過其實之譏且學問文章不足取，然而陳繼儒的超脫俗世與工書畫使其有雅人深致之意。劉聲木認為湯顯祖《臨川四夢》極力詆毀陳繼儒實乃太過了，以為董其昌與陳繼儒不分上下，為何無人詆毀之？這代表劉聲木對於陳繼儒的定評，以陳繼儒雖然有諸多壞處，然而其至少仍存有些許雅致，不可因人而以偏蓋全。

至民國年間，由於國家分裂成南北政府，加上外患的侵略，使得知識份子面臨國危時局，不再對傳統綱常倫理抱著崇尚態度，開始思索如何適應民國這一新時代與新天地。而沿襲自晚清以來知識份子討論的中西交流，則使知識份子多有變革與揚棄舊時代的概念。其中，以陳獨秀於五四運動時所說的「打倒孔家店」，與魯迅所謂的「禮教吃人」最具代表，代表時人對於傳統文以載道的寫作風格，以及以禮

⁷¹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第四章 重建社會秩序：政治與文化的議論〉，頁 127～161。

⁷² 劉聲木撰；劉篤齡點校，《菴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五筆》，卷 3，〈論臨川四夢不應醜詆陳繼儒〉，頁 951。

教綱常束縛人性情的反動，故以胡適為主，提倡新文化運動，主張解放真情，擺脫傳統束縛，以白話文字書寫，強調我手寫我口的直率，同時也注意了里詞鄙謠等民間小調的流傳，以為這才是真正的文學。⁷³

知識份子以真性情為崇，對於道學家的思想情趣僵化極盡抨擊之能事，如林語堂於《吾國吾民》中所云：

一種卑劣的威風，道學先生所挾持以為國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緒的自由發展，而使小說中自由表現的觀點和情緒成為禁物，可是幽默只能在小說和天真觀點的領域上生存。……假使有誰要搜集一個中國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務必從民間歌謠、元劇、明代小說中選拔出來，這些都是正統學術柵垣以外的產物。⁷⁴


以抨擊道學家缺少幽默，限制士人自由發展空間，以為若要追求幽默，得追溯至民間歌謠、元劇、明代小說等源頭。故晚明以率性、真情為主旨的小品文成為時人模仿對象，開始重視小品文的刊印，配合新文化運動破除陳舊，解放思想桎梏以符合時代變革的旨趣，亦使陳繼儒、袁宏道等晚明小品名家被此時知識份子拿出來褒揚。影響所及，使得明末那套研習魏晉至宋元的優雅文化再次被此時知識份子所重視，如林語堂即在《生活的藝術》多有說明。當中，林語堂大讚傳統文人那套平靜、與自然相合，把生活溶於藝術當中的處世態度，以清朝張潮的《幽夢影》作為文人生活精髓所在。推崇傳統文人能於平凡中見不凡，以品茶、飲酒、插花與日常遊覽說明文人生活的雅。⁷⁵

⁷³ 可參見林語堂，《吾國吾民》（台北：德華出版社，1979），〈第七章文學生活〉，頁195～263。當中，林語堂以文學流變、中國文學本身的制度、文學思想等各方面，說明新文化運動的出現實與當時胡適、陳獨秀、周樹人（魯迅）等人強調真情不做作的白話文寫作息息相關。另亦可參見王鳳，〈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之關係〉，收錄於陳平原，王德威，商偉主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594～615。

⁷⁴ 林語堂，《吾國吾民》，〈第二章中國人之德性·幽默〉，頁64。

⁷⁵ 請參見林語堂，《生活的藝術》（台北：德華出版社，1979）。

此時由於白話文運動的大力推行，知識份子欲衝破儒家「文以載道」的思想牢籠，使得小品文獲得極大興盛。然而，清末民初這一階段，大體上一開始仍以中學西用為主軸，知識份子一方面吸收西方學術，一方面亦從傳統文化找尋改革力量，使晚明再度受到重視。⁷⁶自 1920 年代末以降，隨著軍閥混戰，國外打壓，民主制度在中國實行不順利，舊勢力依舊存在的陰影下，使大批知識份子對未來時局產生困惑，對於傳統文化無法因應救亡圖存，有進一步省思；而此時新思潮如德先生與賽先生與後來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亦傳入中國，使知識份子把焦點放在完全西化以加快現代化因應時局。但是，仍有些人以為傳統文化不可全棄，故內部意見不同而有分歧，使得新文化運動的推動改變。此種變化，可藉阿英（錢德富）於 1933 的《小品文談》中窺知一二：



一般的說來，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小品文——那時，是沒有這個名稱的，只是包含在隨感錄內，或者在創作的統稱之下，——是和其他的論文、小說、詩歌等等一樣的，是一種戰鬥的、反封建的工具。……小品文的產生，在新文學初期，並非是由於要做漂亮、緊湊、縝密的文章，是由於進步的需要，是由於有關社會改造的話要說。……要說成為漂亮、緊湊、縝密的文章，那是第一期後一階段的事。……第二時期的小品文，是和第一期一樣，仍不免是個人主義的。但是一方面是更進一步的風花雪月，一方面卻轉向革命。……第三時期的小品文，它的發展是驚人的。小品文作者進一步的有了非常明確的觀點，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要求更熱烈，而它短小精悍的體制也更有力量。……不過，小品文所能採用的說話的方式，一般的是和以前不同了。……近來的小品文，是沒有以前的坦白，在文字上，總是

⁷⁶ 關於晚明受到清末士人的重視，可見《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一書中所引用的論文，其導言亦明白表現出晚清與晚明之間的關係。簡言之，即為求新求變以因應世局動盪的大變。見胡曉真主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1），導言，頁 1~16。

彎彎曲曲，越弄越晦澀。⁷⁷

錢德富把小品文的發展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約於胡適、陳獨秀因八股文寫作使得當時士人思想僵化，無法因應新時代變化，故發動文學改良革命，以揚棄八股文，從晚明汲取心學理論，以真情率性行文，提倡似袁宏道、陳繼儒等人用淺顯文字行文，希冀藉此淺顯文字輸入西方文化以救國。錢德富認為白話文運動一開始的志向在於運用淺顯文字破除傳統八股封建文字，為中國注入新血以救國。

在 1920 年代邁入第二階段後，隨著此時內憂外患更進一步，加上民主科學思潮傳入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自強運動以降，國人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吸收西方文化的方式感到不足，出現反傳統言論，主張全部西化，以船堅砲利等物質文明為主軸，對傳統文化不屑一顧；然而，亦有以為傳統文化有美好之處，以為只學習西方物質文明，棄中國固有文化不顧是無法成功近代化的。主張中西合璧，藉吸收西方文化改善中國傳統文化。⁷⁸

此時對於陳繼儒評價亦有不同，有的著眼於陳繼儒清新飄逸的小品文與似《世說》的清言格談，對於陳繼儒讚譽有加；有的則拿陳繼儒的山人行徑做擋箭牌，逃避現實；亦有人繼續持清中期對陳繼儒評價，抨擊陳繼儒；也有為陳繼儒辯護者等等。以下可從錢德富於 1934 年的〈明末反山人文學〉所云窺知一二：

唐侯先生曾經引用過蔣苕生罵陳眉公的詩，說眉公「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名盡力誇。獼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鍾鼎潤煙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來飛去宰相衙。」這首詩的確是很刻毒的把

⁷⁷ 阿英（錢德富），《阿英文集》（香港：三聯書店，1979），第一冊，〈小品文談〉，頁 97～101。

⁷⁸ 此種中國近代化的爭論，可見羅志田，〈機關槍與線裝書——民初科學與國學的緊張〉，收錄於《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頁 241～254。當中藉民初主張學習西方科學強調船堅砲利，與主張國學淵源，借西方思想改良傳統國學兩派爭論，勾勒出民初知識份子對於救國革世的看法與變遷。

山人名士的原形醜態，暴露盡了。……所以「在不是時候」的時候，一面是山人名士的繁榮，一面也是反山人名士的加緊。拿明季說，陳眉公的遭受是如此，其他的人一樣的被襲擊。……現在時代雖然不同，新山人因著客觀而環境繁榮，新名士捐起招牌而搖擺，卻是彰彰在人耳目。……古人可以談，古文也可以談，問題是應該客觀，要拿陳死人來作自己的擋箭牌，這真是起明末諸公於地下，也知其非的。⁷⁹

以唐俟引用蔣士銓對於陳繼儒的惡評，以其為山人佼佼者，點出明末山人與反山人之間的關係。認為山人是一群對現實有著苦悶態度但又不敢以飛蛾撲火精神濟世，反而逃避現實的一群人，以隱遁為名逃避現實。錢德富以為季世風氣多此類人，藉此說明明末山人名士風的影響。以為明末至清中期真假山人名士之辨（即文中所謂山人與反山人），其實就是士人在面臨國家危急時所做的反應。有趣的是，錢德富認為不論山人或反山人，皆有所謂山人習氣，以清談隱遁山林為尚，只是濟世與對時局不滿之心比山人強大許多罷了。

最後，錢德富又以「現在時代雖然不同，新山人因著客觀而環境繁榮，新名士捐起招牌而搖擺，卻是章章在人耳目」以當時許多人以談論風花雪月等雅事為尚，部分革命激情不再者開始效法山人行徑，以陳繼儒為擋箭牌，認為自己乃是逍遙自在的山人名士，對此抱著強烈批評態度，以為此類人不應以陳繼儒作為自身墮落的藉口。同樣想法，在其〈說隱逸〉中以「隱逸，在本質上，就是對於人世的逃避。……逃的方法也有各種各樣的形式，而大部分是並不到山里去」，⁸⁰表達對隱逸避世的看法，以為此種隱逸其實多市隱，認為此種藉逃避現實沈迷清閑環境的心態，是駝鳥心態，以當今國危在即，日本侵略日漸，知識份子要堅決抗戰，不要再逃避現實一味防守。以明末山人為引，呼籲人民勇敢站起來抗戰。⁸¹

⁷⁹ 阿英，《阿英文集》，第一冊，〈明末反山人文學〉，頁164~167。

⁸⁰ 阿英，《阿英文集》，第一冊，〈說隱逸〉，頁151。

⁸¹ 阿英，〈說隱逸〉，頁151~152。同樣論述，亦可見阿英，〈吃茶文學論〉當中對於飲茶風氣所講求的風雅，並與隱士逃避做一對比，頁168~170。

1930 年代，隨著國共內戰與對日抗戰的紛擾，使知識份子出現類隱士逃避現實與積極抗戰兩種態度，同上論，魯迅〈隱士〉中亦以隱士並非真正隱於世，而是以隱求謀生的一種生活方式，說明亂世知識份子的生活抉擇。只是，魯迅以為這種生活方式只要彼此心照不宣，別拿來搏名講眾取寵，免得大受撻伐。魯迅以為陳繼儒被蔣士銓大肆抨擊其實是有點倒楣的，有為陳繼儒辯解之意。⁸²此亦為小品文發展的第三階段時期，開始朝向迂迴謹慎的文字敘述，不再具有過多的熱情，瀟灑一股苦悶心態。

清末到 1930 年代這一期間，隨著陳繼儒評價變遷，知識份子在面臨救國圖存與變革壓力之下，總共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即為中體西用，從傳統中國尋求變革借鏡以吸收西方經驗，因此晚明社會風氣與心學、經世學等思想變遷，成了焦點。尤其是清新飄逸的小品文更成為白話文運動的一大推行主力；而此時至 1920 年代，隨著中華民國建立，政府內部不安與列強依舊侵擾，復有五九國恥、復辟事件等內憂外患，人們迫切吸收西方文化以求中國近代化，隨著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傳入，導致民國 12 年所引發的科學人生觀論爭，即為中學西學衝突的體現。

這段時間中，對於陳繼儒的看法亦分成兩部分，有以陳繼儒為山人佼佼者，專講風花雪月，拿陳繼儒當擋箭牌；亦有以陳繼儒被清中期蔣士銓污名化，復被時人錯誤理解，對陳繼儒的隱士行為有所微言，替陳繼儒翻案以批評上述專講風花雪月者。在思想上，則有馮友蘭等主張新儒學，對於新文化運動更進一步推行，以傳統文化配合近代西方哲學說明傳統文化不可全棄。⁸³再至 1930 年代，隨著國共內戰、日本對華侵略日益明顯以及此時人民對於民主制度是否適合中國的疑惑，加以馬克思社會主義與其他思想的滲透，在亟欲變革的心態下，有主張全部西化，亦有許多

⁸² 周樹人（魯迅），《且界亭雜文二集》，〈隱士〉，收於《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六卷，頁 231～233。

⁸³ 此方面，可見馮友蘭，《一種人生觀》（香港：三聯書店，2006）與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等書。

左派作家以抨擊晚明山人隱士的逃避現實，以古諷今，主張積極抗戰，對於陳繼儒的看法在強調陳繼儒妝點山林大架子乃是一種時人的誤解，以此抨擊時人。由陳繼儒的形象變遷與時人對陳繼儒的敘述，勾勒出晚清以至民初這段時間，知識份子求新求變與對亂世未來的苦悶心態，以此作一耙梳。

小結：

討論山人與晚明文化的著作於今可謂充棟。然而，在進一步對山人群體變遷與晚明社會文化之間的關聯敘述中，總有遺珠之憾，無法面面俱到或有更深一步的討論。本章中以陳繼儒在明中期以降以至民國初年這一段時間的形象變遷為契，藉各時代對陳繼儒的不同評價，輔以時代背景，從中瞭解各時代的社會文化變遷。藉陳繼儒因時代演變，使時人在面臨自身反省或變革時，對陳繼儒的評價亦隨之變化，從陳繼儒形象變遷，理出一條清晰的社會文化變遷，為本章重心所在。

明中期以後，國家大事連連，使士人反省程朱理學的僵化，心學興起，以率性真情為尚，加以隱風盛行，社會瀰漫一股尚雅風尚，以享受人生追求自適為重。其中，以山人藉隱居山林之名，大行干游之實，在社會上佔有一席之地，造成士人以隱相誇，形成魏晉名士風尚。處於此時，陳繼儒優雅文化宗匠地位與隱居山林關心國事的品德，成為時人追求的典範。故此時陳繼儒形象與評價側重在其因書畫聞名藝壇與刊刻書籍，與隱居山中不輕易入城又關心國事方面。評價以「一代宗工」、「聖代逸民之首」為主，凸顯晚明盛行的名士風尚與山人文化與當時士人對於隱居與山人定義的心態。

清初，身處鼎革，許多士人對於明亡於崇禎有所困惑，反省明亡原因。基此，對於明末流行的名士風尚與優雅賞翫文化有著複雜心情，一方面自饑此種享樂文

化，以爲明亡於此；另一方面在明亡後仍依此生活方式不以爲意。⁸⁴不過，此輩皆以爲明亡於黨爭與處士橫議的弊端，認爲明末士人束書不觀，學問空疏又恣意妄言，此時陳繼儒於清初形象處於轉變階段。一方面，陳繼儒的聲名遠播與隱居山林幾不入城爲時人所稱讚；另一方面卻又指摘陳繼儒名不副實，藉詩文附庸風雅，以其沾染明末著書空泛惡俗，學問不佳。復因陳繼儒聲名鼎盛，朝廷屢徵不起，有徵君美名，清初士人卻以此作爲處士橫議的壞現象，以爲明亡壞於此，才有王應奎《柳南續筆》以毛文龍死於陳繼儒手上，把明亡歸罪於陳繼儒身上。因有此明亡反省論調，使清初士人有意無意地忘記陳繼儒在晚明對國家大事所做建議，反把焦點集中於陳繼儒刻書印刷，學問不佳空泛，然而對其隱士風範仍有好感，以「雖學問不無可議而其人固不易及也」作爲清初士人論定。

清中期，隨著程朱理學重新成爲朝廷主要思想，加上乾隆文字獄的出現與強調考證的樸學興起，使得乾嘉時代成爲考據學的主要天下，陳繼儒在清初所代表的明末束書不觀、著作空疏的形象更加擴大。加上此時自清初士子遺留的明亡反省，在朝廷宣傳之下，使得晚明優雅文化與山人現象成爲明亡主因，藉理學家與乾隆時期的四庫館臣之口道出。復由於清朝經過順康雍三朝的休養生息，加上康熙時的永不加賦與雍正朝的攤丁入畝解放人力，加上乾隆的愛好詩文與奢侈消費，社會上興起以淮揚鹽商爲骨幹，以奢侈與詩文交遊爲流行的社會風尚再度流行。朝野士人以今觀古，以明末社會風氣諷今，視陳繼儒爲晚明社會文化的佼佼者，以之爲替罪羔羊，反省明亡之外，更藉以諷今，抒發對此時社會糜爛的憂慮與抨擊。在此背景下，時人對陳繼儒的評價以蔣士銓《臨川夢》作爲代表，把陳繼儒完全描寫成一個以隱相高，藉山林隱士牟利求名，利用朝野清評干預時事，左右朝政的奸詐卑鄙之人。除有批評明末社會文化與士風之意，更有以古諷今的含意存在。對於陳繼儒的描寫，完全忽略其有利國家地方的建議，也忽略陳繼儒於晚明乃是時人眼中的真山人與當時假山人氾濫所引發的社會現象毫無關係這兩點，代表此時人把陳繼儒抽象化，以

⁸⁴ 此種自懺心情，可參見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頁187～248。

之抨擊古今的標語。

清末民初，由於此時國家社會內憂外患嚴重，士人復如晚明一樣，認為唯有變革才能濟世，強調變的精神，對於陳繼儒亦無清中期不客觀的看法，開始為陳繼儒平反，以為陳繼儒雖然附庸風雅、無心時事，然而人品不像清中期描述的那麼差。有趣的是，陳繼儒建白國家時事的策議，自清初以降無人提及，已完全為人忽略，造成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無人知曉陳繼儒濟世這一面，只是單純為陳繼儒在清初與清中期被時人認為的學問簡陋、人品卑下以及追名逐利的形象做辯解。即便到了民初時期，陳繼儒也只是作為提倡清新飄逸的真性情明末小品大家，以其優雅的藝術化生活被時人視為打破吃人禮教的工具；否則就是被視為在對日抗戰時期，關於和戰的爭議點上，被富救國熱情的知識份子當成抨擊和談、逃避現實者的武器，以那些和談者拿陳繼儒山人形象做擋箭牌為諷刺，抨擊此輩。雖然有提及蔣士銓對陳繼儒的污名化，然而對於陳繼儒的隱士行為不表贊同，以為此乃逃避現實之舉，對陳繼儒的評價可謂不冷不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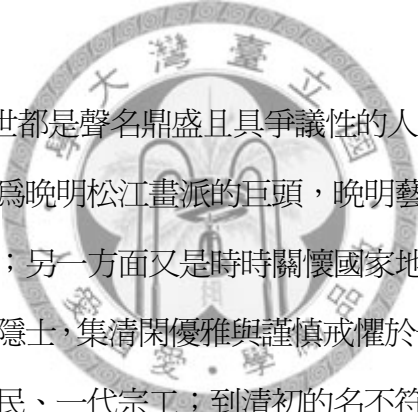
由陳繼儒於各時代的評價變化，看出隨著各時代社會文化與時代背景的不同，使得評價陳繼儒與其形象上亦有不同，藉著陳繼儒的形象變遷，看出自明末以降到民初整個時代背景的變化。從陳繼儒藝壇宗匠、聖代逸民的晚明高度讚美，到清初士人思索明亡與自身角色定義的學問不無可議而人固不易及，對陳繼儒學問批評與人品讚美的轉變階段；再至清中期蔣士銓以陳繼儒為隱奸，大肆抨擊明末社會文化，視陳繼儒為奢侈、附庸風雅習尚的表徵，以抨擊晚明文人流行的自主生活方式；最後，在清末民初知識份子革新求變的精神支持下，配合中西學應用階段，以陳繼儒作為傳統隱士與晚明崇尚真性情的小品大家者，也有以陳繼儒山人隱居行為者作為政局日益險惡逃避現實的擋箭牌者，充分看出陳繼儒於各時代被運用的情形。作為以古諷今的樣版，陳繼儒為我們提供觀察晚明至清的社會文化變遷，除了可以從中看到陳繼儒作為晚明社會文化的代表，在清朝思想文化的影響下，漸被污名化，以

此看山人角色的變遷。復從乾隆朝對於陳繼儒的大肆撻伐，從乾隆統治者的角度，說明陳繼儒為何為乾隆所厭，說明晚明士大夫在社會文化上的影響力，與在地方政治的影響力，以此說明為何陳繼儒會被視為晚明山人代表，且被刻意抹黑抨擊的原因。



結論

晚明可謂中國文人的黃金時代，此時文人生活於商業發達、富文化氣息的江南地區，每天流連於文社酒會及青樓曲坊，住在山林氣息濃厚的園林，遊走各地參與各樣文會與欣賞各地美景，可謂生活在享樂清閑當中。然而，此時也是明代政治最黑暗與國家地方最混亂的時刻，當中尤以天啓為最。士人身處亂世，有禮樂崩壞之憂，故有經濟天下之抱負，又因時勢關係，使得士人皆有謹慎避世心態。然而，此時也有士人以山人自稱，沈迷追求自適生活，以謀名求利攫取錢財，沈淪於享樂中，此種清閑與戒懼並存的現象，既為晚明士人心態的寫照，也是社會文化在面臨新舊轉變時所產生的現象。其中，以陳繼儒堪稱此種現象的代表人物。



陳繼儒，在晚明與後世都是聲名鼎盛且具爭議性的人物。其身份有山人、名士、隱士、徵君等等，一方面為晚明松江畫派的巨頭，晚明藝壇宗匠，同時亦為晚明清閑優雅的山林文化佼佼者；另一方面又是時時關懷國家地方大事，充滿經世救國念頭且屢拒朝廷徵辟的徵君隱士，集清閑優雅與謹慎戒懼於一身。而其形象更是多變，從晚明時人眼中的聖代逸民、一代宗工；到清初的名不符實附庸風雅之人；再至清中期人人喊打的隱奸、偽君子與萬惡山人代表；復於晚清民初時成為士人追求變革，反對傳統禮教禁錮的小品文大家。而在抗戰前後則又被知識份子視為當時求和軟弱份子的擋箭牌；直至今日，則又成為學者眼中研究晚明奢侈文化與文人清閑文化的代表者，以此作為大陸改革開放後，社會風氣習尚流傳的借鏡，以古鑒今，可見陳繼儒形象的多元化。

在陳繼儒眾多形象當中，最為人所知者即為山人與徵君這兩種。有趣的是，陳繼儒的山人與徵君稱號被後人認為是貶義與褒揚的代表，而此種印象的產生，實來自於明末清初至清中期社會文化變遷與當時士人心態轉變所致。而陳繼儒此種身份上的認定與特殊性，除了與社會變遷有關聯之外，亦與其本身清閑與戒懼的性格相

關。綜觀陳繼儒生平事蹟，可知其聲名崛起源於 29 歲科考兩次失利即棄舉業隱居山林，從此不以仕宦為熱，在當時社會士子以科考仕宦的風尚下可謂特殊。之後憑藉其文采與學問，交遊名家與王世貞、王錫爵、王衡、唐順之等著名文士相善，並且與董其昌齊名藝壇，成為松江畫派的大老人物，使得自身聲名水漲船高，加上屢拒徵辟，復以其關懷國家地方大事屢屢上書政府的行為聞名江南，憑藉其圓融又不阿附的處世態度，營建其人際網絡。以上種種，為陳繼儒享大名食清福的日子立下深厚基礎，成為陳繼儒廣為人所知的要因。

此種揉合清閑與戒懼心態的特殊性，除了出現在陳繼儒身上以外，在當時文人士人上亦可見其蹤跡，而這也是陳繼儒之所以聲名持久的一大原因。明中後期以後，隨著經濟發達，傳統生活方式已不符當時社會需要，使得時人價值觀有所轉變，舊價值觀漸毀，但是新價值觀尚未建立完成與為人所接受，士人在面臨自身價值實現，時常心中苦悶，而山人正是此時此種心態的先驅者。在商業發達與心學影響下，使得士人漸漸以實現自身為主，故有山人清閑優雅文化的出現且流行於社會；而在士人的心態轉換中，從李贄的狂者心態至袁宏道的由狂者向狷者過渡，再至陳繼儒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精神，繪出一幅明中後期在社會思想影響下的士人轉型圖像。而陳繼儒的狷者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調和精神，使其清閑與戒懼這兩種生活處世態度達到調和，心態常平和自得，使其成為山人與文人士人仿效的對象，故得以聲名遠播。

在討論陳繼儒此種清閑與戒懼雙面性與當時士人心態變化的關係後，從中可見陳繼儒與山人、士人之間的同異處。與前述所說陳繼儒的山人與徵君兩種形象的變化，配合明中後期社會文化做比較，以陳繼儒表現出來的聲名與清雅文化代表者形象，搭配明中後期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轉變，士商界線逐漸模糊，雅俗文化互相交流，使得以山林飄逸佈置的藝術化生活與風度受到時人喜愛，以此建立其清閑優雅的山人形象，成為晚明山林文化的佼佼者。同時，陳繼儒亦以熱心地方事務關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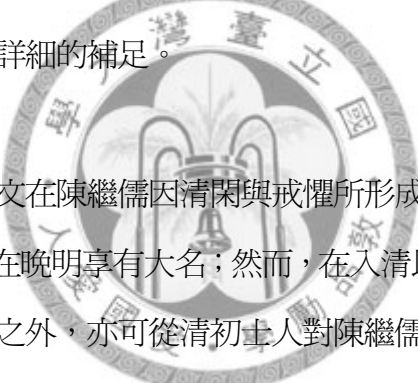
國家大事，屢拒朝廷徵辟，堅不仕宦，以此促成其徵君形象。藉此描繪陳繼儒山人與徵君形象與晚明江南社會的關聯，以此看出陳繼儒在時人眼中的觀感與其自身認知的差異，並以當中的差異說明陳繼儒的山人形象與為何時人少以山人目之的原因。

最後，以陳繼儒自明末以至民初這段時間的形象演變，說明陳繼儒在明末至清中期所奠定的惡名昭彰山人形象，是如何經由明末清初的易代士人反省明亡所產生的自懺意識；再到清中期隨著清廷有效打壓與學術思想氛圍的異變，使得朝野士人一致以陳繼儒為山人代表，成為晚明墮落文化的最大罪惡者。經由陳繼儒於晚明至清初形象的變化，配合鼎革之際的士人心態與社會風潮，說明陳繼儒如何從備受晚明士人尊敬的大名士大山人，成為清初以後人人喊打的學問低陋、以隱詐財的隱奸山人。在說明山人一詞於晚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所表示的意涵與時人對其之觀感後，復說明陳繼儒所處晚明時期的「真假山人」與「山人」和「山人行徑」的區別，說明山人一詞在晚明所代表的貶義實際上應為時人對「山人行徑」的厭惡，並以為此乃假山人，而真山人如陳繼儒者則為時人所敬重，且為社會上的大名士。直至清中期才為四庫館臣以晚明清閑優雅文化為明亡主因，以「山人」為晚明禮樂崩壞、士人無行的表徵，賦予山人貶義，且沿襲至今。

本論文主要討論內容在於藉由陳繼儒聲名崛起，見其清閑與戒懼的狷者精神，說明其形象變化，觀察晚明江南社會與士人對於山人定義與認知，藉由陳繼儒明末民初形象演變，著重在山人一詞於明末至清中期所產生的變化，駁斥當今研究陳繼儒者，以山人為陳繼儒貶義，沿襲清中期士人對山人定義的角度。說明明末所謂山人亂象實奠基於山人行徑汨濫的現象上，以此討論陳繼儒與山人研究的缺失，期以完整敘述清閑與戒懼這兩面性格，呈現陳繼儒完整的一面，探討明末社會自清中期乃至民初的一系列變化。

總結各家研究，本論文釐清陳繼儒與山人之間的關係，以陳繼儒為主線，說明

山人與山人行徑這兩個看似相同實則相異的面向，以陳繼儒被時人稱為山人與徵君這兩種名號，提出真假山人的問題，再來看山人崇拜現象，探討山人與晚明江南社會文化的關聯。從陳繼儒的自我認知與藉其清閑與戒懼的狷者精神，說明陳繼儒的個人形象與其與地方社會和國家的關係。復從陳繼儒的形象變遷，以晚明自民初此段時間，隨著社會文化與思想學術的變動，陳繼儒的山人與徵君意涵亦隨之變化，得出現今學者對於晚明山人亂象與抨擊的印象與山人定義，實乃受到清中期四庫館臣等士人的影響，以山人稱陳繼儒為貶義。但是，若從陳繼儒於清初至清中期的形象演變來看的話，其形象之所以變壞，其實不在山人一詞，而在山人行徑的汨濫與否，以此來看陳繼儒山人與徵君身份，以及晚明江南社會文化的影響。另外，晚明社會流行的山人崇拜現象與真假山人之辨，以及明末至清中期陳繼儒與山人形象如何被四庫館臣污名等議題，亦為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只是由於精力與學識不足，此一部分將等待以後再作一詳細的補足。



值得注意的是，本論文在陳繼儒因清閑與戒懼所形成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精神的基礎上，描寫陳繼儒在晚明享有大名；然而，在入清以後，卻飽受抨擊。當中，除了可見山人意涵的轉變之外，亦可從清初士人對陳繼儒的批評與清中期乾隆官方對陳繼儒禍害晚明的打擊這兩者不同的著重點來看。清初士人對於陳繼儒的批評主要在學問方面，以陳繼儒詩文不佳、著書不嚴，認為陳繼儒學問低下名不副實；但是，對於陳繼儒的人品仍抱以敬重。

到了乾隆時期，其抨擊陳繼儒之處，則主要體現在山人文化與陽明心學上頭，以為陳繼儒在當時聲名傾動天下，屢拒朝廷徵辟且在江南自成一派，成為江南地區社會文化的領袖人物。乾隆以為陳繼儒這麼做乃是挑戰朝廷威嚴，嚴重威脅當時統治者地位；所以批評焦點主要集中在陳繼儒引發的山人流行文化與山人名士崇拜現象，以及士人交結地方官員干預地方政事，對於陳繼儒的山人身份進行批評。這也是為何陳繼儒的山人身份在乾隆朝時被朝野士人一致污名化的原因了。由此來看山

人在現今學者所形成的普遍壞印象，即可得到解釋。

總之，本論文在立基陳繼儒的清閑與戒懼雙面形象上，得出其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狷者精神，配合當時士風流變，描述陳繼儒與山人和當時士人的同異處，配合當時江南社會文化背景影響，釐清陳繼儒山人與徵君這兩種稱號所帶來的身份定位。以陳繼儒在其生存年代的所作所為，討論真假山人與山人崇拜的問題，以陳繼儒是真山人為例，釐清「山人」與「山人行徑」之間的差別，得到山人在晚明不是一味代表負面意義。但是，在清朝因政治社會與學術環境改變的影響下，使得在乾隆時期以山人作為晚明墮落、毀滅的代表。尤其是乾隆皇帝的特別討厭陳繼儒，以為陳繼儒乃士人不良典範，認為陳繼儒憑一己名聲，成為江南一地最負盛名之士，在地方與中央皆享有盛名，恣意品評朝政，認為此風不可長，此種名士社會使得政府在推行政令須其配合，危害中央政權，所以對於此種名士風尚的佼佼者陳繼儒特別厭惡，以之為典型大力抨擊此種習尚，稱之為山人習氣，所以此種山人污名化的出現，其實亦與陳繼儒在晚明聲名大噪有所關聯。本論文以陳繼儒為引，導出山人觀念在晚明至現代的轉變，結合陳繼儒與山人之間的聯繫，重新討論山人的定位與晚明江南社會文化對於清朝的影響。

在漫長寫作當中，本論文從陳繼儒的形象變化看到了山人的定義轉變與陳繼儒山人身份的變遷；然而，迫於篇幅與學識，使得有許多可以補充的細節，諸如詳談清朝在面對晚明江南此種以詩文干謁、名士相尚的社會風氣與文化時的態度，與山人在乾隆時期大肆為朝野士人所抨擊的現象探討等議題，無法在本論文中作進一步論述，希望以後有機會時能更進一步論述大量清人筆記與二手研究，期望對明清社會文化做出貢獻。



附錄一

陳繼儒年表與明代大事記

嘉靖 37 年，陳繼儒 1 歲	父陳濂石 39 歲。
嘉靖 39 年，陳繼儒 3 歲	妻衛氏出生。
嘉靖 40 年，陳繼儒 4 歲	好友王衡生。 太湖、東南地區大水災，為明朝嘉靖以前最大的一次。
嘉靖 45 年，陳繼儒 9 歲	向周雲汀學習，並自己私號半石山人。
隆慶元年，陳繼儒 10 歲	浙江巡按龐尚鵬於浙江推行十段錦(一條鞭法前身)。
隆慶 2 年，陳繼儒 11 歲	跟隨大哥陳紹儒一同唸書。
隆慶 4 年，陳繼儒 13 歲	始習學子藝。
隆慶 5 年，陳繼儒 14 歲	旁及五經子史，慕戰國策不得，誤從總戎家借之，後手摘一冊以藏。
萬曆元年，陳繼儒 16 歲	拜何三畏(何繩武)為師。 張居正任首輔。
萬曆 2 年，陳繼儒 17 歲	
萬曆 3 年，陳繼儒 18 歲	
萬曆 4 年，陳繼儒 19 歲	友王思任(王季重)生。 張居正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
萬曆 5 年，陳繼儒 20 歲	行冠禮。 發生張居正奪情事件。

萬曆 6 年，陳繼儒 21 歲	<p>參加童子試，華亭縣令楊東野奇賞之，得第一名。</p> <p>徐階與陳繼儒講時習之學，讚嘆不已，與徐階相交。</p>
萬曆 7 年，陳繼儒 22 歲	<p>娶妻衛氏，母亡。</p>
萬曆 8 年，陳繼儒 23 歲	<p>教書於王昇之家，與唐元徵、董其昌、方應選、何士端等人結成十八子社，互相切磋學業。</p>
萬曆 9 年，陳繼儒 24 歲	<p>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p>
萬曆 10 年，陳繼儒 25 歲	<p>赴科舉於南京。</p> <p>張居正逝世。</p>
萬曆 11 年，陳繼儒 26 歲	<p>館于王錫爵家，與王衡讀書支硎山。</p> <p>結交太原四王（王世貞、王世懋兄弟與王錫爵、王鼎爵兄弟）。</p>
萬曆 12 年，陳繼儒 27 歲	<p>鄉試考試失利，開始視功名如嚼蠟。</p>
萬曆 13 年，陳繼儒 28 歲	<p>與王衡一同參加應天兆試，復在閏九月時，王世貞招飲於弇園飄渺樓。</p> <p>發生渾河之戰。</p>
萬曆 14 年，陳繼儒 29 歲	<p>棄青襟，作《告衣巾呈》。與朋友徐孟孫隱居小崑山，建乞花場供奉陸機、陸雲，且有王世貞撰記。</p> <p>歲大祲，上書政府，請蠲賑。</p>
萬曆 15 年，陳繼儒 30 歲	
萬曆 16 年，陳繼儒 31 歲	<p>歲大饑，設館沈氏荒圃，為當時何園觀濠堂。</p> <p>潘季馴治理黃河。</p>

萬曆 17 年，陳繼儒 32 歲	延續前年荒災，顧正心捐租十萬以助役，陳繼儒居中謀畫。 顧憲成來訪，以父母不朽見屬。
萬曆 18 年，陳繼儒 33 歲	與顧憲成同舟至秀州遊玩。
萬曆 19 年，陳繼儒 34 歲	徐階子徐澤夫贈田五十畝為館廩。是年，遂同事澤夫于徐階之水西園。
萬曆 20 年，陳繼儒 35 歲	萬曆三大征之一的寧夏之役。 萬曆三大征之一的第一次朝鮮之役。
萬曆 21 年，陳繼儒 36 歲	三王並封事件。
萬曆 22 年，陳繼儒 37 歲	擬臨場十策，有藉以列科第者甚眾。 三月郡文學就試荆溪，與孟直夫郊居，合編《香案牘》。
萬曆 23 年，陳繼儒 38 歲	寶顏堂秘笈付諸刻印。 六月初四過項又新。 十月初四日去吳伯度家。
萬曆 24 年，陳繼儒 39 歲	五月，負館南湖，纂《建文史待》成。因屠叔方題請革除諸公，遜其署名，刻行于世，請羅文崗寫小炤，陸平泉手題。 礦監稅使為禍。
萬曆 25 年，陳繼儒 40 歲	建婉變草堂與讀書台於小崑山上。
萬曆 26 年，陳繼儒 41 歲	蒐集史書野史漏記事物成書《見聞錄》。 萬曆三大征之一的第二次朝鮮之役。
萬曆 27 年，陳繼儒 42 歲	選論膾刻於書肆。
萬曆 28 年，陳繼儒 43 歲	顧憲成及諸名賢，招陳繼儒入東林講社，謝不往。 萬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萬曆 18

	年到 28 年)
萬曆 29 年，陳繼儒 44 歲	刻《逸民史》於新都吳氏（吳懷謙）。 第一次蘇州民變。
萬曆 30 年，陳繼儒 45 歲	父陳濂石亡
萬曆 31 年，陳繼儒 46 歲	刻《品外錄》于婁江。 妖書案。
萬曆 32 年，陳繼儒 47 歲	
萬曆 33 年，陳繼儒 48 歲	常熟縣令耿橘翻新子由祠，建絃歌樓，延四方理學名公開講社，邀陳繼儒同講，陳繼儒以生病婉拒前往。
萬曆 34 年，陳繼儒 49 歲	沈德先、沈孚先假陳繼儒名編纂《寶顏堂秘笈正集》、《眉公雜著》出版。
萬曆 35 年，陳繼儒 50 歲	章公觀割董山四畝相贈。 王錫爵密揭案發生。（見萬曆野獲篇第九卷〈王文肅密揭之發〉）
萬曆 36 年，陳繼儒 51 歲	松江發生大災荒，首倡粥場於天馬山，賑濟災民，上書政府，作有《煮粥條議》。 頒佈《條議制澳十則》（或稱《制澳十則》）。
萬曆 37 年，陳繼儒 52 歲	楊庭筠薦舉陳繼儒。
萬曆 38 年，陳繼儒 53 歲	集合眾文人重修泖橋澄鑿寺，並作記。 刻《丹淵集》。
萬曆 39 年，陳繼儒 54 歲	方孝儒祠求忠書院落成，作《求忠書院記》。
萬曆 40 年，陳繼儒 55 歲	
萬曆 41 年，陳繼儒 56 歲	王時敏請陳繼儒刪訂王錫爵藏稿，成《文草》、《奏草》、《牘草》三集。

萬曆 42 年，陳繼儒 57 歲	
萬曆 43 年，陳繼儒 58 歲	梃擊案。
萬曆 44 年，陳繼儒 59 歲	摹勒東坡帖二十八卷，刊刻《晚香堂蘇帖》。 發生民抄董宦（董其昌）事件。
萬曆 45 年，陳繼儒 60 歲	陳繼儒八月至白門，與鍾惺定交。 青浦縣令舉鄉飲，請陳繼儒主持，以年老辭。
萬曆 46 年，陳繼儒 61 歲	建老是菴。 發生薩爾滸之戰。
萬曆 47 年，陳繼儒 62 歲	
泰昌元年，陳繼儒 63 歲	江南名妓王微來訪。 晚明三大案之紅丸案。 晚明三大案之移宮案。
天啓元年，陳繼儒 64 歲	
天啓 2 年，陳繼儒 65 歲	章允儒欲於郡城西南建城。陳繼儒以為經費短缺、作工繁雜，又值民窮財絀，且城內外的民墳、居房不便遷移，以金山衛改州改縣，作《金山衛議》。 廣寧之戰，王化貞、熊廷弼大敗。
天啓 3 年，陳繼儒 66 歲	妻衛氏亡。 吳牲薦舉陳繼儒。 作《建州考》。 毛文龍亮馬佃大捷。
天啓 4 年，陳繼儒 67 歲	與徐霞客結識。 與董其昌、冒辟疆唱和。

	福建巡撫南居益派兵前往澎湖驅逐佔據的荷蘭人。(見〈賀福建大中丞二太南公盪平紅夷序〉)。
天啓5年，陳繼儒68歲	熊廷弼被殺，傳首九邊。 魏忠賢誣陷左光斗、楊漣、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等人貪贓，打入大牢。
天啓6年，陳繼儒69歲	袁崇煥寧遠大捷。 第二次蘇州民變。 魏忠賢殺害高攀龍、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等人，為六君子慘事。
天啓7年，陳繼儒70歲	憨山、扈芷訪陳繼儒於白石山。 王時敏歸里，董玄宰、陳繼儒走訪南園繡雪堂見之。 袁崇煥寧錦大捷。 陝西王二起義。
崇禎元年，陳繼儒71歲	黃宗羲袖長錐草疏入京訟冤，過杭州遇繼儒，為隨筆改定。 修《松江府志》。
崇禎2年，陳繼儒72歲	袁崇煥殺毛文龍。 高迎祥起兵。 第一次己巳之變，清軍攻陷遵化。
崇禎3年，陳繼儒73歲	何喬遠薦舉陳繼儒。 《松江府志》修成完稿。 建菜香庵。
崇禎4年，陳繼儒74歲	吳永順薦舉。 發生大凌河之役，明將祖大壽城破降清。

	<p>吳橋兵變（毛文龍的部將孔有德、耿仲明 人等在登州兵變，明朝派兵四萬，圍攻山 東重鎮登萊二州。不久，孔有德、耿仲明 率部投降皇太極，成為日後清軍強大的武 裝部隊。）</p>
崇禎 5 年，陳繼儒 75 歲	<p>作《惠桂二王祿米議》，解決松江人民祿 米進貢的困擾。</p>
崇禎 6 年，陳繼儒 76 歲	<p>魏士章薦舉。 章公觀贈山四畝。</p>
崇禎 7 年，陳繼儒 77 歲	<p>《五人墓義助疏》碑立。</p>
崇禎 8 年，陳繼儒 78 歲	<p>黃道周奏疏提及陳繼儒。</p>
崇禎 9 年，陳繼儒 79 歲	<p>撰《時藝》十餘首，又與吳長卿問析書義 十餘章。 第二次己巳之變，清軍攻陷保安、萬全。 山西大饑。 李自成自號闖王。</p>
崇禎 10 年，陳繼儒 80 歲	<p>解學龍薦舉。 建古香庭院。 松江人民以布代繳賦稅，但是解送過程過 於繁雜，人民耗費財力過多，不堪負荷， 作《布稅議》。 第三次己巳之變，清軍攻陷昌平、保安。 高迎祥被磔死。</p>
崇禎 11 年，陳繼儒 81 歲	<p>屏跡東侖，猝聞流寇披猖，官員欲折毀城 濠民房防賊，人民一時震動。陳繼儒向方 岳貢陳情制止，城內外民房得以平安無</p>

	<p>事。</p> <p>第四次己巳之變，清軍攻陷遵化、古北口、將軍石關、平谷城。</p> <p>張獻忠偽降。</p>
<p>崇禎 12 年，陳繼儒 82 歲</p>	<p>陳繼儒亡。</p> <p>皇太極松錦大捷，洪承疇投降。(崇禎 12 ~15 年)</p>



徵引文獻書目

一、原始資料：

1、正史實錄（依年代與作者筆畫排）

(劉宋)范曄撰，《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5)。

(宋)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等合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5)。

(明)方岳貢修；陳繼儒等纂，《(崇禎)松江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明)卓鈿修；王圻等纂，《(萬曆)青浦縣志》(北京：中國書店據明萬曆年間刻本影印，1992)。

(明)顧秉謙修，《明神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6)。

(清)宋如林修；孫星衍纂，《(嘉慶)松江府志》(台北：成文書局據清嘉慶22年(1817)松江府學明倫堂藏版刊本影印，1970)。

(清)陳其元修；熊其英等纂，《(光緒)青浦縣志》(台北：成文書局據光緒5年(1879)刊本影印，1970)。

(清)楊開第修；姚光發等纂，《(光緒)華亭縣志》(台北：成文書局據光緒4年(1878)刊本影印，1970)。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5)。

2、雜史與筆記小說（依年代與作者筆畫排）

(南朝宋)劉義慶撰；徐震堦著，《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4)。

(明)文震亨撰；海軍、田君注釋，《長物志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明)王士性撰；呂景琳點校，《廣志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明)沈德符撰；楊萬里校點，《萬曆野獲編》，收錄於《明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冊。
- (明)陳貞慧，《山陽錄》，收錄於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91)，第127冊。
- (明)陳繼儒，《妮古錄》，《寶顏堂秘笈》(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第20冊。
- (明)陳繼儒，《巖栖幽事》，《寶顏堂秘笈》(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第21冊。
- (明)陳繼儒，《太平清話》，《寶顏堂秘笈》(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第21冊。
- (明)陳繼儒，《安得長者言》，《寶顏堂秘笈》(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第22冊。
- (明)陳繼儒，《佘山詩話》，收錄於(清)曹溶輯；陶越增訂，《學海類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第19冊。
- (明)陸容撰；李健莉校點，《菽園雜記》，收錄於《明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冊。
- (明)程羽文著，《清閒供》，《筆記小說大觀 五編》(台北：新興，1974)，第5冊。
- (明)鄒漪，《啓禎野乘》，收錄於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91)，第127冊。
- (清)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方濬師撰；盛東鈴點校，《蕉軒隨錄 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清)平步青，《霞外攬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清)朱彝尊撰；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 (清)李漁撰；王連海注釋，《閑情偶寄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
- (清)谷應泰編纂，《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以順治十五年筑益堂本為底本參校各版本所成，1977)。
- (清)昭璉，《嘯亭雜錄 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清)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查繼佐著，《罪惟錄》，收錄於《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

(清)柴萼撰，《梵天廬叢錄》，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 十七編》(台北：新興書局，1977)。

(清)陸以湉撰；崔藩芝點校，《冷廬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黃宗羲撰，《思舊錄》，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85)，第26冊。

(清)張岱撰；于學周、田剛點校，《陶庵夢憶》(青島：青島出版社，2004)。

(清)黃嗣艾，《南雷文案》，收錄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85)。

(清)劉聲木撰；劉篤齡點校，《長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

(清)談遷著；張宗祥點校，《國權》(北京：中華書局，2005)。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台北：世界書局，1985)，丁集下，〈陳徵士繼儒〉。

(清)蔣士銓撰；邵海清校注，《臨川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清)蔣瑞藻，《小說考證·拾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文人文集 (依年代與作者筆畫排)

(晉)嵇康撰；崔富章註譯；莊耀郎校閱，《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1998)。

(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十七冊，收於沈雲龍輯，《明人文集叢刊》第一輯(台北縣：文海，1970)，第22冊。

(明)王衡，《王綏山先生集》，收錄於沈雲龍選輯，《明人文集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第27冊。

(明)王穉登，《屠先生評釋謀野集 四卷》(美國：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攝製，2004)，卷一元集，〈答大鴻臚張公〉。

(明)李贄撰；張建業主編；劉幼生副主編，《焚書》，《李贄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明)袁中道，《珂雪齋前集》(台北：偉文影印，1976)。

- (明)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明) 唐順之，〈答王遵巖〉，《荆川集》，卷7，收於盛宣懷輯，《常州先哲遺書》(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第15冊。
- (明) 陳繼儒，《陳眉公先生全集》(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崇禎12年華亭陳繼儒家藏明刊本)。
- (明) 陳繼儒，《晚香堂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66冊。
- (明) 陳繼儒，《白石樵真稿》，收錄於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66冊。
- (明) 陳繼儒，《陳眉公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萬曆43年刊本)，1380冊。
- (明) 陳繼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中國古代小品精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2005)。
- (明) 陳子龍，《安雅堂稿》，收錄於《明代論著叢刊》第三輯(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
- (明) 陳子龍撰；施蛰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明) 馮夢龍編；陸國斌校點，《馮夢龍全集》第十八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 (明) 董其昌，《容臺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
- (明) 薛岡，《天爵堂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陸輯第25冊。
- (明) 鍾惺撰；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清) 顏元撰；王星賢、張芥塵、郭征點校，《顏習齋言行錄》，《顏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4、其他（依年代與作者筆畫排）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漢民整理，《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23冊。

（明）王澐著，《雲間第宅志》，收於《百部叢書集成》（台北：藝文印書館，1968），564冊《藝海珠塵》13。

（清）永瑢、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臺灣商務萬有書庫本，1965）。

（明）陳夢蓮，《眉公府君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第53冊。

（明）曾異，〈送林守一重游吳越序〉，收錄於黃宗羲編，《明文海》（北京：中華書局據原涵芬樓藏鈔本，1987），第3冊，卷296。

（明）蔡清撰；（明）莊煦編，《四書蒙引》，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1983），206冊。



二、近人研究：

1、專書（依作者筆畫排）

（1）中文著作

毛文芳，《晚明閒賞美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

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史小軍，《復古與新變：明代文人心態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林語堂，《吾國吾民》（台北：德華出版社，1979）。

-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台北：德華出版社，1979）。
- 周樹人（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胡曉真主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1）。
- 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會交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夏咸淳，《情與理的碰撞：明代士林心史》（保定：和北教育大學出版社，2001）。
- 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
- 喬傳，《明代文化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
- 張德建《明代山人文學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 馮友蘭，《一種人生觀》（香港：三聯書店，2006）。
-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錢德富（阿英），《阿英文集》（香港：三聯書店，1979）。
- 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2）日文著作

- 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都：研文出版，2004）。
- 酒井忠夫，《增補中国善書の研究》（東京都：國書刊行會，2000）。

（3）英文著作

- Brook, Timothy.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繁體譯本請參見方駿、王秀麗、羅天佑等譯，《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Clunas, Craig.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Greenbaum, Jamie. *Chen Jiru (1558-1639): The Background to Development and Subsequent Uses of Literary Personae*. Leiden ; Boston : Brill, 2007.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期刊論文（依作者筆畫排）

(1) 中文期刊論文

王春瑜，〈明代山人面面觀〉，《紫禁城》，2007：08，頁 28～41。

王鳳，〈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之關係〉，收錄於陳平原，王德威，喬偉主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594～615。

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2005），頁 1～54。

王鴻泰，〈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錯雜〉，《新史學》，17：4（2006），頁 73～141。

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新史學》，11：3（2000），頁 1～47。

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0（2002），頁 1～57。

王正華，〈從陳洪綬的〈畫論〉看晚明浙江畫壇：兼論江南繪畫網絡與區域競爭〉，《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頁 329～379。

李斌，〈晚明「山人」與晚明士風——以陳眉公為主線〉，《學術月刊》，38：6（2006），頁 142～147。

吳承學、李斌，〈明清人眼中的陳眉公〉，《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3：1（2003），

頁 1~7。

吳承學、李斌，〈隱逸與濟世——陳眉公與晚明士風〉，《中國文化研究》，2005 年春之卷，頁 68~81。

吳承學、李光摩，〈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文學遺產》，1997：6，頁 65~75。

巫仁恕，〈明代士大夫與轎子文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8（2002），頁 1~70。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頁 87~144。

巫仁恕，〈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徑與新問題〉，《新史學》，17：14（2006），頁 217~254。

阿英，〈明末反山人文學〉，《阿英文集》（香港：三聯書店，1979），第一冊，頁 164~167。

林宜蓉，〈晚明文藝社會「山人崇拜」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39（1995），頁 633~747。

林麗月，〈晚明的消費與文化〉，《明清史研究》（漢城：明清史學會），20（2004），頁 197~215。

林麗月，〈《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收於陳國棟、羅彤華主編，《經濟變動》（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05），頁 244~259。

夏咸淳的〈論晚明隱士陳繼儒〉，《天府新論》117（2004），頁 131~135。

徐林，〈明代中後期隱士與山人之文化透析〉，《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4（2004），頁 137~141。

陳萬益，〈論李卓吾與陳眉公——晚明小品作家的兩種典型〉，《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頁 85~116。

陳寶良，〈晚明生員的棄巾之風及其山人化〉，《史學集刊》，2000：2，頁 34~39。

陳寶良，〈明代生員層的經濟特權及其貧困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2，

頁 57~64。

張靜秋，〈陳繼儒的文化性格與成因〉，《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6：1（2000），頁 91~94。

張靜秋，〈晚明山人的文化風貌與文化建構〉，《安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1：4（2002），頁 41~44。

張德建，〈隱士、才子、山人、名士——明代山林之士的群體變遷及其文化意義〉，收於羅宗強；陳洪主編，《明代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頁 33~43。

張德建，〈末世的名士風度——陳繼儒芻議〉，《中州學刊》，151（2006），頁 224~227。

趙軼峰，〈山人與晚明社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1，頁 8~16。

劉曉東，〈「地位相悖」與「身份懸浮」——生存狀態視角下的明代士人社會地位芻議〉，《社會科學戰線》，2003：02，頁 97~102。

劉曉東，〈世俗人生：儒家經典生活的窘境與晚明士人社會角色的轉化〉，《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7：5（2001），頁 121~126。

劉曉東，〈科舉危機與晚明士人社會的分化〉，《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頁 103~108。

劉曉東，〈三教合一思潮與三一教——晚明士人學術社團宗教化轉向的社會考察〉，《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1，頁 21~27。

羅志田，〈機關槍與線裝書——民初科學與國學的緊張〉，收錄於《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241~254。

（2）日文期刊論文（依作者筆畫排）

金文京，〈晚明山人俞安期的活動〉，2006年10月6~7日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的 City Life in Jiangnan: From Late Imperial to Early Modern China 會議論文。

金文京，〈晚明山人之活動及其來源〉，《中國典籍與文化》，1997：1，頁 37~42。

金文京，〈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知识人の性格——明代の山人を手がかりとして〉，
《(日) 中國史學》，第7號，〈思想、文化史專號〉，1997，頁193~198。

鈴木正，〈明代山人考〉，《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大安株氏會社，
1962）。

3、博碩士論文（依作者筆畫排）

李鳳萍，《晚明山人陳眉公研究》，台北：東吳大學碩士論文，1984。

李復滿，《陳繼儒《晚香堂小品》研究》，香港：香港大學碩士論文，1996。

李菁，《晚明文人陳繼儒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

李斌，《陳眉公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03。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台北：國立臺灣大
學博士論文，2005。

徐麗莎，《陳繼儒(1558~1639)及其繪畫思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1999。

趙楠，《陳繼儒——晚明士風的一項個案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